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国际史

第一卷

[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著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上海译文出版社

Julius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Band 1

Verlag J. H. W. Diets Nachf. GmbH

Berlin · Bonn 3. Auflag 1978

根据柏林一波恩迪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三版译出

国 际 史

第 一 卷

〔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 著
核寿国 孙秀民 汤成永 桂乾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发行所属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任屯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15.625 字数 365,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册

书号：11188·42 定价：3.05元

内 部 发 行

为纪念友人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而 作

译者的话

三卷集《国际史》，是系统记述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来至1964年为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部专著。

作者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是奥地利人，1891年生于维也纳，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炮兵军官，后任奥地利国防部长副官，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先后在维也纳和伦敦担任过编辑和主编工作。布劳恩塔尔参加过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席过历次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任记录员，并一度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书记助理；1949年底至1956年，以社会党国际书记身份致力于国际的重建工作。此后为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劳工运动》(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发行人，写有或编辑出版了多种有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著作。1971年2月，奥地利联邦总统向布劳恩塔尔授予教授证书，以表彰他从事写作活动，特别是在撰写《国际史》中作出的贡献。

《国际史》的写作完成于1961年至1971年，由柏林一波恩迪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三卷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卷(初版于1961年，1974年再版)分三部分。主要通过追溯1789年法国大革命，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民主社会思想和运动，记述第一、第二国际的成立经过、原则和主张、斗争和发展，以及重大事件的始末，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瓦解和修正主义的出现。这一段国际史持续了近五十年之久。

第二卷(初版于1963年，1974年再版)分为六部分。主要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斗争，包括

重建社会主义国际所作的努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立，中欧、东欧一系列国家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两个国际的分歧和争斗，直至法西斯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个国际双双解散。这一卷前后概括了近三十年的历史。

第三卷（1971年出版）包括五个部分。着重介绍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而战斗，战后逐渐发展形成“冷战”对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及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它们的活动、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巨大发展以及各国运动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实践和存在的问题，苏联政局的演变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事件，以及中苏分歧等等。在本卷的最后一部分，对国际第一个百年史进行了回顾和小结，展望了社会主义前途和人类的未来。

每一卷的卷末均附有本阶段运动的重要历史文件、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及领导人一览表、人名索引和内容索引。第三卷卷末还附有介绍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实力统计表。

作者凭借多年亲身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丰富阅历，以及参与社会党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有利条件，运用大量的史料，包括某些迄今从未公布过的资料，系统地叙述了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的召开、原则、分歧，和经过协商或斗争所作出的决议，从而反映出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流派”的活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较量。他把国际史跟不同历史时期世界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密切联系起来，纵谈各国运动的成果、出现的反复、经受的挫折和失败。作者在概述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总的发展进程和探讨一些国家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的同时，提出了他

自己的见解。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党人的见解，他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并从他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第一国际所坚持的革命社会主义抱有某些不同看法；对列宁的若干世界革命理论和策略，对共产国际的主张，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在苏联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作了否定的评价乃至严厉抨击。他借口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互不一致”，笼统地解释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性分歧。作者对中国革命给予肯定，但在论述中苏分歧时，则曲解为“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利益冲突”，说什么中国旨在谋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谈到中印边界冲突时，竟说是中国“入侵印度”，等等。此外，作者为论证自己的见解而引用文献史料时，往往也暴露出带有倾向性的痕迹。所有这些，读者都必须注意及之。

作者承认，本书的缺点之一，是对非洲和中、南美洲的社会主义缺乏探讨。三卷集《国际史》事实上是以欧洲为中心，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作者的祖国奥地利）的运动，叙述不厌其详。在第三卷中，虽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专题介绍了亚洲的运动，但也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国家，而非洲和拉丁美洲竟在正文中几乎只字未提，相反却花了很大篇幅专题谈到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并给予很高评价。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当然不在于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精力有限和非洲、拉丁美洲的有关资料不足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作为社会党人的根本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社会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处在工业化前的国家，还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述，其中有不少是从其他作者的著作中转引过来的，对此，我们一一查对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中译本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发现在文字上常有不完全相吻合的

地方。凡是引文与中译本出入较大的，我们原则上仍按原著译出，同时在译注中说明“参见”或“自译”等字样，以资识别。

书中出现的国际史上有关人物、政党、组织机构、报刊以及地名等专有名词，我们原则上均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中译本译法译出，尽管其中有一些今天看来译法不一定完全妥当，但可能更便于专门从事国际史研究工作的读者阅读。

三卷集《国际史》涉及的人名众多，我们发现原著中有少数人名的拼写前后不一致，或正文中出现的与书末人名索引中出现的的不相一致，但由于这些人名牵涉到许多不同语种，我们一时无法逐一核对核实，只得按原文译出或保留原文形式。

译者限于水平，特别是对国际史缺乏了解和研究，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4年4月25日

目 录

[7]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先 驱

思想的产生 7

国际主义者托马斯·倍恩 17

通讯会 22

平等派密谋 28

民权的原则 财产权反对人权 法国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 雅各宾派 热月九日 巴贝夫 巴贝夫的思想 “平等派”起义
巴贝夫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地位

反革命国际 46

神圣同盟的思想 反革命国际的方法 卡尔斯巴德决议 对那不勒斯、皮蒙特、西班牙和匈牙利的干涉

共产主义者同盟 54

1830年七月革命的社会意义 法国的秘密团体 正义者同盟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魏特林 马克思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党宣言》 1848年革命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民主派兄弟协会 75

“各国民主之友协会”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成立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思想 马克思和“民主派兄弟协会” 宪章运动的复苏
宪章运动的失败

国际协会 89 [8]

厄内斯特·琼斯 曼彻斯特工人议会 国际协会的成立 国际协会的思想 国际协会的终结

第二部分 第一国际

历史性国际的成立103

英国工人阶级和欧洲革命 美国内战 1863年波兰革命 法国工人代表团参观伦敦世界展览会 昂利·路易·托伦 成立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乔治·奥哲尔 工联伦敦理事会的成立 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信 第一国际成立大会

第一国际的原则和章程115

国际内部的思想流派 布朗基派 马志尼 德国社会主义者 讨论原则声明 成立宣言 临时章程

国际的实力——传说与事实127

关于国际组织力量的传说 国际的实际财源 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会员人数 英国工联和国际 巴黎青铜工人罢工、里昂丝织工人罢工、巴塞尔织带工人被开除、比利时矿工罢工中的国际 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国际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国际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 美国国会众议院关于国际的辩论

国际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143

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1865年伦敦) 波兰问题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 关于儿童劳动、关于工会作用 “对临时总委员会代表的指示”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成就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

[9]

公有制问题 合作社的作用 自由和平同盟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 关于土地社会主义化的决议 资产阶级报刊的反应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 关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的辩论 巴枯宁进入国际 继承权问题 巴枯宁的思想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国际168

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态度 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态度 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总委员会的第二篇章言 德国社会

主义者在色当战役后的态度 巴黎公社 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

讨伐国际的十字军战役183

使国际处于法律保护之外 茹尔·法夫尔致各国的照会 俾斯麦的行动 奥地利政府的态度 罗马教皇的态度 西班牙致各国的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

第一国际的终结193

国际内部论爱尔兰问题 巴黎公社陷落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比利时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总委员会因法兰西内战宣言而产生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冲突 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 英国联合会的成立 汝拉联合会的反叛 意大利联合会的叛离 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 总委员会驻地迁往纽约 巴枯宁被开除 马克思和国际 第一国际的解散 “反权威”国际和“无政府主义”国际代表大会

第三部分 第二国际

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231

成立代表大会(1889年巴黎) 代表大会前的历史 各国代表团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英国工联“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 凯尔·哈第 独立工党 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茹尔·盖得 保尔·布鲁斯 爱德华·瓦扬 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分裂 约瑟夫·波伊克特 约翰·莫斯特 维克多·阿德勒 加因斐党代表大会 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安得列阿·科斯塔 波伦亚起义 卡洛·卡菲埃罗 恩里科·马拉特斯塔 菲力浦·屠拉梯 圣卢波密谋 意大利工人党的成立 西班牙革命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瑞士、荷兰、挪威、丹麦、瑞典、俄国和波兰的运动 “同盟”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 阿根廷的运动 北美社会党 “全国劳工同盟” “劳动骑士团” “美国劳工联合会” 日本的工人运动

[10]

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288

国际的组织 关于5月1日的辩论 国际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

进化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302

米勒兰入阁 德国的修正主义 福尔马尔 伯恩斯坦 倍倍尔
和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汉诺威党代表大
会(1899年) 德意志军事帝国 巴黎代表大会关于修正主义的
辩论(1900年) 考茨基的决议案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1903
年)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 法国的政教斗争 倍倍尔
和饶勒斯的舌战

国际关于总罢工的辩论336

宪章派的总罢工宣传 比利时的政治性群众罢工 苏黎世代表大
会关于总罢工的辩论(1893年) 法国工团主义 费迪南·佩卢
蒂埃 若尔日·索列尔 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 1902年比利
时总罢工 1903年荷兰总罢工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
1904年意大利总罢工 1905年俄国革命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
总罢工 德国工人运动的上层建筑结构 耶拿党代表大会(1905
年)的决议 芬兰总罢工

[11] 国际内部论殖民地问题359

第一国际与美国内战和解放黑奴 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 肖
伯纳和布尔战争 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殖民地政策的批判 美
因兹党代表大会(1900年) 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 罗莎·卢
森堡的决议案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 英国在印度的
殖民统治 德属西南非洲起义 比利时社会党人和刚果邦 利
比亚战争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墨索里尼的崛起 斯图
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 斯图加特决议

国际和战争378

第一国际论战争问题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 普法战争
巴黎代表大会(1889年)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 战争
和资本主义 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年) 伦敦代表大会(1896

年) 战争和帝国主义 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 德国和法国的反军国主义宣传 爱尔威的反爱国主义 马克思论民族 饶勒斯的民族思想 饶勒斯和盖得的冲突 里摩日党代表大会(1906年)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 倍倍尔的决议案 饶勒斯和瓦扬的联合决议案 倍倍尔和饶勒斯的辩论 斯图加特决议 战争紧张的加剧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 凯尔·哈第和瓦扬的联合提案 巴尔干战争 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 巴塞尔宣言 萨拉热窝行刺事件 战争前夕 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和平宣言 布鲁塞尔执行局会议(1914年7月28日)

附 录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425
斯图加特决议	429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表	432
第一国际临时总委员会	433
人名索引	435
内容索引	465

论述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书籍日见增多，汗牛充栋。但是叙述国际这一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机关及其最高精神权威的完整历史著作，至今却尚付阙如。已有的重要专题著述仅限于研究国际的个别时期。G·D·H· 科尔的五卷集巨著《社会主义思想史》记述了第一、第二国际的历史，并简要概括了它们后来的命运，甚至穿插叙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一般历史。但即使在这部内容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史中，国际也只是以一种宣言的形式出现。一部真正的国际史迄今还来问世。

撰写一部真正的国际史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我从1907年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起，即亲身参与国际的活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我出席了国际所有历次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大会记录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年半中，我参加国际执委会会议，任国际书记助理。从1949年末至1956年年中，我以社会党国际书记的身份担负着参与重建国际的工作。因此，有心将这些经历如实写成研究文章，乃是理所当然的。

本书是三卷集《国际史》的第一卷。

通过对国际起源的研究，我深信要叙述完整的国际史，必须上溯到试图建立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初期阶段。1864年诞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有着它的先驱，这些先驱已具备在第一国际中得到发展并形成国际传统特点的基础的思想萌芽。从它们的希望可以看出，第一国际是自十八世纪末开始一再出现的尝试之一，那就是：将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剥夺权利者联合组成一个国际性战斗共同体。

[14] 本卷第一部分试图记述国际的先驱史。第二部分为第一国际史，第三部分为第二国际史。在第二卷中，将试图记述国际进一步发展的命运，直到1951年它的重建为止。

虽然我以社会党人的身份着手这项工作，但我严格地致力于不带批判的偏见来叙述国际史。反躬自问，我深信无意有损历史学家为真实服务的责任。当然，历史学家的立场决定了他对执笔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理解程度。

国际史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和政策中结晶的精神过程。从促使召开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中，则可看出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流派。

国际从创建伊始直到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瓦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但是即使以一卷的篇幅，对它的历史也只能作大略的叙述。有鉴于此，我除列出撰写本书所引用的有关著作外，也尽力列出那些可供用来对社会主义精神史及其运动作深入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首先是德文参考书目）。

本卷附录中收入两个文件：《第一国际章程》，1871年的最后修订本，它反映了第一国际所具有的精神，并以粗线条勾勒出它的思想和目标；1907年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对战争所持态度的决议，对于了解导致第二国际失败的冲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国际史的一个极为珍贵的资料来源，是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对这些记录进行研究，使第一国际史摆脱了和它滋生在一起的某些传说轶闻。该所所长A·J·C·勒特尔教授、博士先生让我利用这些记录，在此，我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找到的关于第一国际史的另一个丰富而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材料来源，是R·P·摩根先生写的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德国社会民主党和1864至1872年第一国际》。作者十分友好

地将论文供我阅读。我也感谢卡尔·兰多尔教授让我先睹为快，看了两卷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长条校样样张，从中得到了宝贵的启示。①

我还应向仔细校阅本书原稿、改正其中错误并提出意见裨补缺漏的学者和友人致谢，首先是《第一国际时代》和《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的作者、米兰的莱奥·瓦利亚尼先生，以及我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研究所和《社会史国际评论》的学术界同人维尔 [15] 纳·布卢门贝格；他们俩极为认真地看了全部原稿。此外，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看了有关第一国际的几章，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卡尔·兰多尔先生看了论进化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章。看过原稿第一、第二两部分的，不仅有威尔士大学讲师 R·P·摩根先生，而且也有纽约卡尔·马克思传记作家博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最后，我要感谢所长勒特尔教授先生和阿姆斯特丹研究所图书管理员玛丽·许宁克小姐，他们真正慷慨地让我利用该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谨将本书用来纪念国际的伟人、导师和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

1960年2月于伦敦

第一部分 先 驱

思想的产生

[19]

社会主义国际诞生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但是，成立时取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社会主义国际，却有着先驱，而它就是继承了这些先驱的思想和传统，并加以发展的。为了更明确地了解社会主义国际的思想史，很有必要穷源竟委，直至它最初的前驱。我们也许可以把引起 1789 年法国大革命——那是一次具有明显的世界意义和充满被压迫者国际团结精神的运动，使许多国家人民为之振奋的伟大民主自由运动，称之为最初的第一国际。这一运动也导致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工人作为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以及法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战斗共同体。

点燃法国大革命之火并照亮许多国家的自由运动的思想，在此以前很久就在英格兰有了发展，其反映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权利和自由。在英格兰，封建主义几百年前即已解体，资产阶级的权利保障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行之久远以及最后通过 1679 年的人身保护法这一宪章，被确定下来。因此，在英格兰，专制制度从未象在法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德意志公国各邦那样得到充分发展。最后，以极其平静的方式而进行的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废除了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对国王和议会的权力作了划分。

可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居统治地位的还是君权，议会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英国实行寡头政治；民主还是一种尚未成为现实的理想，贫富之间的对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尖锐。法国大革命推动了贵族反对国王君临一切的斗争，推动了资产阶级争取分享议会权力的斗争，推动了工人阶级反对工业革命赖以

[20] 开展的骇人的雇佣奴役形式的斗争。但是对欧洲大陆各国人民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深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当时还处在一种以绝对否认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统治体系之下。在这些国家里还存在着不容争辩的原则，那就是：一切权威都出自“神权”，君王的统治受命于天，因而王室是一切权力的根本，贵族及主教自古以来拥有和君王瓜分民族财富资源的特权，平民——无论是资产阶级或农民——都是君王的臣仆。由于一切权力出自君王，因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任何一点权利都是君王的恩赐。对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来说，天赋人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①

因此，由法国制宪国民会议发表的人权宣言，就使所有这些国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和法律基础成为问题，而君王、贵族和主教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财富资源，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人权宣言推倒了“神权”，把“天赋人权”奉为圭臬，这是“人们天生”的并反映为永恒的“理性”的权利。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是不可转让的人权；它否定假托受命于天的君权，并声明人民作为整体是至高无上的，是国家和社会的

^① 詹姆斯一世 1609 年在英国国会所作的一次讲话中，给君王的“神权”下了最形象的定义。“要用神权来称呼君王，”他在国会会议上这样说，“因为他们在这世间行使类似神的权力。你们只要看看神的特点，就能发现它们同君王的特点是一致的。神拥有创造和毁灭、开生和处死、将人人定罪而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权力。这些也就是君王拥有的权力。君王创造和消灭他们的臣民，他们操生杀予夺之权，他们是臣民的法官，除了神以外不对任何人负责。”转引自 G·P·古奇：《从培根到哈里法克斯的英国政治思想》（1914 年伦敦版），第 14—15 页。在 1789 年法国国民会议宣布人民的权利之后半个世纪，这种观点还支配着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在 1841 年致东普鲁士省长冯·舍恩的信中声称：“我感到自己完全受命于天……请您相信我的豪言壮语：在我的时代，凡未经我事先赐与，任何公侯、任何农奴、任何邦议会和任何犹太学校，都不会从本朝治下得到任何一点正当的或不正当的东西……家长制是德意志君主的风尚，由于治理这个国家是祖宗传给我的任务，是我的世袭权力……因此我能够也愿意引导未成年的子弟，惩罚那些堕落的子弟，而只让那些品德良好的子弟参加管理我的家业。”转引自冯·特赖奇克：《十九世纪德国史》（1879—1894 年莱比锡版），第 4 卷，第 57 页。

一切权力的根本^①；它宣布，根据人民意志建立的公团，乃是法国和全世界一切国家的自然的社会宪法。

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在启蒙时代，这些思想就由哲学家们进行过阐述，由作家们进行过艺术加工。但是它们以宪章的形式被宣布作为一个国家——一个象法国这样当时位居强国之冠的国家——的基础，这在欧洲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思想家们和作家们感到，似乎他们的夙愿将成为现实，似乎一个“理性的王国”行将开始，似乎革命开启了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大门——进入一个符合启蒙思想的国家和社会形式的时代，进入一个人类在永恒的和平中成为兄弟的时代的大门。所有追求结束政治压迫、社会压迫和思想压迫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同革命息息相关。德国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席勒、赫尔德、维兰和荷尔德林，英国的布莱克、罗伯特·彭斯、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威廉·华兹华斯，都热情洋溢地欢呼这场革命是理性、权利和社会正义的胜利，欢呼它从专制政治和迷信思想的混乱中缔造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啊，兄弟，听这真理，唯一的伟大真理——
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生来一样的人，
你们的生存权利叫做平等！”

骚塞发出这样的呼唤^②，克洛普什托克恨不得自己有一百个嗓门，用来歌颂自由的诞生。黑格尔在许多年以后描绘自己在青年时代经历的革命多么振奋人心：“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

① 1793年宪法第二十五条宣布：“主权的基础在人民。它是不可分割、不从时效和不可转让的”。

② 罗伯特·骚塞：《瓦蒂·泰勒》，第3幕。（译文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283页。——译者）

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①而歌德则承认：

“因为谁也不会否认，当我们听说自由平等，
听说那意气轩昂的、万民公有的民权理论，
就如新鲜的太阳之最初的金箭射中了心，
我们的心地恢宏，血脉净化，鼓动得更加紧！”^②

但是，在统治阶级看来，自由平等的消息，它在被压迫阶级中唤起的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希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最猛烈的挑战。革命在其内在逻辑的推动下，一步步将一开始就宣布的原则反映为法国的宪法机构。它废除了一切天生的和等级的特权，打倒了贵族和主教的世俗权力，剥夺了君权，最后并推
〔22〕翻了君主专制。最古老的王朝国家、当时居欧洲国家首位的这个大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国作出的振兴民权的榜样，威胁着所有欧洲王朝，威胁着全欧洲的贵族和教会的权力。革命乃是公侯、贵族和教会的共同敌人。

他们决定以武力来结束革命。革命刚爆发后不久，欧洲各国内阁中就商讨了一个关于动用武力对付革命的计划，并在路易十六企图逃走和被废黜后将其付诸实行。1792年夏天，奥、普和有法国逃亡贵族及军官参加的德意志公侯军团的联军逼近法国边境，联军总司令冯·不伦瑞克公爵以德皇和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立即恢复原有的政权。他气势汹汹地说，如果巴黎胆敢拒绝和进行抵抗，“将给予永远难忘的报复”——

① 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405页。——译者

② 歌德：《赫尔曼与窦绿苔》（克里娥，时代）。（译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郭沫若译本，第50页。——译者）

要将巴黎夷为平地。

由于欧洲各国公侯对革命的法国进行联合作战，革命变成了一切深受本国专制政权统治之苦的人的事情。他们希望，革命的胜利能给他们国家带来自由的胜利，他们担心，革命的失败将使他们的希望化为乌有。这样，法国大革命就促使许多国家的民族发生了分化。

国君和公侯们的国际性行动，欧洲对法国的联合作战——受到教会的祝福和资产阶级保守派的鼓励，促使形成了一个民主的国际。资产阶级的一翼，个别贵族、手工业者和工人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同他们国境之外的兄弟组织以及法国的革命俱乐部团结一致，注视着革命的心脏巴黎，将巴黎看成国际自由战斗共同体的中心。

“万邦的人民，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分，
谁不翘望着那世界的首都，那历来有名，
而它今日的名声比较起古时还要鼎鼎？
把那使命最初传宣了的几位豪杰之人，
名望超群，高到绝顶，岂不曾高到了天星？
人人的勇气，精神，言论，岂不是都已沸腾？”^①

这是对革命并非同样怀有激情的歌德的记述。而歌德特在1799年，当法国自身已经开始反动，革命战争就变为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以后，还把法国视为一切思想崇高的人的祖国。因为——他说——法国的命运同人类的最高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坦然深信，他们不仅是法国人民自由

^① 歌德，同上引书。（译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郭沫若译本，第51页。——译者）

[23] 的开路人，而且是全人类自由的开路人。在制宪国民会议起草人权宣言进行的辩论中，人们接二连三地发表演说，阐述它那世界性的、对各国人民适用的性质。^①

他们感到，共同的奋斗目标把自己和所有国家的被压迫者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谈论各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并通过象征性行动表示国际团结的思想。例如，拉斐德将巴士底狱的大门钥匙——战胜专制政治的象征——献给美国独立战争英雄托马斯·倍恩；当本杰明·富兰克林逝世时，法国国民议会表示哀悼。法国国民议会授予外国思想家和作家以法国公民权，“因为他们为人类解放开拓了道路”——英国人、美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荷兰人、德国人，他们当中包括席勒、克洛普什托克、斐斯泰洛齐和托马斯·倍恩——，并在授予令中说明理由时指出，虽然法国国民议会不能指望“人们在法律和自然面前将只建立唯一的一个家庭、唯一的一个社会，但对一个民族来说，自由的朋友毕竟是非常珍贵的，这个民族已宣告它放弃一切掠夺企图，希望同各国人民建立兄弟情谊”，尤其是在目前“国民公会行将决定法国的命运和也许着手准备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②

公侯们已在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战争中联合起来了；法国国民公会呼吁各国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公侯。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提议，在即将进行讨论的宪法中用各种形式宣布法国同全世界的革命者团结一致。他建议应该声明：“世界各国人民都是兄弟，应尽力相互支援，象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样。谁压迫一国人民，就表明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罗伯斯比尔的这一思想，以较为婉转的措辞写进了国民公会通过的 1793 年宪法的第一百

^① 埃里克·汤普森：《民权和 1789 至 1791 年的法国制宪国民会议》（1952 年曼彻斯特版），第 135 页。

^② 转引自 A·奥拉尔：《法国大革命政治史》（1924 年慕尼黑/莱比锡版），第 1 卷，第 207 页。

一十八款：“法国人民是一切自由国家人民的朋友和天然同盟者。”

在法国面临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将革命引向敌人的营垒这样一个想法，是不言而喻的。联军作战开始后不久，巴黎革命市政厅——革命的主脑——即决定，要求国民议会以法国的名义声明：“法兰西民族虽然放弃一切掠夺企图，但并不放弃支援决心废除奴役制度的相邻大国。”^①当一年后法国革命军开进联军国家时，丹东在国民公会提出将法国武装力量用来作为革命的工具。“因为只要我们受到暴君们的包围，”他说，“他们 [25] 的联合就危害我们的自由。”他断言：“由于法兰西民族将我们派到这里来，因此它同时也就建立了一个发动各国人民普遍起义以打倒世界所有君王的大型委员会。”^②

法国同外国革命者武装团结的思想，反映在随后于 1793 年 11 月 19 日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中：“国民公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声明，它给予一切致力于恢复自身自由的人民以兄弟情谊和保护，并委托执行权力机关给各将军发布必要的命令，援助这些人民和保护因其自由思想而受到或可能受到镇压的公民。”吉伦特派领袖之一、国民公会财政部长康邦接受委托起草命令，规定各占领地区将军应采取的措施，报国民公会讨论通过。

康邦上报国民公会的命令于 1793 年 12 月 15 日通过，它作出了一条原则性规定：革命战争的目标在于废除一切特权。“一切特权性质的东西，一切暴政性质的东西，均须以敌人论处。”在人民尚未自己起来彻底变革封建社会制度的占领地区，法国必须以革命政权的名义推翻旧政权。法国将军们奉命立即废除什

① 转引自奥拉尔同上引书，第 1 卷，第 396 页。

② 转引自阿尔贝特·马蒂茨：《法国大革命》（1950 年苏黎世版），第 1 卷，第 386 页。

一税^①和其他封建义务以及任何形式的封建奴役，解散所有旧官厅衙门，选举产生临时行政机关。然而，只有发誓效忠自由平等并放弃一切特权的公民，才能享有选举权。将军们还奉命取消现有税制，没收官厅、公侯和世俗以及教会机关的一切财产，用来作为发行纸币的担保。如果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迫于需要征收捐税，当注意不使劳动阶级增加负担。^②

革命的法国变成了许多外国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他们受到友好的接待。俱乐部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在国民自卫军和国家以及地方行政机关中担任职务，甚至被选入人民代表机关——托马斯·倍恩和普鲁士革命家阿那卡西斯·克罗茨是国民公会成员。他们在宣战后组成外籍军团的核心，外籍军团的任务是在取得胜利之后将他们各自的祖国从封建主义和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北方军中有一个比利时军团，中央军中有一个列日人军团，一个由萨瓦人、日内瓦人、纳沙特爾人和沃州
[26] 人组成的阿洛布罗根军团，一个巴达维亚军团和一个由曾经在威廉二世麾下服役的达姆巴赫上校指挥的德意志军团。外籍军团于1792年9月在瓦尔米战斗和一个月后在热马普战役的胜利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前者迫使冯·不伦瑞克公爵后退，后者摧毁了奥地利对比利时的统治。

法国革命军在许多国家被当成解放者受到欢迎。“我的军队”(在萨瓦)，孟德斯鸠将军向国民公会报告，“高奏凯歌向前推进。城乡居民望风来归，到处别上了三色帽徽。”境内到处建立起革命俱乐部。如同一项决议中所指出，这些俱乐部满心希望“投入法兰西共和国的怀抱，同它组成一个唯一的兄弟民族”。一个由全体常住居民选派代表参加的阿洛布罗根人国民议会推

① 什一税为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公元六世纪，教会利用《圣经》中有所谓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开始征税。——译者

② 转引自马蒂茨同上引书，第1卷，第396页。

翻了撒丁王朝，打倒了贵族和地主的统治，没收了圣职人员的财产，并声明决心同法国合并。

并非欧洲大陆各地居民都对革命作出这样急风暴雨般的反应。但在德意志各邦为数众多的城市中，在瑞士、意大利北部，甚至匈牙利，都有革命的朋友在秘密协会和俱乐部中聚会，在书斋——德国反革命报刊诬蔑为“民主派的巢穴”里聚会。法国大革命领袖的演说，国民公会的工作报告，革命刊物、年鉴、号召和自由歌曲在四处传播，尽管有着最严格的检查制度和可能受到的无情惩罚。例如，萨克森选侯政府于1791年颁布的“暴乱法”扬言，对“煽动他人结社……书写和散发扰乱人心的文章……的首恶和阴谋活动的为首分子”要砍头处死，“罪行情节严重者”要处以磔刑。^①在法军进驻的许多地区，例如在比利时、列日侯国、主教辖区巴塞尔、沃尔姆斯，在宣布共和的美因兹，到处种上了象征革命的自由树，旧政权被推翻。在莱茵河左侧许多山世俗和教会统治的地区，农民拒绝缴纳什一税，拒服强迫劳役和不承认其他封建权利。萨克森农民于1790年，西里西亚农民、织工和手工业学徒于1792年和1793年举行起义，布勒斯劳市民和手工业者于1794年4月举行起义。由法国引起的动乱席卷整个西欧和中欧大陆。但是这一动乱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未能结晶出革命的群众组织，因为当时一种社会革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发展形成。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力量强大的自觉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事
业，这个阶级不甘心再处于“第三等级”的地位，要求上升为国家 [27]
和社会的第一等级。它也造贵族政治社会宪法的反，因为这部
宪法是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它得到了巴黎郊区、里昂和马赛
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持，这个无产阶级指望革命能实

^① 转引自黑德维希·弗格特：《1789至1800年的德国雅各宾派文学和新闻学》（1955年柏林版），第134页。

现他们的希望和奋斗目标。

但是在法国的邻国中，除比利时外，没有强大的工商业中间等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意大利和西班牙贫穷疲惫，而德意志各邦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是农业之邦，仅仅拥有寥寥的几片工业飞地，例如织工区西里西亚，以及中世纪手工业铸剑中心雷姆沙伊德和佐林根^①。只有少数德国城市经过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和人口减少后恢复了元气。十八世纪末，巴黎人口多于所有德国自由市包括德国各大学城在内的总人口。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还不具备那些能够将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的激进、民主和世界主义气概转化为革命政治运动的社会力量。

^① 亦译索林根。——译者

国际主义者托马斯·倍恩

[28]

对法国大革命的种籽来说,英国则是一片无比肥沃的土地。那里,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一场旨在使英国变为“世界工场”的工业革命,开始了壮大资产阶级和产生一个群众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过程。

在英国,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也已有了多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基础。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即已起来革君权神授论的命,并将其打倒;从1649至1659年的十年期间,英国是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共和政体。密尔顿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篇光辉著作中鼓吹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①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他的《民治论》这篇论文中,从人类的天赋权利推论出人身自由和民主自由——这种思想赋予了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以道义上的合理性,并成为1776年独立宣言的鲜明标志。这个宣言是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宣布的人权宣言的蓝本。

洛克的思想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有教养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的共同财富,他们欢呼法国大革命是洛克思想的胜利。关于这些日子的气氛,一篇演说引起的强烈反响颇能说明问题,这篇演说是具有声望的学者理查·普莱斯博士在革命爆发半年后在伦敦发表的。“我为自己感到幸运,”他说,“我还能经历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亲身见到,人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为人们所理解,各民族渴望自由……自由之火在到处燃烧——君王的统治让位给法治……看,在你们的启迪下,这些国家正在从自己

① 约翰·密尔顿:《阿理渥派其蒂措》(1644年伦敦版)。

的沉睡中觉醒，砸断自己身上的锁链并向压迫自由的人要求正义！看，你们点亮的明灯，它使美洲获得了解放，它将自己的光芒照到法国，在法国燃起了使专制化为灰烬并给欧洲带来温暖光明的火焰。”^①

大会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一封致法国国民议会的贺信。演说在农村也引起强烈的反响，以致它不得不迅即连续十二次翻印出版。英国政府被突然爆发的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呼声弄得惶惶不安，授意艾德蒙·伯克撰文驳斥普莱斯博士。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引起了第一流的英国工人文献著作之一——托马斯·倍恩的《人权论》^②——的问世。

艾德蒙·伯克是一位很有写作和演说才能的议员，原是洛克关于天生权利学说的积极辩护者，他在自己的论文《拥护自然社会》中，从天生权利推论出一种使人感到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的批判。本着这一思想，他热情地为北美殖民地对其宗主国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进行过辩护。但随着年事的增长，他变得反动了。

他在为反驳普莱斯博士而写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再也不谈以天生权利为基础的“不可转让的人权”了。他声称，以贵族和教会为其保护者的欧洲传统文明的力量已消耗殆尽。他论证说，贵族和教会是人类社会结构的维持者。没有贵族和教会人类社会将会解体，变成无政府状态。他还指出，也不可能由无法晓喻的、充满谬误的人类理性根据哲学理论设计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公团；这种公团必须在世代相传的习惯和传统中有机地形成。由于法国革命推翻了贵族，剥夺了教会权力，破坏了惯例的世代相传的产业和建立了人类理性的统治，它就为混乱

① 转引自 M·贝尔：《英国社会主义史》（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52页。

② 有关倍恩其人及其思想的评价见 H·N·布雷斯福德的优秀著作《葛莱、葛德文及其朋友》（1948年纽伦堡版）。

打开了闸门。这些思想出自他那犀利的笔锋之下。他的这本著作也许是在那些日子里写得最出色的反对革命的作品；梅特涅的顾问弗里德里希·根茨认为，它是“对革命思想的最具有说服力的驳斥”，并将它译成了德文。

伯克的这本著作在 1790 年出版。就在同一年，拥有三个国家公民身份的托马斯·倍恩从美国经由法国回到了英国。

托马斯·倍恩(1737—1809)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伟大人物之一。人们曾经在半个世纪中将他奉为英国工人运动的导师，直到我们今天，人们还将他奉为英国工人运动的先驱。1737 年，他出生在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父亲是贫苦的女式胸衣缝制者和小佃户。他先学会了父亲的手艺，通过自学获得了丰富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知识，甚至也获得了丰富的数学知识。[30] 洛克的文章和当时英国改革运动的天然权利及理性主义文献，鼓舞了他的革命激情。这种激情首先在美洲得到了发挥。

1774 年，他带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封介绍信去美洲，为北美殖民地居民的独立运动效力，他是在伦敦通过介绍而认识富兰克林的。到达费城后，他以记者身份致力于将殖民地居民争取参与决定征税权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寡头体制、主张共和民主的斗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后，他于 1776 年写出卓越的政治性小册子《常识》，这本小册子被大量散发，使在北美殖民地积蓄的革命火种燃成了熊熊烈焰。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给还在犹豫不决的北美人列举了他们声明独立的理由。小册子出版后五个月，美国正式宣告独立。

这本小册子——它的火热激情，它在道义上的理直气壮，它的革命情调——是一杆投枪，使倍恩一举名闻美洲。但他还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应征加入华盛顿的军队，很快就当上了格林将军的副官，后来任大陆会议外交部长，最后任宾夕法尼亚国民会议秘书。1781 年，他接受美国政府的外交使命赴巴黎，在巴

黎同后来在革命中任领导的人——其中有拉斐德、布里索和孔多塞——交上了朋友。1790年他回到英国，已经是一位闻名于欧洲的人物，这时发表了上述伯克关于攻击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倍恩应战保卫大革命，写了《人权论》一书。

在这本书中，倍恩没有阐述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以天生权利和理性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批驳伯克的有机国家和社会理论。不过那些思想家的作品都是用有教养的人的语言写的，而倍恩写的书则是用极其明白易懂的语言，工人们个个都能理解。哲学家们以清醒的逻辑阐明他们的思想；在倍恩的笔下，这些思想发出了火热的革命激情。

伯克否认人民有权革命，因为他断言，活着的一代不能离开过去世代传统。倍恩回答说，任何一代躺在坟墓里的人都无权再统治活人；每一代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秩序，包括通过革命。一切世袭的统治权要求都是“欺世盗名”。作为整体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力的根本，在各国人民没有以人权为基础改造他们的宪法——如同美国人和法国人所做的那样——以前，世界上就既不可能有自由，也不可能社会正义。只有废除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暴力——“人类的敌人和一切不幸的根源”——和恢复了“人民的天生主权”，才会开始一个永恒和平的时代。

托马斯·倍恩的《人权论》，是英国第一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怀着劳动人民的感情、代表劳动人民的事业并阐述了一种激进的具有现代气息社会改革纲领的政治性文献著作。

这本书的第一卷于1791年问世，次年第二卷出版。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几个月内一版再版，并在被政府视为煽动性的著作而加以查禁之前，已售出了二十万册，使作者收入达一千英镑。他将这笔钱汇寄给一个取名为“通讯会”的工人联合会。就是在该书被查禁以后，尽管任何对它进行翻印和传播都

有受到迫害的危险——处以长时期的监禁和流放到澳大利亚罪犯逐区博特尼湾，它还是被一再翻印，并流传开来。

倍恩遭到通缉。经诗人威廉·布莱克告警，他逃到法国。旋由加来公民选为国民会议员。他以叛国罪受到缺席审判，宣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的著作被刽子手们焚毁。托利党人没有抓到倍恩，想出了一项天才的发明用来聊以自慰：将一种用以钉长统靴后跟的钉子取名 T·P-钉^①，以便至少把倍恩这个可恨的名字踏烂在自己的足下。

但是，无论刽子手还是贵族、主教和有名气的公民向倍恩倾泄的诽谤，都不能限制他的著作普及流传。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两代工人将它奉为他们的圣经。如同直到 1850 年宪章运动结束时，他们发表的历次宣言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了要求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性。这本著作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史文献，但却是一份国际史文献，因为它在英国工人的精神世界中培植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团结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体现在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中，体现在宪章派领袖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和著作中，体现在 1845 年成立的、国际的真正原型——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纲领中。

^① TP 为 Thomas Paine (托马斯·倍恩) 的两个起首字母。——译者

通 讯 会

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影响了英国，吸引了英国知识分子和英国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了历史上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这一运动的奠基人是苏格兰鞋匠托马斯·哈第（1752—1832），一个阅历丰富、善于思考、性格坚定和行事谨慎的人。1773年，他从他的苏格兰老家斯特林郡来到伦敦，在皮卡迪利街开了一家小作坊。1792年四十岁时，他邀集八个象他一样都是手工业者的朋友，在一家酒店里聚会，建议他们成立一个协会，宣传要求享有进入议会的普遍选举权。他提议这个协会取名伦敦通讯会，并设法在全国建立小组——因为当时政治性结社属于禁止之列，将这些小组组成一个协会，通过书信、通知和代表会议等联系方式，统一行动。确定每星期交纳会费一便士，所有与会者当即缴款。这样，通讯会就以九便士的建会基金而诞生。哈第任通讯会书记，直至他于1794年被捕为止。^①

哈第的想法，在熟练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响应。在英格兰的设菲尔德、考文垂、里子、诺丁汉和诺里季，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丹迪，随后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大工业中心，纷纷成立了分会。1792年年底，据估计它的成员人数为两万名，1795年为八万名。1795年10月，它在伦敦北部举行的一次露天示威集会有十五万人参加。“伦敦通讯会已发展成一个大胆的组织，”1795年5月，英国首相皮特在国会陈述停止实施人身保护法的理由时这样说，“它是雅各宾主

^① 最优秀的用德文记述的伦敦通讯会史是前引M·贝尔著作的第4章，详尽的叙述见安东尼·布朗用英文写的《英国史中的法国大革命》（1918年伦敦版）。

义的，目的是要消灭富人。”

伦敦通讯会的确是“雅各宾主义的”，因为它象法国的雅各宾派一样，致力于用民主战胜寡头政治。但作为它的目标，通讯会并未设想对现存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它没有社会主义纲领。它为一切人的政治平等而斗争，为全体人民拥有普遍的和平等的议会选举权而斗争，为穷人统治国家取代富人统治国家而斗争。它为建立民主政治进行奋斗。可是皮特深知，一旦民主政治使穷人掌握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它就会威胁富人的财产和特权。

然而英国寡头政治体制不仅剥夺了劳苦群众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广大拥有产业的资产阶级的权利。象工人阶级一样，中间等级也没有选举权，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中间等级同样致力于争取掌握国家权力的议会改革。因此通讯会认为，在为民主政治而进行的战斗中，自己同具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通讯会认为自己首先是同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倍恩的《人权论》被通讯会大量翻印，免费散发给全体工人。法国革命军在1792年9月取得初次胜利后，通讯会向法国国民公会发出贺信，表示工人期待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以实现他们的希望。“你们已经自由了，”他们写道，“我们现在正准备为自由在我国的胜利而进行斗争……你们享受着值得羡慕的自由先锋的荣誉，而我们则想到人类面临的幸福。如果你们象我们所热望的那样取得了最后胜利，那么，一个美、法、大不列颠的三国同盟——不是王朝的同盟，而是人民的同盟——就将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自由和给全世界带来和平。”国民公会写了一封热情的复信表示感谢。通讯会会员们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榜样，使用“公民”这一称呼来取代“先生”，并管自己的会议叫“公会”。许

多分支组织机构也同法国的革命俱乐部进行书信联系。

政府惶惶不安。早在1792年5月，一项国王公告就警告国民提防“煽动性的作品”——托马斯·倍恩的《人权论》。政府在12月通知议会，指出英国臣民勾结外国人士破坏宪法和推翻政府，并气势汹汹地扬言要采取镇压措施。

三个月后英法开战，这场战争，如同艾德蒙·伯克在下院提出[34]的那样的那样，应成为讨伐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十字军之役；战争的目标必须是把“提出这种思想”的“狂人彻底摧毁”。政府变本加厉地迫害通讯会，迫害这个伯克所声称的“所有不幸的根源”。它试图派遣密探和间谍打进工人运动，以便出卖运动的领袖。

第一个受害者在苏格兰。那里的运动原来取名为人民之友。在它举行的一次纺织工人大会上，这次运动的年轻而有才华的先驱托马斯·米尔发言，主张工人有权派代表参加议会。他被控图谋反叛，判处十四年流刑，流放地为博特尼湾。但是他登上了美国朋友为营救他而准备的一艘海盗船，逃了出来。他在法国受到隆重的欢迎，但不久就因在流放期间受到的折磨而死去。

这时，通讯会总会决定，在爱丁堡召开一次由大不列颠所有分支机构派出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抗议野蛮的判决。伦敦通讯会的代表M·马格罗特和J·杰拉尔德，是在伦敦一个工人集中的郊区所举行的有三万名男女参加的露天集会上选举出来的。

全国会议于11月底召开。政府命令它自行解散。由于它拒不同意，遭到了武力驱散；马格罗特、杰拉尔德和其他代表被捕。所有被告均以“作出决议推翻宪法”的罪名，被判处流放博特尼湾十四年的流刑。他们中间，只有一名囚徒在那里熬过了虐疾的折磨和物质匮乏的痛苦，活了下来。英格兰和苏格兰工人怀着尊敬的心情数十年来将他们当作烈士来纪念，并于1843年在爱丁堡为他们立了一块纪念碑。

通讯会并没有被吓倒。几星期后,即1月20日,它发表一项宣言,抗议逮捕它的代表,抗议进行战争,号召全国工人和公民支持它争取自由的斗争。“现在我们必须自由与奴役之间作出选择,”宣言说。“难道我们应该坐等村村建立起兵营,坐等黑森人和汉诺威人来打我们吗?”宣言宣布,如果真将外国军队引进英国和取消人身保护法、宣布戒严法或取消集会权,将在伦敦召开全国会议。这是直言不讳地以革命进行威胁。同时它组织外地各城市和伦敦举行一连串集会,反对“国王阴谋镇压自由”的战争。

于是皮特决定打击工人运动的领袖。1794年5月12日清晨,托马斯·哈第和通讯会另外十一名领导成员被捕,押进伦敦塔,并被控进行反叛。被捕者的罪名是,“以阴险和大逆不道的方式使用武力单独或串通他人进行反对国王的战争”——在当时的英国,这种罪行要判处极其残酷的死刑。

四天后,经英王乔治三世的一项文告授权,皮特在下院提出,在1802年以前暂时中止实行人身保护法,以便使政府能不经法律程序逮捕政治上可疑的臣民。在陈述要实行非常法理由的讲话中,皮特声称,一个危险的密谋活动正在国内猖狂发展,其目的是推翻宪法而代之以人权。英国人十分珍惜的政府、法律、财产、宗教,象法国那样均处在被扫除干净的危险之中。他指控伦敦通讯会是这一密谋的最危险的策划者。 [35]

议会批准了皮特关于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的提案。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的法庭于1794年10月28日开庭,审讯历时九天,结果并不符合议会的心愿。检察官无法证明被告密谋使用武力进行“反对国王的战争”这一说法是否属实。但检察官指出,业已查明通讯会传播了在法国导致推翻君主制和处死国王的原则。由于通讯会赤裸裸地声明同情法国大革命和托马斯·倍恩的《人权论》,因此这说明它是旨在仿效法国推翻英国的君主制度。

在英国，人们怀着激动、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审讯。伦敦从克伦威尔时代起一向思想激进，陪审员不是胆小鬼。法庭天天座无虚席，城市的街头和农村聚集着人群，等待邮车带来有关审讯进展的消息。在11月5日宣判的这一天，从清晨起法院周围的街道上人山人海。当得知宣判被告无罪时，在群众中爆发出了欢呼声。直到托马斯·哈第在胜利的喜悦声中被送回家后，人群方始散去。

政府还没有打断工人运动的主心骨。战争引起的灾难导致了反饥饿起义，当乔治三世于1795年10月乘车去上议院出席议会的开幕式时，迎接王家仪仗队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号声：“打倒战争！打倒皮特！”在英王返回圣詹姆斯宫时，仪仗队的卫兵被人们从马上拉下来，英王华丽的金御辇饱挨了一阵石块和脏物的袭击。

1797年骚动达到了高峰。爱尔兰统一党领袖同法国政府策划入侵爱尔兰，小股法国军队登陆。

在苏格兰东部各郡，发生了反对苏格兰民兵法的起义。更严重的是舰队水兵因其生活待遇苛刻而哗变，它从斯皮特海德开始，发展到驻亚默斯的邓肯分舰队。变兵封锁了泰晤士河，并呼吁人民进行声援。但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

[36] 这时，不列颠大小岛屿上的任何自由事实上都已被扑灭干净。在反对英王的街头游行示威举行后不久，在公布从严惩治反叛法令的同时，还公布了一项取缔未经官方批准的集会的法令——实际上已不许举行任何集会了。1798年，政府下令逮捕伦敦通讯会的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不经司法程序处以三年徒刑。1799年的一项法令宣布取缔讨论会，禁止政治社团相互间进行书面或口头联系，最后在1800和1801年，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被取消。这些法令一直生效到1825年。

这些法令扼杀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性工人运动。产业工人

当时还处在成长为现代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初期阶段，他们在精神和知识上还不成熟，不能同十分强大的国家权力对着干，起来革它的命。农民在此以前很久即已受到圈地法令的打击，一蹶不振。热情欢迎法国大革命并感到要同通讯会团结一致的具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并不是革命的，它追求的仅仅是政治改革。当内战的形式越来越残酷，法国自由战争蜕变为掠夺战争时，英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民主先驱——柯勒律治、骚塞、华兹华斯——也失望地同法国大革命疏远了。他们害怕革命。哈第的忠实朋友及其后来事业的继承者弗兰西斯·普累斯证实，镇压法令“尽管十分卑劣，还是受到人们欢迎的”^①。由于还不具备进行革命的基本条件，这就注定了首次进行政治性工人运动的尝试不可能有其他命运。

这次运动的历史，仍然是英国工人运动史和国际史中重要的一章，因为它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群众奋斗的目标相同，休戚与共的意识为英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传统奠定了基础。

^① 转引自格莱安·华莱士：《弗兰西斯·普累斯(1771—1854)传记》(1898年伦敦版)，第20页。

平等派密谋

1

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席卷了半个欧洲，它是以大资产阶级造专制主义的反开始的。大资产阶级根本无意推翻君主制。它要实现的只不过是以前英国为楷模的君主立宪制，国王和议会分权。它所设想的轮廓模糊的目标，是将现存的贵族社会制度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但是，路易十六的绝对君主制是由“神权”赋予法律效力的，神权从先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即源出圣经的教义推论出自己的法律根据：一切权威均由神授，因而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并且是人权和人的意志所不能触动的。这种教义，在中世纪教皇和皇帝之间关于“神权”领先地位之争中、关于宗教权威胜过世俗权威之争中一再出现。但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些争论中并未成为过问题，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条，而且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不曾遭到学者的置辩。

那么，法国资产阶级凭什么法律名义向专制政体挑战，将君王的“神权”解释为狭义的独裁，而要求君民分权呢？

人民要求拥有权力以及法国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由神权引申出专制政体统治要求的理论，乃是社会契约论。

这种理论也见之于圣经——旧约。圣经说，大卫王同他的人民缔结了一项同盟条约，亦即根据一项社会契约行使他的权力。由于在笃信宗教的中世纪中，无论新约旧约都字字句句被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的启示，所以神学必须使圣经的这两种

相互矛盾的教义一致起来。

这项工作由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来着手进行。〔39〕他在他所写的《统治制度原则》一书中，将世俗权威分为三种因素：由神授予的它的基本主体，它的制宪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和它的行使政府权力的形式——后面这两种权威因素，据托马斯说，是由人民交给政府的。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政府滥用人民交给它的权力，并使之蜕变为暴政，人民就有权收回由自己授予政府的权力。这一学说包含了社会契约论的萌芽和民权论的萌芽，它在中世纪神学家和法学家中间盛行。

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用同样由古代思想界流传下来的天赋人权学说充实了这一神学教义的基础。这种理论论证说，人根据自然法则是自由平等的，而且只要他们在自然状态中生活，他们就永远是自由平等的。但是当他们在着手建立一种社会制度时，他们就委托一个根据契约组成的政府，把自己的主权托付给政府，让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一个哲学学派从这一设想得出结论说，这种社会契约是不可解约的，不可改变的，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因此君王的权力也是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另一个哲学学派却得出结论认为，民权不从时效，也必不可少，因此人民可以更改或撤销同君王缔结的契约，可以收回自己授予君王的权力，因为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根本，君权是委托给君王的民权。

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和1688年废黜詹姆斯二世，决定了英国关于君权神授和民权的讨论。人民通过代表参加议会，重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杀掉了查理一世，宣布詹姆斯二世失去王位，因为前者使用暴力同民权作对，后者滥用人民托付给他的权力，正如议会的决定所指出的，他们“破坏了君王与人民之间的

原来的契约”。有关人民主权的这些行动的理论的正确性，由约翰·洛克于1690年写在他所写的《民治论》一书中，这部著作当之无愧地创造了历史。因为由洛克从天赋人权推论出来的、阐述得异常明确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力之本的思想，推动了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民权论典型地表现为1762年出版的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

[40] 在当时，本身和谐地包含着君权神授概念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已经被其他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伏尔泰——彻底动摇了。但是卢梭的思想——即民权系由人的“天生权利”产生，因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权利”都是国家主权的主人，通过成千上万册热情洋溢的政治小册子的发行做到了家喻户晓，远远超出了有教养的人士的圈子，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① 它变成了民间神话，变成了一种信仰热的源泉，一种获得拯救的希望的象征。它贯穿在陈情书中，第三等级的选民——这是全体有纳税义务的男性居民——用这些陈情书向1789年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表达了他们对路易十六的金口玉言表示不满，提出要求。②

在这种思想推动下，多数选区要求“庄严宣布天生的、不可转让的和神圣的人权”，因为，如同1791年宪法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序言中所说：“对人权的无知、忘记或滥用，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2

可是，1789年秋法国国民议会宣布的“天生的、不可转让的和神圣的人权”，怎么能同一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相协调呢？“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和永远自由

平等的”——宣言一开始这样说。但是如果承认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的基础，又怎么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必然以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人类社会分裂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呢？

原则和阶级利益的互不一致，国民议会最初是这样解决的，即将人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划分为如同西哀士在他的宪法草案中称之为“大社会企业的真正股东”的纳税人，和那些收入在纳税起征点以下的人；^①后一种人按照西哀士 [41] 的方案被剥夺了“积极参与建立公众权力的权利”，他们没有选举权。此外，积极公民本身也被划分为两个选举等级，以确保大“股东们”的优势。最后，被选举权受到很高的纳税标准的限制，象卡米尔·德穆兰在关于选举法辩论中说明的那样，致使卢梭、科尔内耶和马布利等人都不可能当选。这样，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就通过选举制度确保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它可以作为拥有政治特权的阶级组织起来。经过这一过程，最后它就控制了整

①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作出的出色评价，见G·D·H·科尔为1913年平民图书馆出版的该书英译本所写序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该书也收入了洛克的文章，引言是厄内斯特·伯克写的一篇短论，它论述了这些著作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② 见汤普森同上引书，第25页。

③ 在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辩论穷人选举权之前，已有过著名的1647年帕特尼(伦敦附近地名。——译者)辩论：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代表(士兵和军官)在帕特尼开会讨论一项“以普遍权利为基础的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士兵代表要求给予所有国家公民以“绝对的天生权利的”平等选举权。H·爱尔顿将军反对有“绝对的天生权利”；声称本身一无所失的人无权选举他们的立法者。另一有产阶级代表(富有者先生)指出，那些本身一无所有的人自然会选举他们的一无所有者。“那样一来，”他说，“就有可能出现多数人破坏所有制并通过法令宣布均产”。讨论记录见C·H·弗思出版的W·克拉克的《克拉克文件(1647—1649)》(1891年伦敦版)，第1卷，第299—307页、315页。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民主诞生之国的政治理论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把demokratia一词按字面意思翻译：“通过人民进行监督”)的概念解释为“通过穷人进行治理”。见H·D·F·基托：《希腊人》(1951年伦敦版)，第125页。

个国家,并且,如同奥拉尔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使不那么讲兄弟情谊的思想变成了现实:资产阶级即国家”。^①以一个富豪贵族取代血统贵族。

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首先关心的是所有制的不可侵犯。人权宣言即已宣布财产权是“自然的和不容改变的权利……是不容反对的,是神圣的”。所有制看来受到了反饥饿起义的威胁。被穷人的骚动弄得惶惶不安的丹东在国民公会提出,“将一切地产形式和实业形式的私有财产永远”置于“国家保护之下”。随后,国民公会决议在1793年3月18日的法令中规定,哪怕是宣传反对现行财产制度的人,即法令指出的“所有提出土地法令或任何其他建议推翻土地、商业或工业所有制的法令的人,也应对其处以死刑”。^②在此以前,国民公会(通过1791年6月14日的法令)已将所有手工业行会和工人工会列为“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而予以解散,禁止恢复活动,违者予以惩处,同时指示行政机关,对手工业者、短工和艺徒集会讨论工资问题,采取武力手段加以镇压。^③在国民公会就此项提案说明理由的伊萨克·列沙白里哀,并不否认工资的低标准构成了工人的依赖关系,即“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④但是所有制必须加以保护,以免

[42] 受到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威胁。

在工厂和手工业小企业中做工的工人,盼望通过革命来改善他们的状况,提高工资,公布法令调整食品价格,帮助他们取得经济独立。他们并不是对财产权提出问题;手工业者和艺徒希望成为独立的师傅,他们象小资产阶级一样力求确保小私有制。他们只是反对大量占有。他们要求给财产限定一个最大

① 奥拉尔同上引书,第1卷,第44页起一连几页。

② 转引自奥拉尔同上引书,第1卷,第366页。

③ 法令全文见亨利希·库诺夫史料研究集:《法国大革命的政党及它们的报刊》(1912年柏林版),第145页。

④ 转引自库诺夫同上引书,第301页。

占有量，例如“同一个公民只许占有一家作坊，一个店铺”，“任何人不得租种超过按用犁计算的一定数量的土地”。^①但是，这派主张却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资本集中和工业集中的趋势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群众还没有形成为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了雅各宾俱乐部这种政党组织；工人还没有独立的政党。虽然在历次人民起义中工人都充当先锋，但他们在思想上是追随小资产阶级的。反复发生的罢工运动只是革命过程中的社会潜流。事实上工人阶级没有将自己中间任何一个重要人物推到革命斗争中来。即使在1793年到1794年期间——革命动乱最激烈的年头，也是小资产者、记者、律师、修道院院长和商人充当工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这些人本质上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而不是代表工人意识形态和利益的。^②

工人和小资产者——无套裤汉——用自己的鲜血保卫了革命。他们攻打了巴士底狱，他们在马尔斯广场抗击了1789年7月14日由宫廷调来镇压革命的皇家军队，他们在不计其数的战斗中为革命奋战。但是富人通过对国家没收的贵族和祖传财产进行肮脏交易，通过军需用品供应和从事货币及食品投机买卖而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农民至少摆脱了他们的封建负担，成了自己田产的主人。而工人则一无所得。人权何在？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何在？

革命原则与资产阶级财产制之间的这种富有刺激性的矛盾，自然被革命的剥夺继承权对象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如果一个人人类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把另一个人类阶级活活饿死，那么自由只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如果富人通过垄断手中掌握着生杀 [43]

^① 转引自阿尔贝特·佐布尔：《法国大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载于瓦尔特·马尔科夫出版的文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1956年柏林版），第67页。

^② 转引自库诺夫同上引书，第355页。

予夺的权力，那么平等只是一种空洞的幻想，”雅克·卢在国民公会这样抱怨说。^①对这一点，短工、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有着切身体会。他们造反了，他们把马拉和罗伯斯比尔推上了台。

但是，不论是国民公会极左派雅克·卢，还是雅各宾派领袖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没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解决这个矛盾的现实方法，而是象早在几十年以前的哲学书中一样，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空想。他们反对财富的弊病，主张限定“财产的最高额”，主张缓和贫富矛盾，主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当成理想加以描绘的那种社会状态，即“人人都有一点，但谁也没有多余”。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共和国。对废除现行所有制，对取消私有财产而代之以公有制问题，他们没有认真考虑过。

为解决自然的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人权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财产权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而进行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革命自身的历史。这一斗争，在国民公会中拥有财产的中间等级和大资产阶级党吉伦特派以及小资产者、手工业者、短工和农民党即雅各宾派之间进行。

吉伦特派于1793年5月被推翻，雅各宾派接过了革命的摊子。这是一副多灾多难的摊子。法国在战争中受强敌包围，北部和东部敌人已侵入国土，在此同时，西部和南部，在万第，在里昂、马赛、波尔多和土伦，反革命已武装起来反对巴黎。货币急剧贬值，粮食价格飞腾。看来似乎革命将为内外敌人所压倒。为了防止发生这一危险，雅各宾派建立了采取恐怖手段的革命专政。随着他们上台执政，开始了第二次革命，即广大城市人民群众的革命。

但是这次革命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不可能以推翻

^① 转引自库诺夫同上引书，第357页。

资产阶级财产制为目的。它所不同于第一次革命的，仅仅是具有鲜明的民主和社会倾向。它取消了选举权的限制，它的1793年宪法宣布以“全民的幸福”作为社会目标。此外它在宪法中重申财产是一种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权利，“享有……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财产和收入”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公安委员会——革命专政机关——干预财产权，是国家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它公布法令禁止大量投机购囤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它限定食品最高价格，但同时也给工人 [45] 限定最高工资；它没收“共和国敌人”的财产，将其用于救济灾民，但另一方面又声明：“爱国者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在“打倒暴君罗伯斯比尔！自由！”的战斗口号声中，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于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日）被大资产阶级推翻。而实际上，现在开始了如同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F·A·米涅所说的“取消自由的时期”。普选权被取消，给候选人规定财产资格限制的双级选举制重新生效；言论出版自由受到钳制，最后于执政的后期完全被取缔；俱乐部先后被查封，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任何骚动都被恐怖政权镇压下去。具有解放受奴役世界精神的1792年、1793年和1794年三次革命战争蜕变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后不到几个星期，即1799年12月，宪法规定将全部政府权力交给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自由的太阳坠入暴政的黑夜，”威廉·黑兹利特这样悲叹说。随着雅各宾派被推翻，革命力量已消耗殆尽。工人对革命斗争感到厌倦，他们变得漠不关心。革命使他们的希望成为泡影，他们自认失败。

3

然而，就在“暴政的黑夜”尚未笼罩整个法国大地之前，从革

命的灰烬中再一次燃起了明亮的火焰。这一事变对社会主义史和国际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就是1796年的巴贝夫平等派密谋。

革命爆发时，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60—1791)年方二十九岁。他的父亲曾在玛利亚·特利萨女王的军队中服役，任少校，但在回到法国后生活异常贫困，为挣钱养家，先做短工，后来做低级盐税职员。年轻的巴贝夫一开始给士绅家当仆役，通过自学掌握了采邑法知识，在毕卡底封建法律文书处任土地丈量员和档案保管员。他后来写道：在那里，“在封建领主档案的尘埃中”，他发现了“贵族阶级霸占产业的丑恶秘密”。当毕卡底农民在1789年起义时，他在鲁昂市场上焚毁了封建主的文件和财产契据。

从此以后，他决心为革命效力。他酷爱狄德罗、卢梭、布里索，特别是马布利和摩莱里的著作，酷爱法国文学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和空想主义者。他在毕卡底组织农民运动，抗交酒税、盐税、人头税和什一税，主张归还和分配官产。1790年10月，他创办《毕卡底通讯员》报，并在报上不断论证人权宣言中所声明的平等原则以及事实上存在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不平等两者之间的矛盾。1792年9月，他被选为索姆河地区行政机关掌权者，但于1793年年初因卷入一起没有了结的起诉而逃到巴黎，并在市物资供应局找到了一个职位。

巴贝夫没有参加吉伦特派垮台的那些日子的生死搏斗。他厌恶雅各宾派建立的断头台统治。他目击了可怕的暴行，为之深感不安；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巴黎发狂的群众卷进了这种暴行。当时，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的风气被老虎凳、磔刑刑具、执行火刑的柴堆、绞架以及在我们周围到处忙个不停刽子手败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先生们不是让我们懂得文明，而是把我们变成野蛮人。”^①出于对暴行的痛恨，他憎

^① 马蒂茨同上引书，第1卷，第63页。

恶“卑劣的暴君罗伯斯比尔”，把罗伯斯比尔的垮台当作重新获得自由而庆贺。

但他很快就看到——他这样写道——“暴政只是从一只手转入了另一只手”。他在热月九日之后不久创办的《人民论坛》报上坦率地承认，他对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专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在热月九日以前，尽管存在种种阻碍，革命一直是前进的，而自从热月九日以后，革命就不断倒退了。

热月九日的胜利者把雅各宾派的领袖们送上断头台，查封了他们的俱乐部。可是为时不久，原国民公会和各地区雅各宾俱乐部的雅各宾派成员，就设法将他们被打散了的拥护者聚集起来，重建他们的组织。他们给自己的团体取名“潘提翁俱乐部”。俱乐部没有独特的纲领，它保持雅各宾派的民主共和派传统，以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代言人的面目出现。

俱乐部成立于 1795 年 11 月，正是经济危机最为严重和生活异常困苦的时刻。大资产阶级政府已宣布取消对食品的最高限价和征集制以及禁止重要生活用品进行投机的法令，食品分配的定量仅够半饱。同时货币急剧贬值，粮价如脱缰之马。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工人的状况令人绝望，死于营养不良的现象已司空见惯。^① 巴贝夫一个七岁的女儿也于 1796 年活活饿死，当时他自己被关在阿腊斯监狱。巴黎发生了饥民起义。^② 潘提翁俱乐部成员要求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政府当即通过当时担任国内部队司令官的波拿巴，于 1796 年封闭了俱乐部。 [47]

格拉古·巴贝夫自称格拉古，凯尤斯·格拉古是古罗马的

^① 见马蒂茨同上引书，第 3 卷，第 37—38 页。马蒂茨由于早丧未能完成自己的著作，这里引述的第 3 卷系由 G·勒费夫尔整理出版。

^② 1795 年 10 月的巴黎饥民起义，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郊区平民最后一次群众性起义。有关起义的详细记述见 E·W·塔尔莱：《萌芽月和牧月》（1953 年柏林版）。

护民官。他在自己的报纸上热情地为穷人和工人的事业说话。当潘提翁俱乐部成立时，他就加入进去，在俱乐部内同一小批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联合会，取名为“平等会”。

由巴贝夫创建的平等会是一个密谋组织，其目标是用武力推翻政府——督政府，夺取国家政权，实行专政，建立一种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制度。平等会的历史，由巴贝夫的忠实朋友和精神遗产维护者菲利浦·米歇尔-邦纳罗蒂于三十年后在一本文献性著作中作了记述。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巴贝夫的指导思想、他拟定的密谋组织的计划、他研究的宣传方法，以及审讯密谋者的经过。

巴贝夫在 1789 年后的几年中一直反复思考，怎样才能克服生来就有的、得到革命承认的平等权与当时令人愤慨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1793 年的宪法宣布了政治平等原则，但它并未取消穷人与富人之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巴贝夫致力于实现人类生来平等的权利的合乎逻辑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自然给了每个人享受一切财富的平等权利，”他在一份张贴在巴黎墙头的、简要概括了他的思想的传单上，一开始就写下了这句话。“在一个真正的社会里，既不应该有富人，也不应该有穷人”。为了促使这个“真正的社会”的到来——他得出结论说，需要再进行一次革命。他解释说：象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另一次革命的序幕，那将是远为伟大和远为崇高的最后的革命……土地私有制将不再存在……扫除令人憎恨的穷富差别和主仆差别！……建立平等派的共和国，建立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宾馆的时刻来到了。”

巴贝夫的社会主义带有他所处的时代的特征。在当时，大多数居民是小农、佃农和大地主的雇农。给巴贝夫以激励的摩
[48] 莱里和马布利的共产主义，基本上是农业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从土地分配的不均等，而不是从工业发展的矛盾派生出

来的。工业财富主要还是由小工场里的手工业者和工厂里的短工，不少甚至是由农民家庭所创造的。以进行大规模集中生产为前提的工业社会化思想还没有产生。

巴贝夫所要实现的是一种平均共产主义。他主张在土地少的农民和雇农中重新分配土地。但土地不得成为农民的财产，而是成为国民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只有非继承性的使用权，并有义务将自己的收获交给公共仓库。取消一切财产的继承权，以限制财产的积累，生产性的私有财产应转为公有财产。这样使个人财产逐渐归国民所有，并在公众监督下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加以管理。人人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人人都由国家负责供给。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福利必须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教育平等是巴贝夫纲领中的一个重要要求，它规定保证给予个人以相同的发展条件。

虽然平等会面临横遭迫害的危险，它只能进行暗中活动，但还是争取到了大批拥护者。保尔·路易声称，1796年5月单在巴黎一地，平等会的会员就达一千七百名左右，还在外省拥有各地的分支机构。^①参加平等会的，有原雅各宾派、许多被五执政内阁免职的军官和民主共和派，他们的组织即潘提翁俱乐部已为警方所镇压。奥拉尔没有提到具体数字，但他根据同时代的文件和警局档案证实，巴贝夫的宣传接触到了巴黎人民群众，他们知道他的学说，并“对它给予重视”。^②

但是，了解密谋内情、特别是了解其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人，却只占秘密团体中很少一部分。这批人由一个自称为“秘密安全执政内阁”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其成员有巴贝夫、昂托纳尔、西尔万·马雷夏尔和邦纳罗蒂。中央委员会下设十二名全权代表，每一名全权代表负责巴黎的一个区，其任务是：通过

^① 保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38页。

^② 奥拉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524页。

一个由各区秘密宣传室组成的网，发动群众起义。不论是全权代表还是担任同中央委员会进行联络工作的联络员，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宣传手段——巴贝夫的《人民论坛报》和由西蒙·迪普莱出版的《人民闪电报》除外——是散发传单、在墙头张贴告示、在咖啡馆里唱革命歌曲、组织街头骚动和秘密集会。各宣传室的成员也接到指示，通过全权代表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居民的情绪。

[49] 中央委员会下设一个“军事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军队和警察部队中争取密谋拥护者，并向中央委员会汇报部队的情绪和有关武器弹药的情况。

平等派的宣传工作看来在警察部队中进行得特别深入，因为政府起了疑心，下令将警察部队调往前线。警察部队哗变，两天后，即 1796 年 4 月 30 日被解散。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一事件是举行起义的良机。它任命一个“起义委员会”，由巴贝夫、前国民公会成员达尔特、邦纳罗蒂和费利克斯·勒·佩尔蒂埃几人组成。起义委员会同一批雅各宾派国民公会成员取得联系，他们是在热月九日后被宣布不再拥有议员资格，并同样进行密谋推翻政府的。

两派人就起义成功后所要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一致意见：由武力支持起义的巴黎公民在革命广场集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起义委员会为临时政府。随后国民公会开会，但国民公会只是由被取消了议员资格的原国民公会成员组成；另外以八十名可靠的民主共和派——其名单由邦纳罗蒂提出——代替其他被排斥在外的议员。这个国民公会应废除热月九日以后颁发的所有法令，宣布 1793 年宪法重新生效。

起义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密谋者计划武装起来，在黑夜里分头从全市各地向中心点集中，占领执政内阁政府大楼和市政厅。写明起义战斗口号——“1793 年宪法！自由！平等！”——

的墙头布告已经印就，计划在起义的夜晚张贴出去。

出击的日期和时刻业已确定。

可是，就在商定的起义日期快要到来的前几天，计划被军事委员会成员乔治·格里泽尔上尉向政府告了密。1796年5月10日，巴贝夫和一大批参与密谋者被捕，其中有达尔特、邦纳罗蒂，和当年发现路易十六逃亡瓦伦的知名的圣-默纳乌尔邮政局长让-巴蒂斯特·德鲁埃，另外还签发了二百四十五张逮捕令。警察在巴贝夫家里抄出了全部密谋计划。政府立即向居民发布公告，征集一万名居民入伍。大约三个月后，在8月26日深夜至27日拂晓前，被告被装在囚笼里押解到旺多姆，最高法院在那里开会，但直到半年以后才开庭审讯。

在此期间，巴贝夫的拥护者试图进行最后一次搏斗。自9月9日深夜到10日黎明前，约有六七百名武装密谋者在军队中同党的支持下，冲入格列涅尔兵营，号召士兵们同他们联合行动，[50] 推翻政府。卫戍部队司令官下令吹起冲锋号，双方开了火，密谋者战败溃逃，有几名被击毙，许多人被俘。三十名密谋者——其中三名系原国民公会成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三十名被判处流放，二十四名被判处徒刑。

4

对巴贝夫及其同志们的审讯，于1797年2月底开始，历时约三个月。在六十四名密谋者中有四十六名坐在被告席上；十八名受到缺席审判，其中包括越狱在逃的德鲁埃。

起诉书避而不谈密谋者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是提到密谋者企图使用武力解散立法机关和恢复1793年宪法的事实。政府在一年前（1796年4月16日）曾颁布命令，规定将那些宣传恢复1793年宪法的人处死。检察官援引这项命令，提出对被告处以

死刑。法官肯定了巴贝夫和达尔特的犯罪问题，给邦纳罗蒂和其他被告酌情减刑，对五十五名被告宣布无罪开释。

在一篇庄严而感人至深的、经前后六次开庭审讯才发表完毕的辩护发言中，巴贝夫描绘了革命的命运、革命宣布的壮丽原则，以及它的令人痛心的现实。“革命，”他说道，“不是成果可以等于零的活动。不能流了那么多的鲜血而结果仅仅是人民的处境更加恶化。……革命是为了争取多数人的幸福。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那么革命就没有完成……要说革命已经完成，那它只能是犯罪的可怕的结果。”

接着，巴贝夫阐明了他和他的拥护者所追求的革命的最终目标。“有这样的时代，”他说，“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社会无情的发展规律最后使属于所有人的财富全部集中在寥寥无几的少数人手里……多数人无法再生存下去，因为财产为别人所掌握；他们面对着一个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将一切攫为己有并死死抱住不放。这种关系决定了进行大革命的时刻。它引起了那种意义重大的、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所预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全面推翻所有制关系已不可避免，穷人反对富人的革命起义乃是历史的必然。”巴贝夫说，这一时刻现在来到了。

几乎所有被告都发了言。“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米涅记述说，[51] “他们的发言就象既无惧于承认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无惧于为自己的目的而死亡的堂堂男子汉那样。每次庭审开始和结束时他们都唱《马赛曲》，被告高唱这首古老的胜利之歌和那种大无畏的精神，给旁听者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巴贝夫和达尔特被押上断头台。在宣判死刑后，他们试图用巴贝夫的儿子偷偷送进牢房的一把匕首进行自戕。他们鲜血淋漓地被押回牢房，第二天(1797年5月28日)又被鲜血淋漓地

① F. A. 米涅：《法国大革命史》(1846年伦敦版)，第325页。

拉上断头台。其他认罪的被告——包括邦纳罗蒂——被判处徒刑或服流刑。邦纳罗蒂向前来告别的巴贝夫表示，保证将他的身世、他的思想、他的密谋和对他的审讯写成一本书。

巴黎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对密谋的揭露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对巴贝夫被处决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只有唯一一张报纸《自由人报》怀着敬意称巴贝夫和达尔特为“自由烈士”。巴贝夫的名字在巴黎郊区人民中是很熟悉的，但不及马拉的名字那样家喻户晓。^① 他的社会主义文告未能把群众在热月九日后消失的革命激情再次鼓舞起来。和巴贝夫持同样思想的人为数很少。

巴贝夫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也是空想。即使密谋成功，掌握了政权，它那变农业财产产业所有权为使用权以及取消农业财产继承权的计划，也会由于农民起义而告失败。废除手工业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继承权的尝试，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巴贝夫派掌权执政至多只能继续雅各宾派的传统。但由于他们构成了对保障财产制的威胁，他们将很快为联合起来的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军队所推翻。

但尽管如此，平等派密谋仍是社会主义史和国际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随着这个密谋的酝酿，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此以前，社会运动没有任何一次以变革建立在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财产制为自己的目标；象公元前二世纪由凯尤斯·格拉古领导的农民运动或十七世纪平等派^②领导的合理分配土地的运动，或例如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它们都只是致力于争取摆脱不堪忍受的经济奴役和社会奴役的条件。而巴贝夫的密谋则是以彻底变革财产制为目标——消灭私有制和建立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使平等派密谋受到鼓舞的社会主义幻想并不是新的。十八 [52]

① 奥拉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525页。

② 指英国的克伦威尔，亦译平均派。——译者

世纪中叶法国的马布利，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十六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以及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柏拉图，都用鲜明的色彩描绘了这种幻想。但这些思想家所叙述的社会主义公团却是一种梦想的愿望，是想象中的符合道德水准的境地，并非考虑将它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目标。

巴贝夫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新颖之处在于，社会主义不是象柏拉图那样的为某个哲学家——国王服务的思想，或者象马布利所希望的那样作为“认识进步”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现实目标，即巴贝夫所说的“平民反对贵族、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以夺取国家政权作为变革所有制的工具的斗争。他十分明确地承认，国家是为那些处于有权地位的阶级服务的统治工具，即吉伦特和执政内阁政府时期的大资产阶级——他管大资产阶级叫“金百万”，以及雅各宾政府时期的“平民”——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政权也可以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工具。这一思想包含了由马克思发展的关于国家政权是革命过程中的杠杆这一学说的萌芽。

巴贝夫也是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注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他的目标无疑是一种争取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实现人人平等的民主制。但他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性结局中引出了教训，即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思想习惯都是在一种以阶级分裂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下形成的，并且如同他所认为的那样受到了“腐蚀”，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立即要求他们作出牺牲和自我否定，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

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专政的思想并不新奇，它是法国革命传统的一个基本原理。它来源于卢梭论证“自由对暴政专政”的正确性的《社会契约论》。马拉曾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罗伯斯比尔将它变为现实。巴贝夫的专政概念的新颖之处在于，将专政设想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种想法

包含了在布朗基、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中得到发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萌芽。

此外，巴贝夫平等派密谋还包含有用一支有纪律的先锋队进行武装突然袭击，以此作为夺取政权的方法这一理论的萌芽。这一理论由布朗基加以发展，由列宁引出了异常重要的世界历史性的结论，并加以运用。巴贝夫的组织在结构、技术和宣传方法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上一切进行密谋活动的秘密团体——布朗基派、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

是邦纳罗蒂的《巴贝夫和为平等而密谋》^①一书，将巴贝夫 [53] 主义者的思想和方法传于后世。该书于 1828 年在布鲁塞尔问世，两年后在巴黎出版；宪章派领袖布朗太尔·欧布林将其译成英文，于 1838 年出版；马克思在 1844 年读了这本书，同恩格斯考虑出德文本，由莫泽斯·赫斯译出。^②

这本书以其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运动所起的作用，使它居于社会主义文献的经典著作之列。书中所叙述的巴贝夫思想，在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的法国共产主义秘密团体中^③，以及在由乔治·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领导的宪章派左翼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它也被 1838 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作为遗产加以继承；正义者同盟再将它传给“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国际的先驱，它留给国际的遗产是《共产党宣言》。

① 该书德译本(1909年斯图加特版)全名为《巴贝夫和为平等而密谋以及由它而引起的审讯和证件》。

② 见阿瑟·莱宁：《邦纳罗蒂的共产主义和专政理论》，载于《社会史国际评论》，1957年第2卷，第282页。

③ 关于巴贝夫思想在法国共产主义秘密结社中的继续存在，见乔治·桑克埃：《巴贝夫以后的巴贝夫主义。1830至1848年的秘密社团和共产主义密谋》（1912年巴黎版）。

反革命国际

法国劳动人民的政权在热月九日被推翻。平等派密谋奋不顾身试图重建劳动人民的政权，结果宣告失败。经过执政内阁短暂的过渡时期，拿破仑专政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巩固。但是，面对封建专制的欧洲，决定法国大革命最终结束的波拿巴主义，却仍然体现了革命的思想。虽然在法兰西帝国已再无人民的主权可言，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就得到了保存——消灭了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农民财产摆脱了封建负担，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建立了陪审员法庭。而在那些被革命时期诞生的法国人民军队占领的其他国家，封建主义都已被打倒，《拿破仑法典》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取代了旧的封建专制的法律制度。

在法国，民主制度已被扑灭殆尽，而在法兰西帝国统治的其他国家，民主运动正方兴未艾。随着法国军队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到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向本国的当地的专制制度造反的精神，深入到这些国家。他们在那里建立的外来统治固然同时也唤醒了民族主义精神，但这种民族主义在其产生的时刻是一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一种适合本国民主义人民国家的民族主权思想。

保守势力在1792年联合起来扑灭法国革命。但它们在1814年战胜拿破仑后，立即发觉自己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它们虽然打倒了拿破仑这个革命的继承者，但这一期间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里也四处长出了革命的苗子。

欧洲各国王公诸侯在拿破仑垮台后在维也纳集会，决心恢

复1789年以前的“正统”秩序。

[55]

维也纳会议虽然大体上得以恢复王朝继承权的“正统性”，被革命和拿破仑打倒的各王室先后复辟，但重新建立专制统治却并非易事，因为由法国传播的民主思想已席卷半个欧洲。西班牙已于1812年在加迪斯召集议会，宣布实行立宪君主制的民主宪法生效。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德国各邦德意志公侯受拿破仑所逼，声明保证在战争结束后颁行选举产生的议会制。乘坐胜利者的辎重车于1814年返回巴黎的路易十八，同样在法国民情的压力下，在康布雷宣言中保证根据议会制宪法施政。在法兰西帝国崩溃后重新处于令人憎恶的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北意大利各邦，以及在再次沦为凶相毕露的沙皇统治之下的波兰，民族主义如火如荼。

梅特涅是在维也纳集会的政治家中最机智的一个，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即使最微小的民主苗子，也必然会由于其内在的规律而发展成为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特别是欧洲王朝新秩序的致命威胁。因为一旦人民主权的原则得到承认，随即就势必发展成一种不断扩大的民主，以致最后导致一无所有的人民群众掌握政权，危及现有财产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民族分裂的国家，例如在意大利各邦，如他所说，民主最终将会推翻在那里恢复起来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将意大利统一成一个共和国。他向当时对是否应该实现自己的诺言而制定宪法还在摇摆不定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力陈，这种危险也将威胁德意志各邦公侯。他解释说，实行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将意味着普鲁士的完结和“革命”的胜利。^①维也纳会议在“反革命的原则”——梅特涅的提法——基础上建立起欧洲的政治秩序。危及这一秩序的，是革命的民主原则、人民主权的原则。因

^① 见里夏德·梅特涅-温内堡和阿尔方斯·冯·克林科夫施特勒姆出版的《梅特涅遗稿》(1880—1884年维也纳版)，第3卷，第171—181页。

此,防止出现这一危险是所有保守势力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是,
[56] 只有当这些势力团结一致行动,不仅镇压它们自己国内的自由
民主运动和拒绝任何民主改革,而且——如同沙皇尼古拉提议
的那样——相互确保它们的统治并保证对专制政体受到“革命
入侵”威胁的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才能防止这种危险。维也纳议
会可以说是反革命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防
止欧洲民主化”。①

俄、奥、普三个封建国家缔结神圣同盟,作为反革命国际
的执行机关。神圣同盟的建筑师梅特涅仿佛就是它的总书记。它
的目的是协调各国保守势力的行动,镇压民主斗争。它的方法是
运用外交压力或武力,对那些出于自愿或在人民起义的迫使
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进行反革命干涉。不论在什么时候出现
这种危险,欧洲的为首国家即行召开会议,就干涉的形式和手
段问题进行磋商。

1815年至1849年的欧洲史,是神圣同盟在镇压民主的斗争
中取得胜利的历史。它通过外交干涉,使1815年德意志联邦协
议书第十三条庄严确定的、由德国各邦君主保证向人民颁行民
主宪法的诺言没有兑现。它强迫德意志联邦议会(1819年9月)
发布卡尔斯巴德决议——威廉·冯·洪堡称之为“寡廉鲜耻”,
镇压各邦的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授课自由。它强行制定
卡尔斯巴德决议补充法令,责成德国各邦君主维护专制统治,
并授权联邦用武力干涉仍然实行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度的德意志
邦。

在卡尔斯巴德决议补充法令中,武装反革命干涉的原则被
作为法规确定下来。这一原则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首次付

① 见俄国驻维也纳公使声明,载于阿尔弗雷德·施特恩:《1815至1871年欧
洲史》(1894—1925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460页;以及卡斯尔里内阁报告,载于
其所著《回忆和通信》(1848—1853年伦敦版),第3卷,第63页。

诸实行。在那里，革命民主主义秘密结社烧炭党的起义，逼使斐迪南四世实践自己关于颁行宪法的诺言。他颁行了宪法，并在议会开幕式上宣誓。但他同时又请求梅特涅——他在致梅特涅的信中写道——让他“借助奥军恢复专制政权”。于是神圣同盟各国在特劳波①（1820年10月）开会，授权奥国进行干涉。奥军开入那不勒斯，在里蒂一战中歼灭了革命军（1821年3月7日），恢复了专制政权。

那不勒斯的革命推动了皮蒙特②的革命起义。皮蒙特也由亲王摄政宣布了宪法，但五天后（1821年3月）就被他取消。又是神圣同盟开会（1821年3月在莱巴赫③召开），决议授权奥国干涉皮蒙特。同时要求俄国准备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一旦德国各邦发生革命起义，就立即介入。 [58]

反革命武装干涉的典型一例出现在西班牙。西班牙从1812年起实行合法的宪法。斐迪南七世在乘坐盟军辎重车——象他的堂兄弟路易十八那样——回到马德里时，曾宣布宪法“无效”。但是一场人民运动迫使他终于承认了宪法。随后他请神圣同盟国家对他的人民进行武装干涉。俄、法、奥、普四国旋即于1822年8月在维罗纳开会，组织十字军镇压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沙皇亚历山大自告奋勇愿意率领一支十五万人的军队开赴西班牙。但由于俄国已陈兵十万对付德国革命，奥国又正忙于镇压那不勒斯和皮蒙特的革命，于是委托法国干涉西班牙。四国在一份联合签署的致西班牙政府的最后通牒（1823年1月）中，提出取消1812年宪法。

几天后，路易十八在一项敕令中宣告十万军队即将开进西班牙。西班牙根据宪法规定的合法政府被法军推翻，恢复了地

① 捷克城市，现名奥帕瓦。——译者

② 意大利北部地名。——译者

③ 现为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译者

道的专制统治。它犯下耸人听闻的残暴罪行。弗兰西斯科·戈雅在他所作的蚀刻画中，给后人留下了反动派野蛮肆虐的确凿证据。英国和法国公众表示愤慨。连路易十八也要求奥、俄、普三国联合采取外交行动，制止对拥护宪法派野蛮地进行集体屠杀。可是神圣同盟三国拒绝这一建议。它们反而催促斐迪南用武力彻底消灭西班牙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运动。

梅特涅完全按照神圣同盟的反革命原则精神行事。在希腊反对专制的土耳其异族统治争取自由的战争中（1821—1827年），他也支持土耳其苏丹，而土耳其苏丹曾下令要数以万计地屠杀那信奉基督教的自己的臣民。苏丹终究是那些举行革命起义，从而要把它打倒的希腊臣民的合法统治者；象任何革命一样，这次革命也必须加以镇压。针对土耳其苏丹消灭希腊人，梅特涅泰然地说，在东部边界的那一侧吊死、勒死和用刺刀捅死三十万人或四十万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英国政府对他的干涉政策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发表声明予以驳回：“奥皇陛下承认，采取各种形式支持受到共同敌人进攻的一切合法权威，这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也是他的义务。”神圣同盟各国在1833年签订的柏林条约中再次保证：“承认任何一个独立国家的统治者有权请求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对付国内或国外遇到的困难”。^①

神圣同盟未能干预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波旁王朝的统治象纸扎的房子似地倒塌了。武装干涉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内政，将引起一场欧洲战争。

但是，神圣同盟却出动全部力量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1848年2月，巴黎革命起义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发出外交照会（1848年3月5日），要求各国使用武力遏制“危及整个欧

^① 梅特涅同上引书，第3卷，第483页，又见A·F·波拉德：《德意志联邦》，载于《剑桥现代史》，第10卷，第376页。

洲的无政府状态的扩展”，并为此提供能调往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镇压革命的强大的武装部队。当几天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也爆发革命时，他集中一支强大的部队，陈兵德国边境，并向接受奥皇特别使命去圣彼得堡的图恩伯爵声明：允许加里西亚或匈牙利实施宪法是俄国所不能忍受的。“我不能容忍在我的大门口、近在我的‘朋友’波兰人身旁出现一个动乱的中心；如果竟然允许那个地方实施宪法或在加里西亚爆发革命而不大力加以镇压，那么我将迫不得已进行干涉，我将毫不犹豫地越过奥地利边界，以斐迪南皇帝的名义恢复秩序。”①

奥地利专制政权无需沙皇援助，就成功地先后镇压了伦巴第和威尼斯省以及布拉格和维也纳的革命。但是匈牙利坚持抵抗。于是反革命国际采取行动。1849年6月，一支十四万人的俄国军队使用由普鲁士政府提供的波森和西里西亚铁路网侵入匈牙利，将革命镇压下去。与此同时，一支法国军队攻占了由加里波第保卫的罗马，消灭了罗马共和国。

保守的英国虽然不是神圣同盟成员，但却是它的盟友。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不论它如何反动，都无法公开承认神圣同盟的基础，无法承认由此而引出有权武装干涉镇压民主运动和民主政府的“反革命原则”的合法性，因为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里——虽然他自己是民主的死敌——声明，“倘使英王承认这一 [60] 原则，那么将导致他自己的下台……汉诺威王朝不能承认与斯图亚特王朝以它的名义登位的原则相抵触的原则。”②他在一份致欧洲各国的备忘录（1820年5月5日）中提出，“任何一个实行代议制政府的国家都不能根据一国干涉另一国内政的原则”采

① 维孔特·德·吉尚：《第二共和国时期欧洲的重大问题和大国外交》（1925年巴黎版）。转引自L·B·纳米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1946年伦敦版），第94页。

② 转引自C·K·韦伯斯特：《卡斯尔里的外交政策（1815—1822）》（1925年伦敦版），第3卷，第301—302页。

取行动。

尽管如此，反革命国际的十字军征伐还是得到了卡斯尔里以及多数英国保守派道义上的全力支持。“大不列颠的托利党大臣们暗地里对攻击已取得英国代表直接同意而颁行的宪法表示支持。”卡斯尔里公开声明抗议卡尔斯巴德决议违反了英国也曾作出保证的联邦协议书，同时却祝贺梅特涅所取得的此项成就。“这个怪物”——他指民主革命——“还活着，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他在一封致梅特涅的密信中写道，“但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一定会有耐心将它加以摧毁。”卡斯尔里“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两国国王的残暴和阴险面前完全无动于衷，他们镇压本国的自由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英国力图加以巩固的。事实证明他是在串通梅特涅进行密谋策划”。^①

英国外交政策即使在坎宁接替卡斯尔里的职位后开始奉行自由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也还是为乔治四世及其顾问所破坏。他公开抗议路易十八宣布的对西班牙进行军事干涉的计划，英国最有势力的人物威灵顿公爵却暗中催促波旁王朝出兵。象梅特涅和大多数英国保守派一样，威灵顿认为，任何民主苗子“早晚都要导致无政府状态，任何形式的专制政治都需要恢复秩序”。因此他不仅反对英国，而且也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在希腊的自由战争中，他象梅特涅一样支持土耳其苏丹。他反对承认摆脱了西班牙统治而争得解放的南美各共和国。他敦促沙皇干涉匈牙利革命：“进军吧！只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他向俄国驻伦敦大使布鲁莫夫男爵说。连支持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帕麦斯顿也拒绝承认匈牙利革命政府，未提任何抗议，容许俄国军事干涉匈牙利，而如果英国表现坚决，本来是很有可能制

^① R·S·塞顿-沃森：《不列颠在欧洲。1789—1914年》（1937年剑桥版），第49—50页。

止这次干涉的。^①

[61]

反革命国际是一支异常强大的力量。它的核心由俄、奥、普三个封建君主国组成；围绕这一核心的，是德、意、西班牙三国封建王朝和所有欧洲国家的强有力的盟友，首先是天主教教会、拥有财产的英国保守主义资产阶级，以及1830年7月革命后掌握政权的法国金融贵族。

反革命国际的基础是统治阶级在保护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国际团结。这种国际团结鲜明地体现为：各国保守主义政府采取国际性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对付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自由运动和革命，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爆发。

被压迫阶级和民族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了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他们也必须采用国际性的联合行动；为了击败国际反动势力，有必要以革命国际对付反革命国际。1830年7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后在法、英、意、德等国出现的国际革命组织，就是认识到这一必要性的产物。维也纳工人的英勇行动出于革命的团结的愿望，他们在1848年10月起阻止反革命的奥军开赴革命的匈牙利。出于同样的革命团结的意愿，发生了1848年5月的巴黎工人暴动，他们冲进议院，迫使法国对俄国开战以援救波兰革命。反革命国际是革命国际的助产士。

① 金斯利·马丁：《帕麦斯顿勋爵的胜利》（1924年伦敦版），第51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

1

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革命的人民主权原则自1815年以来第一次战胜了由神圣同盟主张的反革命正统原则。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唤起了昂扬奋发的希望；他们相信，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时代现在开始了。

但是革命的蜜月和它带来的希望为时不长。正象1789年7月一样，巴黎市郊工人和小资产者在1830年7月也只是为一场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效力，充当了它的突击部队，因而象上次一样，这一回他们的斗争果实也被别人所窃取。他们在自由资产阶级议员的激励下，奋起赶走可憎的、由盟邦君主在1814年扶植起来的波旁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可是当他们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前，还没有定下心来思考问题时，老实而思想狭隘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就被梯也尔和拉菲德宣布拥戴为国王。

发动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推翻“君权神授”的专制制度，剥夺查理十世统治下不断扩大的神权政治的天主教的权力，特别是要变革贵族地主的统治。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打倒他们，目的是为了自己掌权执政。它希望通过君主立宪制确保自己独占政权；而不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同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分享政权。

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1830年完成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830年，”这个时代看问题最尖锐和考虑问题最深刻的过来人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830年中等阶级取得了最

后的、十分圆满的胜利，整个政治权力、所有豁免权、所有特权、所有政府权力，一古脑儿全落入了唯一的一个阶级的狭小天地，这个阶级采取法律途径，事实上将处于它之下和超乎它之上的一切通通排斥干净。”

中等阶级现在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决心“采取法律途径” [63] 对付“处于它之下的一切”，以巩固国家政权。^① 它通过给候选人规定财产资格限制的那种选举制，杜绝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对立法施加任何影响；它通过禁止成立工会和政治结社，使工人无法组织起来；它通过对新闻的控制，不许对它的统治提出任何批评。当1831年11月，即七月革命过后不到一年半，里昂纺织工人在饥荒暴动中起来时（他们当时从事家庭手工业，每天劳动十八小时，所得工资约为九十生丁），政府就出动军队，由苏尔特元帅指挥进行镇压。^② 鉴于政府扼杀一切反对派活动，人们只能组织秘密团体同政府进行对抗。这种秘密团体当时在巴黎为数很多。

2

这种秘密团体之一，是1834年由在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组织的“流亡者同盟”。两年后，以海尔曼·艾韦贝克和格尔蒙·莫伊勒为首的一派分裂出来，发起建立了国际先驱之一的“正义者同盟”。在正义者同盟章程第二条中指出，它的宗旨是“将德国从可耻的奴役枷锁下解放出来，并建立一种状态，尽人的职责之所能以防止重新被置于悲惨和奴役的境地”。在接受入盟时需要先进行如下宣誓：“我们工人已终于厌倦为懒汉劳动，忍受匮乏的痛苦，而别人则享受优裕生活；我们不愿再

① 阿列克西斯·托克维尔：《回忆录》（1954年斯图加特版），第40页。

② 见路易同上引书，第76页。

承受自私自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任何沉重负担，不愿尊重任何法律，这样的法律使人数最多和最有用的人类阶级处于受凌辱、匮乏、被歧视和无知识状态，而让为数很少的人成为这些劳动群众的主宰。我们要自由，并且要使全世界一切人象我们一样自由地生活，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比别人生活得好些或者坏些，而是整个负担、辛劳、欢乐和享受人人有分，这就是说，在共同体中生活。”正义者同盟跟由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阿尔芒·巴尔贝斯和马丁·贝尔纳领导的法国革命秘密团体“四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季社创建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者，他无私地献身于自己为之奋斗的思想，英勇而富有胆略，以其才智和高尚的道德成为追随者的[64] 导师和楷模。^① 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公会吉伦特派成员，后来在拿破仑当政时期任阿尔卑斯山麓小城市皮热-特尼埃的低级地方行政长官。奥古斯特十七岁时的一次经历，决定了他的生涯。当时他是拉罗舍尔“查理大帝”中学学生，亲眼目睹处决四名因参加革命秘密团体烧炭党而判处死刑的军士。布朗基发誓要为这些死难者复仇。他加入烧炭党，参加七月革命的街垒战斗，为此路易-菲力浦政府向他授予勋章，以资表彰。在邦纳罗蒂平等派关于密谋的故事鼓舞下，他将革命的突然袭击发展为一种军事艺术，并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布朗基在1837年提出的——作为这种夺取政权的方法的理论基础，它以布朗基主义的理论而载入社会主义思想史。

布朗基是从1839年起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为止这一期

^① 关于布朗基生平见尼尔·斯图尔德：《布朗基》(1939年伦敦版)；居罗达夫·热夫雷：《被关起来的人奥古斯特·布朗基》(1897年巴黎版)。关于布朗基思想的简介见保尔·路易：《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载于《新时代》(1900—1901)，第2卷。

间历次巴黎起义的灵魂。1839年5月首次发动武装突然袭击后，他被判处死刑，经从轻处理改为无期徒刑；法国大革命中他获释出狱，过不多久再次被判处十年单独囚禁；刚刑满释放，又一次为自己进行的正义斗争作出牺牲。这就是他一生的节奏，他被禁锢在监牢里的时间总共达三十七年之久。在巴黎工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他们管他叫 *l'enfermé*，意为“被关起来的人”。1848年5月15日，制宪国民议会成员托克维尔亲眼看见他率领一大批群众冲进议会会场，迫使政府出兵干预沙俄，以援救波兰革命。当时布朗基出狱后还不满三个月。“他两颊消瘦，布满皱纹，嘴唇毫无血色……他的外表象长满了霉菌；没有看见他穿内衣；一件旧黑大衣紧紧裹住他那枯槁瘦削的身子，”这就是托克维尔所看到的布朗基。^① 乔治·桑称他为“我们时代的马拉”，马克思称他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②。举行葬礼的那天，走在他的灵柩后面的有二十万巴黎工人，其中包括克列孟梭和路易·勃朗；在他墓前发表讲话的，有法国所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其中之一的爱德华·瓦扬，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创建人之一。

布朗基本人发动的第一次起义——“四季密谋”——也是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最后一次起义。1839年5月12日，几百名密谋成员攻入巴黎郊区城镇圣德尼和圣马丁的军火库，建立街垒。但就在当天傍晚，起义即遭到镇压，布朗基和其他起义领袖被捕。

3

正义者同盟参加了这次密谋。它的支部排列在队伍里一同 [65] 前进，也一起遭到失败。同盟的两个领导人，即印刷工人卡尔·

^① 托克维尔同上引书，第181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12页。——译者

沙佩尔和鞋匠亨利希·鲍威尔也被捕了，最后和约瑟夫·莫尔一起被逐出法国。^① 他们来到伦敦。

到达伦敦后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同盟小组。由于英国集会结社不受限制，他们选择了公开协会的形式——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为秘密同盟的宣传机构。协会成立于1840年2月，它经历了历史上的许多风暴；直到1917年底，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监禁德国籍公民，它才解散。^②

工人教育协会——同盟也是如此——很快就变成了国际性组织。参加者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以及也有个别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由于它同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因此改名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在会员证上印有十二种文字的一句口号：“人人皆兄弟”。协会成立五年后，即1845年，会员人数超过五百。协会会址设在索荷区的一家酒店里，这是位于伦敦中心的一个外国人聚居区；后来马克思也在这里居住过多年。据《北极星报》描述，在宽敞的会议厅里，墙壁上绘有饰以花边的莎士比亚、席勒、莫扎特和丢勒的肖像画，一幅大小和真人身材相等、头戴雅各宾派便帽的妇女画像，以及象征自由平等的标志。演说台的两侧分别立着自由塑像和正义塑像，在主席座位的上方悬挂一幅以工人联欢为主题的油画。四壁墙头挂着大幅红色粗麻布，上面用金色花环绕成十二种文字：“人人皆兄弟”。^③

^① 曾经是街垒战目击者的魏特林还提到参加战斗的另一个德国人：“最后一座街垒被攻下了。巴尔贝斯负伤倒在这座街垒旁……他身边还站着仅有的一个受伤者，一个德国鞋匠，但泽人奥斯滕。”《正义（原文如此，疑为“和谐”之误。——译者）与自由的保证》（1849年汉堡版），第14页。

^② 见B·巴吉拉也夫斯基：《共产主义者同盟史（1847—1850）初探》，载于《社会史国际评论》，1956年，第1卷，第236页。

^③ 约翰·萨维尔：《厄内斯特·琼斯：宪章派》（1952年伦敦版），第92页。有关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史见W·布雷特施奈德：《德国早期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意义》（1936年科尼斯堡版）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一位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载于1898年《德语》杂志。

虽然同盟的重点置于伦敦，但它的中央机关驻在巴黎。直到1846年秋它才移往伦敦，由沙佩尔和莫尔担任领导。

这一时期，同盟除与法国流亡者保持密切联系的强大的伦敦支部外，还有三个巴黎支部，由威廉·魏特林和菲利浦·贝克 [66] 尔组织的日内瓦、苏黎世、伯尔尼、沃州、纳沙特尔和阿劳等瑞士各州的支部，以及德国的几个小支部。但是，梅特涅的警察所说的话如果属实，那么它们的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支部以外。“它们打入了德、法、英、荷兰和瑞士的所有手工业行会，几乎占据统治地位，”一份发自苏黎世的警方报告(1845年6月15日)说，“它们利用整个联络网通信，相互鼓励，交换决议。如果受到警方监视，就互通消息。”①

1842年11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访问英国，在伦敦了解了工人教育协会的情况，结识了它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恩格斯在四十多年后说，他们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②，特别是沙佩尔(1813—1870)。沙佩尔于1832年参加由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鼓动黑森农民起义的密谋活动，当时他是农学院大学生。一年后，他和另一批密谋者袭击了法兰克福警察岗哨，逃亡国外，于1834年参加由马志尼领导的向萨瓦进军，欲将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1836年，他在巴黎建立正义者同盟，并于1839年和布朗基一起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他身材魁伟，”恩格斯这样描写沙佩尔说，“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幸福的生活乃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③

① 转引自路德维希·布吕格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史》(1922年维也纳版)，第1卷，第43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3页。——译者

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3版所写的引言(1885年)；恩格斯所作共产主义者同盟史概要，在该书第4版时(1914年)由弗兰茨·梅林加写序言，补充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2页。——译者)

1845年夏,当时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在恩格斯陪同下初访伦敦,恩格斯带他去看了工人教育协会。马克思也对协会领导人的团结精神和对理论的关心有着强烈的印象。在此以前,马克思同秘密团体没有任何接触,对秘密团体不怎么重视。它的那些密谋者的浪漫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空想主义概念,使他感到厌恶。本着他那不带任何浪漫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力量。布朗基派通过革命者武装突然袭击发动社会革命的思想,深深引起他的反感。他认为,英国宪章运动是独立自主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充满希望的榜样。这一运动所缺少的,象其他国家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人运动一样,是对自己的历史性目标的明确认识。

4

[67] 马克思在伦敦访问同盟时,正值同盟成员和魏特林进行一场持续了许多个星期之久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和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前景问题的讨论。

威廉·魏特林(1808—1871)是非婚生子,父亲系法国军官,母亲是德国裁缝。他出生于马格德堡,在贫困匮乏中长大,学会了裁缝手艺。他的写作和演说才能,他的理想主义和高尚思想,使他在德国工人群众中赢得了热情的追随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他进行过长期观察的威廉·马尔这样描绘他说,“他热心事业,带有一种宗教狂热的特色。”^①马克思称他为“大力士”^②,是德国早期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他那酷爱思索的

^① W·马尔:《青年德意志在瑞士》(1846年莱比锡版),第45页;另见奥托·布鲁格尔:《魏特林的影响(1841—1843)》(1932年伯尔尼版);罗伯特·格里姆:《瑞士社会主义思想史》(1931年苏黎世版)。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译者

精神，在圣经和法国社会主义文献——傅立叶、卡贝、拉梅耐——的哺育下，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基督教平均共产主义幻想。

1837年，魏特林来到巴黎，立即加入正义者同盟，他当时是一个流动的手工业帮工。在那里，想必他非常积极地谈论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因为同盟中央机关委托他“写一篇文章清楚地阐明平均共产主义的可能性”^①；这篇文章于1838年发表，标题为《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四年后，他在瑞士——他于1841年迁居于此——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被马克思称赞为“德国工人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这本书不仅在瑞士，而且在德国和奥地利惊人地广为传播，流动手工业工人不顾德奥两国警方监视森严和长期坐牢的危险——在奥地利甚至有被处死的危险，将该书偷带入境。继1842年初版两千册后，1844年在汉堡秘密印了第二版，1849年三版；这本书也被译成法、英和挪威文。^②

但是，魏特林在瑞士的组织、宣传和写作工作于1843年陡然结束。他写了一本新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并在征求预约该书的广告上宣称，他将“引用一百多处圣经上的话”论证基督是“自由的预言者”和共产主义先驱。虔诚的苏黎世教会法院认为这是十足的亵渎上帝，提请检察官对他进行刑事诉讼。该书被 [68] 没收，魏特林被捕，经过十个月的待审拘留后被起诉，判处半年徒刑和终生逐出瑞士，于是他被戴上镣铐，嘴里塞上东西，押到德国边境的巴登警局，引渡给普鲁士。经过短时期在德国四处流浪后，他于1844年9月去伦敦。

在伦敦，他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接待。工人教育协会举行国

① 麦克斯·诺特劳：《伦敦1845年德国共产主义讨论会》，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第10卷，第363页。

② 埃米尔·卡勒尔：《威廉·魏特林》（1887年荷廷根—苏黎世版），第38页；另见奥托·布鲁格勒：《瑞士德意志手工业者行会史》（1932年伯尔尼版）；卡尔·威特基：《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1950年路易斯安那版）。

际性宴会，英、法和德国演说者盛赞他是“献身共产主义的人”。这是在英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政治性集会，这次事件推动了各国民主之友协会的建立，该协会对国际史的作用在后文中还将谈到。

魏特林当然也应工人教育协会的邀请在该协会的每周讨论会上阐述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些谈话的记录，主要是魏特林与沙佩尔之间的谈话记录，已由麦克斯·讷特劳于1922年发表；它能使我们深深地了解德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①

可是，沙佩尔及其朋友们并不赞同魏特林的感情社会主义。尽管魏特林受到伦敦同志们的尊敬，但他们拒绝他的精神领导。

5

马克思在人们同魏特林进行争论的时刻访问伦敦，无疑了解了有关争论的情况。他看到，同盟作为工人理论学习机关和共产主义宣传工具是会起宝贵作用的。但他也看到，这种宣传必须扎根于一种明确的、从现实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引出的理论之中。

作为当时同盟成员汲取力量的源泉，社会主义有着形形色色的多种学派：圣西门、卡贝、傅立叶、蒲鲁东、布朗基、路易·勃朗、罗伯特·欧文、威廉·魏特林。马克思虽然为这些社会主义者的一些思想振奋过，但却认为他们的学说和方法是空想主义的，而不予接受。他觉得当务之急——如同他在回到布鲁塞尔后的计划和工作表明——是经常进行理论探讨，明确社会主义的基础问题和制定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他试图首先在布鲁塞尔创办一份国际性刊物，作为讨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论

^① 讷特劳同上引书，第362—391页。

坛,当这一计划失败后,他在1846年和恩格斯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通信和各种通知从精神上影响同盟的各支部。

同盟在伦敦的中央机构也深信运动需要有一个纲领。它在 [69] 1846年秋决定,于次年在伦敦召开所有各支部的代表大会,研究制定纲领。它还决定,请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纲领。

马克思当时才二十八岁,已经是德国最杰出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代表。他在《莱茵报》^①上——他担任该报编辑时还不满二十四岁——写的批判性文章,已为他享有同时代资格最老的政论和哲学作家之一的声誉打下了基础。“你把卢梭、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并考虑为一个人——我是说合并,不是说混在一起,你就知道马克思博士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莫泽斯·赫斯在一封致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的信(1841年9月2日)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②《莱茵报》的豪言壮语使普鲁士政府受不了,很快就被政府查封。此后马克思于1843年移居巴黎,他在巴黎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1845年初,他在被驱逐出法国后定居布鲁塞尔,在这里,他写下了《神圣家族》,这是和同时代哲学学派进行批判性论战的著作,它发展了在学术系统的精神修养中形成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载入欧洲思想史。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以他在1844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和为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撰写文章而成名。就同盟中央机关来说,希望争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制定党纲,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受同盟中央机关的委托,约瑟夫·莫尔于1847年初来到布鲁塞尔,邀请他们出席代表大会。据恩格斯记述,莫尔表示:同

① 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译者

② 埃德蒙德·西尔伯尔出版《莫泽斯·赫斯书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80页。

盟“确信我们的观点一般正确，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同盟将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机会“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邀请。

同盟代表大会于6月1日在伦敦召开。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分别代表巴黎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支部出席。马克思因缺乏旅费而未能成行。

代表大会决定，将同盟改组为一个宣传机构，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各执行委员会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罢免，并——如同恩格斯所说——取消“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现在它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同盟”^②。章程草案第一条指出，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③。经商定，将章程草案发给同盟各支部讨论，并于晚秋再次开会最后通过。代表大会还决定，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同盟的纲领草案，同时出版一份月刊；这份月刊——取名《共产主义杂志》——创刊号，也就是唯一的一期由沙佩尔编辑，于9月出版，刊头上印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沙佩尔主持下，于1847年在伦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英、法、比利时和德国支部的代表；这次马克思也来了，他刚与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和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的内弟——建立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据马克思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协会在代表大会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51页。——译者

② 见同上。——译者

③ 见同上。——译者

会时有一百零五名会员。^①

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关于确定同盟以新的性质的章程之最后文本。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以及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组成。同盟最高机构代表大会在每年8月召开，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并向其负责的中央委员会，是它的执行机关。由于当时除英国外几乎还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组织，因此应建立工人教育协会，由秘密同盟来掌握。

但是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问题却是党纲，为期十天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纲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执笔起草。

这一决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推动撰写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象少有的、不可磨灭的痕迹一样，永远铭刻在人类的思想体系之中。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②，贯穿着激动人心和令人神往的救世思想：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坚定不移的历史必然的原则，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必然不可避免地引起“整个社会的革命变革”。“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宣言预告说，“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

宣言还贯穿着另一个救世思想：工人阶级不使整个人类社

① 麦克斯·纳特劳：《马克思文选》，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集》，第8卷，第397页。

② 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明了为什么在1847年起草时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是指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站在工人阶级以外，向“有教养的”阶级发出呼吁。“共产主义者”是“根本改造社会”的思想的代表，他们向工人阶级发出呼吁。恩格斯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直接引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4页。——译者）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3页。——译者

[71] 会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就不可能使自己从它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从不合理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就是使全人类从社会不合理的一切弊端下解放出来。这一思想，使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的斗争由于一种道义的或历史的意识而变得神圣光荣起来，因为它既是为实现自己的道义要求而尽力——人人自由平等的思想，也是为历史必然性而尽力：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6

宣言写于欧洲各国革命的前夜。文件的字里行间，许多地方荡漾着盼望历史性时刻到来的激情。当同盟代表大会于11月底在伦敦召开时，传来了瑞士联邦政府不顾俄、奥、普、法等国的威胁而镇压反动的天主教宗得崩德^①的消息；1月里，马克思还在草拟宣言，爆发了伦巴第和西西里起义，以及那不勒斯、都灵和佛罗伦萨革命。马克思预见到革命也将波及法德两国；他在宣言中预告，法德两国即将爆发革命。

宣言出版——德文本，在伦敦印刷——后两星期左右，法国革命开始了。2月23日在巴黎街头举行游行，心平气和地要求选举改革的人民群众遭到枪杀，这是革命的导火线。翌日，工人“一举成为巴黎的主人”——托克维尔这样报道说。托克维尔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和1830年革命，并对1789年革命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对1848年革命最深刻的体会，是认识到它具有的崭新的社会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他这样写道。“这一次问题不在于引导一个政党取得胜利；人们力求建立一种社会学，一种哲学，我几乎要说

^① 亦称特殊联盟。——译者

是一种宗教……这是某种真正的新事物的征兆。”^①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到达伦敦时，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布鲁塞尔总区部全权委托马克思在巴黎成立新中央委员会。3月初，沙佩尔、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分别从伦敦和布鲁塞尔迁往巴黎。

但是，马克思在巴黎成立中央委员会以前，必须在他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作出一个政治决定，这个决定在巴黎德国流亡者聚居区引起了很大的纠纷。法国爆发革命当然受到了在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来自比利时、意大利、波兰和德国的好几千名流亡者——十分热烈的欢迎。1792年和1793年，外国流亡者革命军团曾经同法国革命军并肩为解放自己的祖国进行过战斗，现在这一传统再次活跃起来。这些日子里，在巴黎的一个由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领导的德国民主派协会，决定成立一支德国革命军团。 [72]

作出这项决定的会议在3月6日召开，即马克思到达巴黎的第二天。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演说，表示不同意这个主意。他说明，不能靠外国的刺刀尖把革命送进自己的国家；外国武装部队的入侵只会加强本国的专制统治，因为那样一来，本国专制统治可以以民族独立和国家保卫者的姿态，呼吁人民群众发扬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建议工人们一个个返回德国，在德国为革命工作。

此后不久即行成立的同盟新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沙佩尔任书记——批准了马克思的立场。它为日益临近的德国革命拟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十七条要求中的第一条是：“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②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由它组织几百名

① 托克维尔同上引书，第119—120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53页。——译者

德国流亡者返回德国。3月13日维也纳爆发革命，3月18日柏林爆发德国革命——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高卢雄鸡的高鸣”^①发出了德国革命来临的信号，这时多数同盟成员赶回德国，迅即站在当地工人运动的最前列。马克思和恩格斯去科伦创办《新莱茵报》，这是革命的领导机关，它的创刊号于1848年6月1日问世。

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盟再存在下去已属多余，因为据马克思在到达科伦后随即召开的一次同盟领导成员会议上声明，它“不是一个密谋、而是一个宣传”组织，并且“在现有情况下可以公开进行宣传而不需要保持秘密状态，因为存在着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马克思提议解散同盟，由于沙佩尔和莫尔表示抗议，他根据在巴黎授予他的全权宣布同盟解散。^②

但是，欧洲革命失败后，同盟又在1849年秋在伦敦恢复活动。老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在伦敦聚会，马克思也参加了，他是在先被逐出科伦（1849年5月）、继而被逐出巴黎（1849年8月）后移居伦敦的。只有莫尔缺席，他在巴登战斗中牺牲了。

7

[73] 同盟期待很快再次爆发革命，由马克思在1850年3月执笔写成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指出，“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③。告同盟书详细阐明了工人阶级在下次革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5页。——译者

② 关于1848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之解散，共产党人案件的主要被告彼得·格尔哈特·勒泽尔的供词提供了特别富于启发性的说明，该供词存柏林警察总局档案中，由奥托·梅恩兴-黑尔芬和波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录出，作为他俩所著《卡尔和燕妮·马克思》的附录出版（1933年柏林版），第152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0页。——译者

命中应采取什么态度，最后提出“战斗口号”：“不断革命”^①。马克思在1850年6月还认为——他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为时不久一定会迅速爆发一场新的革命”。^②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产生了怀疑。他们通过共同研究，认识到反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在于世界经济的复苏。184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革命之母”——在1849年已经过去，开始了繁荣时期。他指出：繁荣是“反革命之母”。这一研究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时期已暂时结束。马克思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③

对于革命前景这个问题，同盟内部发生了一场争执，在1850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导致分裂。^④以沙佩尔和维利希为首的一派指望革命即将再度爆发，要求同盟按此调整政策。^⑤根据布朗基不断革命论——这也是1850年3月《告同盟书》末了提出的“战斗口号”——的精神，他们把革命仅仅看成一个军事策略和领导意志力坚定的问题。他们相信，工人阶级在下次革命中能够夺得政权，并通过相应的“措施”长期确保自己的统治。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9页。——译者

② 两次告同盟书全文附在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后出版。

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5—6期）（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译者）

④ 见同盟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记录，载于尼古拉也夫斯基同上引书，第248—252页。

⑤ 沙佩尔和维利希在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通知中，对分裂原因作了如下解释：“早在我们和他们（马克思及其同志们）站在一起时即已产生的唯一一个原则性分歧是，这些人表示必须至少再当上五十年反对派，即采取单纯批判态度，而我们则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我们党的恰当组织下，我们一定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贯彻为工人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措施。”通知标题为《1851年第一季度维利希告党内书》，载于普鲁士王国警官维尔特穆特博士和施梯伯博士合著的文献集《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附录15，第1卷（1853年柏林版），第276页。

这是他们从1789年革命史以及从1830年和1848年革命史中引出的教训。他们认为,1789至1793年事件已证明,只要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英勇地在街头为政治权力进行战斗,他们就能取得胜利。1830年7月的日子,以及1848年巴黎的2月和维也纳、柏林的3月,也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训。为什么过去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在明天重演呢?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那时为止之所以失败,他们解释说原因在于其领导的“错误”。

沙佩尔和维利希参加过战斗,亲身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前普鲁士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现在是火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曾作为志愿兵小队长和恩格斯一起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他计划在革命的第二天建立军事专政。沙佩尔在革命前曾向魏特林表示了自己的主张,即革命必须有待于工人“成熟”。但他从1848年革命的经历了却引出教训,认为革命胜利首先取决于革命领袖的知识和思想成熟程度。

沙佩尔和维利希指望革命即将重新爆发,在这一点上他们并非孤立。在伦敦的许多法、意、波、匈和德国流亡者侨居区,对这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他们草拟革命纲领,讨论革命政府的组成人选。诗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个虽然才华平平、但有浪漫主义的灵光护身的革命英雄——提出,向美英两国借一笔革命贷款,作为德国革命的经费;他的主意受到德国流亡者、包括沙佩尔、维利希和魏特林的热烈欢迎。

马克思骇然地同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划清界线。他不相信仅仅靠领导意志力坚定就能发动一场革命;革命是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的综合情况下的产物。他也不相信可以跳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他在同魏特林进行的一次激烈争论中说:“目前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由资产阶级掌权执政”^①,他在宣言中重复谈了这一思想。当时,他对魏特林“把革命当做儿戏”加以驳斥,说:“唤起异想天开的希望决不会导致受苦者获得

拯救,而是导致他们的毁灭。”①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通过革命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而变 [75] 得坚定起来。他在会上对沙佩尔提出不同意见,说:“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②。路易·勃朗实现“劳动权”的试验,由于1848年6月24日巴黎工人受到残酷屠杀而失败。马克思指出:“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③

讨论最后是决定各走各的路。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央委员会正式迁往伦敦。在伦敦同盟成员的多数支持下,沙佩尔和维利希建立了一个宗得崩德。

8

共产主义者同盟始终不是群众性组织。它的成员人数很少,根据同盟章程规定的“具有革命效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④的义务,作为社会主义种籽的传播者在工人教育协会、体育运动协会和歌咏协会中活动——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也深入到农民和短工协会。这样,为数较少的同盟成员成功地

① 见1846年3月31日魏特林致莫泽斯·赫斯特他与马克思争论的信,载于前引《莫泽斯·赫斯特书信集》,第151页。争论发生在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有马克思、恩格斯、比利时人非力浦·日果、德国人路易·海尔堡、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威廉·魏特林和约瑟夫·魏德迈,客人有俄国自由派作家P·W·安年柯夫。

② 见安年柯夫就谈话所作记述,载于梅恩兴和尼古拉也夫斯基同上引书,第104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9页。——译者

④ 见同上,第637页。——译者

⑤ 见同上,第4卷,第572页。——译者

在广大工人阶层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德国各邦政府被共产主义宣传弄得惶惶不安。它们推测，伦敦是它的中心，马克思是其头子。普鲁士政府在1851年春考虑，会同奥地利和俄国向英国政府提出①，“将特别有名的主要革命者作为欧洲国家秩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敌人……驱逐出侨居区，以消除祸害”。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倾向于一个更为现实主义的、虽然他自己承认并不是完全“诚实的主意”；他亲笔写信给他的首相冯·曼托伊费尔男爵，责成他“揭露这一解救[76]阴谋的组织，并让普鲁士公众看到一出又长又正义的戏，即一个阴谋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向他推荐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威廉·施梯伯执行这项不太干净的任务。②

施梯伯接受了这项任务。由于一次意想不到的偶然机会，他发现了十一名同盟成员的行踪。他们于1851年5月被捕，经过待审拘押一年半后，于1852年10月4日押上法庭。当载着犯人的公共马车在身穿胸甲的骑兵重重包围下驶过法院大楼时，据一位目击者报道，迎接他们的是“汇集着的无数人群，脱下帽子，此起彼伏地高呼万岁”。③

起诉书指控被捕者“策划旨在推翻宪法及武装公民和居民进行反对国王权力并挑动相互内战的阴谋活动”。检察官在起

① 《德国中央第二档案馆文件》，载于卡尔·奥伯曼：《1849至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史料》（1955年柏林版），第66—67页。又见奥地利驻伦敦大使B·科勒1850年6月8日致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谈他与英国内政大臣乔治·格雷爵士谈话的书面报告。他告诉这位英国大臣：在以卡尔·马克思、F·恩格斯、H·鲍威尔和A·维利希为领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甚至谈论了谋害国王”，并且显然是建议对他们进行迫害，因为格雷爵士回答说——科勒在报告中写道——：“根据此间的法律，谈论谋害国王并非指的英国女王，而且只要不存在证据确凿的计划，就构不成拘捕密谋者的理由”。材料来源为奥地利王室、宫廷及国家档案馆，转引自路德维希·布吕格尔：《伦敦流亡岁月中的卡尔·马克思》，载于《斗争》第17年度（1924年），第347页。

② 国王亲笔信见梅林同上引书，第165页。

③ 见贝姆巴赫致马克思信，载于梅林同上引书，第167页。

诉书中还指出，情节特别严重的是，被告所属的党力图“甚至……压制一切对神的和对世俗的感情”。①

案件确如国王设想是一出“长戏”，演了五个星期，但并不十分精彩。警方在搜查住宅时，抄到了宣言和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也抄到了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几份通知和印刷品，但这些文件没有任何一份能证明挑动内战的“阴谋”罪行。事情也只能如此，因为同盟虽然是秘密组织——因为革命被镇压后在德国不可能公开宣传拥护共产主义思想，但并不是搞阴谋活动的组织。由于起诉缺乏证据确凿地说明阴谋推翻政府的文件，于是施梯伯投国王之所好，自己动手炮制罪证。这个掩人耳目的可笑的故事，由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作了记述。

在陪审员席上坐着六名贵族、四名金融贵族和两名文官。伪造的文件在审讯中一批批被抛出来。但陪审员未能有力地抵制国王的意愿——上演这出虽然不是被破获的但却至少是“受到惩办的阴谋”的“戏”。六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在要塞监禁三至六年、剥夺公民权，并在刑满后交由警方监督；另外五名宣判无罪。万哈根·冯·恩赛②肯定不是同情叛逆罪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次卑鄙的、毫无道理的判决，政府拼命作了各种准备，用了一年半时间待审拘押，任命了陪审员，玩弄欺骗狡诈手段…… [77] 在这里和莱茵河畔所有精通法律的人都深信，根据现行法律是不可能对被告判罪的。但是现在的普鲁士法官和普鲁士陪审员都是干什么的啊！我感到十分痛心！”③

审讯起了不小的宣传作用。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意味着共

① 卡尔·比特尔出版：《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同时代报刊中的反映》（1955年柏林版），第48和50页。

② 万哈根·冯·恩赛（1785—1858），德国作家，进步的浪漫主义文学家。——译者

③ 卡尔·奥古斯特·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第9卷，第411页；转引自奥伯曼同上引书，第125页。

产主义者同盟的完结。宣判后不久，同盟即经马克思提议，通过表决后解散。过了几个月，宗得崩德也结束了。它的领导成员散处四方。亨利希·鲍威尔去了澳大利亚，魏特林、艾韦贝克和维利希去了美国。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任准将，在田纳西州的默尔弗里斯博罗战役中身负重伤。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进了父亲开办的纱厂，马克思开始研究撰写《资本论》。当十二年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它的总委员会成员中有原同盟盟员马克思、恩格斯、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卡尔·普芬德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民主派兄弟协会

[78]

1789年至1848年的英国社会史,是工人阶级暴动、反对随着工业革命而压在它头上的残酷剥削^①,反对束缚它的政治上毫无法律保障的波澜起伏的历史。

以通讯会为其组织形式的第一次暴动浪潮,如同前文所述,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世界主义平等思想推动下掀起的,托马斯·倍恩对这种思想作了感人至深的阐述。继第一次暴动浪潮过去,一段沉闷的、绝望的反动时期之后,是捣毁机器者的暴动;在他们被镇压下去以后,是罗伯特·欧文的合作社社会主义运动;再后,欧文的运动失败,工会运动重新抬头,并最终出现了强大的宪章派选举法改革运动。^②

这是一个年轻的、往往还囿于农村观念的工人阶级的运动,被圈地法弄得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就是从农村流入新的工业城市的。他们长期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现代资本主义怪物面前。他们不断寻找和尝试采用新的方法争取摆脱工厂奴隶制度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在同苦难和屈辱进行搏斗中,工人群众中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渐渐形成,这种思想是来自工人的认识,即他们只有作为阶级进行联合斗争,才能摆脱个人的苦难。

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本身就包含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思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特别是在第8、13和23章中,对此作了动人的、记实性的描述。有关工业革命中英国工人状况的最优秀的研究著作是J·L·和巴拉·哈蒙兹的《悲惨时代》(1934年伦敦版)。

^② 有关英国工人运动史的这些时期,见贝尔同上引书,第1和第2部分。

[79] 想、全世界被压迫者团结思想的萌芽。这个思想曾经启发了英国第一个政治性工人运动——通讯会，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再次唤醒了它。

1

给予推动作用的，是1830年7月的法国革命和1830年及1831年的波兰革命。在七月革命一周年时，工人报纸《穷人卫报》号召伦敦工人举行一次宴会，庆祝那次“光辉和不朽的事业”，用以显示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必须永远看到，”号召说，“我们要永远牢记工人阶级在巴黎街头所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导致了比利时、瑞士和光荣的、虽被出卖但仍决心争取胜利的波兰人的自由。”^①

这一呼吁以及《穷人卫报》号召参加的1831年8月1日群众大会，是国际团结思想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复苏的最初反映。《穷人卫报》和后来宪章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始终意识到这种思想。宪章派领袖威廉·洛维特于1836年创建的宪章派政治团体伦敦工人协会，也因受到国际工人团结思想的激励而生气勃勃。“统治我们的人联合在一起，我们干吗要被民族和宗教偏见分开呢？……没有国际团结，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解放人类，”该协会在它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这样说。^②

这时候的伦敦，是许多法、意、波兰和德国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他们组织在各种协会中，他们的许多领袖同宪章派领袖威廉·洛维特、乔治·朱利安·哈尼及厄内斯特·琼斯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响应正义者同盟盟员卡尔·沙佩尔和波兰革命者

^① 见Th·罗特施泰因：《国际史前史》，《新时代》1913年第17期补刊本，第3页。

^② 贝尔同上引书，第275页。

路易·奥博尔斯基的提议，洛维特会同波、德、法流亡者于1845年建立了各国民主之友协会。这是英国第一个国际性团体。

但是协会的寿命很短。洛维特是一名出色的工人，职业为木匠，彻底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思想的信徒；他才华过人，是工人自由的文件并以此给运动命名的宪章的执笔者。当时的宪章运动以他和菲格斯·奥康瑙尔为首领，他在运动中代表以“道德力量”作为工人解放斗争手段的思想，代表为争取普选权与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策略。

[80]

由他起草的各国民主之友协会成立宣言，也贯穿着这一思想。宣言号召“所有被压迫者”起来进行反对“城堡、军队和监狱”的联合斗争；它呼吁一切阶级的人类感情，并本着洛维特的人道的和平主义的根本观点坚决拒绝任何革命的方法。可是这种思想不能给政治流亡者以鼓舞，政治流亡者的奋斗目标是再次爆发革命，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推翻将他们逐出自己家园的各国政府。革命流亡者纷纷退出协会；协会在成立后不久即告结束。

但是就在这一年，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了。它以国际先驱者之一载入史册。它的成立归功于哈尼的首倡。^①

乔治·朱利安·哈尼(1817—1897)是英国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他原是一个孤儿，父亲曾在商船上当水手，他也渴望去海上。十一岁至十四岁时就在航海学校读书，但因体质过于柔弱，不能适应这种重活，不得不在首次海上航行后放弃这一职业。他成了《穷人卫报》的卖报青年。推销这份工人报纸可是冒险的事情。为了限制在工人中发行报刊，法律规定每期报纸征收印花税四便士（按当时币值约合三十三芬尼）。《穷人卫报》创办人亨利·赫瑟林顿置法律于不顾，该报出版没有印花

^① 最优秀的用德文记述的有关民主派兄弟协会史，见罗特施泰因提及的文章。

税付讫的戳记,而且在报头上刊登醒目的标题:“本报宗旨为抨击法律,拥护公理,反对强权”。每份报纸都得采用巧妙的方法避开警方密探,通过秘密渠道偷偷送到工人手里。谁要是在送报时被逮住,就得进监牢。哈尼在不满十七岁时第一次被判处半年徒刑,十九岁时已第三次被判处半年徒刑,而当时的英国监牢是活地狱。但他对此无所畏惧。当第三次站在法官面前时,他毫不胆怯地对法官说,他在释放后仍要非法传播《穷人卫报》,这是他在反对统治阶级强加给工人的“知识税”的斗争中应尽的责任。

是《穷人卫报》燃起了年轻哈尼拥护社会主义的激情之火。这份报纸的编辑是詹姆斯·布朗太尔·欧布林(1805—1864),他的父母很富有,他抛弃了收入优厚的律师生涯,一心在工人阶级中为最贫苦的下层效力。欧布林是宪章派领袖中的精神支柱,卓越的作家和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家,最先试图给宪章派运动确定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宪章派将他奉为自己的哲学家,称[81] 他为他们的“导师”。

哈尼钦佩欧布林。他认识他写的每一个字;他欣然接受他的精神领导。欧布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传统。他认为罗伯斯比尔是理想的人民领袖,为罗伯斯比尔撰写挽歌及其生平的片段。他吸取巴贝夫学说的精神来制定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也翻译了邦纳罗蒂论巴贝夫及其平等派密谋的著作。欧布林拥护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传给了哈尼。马拉、巴贝夫、托马斯·倍恩,成了哈尼努力学习的榜样。根据这些人的精神,哈尼于1837年发起组织了左翼宪章派组织——伦敦民主协会,据他在成立宣言中说,协会的任务是:“通过传播人类伟大哲学家和拯救者托马斯·倍恩代表的原则,以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①

^① 转引自A·R·斯科廷:《宪章派的挑战——乔治·朱利安·哈尼画像》(1958年伦敦版),第14页。

伦敦民主协会由哈尼任书记，很快就有数千名伦敦码头工人、纺织工人和爱尔兰短工参加。按照他们的设想，协会应起到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俱乐部所起的作用：将宪章运动进一步推向社会革命。象法国大革命起到了人类斗争的先导作用那样，宪章运动应成为全世界工人为自由而斗争的先导。它提出，宪章运动的目标应是：“自由的共和国世界”。

伦敦民主协会成立后不久，哈尼以惊人的速度晋升为左翼宪章运动的领袖。两年后，他不满二十三岁，被三个大工业地区的工人推选为出席宪章派全国会议的代表，并于1841年成为《北极星报》编辑。1843年，恩格斯在《北极星报》编辑部看望了哈尼。他们两人结为朋友。很明显，这时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进一步加深了哈尼头脑中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激发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意识。

1845年9月22日，在为庆祝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纪念日而举行的宴会上，哈尼宣布这个国际工人组织成立。这次集会系由各国民主之友协会召开，由宪章派诗人托马斯·库伯主持，它已经带有国际的性质。法国、波兰和德国的流亡者团体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当中有莫尔和魏特林。

民主派兄弟协会于1846年3月15日建立起完备的组织。最初，为了避免嫌疑——仿佛它是同宪章运动竞争而建立的政党，它是一个没有章程的松散的协会。协会的目的是“成员之间相互进行教育并宣传协会的口号‘人人皆兄弟’中包含的伟大原则” [82]。在为庆祝协会成立一周年而召开的大会上，哈尼将协会的纲领表达为如下庄严的声明：“我们谴责、鄙弃和诅咒一切传统的政治不平等和阶级差别。我们宣布，地球及其一切自然资源都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我们声明，容许懒汉和投机者垄断土地果实和劳动成果、并强制劳动阶级为不得温饱的工资服劳役的现有社会状况，是断然不公正的……出于我们的道义信念，我

们承认我们的同人不分出生国土都是同一个家庭——人类——的成员和同一个公团——世界——的公民。”^①

哈尼是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作为《北极星报》编辑，他将这份工人报纸提供给民主派兄弟协会去支配。他刊登协会的声明及其会议上所作的演说，发表恩格斯论大陆上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报纸变成了宣传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思想的强有力的工具。哈尼虽然不是天才的演说家，但却是宪章派领袖中最受人欢迎的演说者之一。他孜孜不倦地在大小会议上进行宣传，使人们了解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思想，建立地方组织，寻求宪章派领袖的合作。全国宪章派协会主席菲利浦·麦克格雷斯及其另外两名执行部成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执行委员会。1847年年中，民主派兄弟协会已在二十多个城市中有了地方组织。

民主派兄弟协会每月第一个星期一召开例会。每个重要革命纪念日——如攻占巴士底狱、宣布法国大革命开始、波兰起义，以及诸如克拉科夫起义、日内瓦革命、葡萄牙政府委员会举事等每个同时代革命事件，都被用来举行集会和发表宣言，这些集会和宣言的影响远远超出英国国境之外，得到大陆各民主协会和报纸的响应。

由于民主派兄弟协会如此声誉卓著，它寻求一种更为固定的组织形式。1847年12月通过的章程规定，会费每年为一先令。由总书记和各成员国组织的通讯书记组成执行委员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为：通讯书记朱利安·哈尼（英国）、卡尔·沙佩尔（德国）、让·米歇尔（法国）、彼得·霍尔姆（斯堪的纳维亚）、奥古斯特·内梅特（匈牙利）、亨里·许伯特（瑞典）和路易·奥博尔斯基（波兰）；此外，参加执行委员会的还有宪章派领袖菲利浦·麦克格雷斯、厄内斯特·琼斯、托马斯·克拉克、查尔斯·

^① 转引自G·D·H·科尔：《宪章派画像》（1941年伦敦版），第284页。

多伊尔和威廉·狄克逊。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结构是历史性国际^①的完备的楷模。象后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中央委员会内，各国通讯书记代表本国支部，直接与本国支部联系。 [83]

从它的目标和激励它的精神来看，民主派兄弟协会也是历史性国际的名副其实的先驱。民主派兄弟协会是一个工人国际，它鼓吹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问世两年以前，在历史性国际成立二十年以前，它就宣布了全世界无产者战斗共同体的思想。

在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46年2月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哈尼阐述了民主派兄弟协会对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思想的想法。“我呼吁各国被压迫阶级为了共同事业联合起来，”他这样说。但是，什么是共同事业呢？是使波兰摆脱俄国的外来统治，还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外来统治呢？“仅仅摆脱俄国和奥地利的枷锁，那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他说。“我们不需要查尔托雷斯基国王”（革命的波兰贵族领袖）。“我们不需要意大利王国。我们需要的是两个国家的人民主权。”那么谁是“人民”呢？他说，人民是工人和农民，人民的事业是“劳动、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劳动的事业……全世界生活着这样的人，他们生产小麦，吃的却是土豆，生产衣服的人却衣裳褴褛，造房屋的人却住的是破茅屋……各国工人岂不是一样困苦吗？因此他们的美好事业岂不是相同吗？”

历史性国际充满了各国工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中十分生动地表现出来。在一次声援葡萄牙革命的群众大会上，哈尼说：“打击特茹河畔的自由，就是打击泰晤士河畔的一切自由之友；法国共和制的成就将决定所有

① 历史性国际，即指第一国际。——译者

其他国家暴政的命运；而英国民主宪章的胜利将导致全欧洲千百万人的解放。”

民主派兄弟协会同在伦敦的各左派革命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法国民主派联盟和左翼波兰民主协会——紧密配合工作。为了专门在英国公众中宣传波兰革命事业，它成立了一个复兴波兰民主委员会；哈尼任委员会书记，宪章派领袖奥康瑞尔任财务委员，赫瑟林顿和厄内斯特·琼斯以及沙佩尔和奥博尔斯基均任委员会委员。

与民主派兄弟协会建立联系的第一个国外的国际性团体，是由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建立这一联系是由马克思主动提出的。1847年夏，有 [84] 一名工人代表，即奥康瑞尔被首次选进英国议会。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发出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利浦·吉戈签署的贺信，祝贺民主派兄弟协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并声明同宪章派团结一致。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复信中表示“全世界民主派在争取政治和社会平等的伟大斗争中紧密联合”。果然，协会在成立两周年之日发出一个号召：组织起来召开国际无产阶级民主代表大会——作为同当时正在召开的资产阶级国际自由贸易代表大会分庭抗礼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欢迎这一建议。他以布鲁塞尔民主派代表身份，赴伦敦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举办的纪念波兰1830年起义的活动。

纪念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前夕召开。沙佩尔宣读了布鲁塞尔民主派的贺信。接着，马克思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说，他受布鲁塞尔民主派的委托，同他们的伦敦兄弟就明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各民族工人争取建立全世界自由的代表大会”一事进行商谈。比利时民主派和英国宪章派都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如果英国宪章派实施了他们的宪章，“他们就给大家开拓了争得自由的道路”。“英国

工人，”他在演说结束时说，“完成这一使命，你们就将被誉为全人类的解放者”①。

在答复由马克思呈递的贺信时，民主派兄弟协会向布鲁塞尔民主派表示：“你们的代表、我们的朋友和兄弟马克思将告诉你们，我们怀着何等的激情欢迎他的到来和宣读你们的信件……我们以雀跃的心情接受你们向我们提出的结盟建议……我们已提议建立一个民主代表大会，我们高兴地听到你们公开宣布了同样的建议。必须以各国人民的密谋战胜各国君王的密谋……我们深信，为了实现普遍的兄弟情谊，必须向真正的人民发出呼吁，向在现有社会制度压迫下每天流血流汗的无产者发出呼吁。”②

2

但是，经由民主派兄弟协会提出建议原定于1848年10月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由于这一年发生的事件而没有开成。

1848年2月和3月先后爆发的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已由1847年秋革命风暴行将到来之前的闷热作出了预告。瑞士的革命情绪高涨，意大利爆发了革命，爱尔兰民怨沸腾，英国宪章派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决战。

[85]

在巴黎爆发革命的同一天，民主派兄弟协会正在召开盛大的集会，纪念克拉科夫起义。这时伦敦尚未获悉巴黎发生的事件，哈尼已预告欧洲革命即将到来。他说，欧洲这场革命的唯一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从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群众必须夺取政权，

① 此段引文均根据德文原著译出。——译者

②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1918年莱比锡版），第147页。

以便使“种地的人也是土地的主人”。过去工人在各次革命中流了血，但革命的果实却被资产阶级所占有；现在是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了。

法国爆发革命使民主派兄弟协会振奋异常。一个目击者记述了在集会过程中传来路易-菲力浦下台和宣布法兰西共和时的场面。“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从他们的座位上跳了起来，相互拥抱，兴高采烈地叫喊和打着手势。人们将布置会场的旗帜从墙上摘下来，举在手中挥舞，一面高呼‘万岁！Eljen！① Vive la Republique！②’，随后，人们手挽着手，高举迎风招展的旗帜，走向宪章派的集会广场。”③

几天后，民主派兄弟协会召开庆祝革命的大规模集会。会上通过了致法国临时政府的贺信，并派哈尼、琼斯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麦克格雷斯为代表，呈递这一贺信。代表团组成人员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沙佩尔、莫尔和鲍威尔，他们一行于3月4日到达巴黎，次日受到赖德律-洛兰、路易·加尔涅-帕热斯和阿尔芒·马拉斯特代表政府接见。代表团也参加了在海尔维格主持下于3月6日召开的有名的巴黎德国工人大会；在会上，他们会见了马克思。

3

法国革命焕发的激情感染了全体工人群众。四十年代的英国遭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以“饥饿的四十年代”载入英国社会史。工人寄希望于实施宪章——工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以结束他们的苦难。1839年和1842年，议会曾两次拒绝几百万

① 匈牙利语：万岁。——译者

② 法语：共和国万岁。——译者

③ 转引自斯科廷同上引书，第157页。

人签名的关于要求取得普选权的请愿书。欧洲革命事件再次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伦敦墙头张贴了声援法国革命的标语，口号是“拥护法兰西共和，拥护英国实施宪章！”在伦敦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和郊区草地以及广场上，连续召开声势浩大 [86] 的夜间露天大会，因为伦敦的各处会场太小，容纳不下涌来集合参加示威游行的大量人群。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纽瓦克和其他城市，在这些星期里出现了骚动。人们再次发动为请愿书签名，执行委员会定于4月3日在伦敦召开全国会议，讨论战斗措施。

出席全国会议的有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代表四十二人，其中有奥康瑙尔、哈尼、琼斯和欧布林。首先，全国会议将请愿书的原则草拟为下述声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民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本。工人有权优先享有自己创造的产品。在没有代表参加议会的情况下课税，这是暴政。能够借以最妥善地发挥和最有成效地管理一个国家的资源和经济手段的法律，乃是由劳动者和一切依靠手艺辛勤为生的阶级的代表制定的法律。宪章主义者承认这些原则，要求将人民宪章当作国家的法律。”①

然后，全国会议决定宣布自己为常设机构，号召工人于4月10日在肯宁顿公有地——位于伦敦南郊工人区的一块大草地——集会，从那里出发，游行去议会递交请愿书。

资产阶级和政府慌了手脚。整个欧洲，从加来海峡到匈牙利低地，各国人民都起来革命了。革命的狂涛巨浪，难道不会同样把英国淹没么？资产阶级害怕，由宪章派全国会议计划的群众游行将会发出爆发革命的信号。政府成员坎贝尔爵士在宪章派游行前一天写给乃兄的信中，说出了资产阶级的心情：“这也

① 转引自贝尔同上引书，第410页。

许是我在建立共和前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①

政府准备决战一场。它于4月7日向国民宣布，宪章派全国会议是非法团体，警告国民不要参加游行行列。同时它宣布伦敦戒严，将首都变成一所固若金汤的军营。它把南英格兰卫戍部队调集伦敦，命令内河水兵戒备，武装资产阶级——由十七万名志愿者组成一支号称“特别警察”的辅助警察部队，并授权滑铁卢之役胜利者威灵顿公爵指挥作战部队。伦敦塔、英国银行和政府大楼均用沙袋筑垒，大百货商店关门打烊。威灵顿封锁了从伦敦南郊工人区进入市中心的各处桥梁。《晨报》在游行前

[87] 一天警告宪章派，“大量骑兵和配备炮兵的步兵严阵以待，一声令下，即行出击……”

4月10日，约有十万名群众不顾警告，涌向肯宁顿公有地集会。但大会还未开始，就来了一名警官，他通知奥康瑞尔和欧布林：政府虽然对召开大会无可奈何，但决不容许游行去议会，因为根据现行法律，哪怕对议会施加表面上的威胁也是有罪的。

在号召举行示威游行的民众集会上，人们讲话往往都是些革命的豪言壮语。聚集在肯宁顿公有草地上的群众盼望采取革命行动。但是全国会议并未作进行革命的打算。群众没有武装。面对政府调集大量武装力量，宪章派领导放弃了游行的计划。受到群众崇拜的奥康瑞尔恳求群众平静地散去。群众散去了。

请愿书——据后来一个议会委员会指出，共有一百九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九人签名——用三辆有篷的马车装着，由执行委员会委员护送到议会。直到十五个月后，它才提交议会讨论，以二百二十二票对十七票而第三次被否决。

^① 转引自雷蒙德·波斯特盖特：《一八四八年铁闸》（1955年伦敦版），第118页。

4月10日的游行示威无声无息地告终，使宪章运动一蹶不振。对第三次试图迫使政府接受宪章的不光彩的失败，工人们感到无比失望。宪章派领袖在绝望之余，的确设法重新树立工人的自信心，鼓励他们继续斗争。他们在外地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声称要组织一支国民卫队，在几处地方发生了暴动。政府下令逮捕宪章派领袖，被捕者包括厄内斯特·琼斯，他因发表“煽动性演说”被判处两年徒刑。在受到打击、迫害、羞辱和领导人被捕的情况下，宪章运动趋于衰落。

欧洲革命的失败加速了它的衰落过程。英国工人群众怀着热切的心情，关注着法、德、奥、意、匈等国的革命。他们希望，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能给他们的事业带来胜利。这些希望也落空了。1848年所向无敌的欧洲革命的领袖，在一两年后不得不来英国寻找栖身之所；他们之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叙述了他亲身见到的欧洲革命失败对英国工人阶级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①“我不明白，”资产阶级激进派先驱者理查·科布顿在1861年还感慨万端地说，“工人们尽管受到人们的侮辱和讥讽，仍然是那么安安静静。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斯巴达克斯，敢于率领奴隶阶级造他们的政治压迫者的反么？我认为，这是宪章运动大动荡过后的缓和使得目前这一代人如此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1页。——译者

安静。”^①工人运动的衰落，当然也使得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联合工作疲塌下来。外加议会还发布了一项矛头针对政治流亡者的外侨管理法，它授权内政大臣可以毫不迟疑地将任何一个外国人作为“不受欢迎者”驱逐出境。民主派兄弟协会执行委员会于1848年5月开会，它不得不对协会的章程作出相应的修改；它郑重宣布免除它的外国籍成员对协会所承担的义务。

哈尼毫不动摇，孜孜不倦，而且坚持在《北极星报》上积极宣传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思想。他在1850年3月为二月革命两周年而提出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宣言中还写道，他相信大陆上不久即将再次爆发革命，这场革命“必将导致阶级统治和阶级奴役的消灭”。

但是协会的宣言和会议越来越少了。过去发布号召能引起巨大反响的协会，其成员人数于1850年7月降至二百六十一名。它还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欢迎1851年秋以政治流亡者身分来到伦敦的科苏特。但这却是它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1852年底左右，协会停止活动。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第一个贯彻无产阶级国际团结思想的组织，是第一个扎根于当时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工人组织。罗特施泰因撰写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史在结束时正确地指出：要不是1848年后反动派对它施加阻挠，它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历史性国际的。

^① 约翰·摩里：《科布顿生平》（1903年伦敦版）。转引自贝尔同上引书，第425页。

1

宪章运动的失败大大削弱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但导致它完全没落的，却是它的领导人哈尼和琼斯之间的冲突。

恶化成为个人之间相互敌视、势不两立的冲突，其根源在于对工人运动的前景在看法上产生分歧。宪章派的失败和欧洲革命复苏的希望落空，深深动摇了哈尼对工人阶级开展纯政治性运动的可能性的信念。他认为宪章运动前途无望。早在青年时期即全心全意和满怀激情地为宪章运动进行过战斗的哈尼，于1852年退出它的执行部，不久即同运动完全分手，几年后脱离一切政治活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起初他迁居到与世隔绝的英国泽稷岛，后来去美国。他虽然在心里还忠于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于1869年从波士顿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加入第一国际。^①但是在后半生的四十年里，他并未参加到重新上升的工人运动中去。

相反，琼斯则仍然相信宪章运动能东山再起。他在监禁两年后于1850年7月出狱，在染病和身体备受折磨的情况下，立即周游英格兰和苏格兰，出席各地集会。他到处受到热情的接待。哈里法克斯是他接受提名候选的选区，是当地的工人选他为代表出席宪章派全国会议的，在那里，一万人列队欢迎他。^②“这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9年5月4日)。

^② 约翰·萨维尔：《宪章主义者厄内斯特·琼斯》(1952年伦敦版)，第39页。关于琼斯的简短而动人的生平传略又见科尔：《宪章主义者画像》，同上。

在哈里法克斯是罕见的，”报纸这样报道说。这次欢迎增强了他对宪章运动前途的信心。

[90] 厄内斯特·琼斯(1819—1869)的确深受工人群众爱戴和钦佩。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宪章主义者之歌，在感染力方面几乎不亚于海尔维格和弗莱里格拉特的自由之歌，成了在千百次工人集会上朗诵和咏唱的战斗歌曲。他写的诗优雅、美丽、感情深刻，也得到文学评论的称道和推崇。但并不仅仅是诗作使他赢得了英国工人的心。他还是一位卓越的记者和鼓舞人心的演说家，他的言词和文字迸发出使工人深受感动的、致力于工人事业的热忱。因为琼斯不是平民的儿子，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骑兵军官，在随威灵顿赴西班牙作战中负伤之后，他为坎伯兰公爵、即后来的汉诺威国王效力。公爵是琼斯的教父。琼斯在父亲家庭和贵族化的吕内堡圣米迦勒书院的极其保守和宫廷环境中长大。在他十八岁那年，全家从他的出生地德国迁回英国。他学法律，当了律师，娶富有的地主得比伯爵亲戚的女儿为妻，被介绍觐见过维多利亚女王——一句话：他本人在有钱有势的环境里过着优裕的生活。

1846年年初，由于偶然的机，他看到了《北极星报》。从此他就献身于宪章派事业。他成了奥康瑞尔的亲蜜合作者，并迅即成为深孚众望的宪章派领袖之一。1848年，他与许多同志一道入狱。他在一间没有桌椅的狭小牢房里过了两年单独监禁的生活，在整整十九个月中甚至看不到书、笔、墨水和纸张，忍受了当时英国监狱中所盛行的野蛮的沉默制度的折磨。只要他不小心讲了一句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就得被投入不见天日的暗牢关上三天。和他一起被判刑的宪章主义者，两名瘐死狱中，另一名在出狱后不久死去。在服刑的第二年，琼斯的身体完全垮掉了。在监狱医院里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答应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可以获释出狱。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琼斯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他将本人继承的财产全部用来办他在1852年创办的《人民报》——马克思最初和他一道负责编辑，后来也为该报撰稿，他的妻子被赶出家门。W·E·亚当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在1857年的一次会上所见到的琼斯：“布满皱纹的脸和破烂的衣服，说明了他受到的考验和痛苦……显然他没有穿汗衫……一件破旧的大衣紧紧裹住身体，连领口上的钮子也扣住，似乎要把由于忠于失败的事业而使他陷入的贫困包起来。”①他的一个伯父表示愿意给他提供一笔每年两千英镑的收入——折合当时币值为四万金马克，条件是放弃为宪章派工作，但他拒绝了。他献身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马克思和恩格斯敬重他。他于1869年1月过了五十五岁生日的第二天去世；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琼斯的死讯“自然使我们全家极为震惊，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之一”。②他死在曼彻斯特，当地有一万名工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不过琼斯在出狱后所进行的旅行集会活动，并没有使宪章运动再次活跃起来。处于上升时期的工联，在4月10日出师不利后失去了开展政治活动的信心；它们不肯再参加宪章运动。宪章运动的杰出领袖奥康瑞尔、哈尼、欧布林也已改宗转向。1852年底，在仍然忠于宪章运动中的人中，只剩下琼斯一个头儿。他改组了宪章运动执行部，将《人民报》作为中央机关，并试图把工人阶级——宪章主义者、工联、合作社——合并成一个总的团体，定于1854年3月在曼彻斯特召开“工人议会”。

他提出的想法是，象议会是统治阶级的机关一样，工人议会会是工人阶级的机关，经常开会处理工人阶级的事务。由它负责领导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通过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行动从财

① 转引自萨维尔同上引书，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181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33页。——译者）

政上支持罢工，利用工人阶级的储蓄创办生产合作社。

这是一个大胆但属于空想的计划。不过连通过欧洲革命失败而头脑变得十分冷静的马克思，也在致工人议会——工人议会推选他为出席开幕式的名誉代表——的一封信中支持这一计划，热情地寄予希望。“召开这个议会的事实本身，”他写道，“证明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唤起欧美各地工人的希望……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①这一愿望没有实现；“穷人的议会”不多几星期后即行结束。

但是就在同一年里，建立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思想再度萌发。1853年10月，土耳其对俄国宣战，克里木战争开始，英国群情激愤。资产阶级和工人都痛恨专制的俄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琼斯，都敦促政府援助土耳其对俄作战——对付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②，马克思从
[92] 1848年起就这样痛斥俄国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促使政府勉强于1854年3月向俄宣战。^③但是，作为英国的盟友同专制的俄国作战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法国，这个人通过一场政变攫取了权力，将抗议他的暴行的呼声消灭在血泊之中，并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尸体上建立起自己的皇帝宝座。直到缔结法英联合作战以前，自由主义的英国一直把他视作卑鄙无耻之尤；现在作为盟友，英国将他的恶行置诸脑后，同他握手言欢。

英国社会主义者以及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却并未忘记路

^① 该信全文见萨维尔同上引书，第274—275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6—77页。——译者）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1页。——译者

^③ 金斯利·马丁：《帕麦斯顿勋爵的胜利》（1924年伦敦版），记述了人民运动在克里木战争中迫使英国对俄宣战的经过。

易·拿破仑统治下的臣民。当1854年秋布朗基的战友阿尔芒·巴尔贝斯在多年监禁后遇赦的消息传开，以及路易·拿破仑行将访问英国时，琼斯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邀请巴尔贝斯来英国，同时抗议拿破仑来访；这个委员会取名“欢迎和抗议委员会”。它定于12月4日——拿破仑政变后两天在巴黎街头进行大屠杀纪念日——召开大会，“欢迎一位著名的流亡者和抗议一个寡廉鲜耻的暴君”。

几星期后，这个英国人的委员会扩大了，增加了法、德和波兰社会主义流亡者团体的代表，并给自己改名为“国际委员会”。一年后，国际委员会发展为“国际协会”。^①

1855年2月27日，国际委员会公开亮相，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第一国际就是九年后在这里成立的。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有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法国社会主义者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宪章派领袖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并宣读了巴尔贝斯、维克多·雨果和斯塔尼斯拉夫·沃尔策耳的信。由宪章派领袖詹姆斯·芬伦提交大会讨论的决议案宣布，“同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法国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俄国的尼古拉等暴君与罪犯”缔结任何同盟“都是公开的耻辱”；决议案建议设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委员会，作为“各国人民同盟”的核心，并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宣布并宣传民主主义和社会共和国原则”。

琼斯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呼吁“欧洲人”注意。“为了分裂各国人民的团结，各国君王编造了敌对民族这一概念，”他说，“但是民主象太阳一样照耀着一切国家的人民，它的光芒颜色始终一样，不论照在法国或英国、德国或波兰，分量都是相等的。我们在这里开会的人是民主战士——世界解放大军的先 [93]

^① 有关其成立及历史的纪实性叙述见 A·米勒-莱宁：《国际协会（1855—1859）》，载于《社会史国际评论》，第3卷，1938年。

锋队。”

琼斯阐述了指导国际委员会斗争的“三项伟大庄严的原则”：“抗议暴君同盟和滥用我们的名义，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争取劳动的主权，即虽然没有戴上王冠但事实上是世界唯一合法统治者的发号施令的主权”。

1848和1849两年中，哈布斯堡、沙皇和普鲁士反革命镇压了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重新巩固了它们对这些国家的外来统治。贵族、资产阶级以及被奴役民族的工人阶级，都在进行反对这种外来统治的斗争。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这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目的，是建立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不是独立的社会和民主主义人民国家。“我们的直接义务是为各国被奴役的民族重新获得独立而斗争，”琼斯说，“但这是什么样的独立呢？依我说，是国内挣脱贵族和高利贷者统治、国外挣脱沙皇和皇帝统治的独立。宁可没有波兰，也不要一个专制的或寡头政治的波兰！”

然后，琼斯指出民族解放斗争的社会内容：“对我们说来民族无关紧要，人就是一切，”他说。“我们认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只不过构成了唯一的一种人民——穷苦的人民。他们的斗争是人民反抗有产者的斗争，是工人争取健康、劳动和生活权利的强大的斗争……我们今天开始一场不仅仅是讨伐贵族政治的十字军战役。我们不是要推翻一个暴政以便建立另一个暴政。我们是进行反对贵族暴政和反对资本暴政的斗争！”^①

2

在旅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团体中，最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委

^① 转引自萨维尔网上引书，第58—59页。

员会的，是 1848 年法国国民议会左翼共和派议员费里克斯·皮阿在拿破仑政变后不久组织的革命公社。这个革命公社的成员包括左翼激进共和派、布朗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中有 G·茹尔登、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和亚历山大·贝森，后来他们都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革命公社同法国各革命秘密团体、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社会主义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以及宪章主义者保持联系。为了开展宣传工作，它创办了《人。世界民主主义报》，由维克多·雨果在泽稷岛出版，从那里运往法国散发。

国际委员会每星期召开一次会务会议，并按民主派兄弟协 [94] 会的传统，在革命事件纪念日同社会主义流亡者团体联合召开国际性群众大会。

在 1855 年 9 月 22 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成立纪念日，同革命公社联合召开的大会，产生了未曾预料的影响。费里克斯·皮阿在会上宣读了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公开信”，生动地叙述了路易·拿破仑的臣民的际遇，抗议英国同这个窃取政权者结盟。这封信刊登在《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上，受到《泰晤士报》的抨击。这件事发出了保守派猛烈攻击法国革命流亡者的信号。于是政府下令将《人。世界民主主义报》的三名工作人员逐出泽稷岛，并逮捕一名将“公开信”印成传单进行散发的波兰流亡者。维克多·雨果发表声明抗议驱逐他的工作人员；他断然离开泽稷岛，迁居格恩西岛。维克多·雨果是在拿破仑政变后来英国要求避难的，当时受到了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热烈欢迎，他们把他当成最受人尊敬的法国流亡者。现在他们认为，政府此举违反了政治避难权，给雨果制造麻烦是可耻的行径。自由派议员爱德华·迈奥尔定于 11 月 12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抗议大会；厄内斯特·琼斯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把“公开信”刊登在《人民报》上，国际委员会将其作为传单散发。在激进派

群众抗议集会的压力下，政府停止了对法国流亡者的迫害，释放了被捕的波兰人。

1856年4月初，一个法国工人代表团来到伦敦，送交一份“法国工人致兄弟的英国工人的宣言”。他们是信奉蒲鲁东鼓吹合作社共产主义思想的巴黎团体的代表。宣言建议成立一个旨在通过创办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以压倒资本主义的“各国工人同盟”。欧布林表示欢迎这一建议。在他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公开集会，通过了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感谢信，并任命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建立国际。不过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其他工作。

但是，由法国代表团提议成立工人国际的想法，看来促使国际委员会决心由自己来建立工人国际。几星期后，在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讨论了改组国际委员会和建立国际协会的计划。1856年8月10日，在同法国革命公社联合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协会。

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声明，法国革命公社、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波兰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和宪章主义者协会已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协会，以便在它们的工作中相互“支援，争取世界性的民主主义和社会共和国的胜利”。决议进一步指出，这些团体的“责任是，利用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发动各国公民组织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协会，通过普遍的联合使它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国际宣传能收到联合起来力量大的……效果，从而并为今后革命胜利进行准备，而这一胜利至今之所以尚未实现，仅仅是由于革命对这一规律缺乏认识和不曾加以运用；没有团结，不论一国人民或各国人民都不可能得到解放”。

国际协会仿效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也为第一国际所继承。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它称自己为国际委员会中央——由所属各国团体各派五名代表组成。中央会址

设在伦敦。它负责每年召开一次协会的全体会议，并向其提出工作报告。每十名会员——一个“十人组”——可成立一个地方支部。会费规定为每年六便士。^①

在莱宁著作中提到，中央委员会中的德国籍成员有：后来同拉萨尔合作、在拉萨尔死后一度短时间任过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后来任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代表出席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代表大会的胡果·希尔曼；魏特林的朋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成员A. 谢尔策尔。此外，从当时德国流亡者报刊上查找过有关协会事迹的罗特施泰因还发现，在协会的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的人中，几乎每次都有沙佩尔、列斯纳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波兰革命者协会中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代表是奥博尔斯基、策诺·斯维托斯拉斯基和亨里克·阿比希特。法国代表为茹尔登、塔朗迪埃和弗朗索瓦——达维德·拉尔多，他们后来都是第一国际伦敦法国支部成员。

说明国际协会活动情况的报道资料很少。从1857年6月起，出版了一份由塔朗迪埃编辑的用德、法、英、波兰四种文字刊行的简报；一年后即停刊。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辛辛那提和芝加哥——建立了协会地方支部；1857年建立的、由马克思的朋友F·A·左尔格领导的纽约德国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加入了协会。1872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纽约后，左尔格任书记。每逢革命纪念节日，伦敦和纽约都有群众集会进行庆祝；从报道的资料来看，最后一次群众集会是在1859年6月24日，列斯纳和沙佩尔在会上讲了话。

在此以前，国际协会还发表过两个宣言。第一个“致欧洲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宣言（1858年12月用英文 [96]

^① 国际协会章程见莱宁同上引书，第263—266页。

和法文发表)是针对马志尼的;马志尼发出过一个号召,试图劝说欧洲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不要提出“社会问题”来阻挠为建立欧洲共和国同盟的斗争,而是要同资产阶级联合组成一个民主主义团体。

国际协会宣言谴责马志尼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宣言指出,象1848年的法国一样,资产阶级之所以希望推翻君主专制,只是为了代之以一个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工人没有忘记1848年,他们没有忘记资产阶级下令在巴黎街头屠杀工人的可怕的六月里的日子。宣言声明,一旦革命到来,工人们将齐心协力拿起武器——但那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目标。宣言最后说,国际协会致力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团结,它的目的只能是进行一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①

国际协会的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宣言发表于1859年春,系就奥法伦巴第战争表态。宣言声明,工人阶级对民族之间的纯政治性冲突不感兴趣,因为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还并不意味着工人得到自由。宣言说,只要仍然保持目前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在此期间,国际协会已于1859年1月初分裂。波兰革命者协会退了出去,显然是抗议发表反马志尼的宣言。中央委员会解散。虽然在3月里组成了一个新中央委员会,波兰人再度参加进来。但此后见之于报道的行动只有两次:发表关于法奥战争的宣言,和进行前文业已述及的1859年6月24日公开集会。

国际协会是历史性国际的直接先驱。被压迫者国际的思想溯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即人人自由平等的普济主义

^① 宣言全文见莱宁同上引书,第274—280页。

思想。它鼓舞了英国第一个政治性工人运动通讯会，以及法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经过了反动的岁月之后，它又重新活跃起来，见之于布朗基的四季社、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民主派兄弟协会、国际委员会和国际协会。从以托马斯·倍恩为代表的、在英国世代相传的政治奴隶国际团结的思想开始，经过巴贝夫的影响，发展形成了社会奴隶和经济 [97] 奴隶的国际团结思想，形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在四十年代中期，民主派兄弟协会已将法德两国的国际社会主义秘密同盟，发展为一种公开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组织形式。国际委员会和国际协会，实际上只是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重建。它们是历史性国际的先驱。在国际协会结束五年之后，以国际工人协会命名的历史性国际宣告诞生。

第二部分 第一国际

历史性国际的成立

[101]

第一国际是社会主义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它的寿命很短，从1864年成立到1872年召开海牙代表大会，只活动了八年时间。它的会员人数并不太多。它的经费来源拮据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尽管如此，它却给它的时代面貌铭刻上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千百万工人心目中，第一国际是一种神话般的力量，工人们对它寄予热切的希望。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喉舌把它比拟为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各国政府将它视为一支神秘的、咄咄逼人的巨大势力。欧洲各国内阁忙于制定计划将它斩草除根。法国和西班牙颁布了迫害它的特别法律，奥匈君主政权和德意志帝国以危害国家的罪名将它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罗马教皇诅咒它是“上帝和人类的敌人”。随着第一国际的出现，在或诽或誉的种种反应中，社会主义作为世界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

1

但是，对于第一国际成立后在历史进程中究竟应起何等重要作用，它的缔造者们事先并无明确的了解。首倡建立第一国际的，也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是卡尔·马克思，而是英法两国的工人领袖。^①

从1789年起，国外革命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深深地唤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情心。每当历史性事件要求国际团结一致行动

^① 见本书叙述所根据的D·梁赞诺夫论历史性国际史前史的详细研究著作《第一国际史》。《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1926年。

时，由托马斯·倍恩注入英国工人思想感情的被压迫者国际团结的传统，就一再反复活跃起来。

[102]

从三十年代起，英国工人国际团结运动的主要代表是宪章派。宪章运动于1856年左右结束后，正在兴起的工联接替了这一任务。在这一时期，唤起英国工人火热般的同情心的，是意大利人争取自由的斗争。英国工人举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挫败了帕麦斯顿利用奥尔西尼行刺事件^①（1858年1月14日）实行为打击政治流亡者而制定的“惩治密谋分子法”的企图。他们抗议拿破仑在维拉弗兰卡的媾和^②（1859年7月11日），这个和约规定建立一个承认罗马教皇为名誉领导的联邦，以取代统一的意大利。他们热情地关心加里波第“千人红衫志愿军”在西西里（1860年）的每一阶段的战况，并同激进派一道迫使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以否决权来挫败拿破仑武装干涉加里波第的计划。1864年4月，加里波第流亡到英国，得到了隆重的欢迎；几星期后当政府强迫他离开英国国土时，伦敦工人就集会，进行强大的群众性抗议，同警察发生冲突。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工联领袖奥哲尔、克里默、豪威尔组织和领导的。

英国工人运动在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的态度，记下了它历史上特别光荣的一章。大西洋彼岸的这场战争使英国陷入经济灾难。英国纺织工业——英国的经济命脉——依靠北美南方各州黑人种植园收获的棉花。可是由于北方各州实行禁运，棉花无法进口。近五分之三的英国纺锭和织机停止运转，好几万名纺织工人失业。纺织工业的瘫痪影响到英国整个经济生

① 奥尔西尼，费利切（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参加者，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而被处死。——译者

② 法国和撒丁（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奥军败绩后，他害怕欧洲各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便首倡停战，与奥皇在维城举行没有皮蒙特国王参加的单独会晤，签订和约。——译者

括。资产阶级中的一派，当然同样是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要求政府对北方各州动用武力，打破棉花禁运。这一要求得到英国贵族阶级的支持，英国贵族阶级同美国南方各州土地贵族阶级在生活方式和感情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尽管由于美国内战而使自己受到沉重的损失，英国工人阶级并未背弃同黑奴的团结。他们发动一场强大的运动，抵制迫在眉睫的有利于奴隶主的战争。在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英国纺织区郎卡郡中心曼彻斯特召开的群众大会，以及在伦敦召开的群众大会，都警告政府不得以发动战争来进行干预，并致信阿伯拉罕·林肯总统，表示同情解放黑奴的斗争。林肯对这些来信一封封都给予答复，曼彻斯特的来信特别使他感动。他写道：“我了解曼彻斯特工人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不得不忍受的深重苦难，并为此感到难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立场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的崇高范例。”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9月）^[103]中，也提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史上的这一事件。他写道：“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①

在这场群众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在北英格兰是老宪章主义者厄内斯特·琼斯，在伦敦是工联领袖奥哲尔、克里默、豪威尔和阿普耳加思，可以说是他们创建了国际。

不过，促使产生以新的尝试来建立工人国际这一思想的，却是另外一次国际团结行动。

1863年底，波兰人民进行1830年以来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反对俄国的外来统治，并建立了临时政府。沙皇政府不得不调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4页。——译者

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对付革命，进行了一年以上的残酷讨伐，才将革命镇压下去。欧洲，特别是法英两国的民主派，思想上一向同情波兰革命事业。法国工人在1848年曾经敦促政府对可恨的俄国宣战，使波兰从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

1863年波兰革命的再度爆发，在法英两国激起了旧有的同情心。路易·波拿巴的法国利用违警法镇压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活动，在那里，这种同情心无法见之于行动。在英国，工联领袖召开群众大会，用以表示他们同波兰起义团结一致。这次群众大会于1863年4月28日在伦敦召开，主持者为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教授，他也是国际成立大会的主持者。群众大会要求英国动用武力援助波兰，并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政府。首相帕麦斯顿勋爵接见了代表团，声称没有法国的共同行动，英国政府不可能考虑采取武装干涉。于是工联领袖决定，为了进一步对政府施加压力，再组织一次有法国工人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

2

1862年，法国工人代表团曾来伦敦参观世界工业展览会，在参观期间，英国工联领袖同法国工人代表之间建立了联系。派出代表团是帝国工人阶级寥寥可数的成就之一。拿破仑第三的警察政权不容许出现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建立工会受到严格的法律制裁，集会自由被取缔，新闻遭到控制。但另一方面，拿破仑也力图通过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使工人阶级同这个依靠政变而建立的政权取得和解。他设立劳资仲裁法庭，由国家拨款资助工人福利机构，容许得到好评的合作社存在，注意平抑面包价格和大办公共设施的工程。这种“帝国社会主义”的凯撒主义政策，由于五十年代的繁荣而更见成效，多数法国工人对这种状况也的确感到不错。

可是,1857年到1858年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凯撒主义的幻想。工资下降,尽管有关于结社的禁令而仍然爆发了罢工运动。工人阶级的动乱迫使政府作出新的让步。

这种让步之一,是推选一个工人代表团参加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凡持有工人身份证证明其为工人的每一个工人均有获选资格,并任命经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组织和监督选举之进行。法国工人阶级自政变以来第一次在这场选举中独立行动。在巴黎,近二十万名工人参加投票,选出了二百名代表;在外省和其他城市选出了五百五十名代表。皇家展览会委员会和巴黎市政厅各拨款二万法郎,资助代表团的经费;另外在各工场工人中募得一万三千法郎。平均每个代表得到二百法郎。

但是,虽然经团体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团体现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真实代表性,英国工联领袖对代表团还是不感兴趣,因为代表团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为他们鄙夷不屑的拿破仑的保护,似乎是拿破仑政策的工具。邀请参加工联领袖举行的盛大招待会的请帖,也不是理所应当由工联伦敦理事会发出,而是一个由合作社代表、资产阶级政界人士和实业家组成的委员会发出的。帕麦斯顿还发表书面发言,欢迎代表团。

可是法国工人代表团的伦敦之行,从广义上说,对国际的史前史仍然具有其重要意义。在伦敦访问期间,法国工人代表团中以昂利·托伦为领导的一个小组跟英国工联领袖进行了接触。这样,在英法两国工人代表之间就首次建立了个人关系。因此托伦及其小组接到了邀请,派出法国工人代表来伦敦参加工联第二次为同情声援波兰革命而进行的集会。

昂利·路易·托伦(1828—1897)是个铜版雕刻工,他是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工人领袖之一。他率先提出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人代表团,并不顾巴黎警察总局局长的阻挠,同展览会委员会主席、皇帝兄弟维克多·拿破仑亲王举行谈判,实现了这一主

张。托伦可并不是凯撒主义的工具。他是共和派，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因此也是共产主义的对头，并反对一小批布朗基信徒主张的对现在的政治秩序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托伦认为，用和平的、合乎宪法规定的方法在工人群众中孜孜不倦地进行解释教育工作，可以迫使统治政权实行民主制度，并通过合作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但他也同那些寄希望于皇帝采取改革政策的工人有分歧。在代表团从伦敦回国后不久，他就同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分道扬镳，成为一派工人的领袖，这派工人虽然见容于政府，但却摆脱了政府的监督。他接受这派工人提名，作为独立的反对派的工人代表，参加1863年3月在巴黎的选举。

托伦接受英国工联领袖的邀请，同几个朋友来到伦敦，参加了于1863年7月22日为同情声援波兰革命而进行的群众性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的人，其中又有奥哲尔、克里默，当然还有托伦，他自我介绍是“巴黎工人代表”。

会后第二天，法国代表团应工联伦敦理事会的邀请出席招待会。宾主双方在祝辞中，都提出希望建立全世界工人的更紧密的联系。任命了一个英国委员会，委托它起草一封致法国工人的信，信中提出考虑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思想。这样，7月23日的聚会就成了建立历史性国际的第一步；在奥哲尔起草的信中宣告了这一点。

乔治·奥哲尔(1820—1877)的职业为鞋匠，当时任工联伦敦理事会(一种工会卡特尔)书记。工联伦敦理事会是英国建筑工人为争取九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大规模斗争的产物。建筑工人的斗争开始于几家大建筑公司的罢工。建筑公司老板们的回答是将工人全部开除，并宣布他们今后只雇用签具“保证书”、声明不参加任何工会的工人。于是，原来为要求缩短劳动时间的罢工，变成了为争取工会基本权利的斗争。持续半年多时间的

罢工(从1859年7月至1860年2月)动员了全体工人群众。建筑工人呼吁他们的同志团结声援,取得了效果;单伦敦一地就募得一万五千英镑(按当时币值折合三十万金马克),在伦敦以外的二百四十个地方募得八千多英镑。这笔捐款使资产阶级为之惊讶。为了组织团结声援行动和召开会议向居民宣讲罢工的原因,成立了一个由建筑工人代表和其他工联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中,有后来的国际主席奥哲尔和后来的国际总书记W·R·克里默。(克里默出身于木工,后任建筑工联书记,曾在一百多次这种会上发表过讲话。)

罢工以妥协而告终。老板们收回“保证书”,从而承认了工人的结社权;工会则停止为争取九小时工作制而开展的斗争。 [106]

这次斗争尽管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还是成为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仅给予工人团结思想以新的、强有力的促进,也培植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机关。为了发动组织各工场的工人募集捐款,成立了各地区工联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发展成一系列大工业城市——因而也包括伦敦——的地方一级卡特尔组织工联理事会。工联地方理事会是代表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开端。1860年7月成立的工联伦敦理事会,很快赢得了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它的任务是,不仅采取如同建筑工人罢工中所采取的那种团结声援行动以维护工联的利益,而且也组织并指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工联伦敦理事会首任书记为乔治·豪威尔——后来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2年由乔治·奥哲尔接任。

3

由奥哲尔执笔写成的“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信,① 总的

① 该信全文见梁赞诺夫同上引书,第172页。

精神是响应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呼吁，就象由乔治·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由民主派兄弟协会及其后继者们从四十年代起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信中再次提醒工人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有权者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由丧尽天良的部长们为他们的罪行辩护并使之合法化”，而为民族自由和人民群众的权利进行斗争的人，却陷身缧绁或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可以各国人民的兄弟团结予以制止的。“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英国以及一切有志于为人类造福的国家的代表应该集会，”信中这样说。“让我们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让我们来谈论关系到各国人民和平的重大问题。”

接着，信件谈到一个极为具体的社会问题。它指出，英国企业主已多次试图采用从比、法和德国招募低工资工人来英国的办法，以压低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信中说，“并非由于我们大陆上的弟兄居心不良，而是由于全世界劳工阶级缺乏正规的、系统的联系”。任务在于提高大家的工资水平，防止利用低工资工人反对工资较高的工人来普遍降低工资水平。而这这就要求工人非进行国际合作不可。

最后，信件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团结声援波兰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信件提议，在法英两国同时开展征集请愿书签名运动，并于同一天分别向两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是要求承认进行抗俄革命斗争的波兰为交战国。“我们必须这样做，”信件的结尾部分说，“以便粉碎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秘密外交阴谋和防止残酷的悲剧的重演：屠杀波兰的英勇儿子和变这个美丽的国家为大型屠宰场，造成文明世界的耻辱”。

但是英方的这封信直到三个月以后才发出，又过了八个月，法方的复信才到达伦敦。而在此期间波兰革命已被镇压下去。

为交换这些信件而召开的会议，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历史性国际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马克思在几星期后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会议大厅“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①工联机关报《蜂房》事前号召伦敦工人参加会议。出席的也有人数众多的法、意、瑞士和波兰工人小组，以及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许多会员。巴黎工人代表为昂利·路易·托伦、编织花边的工人沙尔·利穆津和青铜手工艺匠帕拉雄。巴黎各工场车间的工人几个月来募捐——每人捐献二十五生丁——资助代表团的经费。

W·R·克里默写信给马克思，“敬请”他参加大会。马克思关于这次大会的开法所提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而没有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②不过他的老友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德国裁缝，——可能参加英国工联运动的活动，与奥哲尔有联系——几天前将大会的目的向他作了介绍。马克思在英国工联领导人士中也是知名的社会主义学者和作家，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邀请他参加大会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据他写信告诉恩格斯的情况看来，他在大会上只是起了“哑剧演员”的作用。

从大会的性质、召开经过和作出的决议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经打算通过大会的召开掀起一个历史性的运动。

在大会主席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致简短的开幕词后，^[108]奥哲尔宣读了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信，如上文所述，这封信提出了国际联合的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235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2页。——译者）

② 见列斯纳同上引书，第158页。

托伦代表法国代表团宣读(由勒·吕贝译成英语)了法国工人给英国工人的复信,表示赞同这一思想。法国工人的复信说:“从现在起,一切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应听取人民的声音。它向暴君们宣布,他们专制统治的末日已经到来了”。信件号召“决心自己解放自己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团结在一个国际组织里。“分工的系统已将工人变成机器,”信件进一步指出。“一种工业奴隶主义正在形成,它将比我们的父辈在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日子里所摧毁的奴隶制更为可怕,如果工人不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的话。”信件最后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将人类分裂成两个阶级的、置人于死地的制度。我们的出路就在于团结。”

法国代表团在巴黎还准备了“组织计划”,由勒·吕贝宣读。不过,这个计划没有提及在两封信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布的关于今后国际组织伟大目标和任务的任何内容。对于国际的组织结构已有先例可循。规定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伦敦,其成员由各参加协会国家的代表经选举组成;中央委员会任命设在欧洲各国首都的小委员会及其通讯员。“计划”赋予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只是:将可能同工人利益攸关的问题提交小委员会进行审议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用各种文字公布。“计划”还建议,下一年在比利时举行首届国际代表大会。

这些建议都被综合在由英国工联领袖乔治·威廉·威勒尔和威廉·德尔提出的一项决议案里。在辩论中发言的有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代表J·G·埃卡留斯、加里波第副官和后来任马志尼秘书的鲁伊治·沃尔弗少校、法国人博凯和爱尔兰人福布斯。

关于成立国际的决议说:“会议听取了我们的法国兄弟对我们的信的复信。我们再次向它表示欢迎。鉴于它的纲领有利于劳动人民,我们接受这个纲领作为国际协会的基础,并授权一个委

员会负责增加自己的成员和起草这个协会的章程及议事规程。”

接着大会选举了一个由三十二名成员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包括英、法、意、波、德等国的工人团体代表，他们当中有奥哲尔、克里默、豪威尔，德国代表有埃卡留斯和马克思。

这次历史性大会在德国工人大合唱歌声中开幕和闭幕，其经过情况就是如此。无论就其精神或通过的决议来看，它跟它以前的各次集会均无不同之处。从1789年以来不知举行过多少次相类似的大会，表达了各国被压迫者命运相同的意识及其团结精神。而从1837年以来，人们即已试图设法组织一个“被压迫者的国际”。所谓“被压迫者”，是指处在封建专制统治系统下的各国人民，处于外来统治枷锁下的民族，以及受资本剥削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109]

但是，从1789年以来的政治、社会和民族革命已表明，这种“被压迫者”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盟——不可避免地一再遭到相互矛盾的阶级利益的破坏。资产阶级政治和民族革命的目的不是社会民主和劳动人民统治国家，而是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这个在圣马丁堂成立的国际，其具体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大会上的演说——不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演说——并没有对它作出概念明确的阐述。这些演说响应被压迫者对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提出的抗议，谈论自由和各国人民的兄弟友谊。英国的呼吁书提出了各国工人在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斗争中的共同利益，法国的信件提出了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工人的资本主义奴役。但社会主义思想——摆脱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的社会的思想——却没有得到阐明。所有演说者都呼吁工人团结，可是谁也没有把今后的国际工人组织看成是一个政治的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工会的行动共同体。由法国人提议并经大会通过的组织

计划，实际上只给国际规定了一个任务——负责审议和讨论同工人利益攸关的问题。

因此，圣马丁堂的这次大会给今后的国际既未确定形式，也未确定内容，既未提出一个纲领，也未哪怕是确定一个名称。这些任务暂时落到了由大会选举产生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的肩上。

第一国际的原则和章程

[110]

1

国际创立伊始，马克思就在其中参与工作，这对国际及其历史作用的性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是他确定了国际的形式和纲领。尽管国际的创造人——英国工联领导人和法国工人领袖——对国际不抱大的期望，马克思却把它的存在看成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他虽然要急于完成《资本论》这部著作，但还是毫不迟疑地参与国际的建设工作。

自从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马克思就停止了任何政治活动。1848至1849年革命的失败，并未动摇他认为革命可能东山再起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但是，他在五十年代看不到有任何“革命形势”的迹象。正如他的著作所表明的，^①他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失败的社会原因。它是失败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在革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其历史任务之前，“无产阶级不成熟的形象”已被强大的资产阶级所压倒。它的失败使革命力量处于瘫痪状态。

但是，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又重新动荡起来了。在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坚决地投入反对当权的封建贵族的斗争。波兰人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奋起反对沙皇的外来统治。加里波第率领共和志愿队在辉煌的胜利进军中消灭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腐朽封建王朝。1863年的法国大选使帝国陷入危机，工人运动又

^①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蓬勃发展起来。爱尔兰处于革命的骚动之中。英国“无产阶级的形象”在不断壮大成熟。五十年代末，分散成无数小行会的工会，开始了组成大型联合会的过程，建筑工人声势浩大的斗争加强了它们内部的团结，到六十年代初，它们又重新展开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1819年以后欧洲民主与无产阶级运动所陷入的停滞状态有了转机。马克思指出，他认为这些事件就是一场将要

[111] 从法国揭开序幕的革命业已日益临近的征兆。作为建设各国工人运动的工具的国际在眼下复苏，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革命，便具有它的意义了。

这次国际的复苏，也比过去任何一次有着更加牢固的基础。民主派兄弟协会是以宪章运动为基础的。宪章运动一衰落，民主派兄弟协会亦即随之垮台；它的后续组织，即国际协会，在英法两国工人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气氛中无法开展活动。现在，这种气氛消失了。在圣马丁堂成立的国际，是出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重整旗鼓的英国工运和法国工人组织领导人的主动倡议。因此，国际看来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马克思看到了国际可以真正开展活动的机会。他在致友人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协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加入协会的有伦敦工联的领导人，正是这些人筹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接待，并且通过在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挫败了帕麦斯顿同美国作战的计划。巴黎工人的领导人也同委员会有联系。”^①

2

马克思很清楚，他在国际中的合作者尽管是一些有阶级觉

^① 卡尔·马克思：《致库格曼》（1864年11月29日）（1952年柏林版），第20页。（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36—437页。——译者）

悟的工人，但决不会是完全如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者。那些在圣马丁堂以真挚的热情——如报刊上报道的——欢呼关于成立国际的决议的人，象比斯利教授所证实的一样，都是“工人阶级最有聪敏才智的分子，但是，很少有人，也许其中没有任何人属于哪一种社会主义流派”。他写道：“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摇摆不定地接受了社会主义者这个称号的……他们之所以参加国际，是因为他们对本大陆的劳工同志充满了兄弟般的热情，他们感到，与这些劳工同志的感情的密切程度，胜过了与本国的富有阶级的感情。”①

但是，英国工人——尽管他们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以健全的理智看出了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特别是开展争取选举权以参与决定立法的斗争的必要性，而多数法国工人却以不信任的态度与国家对立。他们力图采取工人自救，采取包罗万象的合作社制度来战胜资本主义。 [113]

法国工人的社会使徒，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一位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尽管并非深思熟虑），卓越的语言大师，一位具有出色分析能力的天才的社会制度批评家，但在他的思想结构方面则杂乱无章和矛盾百出。蒲鲁东出身于贝桑松的一个穷苦家庭，小时候在贝桑松的近郊放牛。他的生涯是从排字工开始的。通过自学的途径，他掌握了非常广博的学识，并以大量著作丰富了法国社会主义文学。

他的第一本著作《所有制备忘录》（《Denkschrift über das Eigentum》）立即使他获得了声誉；此书发表于1840年。“什么是财产？”——这就是他所探讨的问题。他的回答措辞简练：“财产就是盗窃”。如他所述，由于财产是掠夺、暴力行为和不义的产

① 转引自梁赞诺夫同上引书，第192页。

物,所以他要求予以废除。但是,他在运用支配自己思维方式的黑格尔辩证法时,也诅咒私有制的对立面,即公有制,共产主义,并进一步提出以合理分配的小私有制作为两个对立面的综合体,而且对农民和手工业者采用私有制,对工人则采用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以及救济和保险公司形式的社会所有制,通过人民银行在“无息信贷”的基础上提供资金。他建议用这种“职务互惠”制度——他称之为“互助论”——解决社会问题。他指责在国家控制下的任何社会主义形式,指责国家本身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威胁。他认为,国家就是“宪兵和刽子手”。①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一书中,以无情的尖锐笔触分析了蒲鲁东的矛盾和错误,并将不给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发展留有余地的蒲鲁东思想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尚未接触过蒲鲁东辩证法的大多数法国工人——他们几乎不懂得他的辩证法,却被他那以“互助论”改造法国和世界的思想所迷惑。

当然,布朗基的革命传统在巴黎的工人中也没有完全消失。1859年,布朗基在坐了十几年牢之后出狱,当即把各阶层中火气最大和最热心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的名字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口号。然而,警方是不容许革命政党重新抬头的。1865年春,布朗基的学生特里东创办《老实》周刊,但在发行第[114]八期之后,就遭到政府的查禁。布朗基逃往比利时,避免了被捕的危险,直到德法战争爆发后才回到巴黎。他在布鲁塞尔尽管还同一些支持他的小组保持联系,并试图把他们组成一个政党,但它直到巴黎公社才发挥作用。在国际成立时,只有蒲鲁东派代表法国有组织的工人。

总委员会的意大利委员 G·P·方塔纳、D·拉马、阿耳多夫兰

① 见卡尔·迪尔:《P·J·蒲鲁东——他的学说和生活》,第2部分,载于《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论文集》,(1890年)第6卷。

迪、M·萨西纳里、C·塞塔奇和L·沃尔弗——拿破仑第三垮台后法国政府公布档案材料，揭露他是个警察局的密探^①，甚至意大利的工人联合会也完全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而马志尼是个激情奔放的革命民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并不是社会主义者。

德国工人运动在六十年代初又开始高涨起来，但直到1868年，它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根本没有代表，虽然马克思担任了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职务。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唤起了德国的工人，1863年，他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意志土地上第一个独立的、具有生命力的工人政党。就在召开国际成立大会前的几个星期，他在一次决斗中（1864年8月31日）丧生。拉萨尔死后，据披露，他在与俾斯麦密谈时曾考虑过采取这种做法：支持俾斯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以换取颁布普选法和进行社会改革。拉萨尔去世后，党的领导权落到J·B·冯·施韦泽（1833—1875）的手中。他在由他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赤裸裸地提出工人阶级与封建贵族结盟的政策。为此，他和对这一策略避之唯恐不及的马克思彻底决裂（1865年2月）。直到三年之后，这一裂缝方始弥合。^②

3

但是马克思认为，工人运动国际中心的存在，无论如何比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比政治问题更加重要得多。他留神提防意识形态的问题危害这个中心。马克思在起草国际的原则宣言时，避免有可能引起参加国际的任何一派反感的要求和提法。例如，我们无论在成立宣言中或在章程中都看不到对生产资料实行国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年7月4日）。

^②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1918年莱比锡版），第337页起一连几页。

有化的要求——这是蒲鲁东主义者不会接受的要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上述信中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①

如同会议记录所载明的，国际的原则宣言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以“十分冗长而激昂的讨论”形式进行了辩论。②

开始辩论之前，成立了委员会（原名中央委员会）。乔治·奥哲尔当选为主席，W·R·克里默为总书记，G·威勒尔为财务委员。决定每星期二晚上八时举行会议，规定会员每季度缴纳会

①（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7页。——译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把对生产资料转归为公有制的要求，具体化为一个纲领。由于他的一系列当时看来似乎属于空想的思想已经实现，所以这个纲领今天更值得一谈。纲领说：

“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②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年10月5日）。

费一先令(折合当时币制为一个金马克)。但不久之后大家就认为会费定得太高;一致同意个人会员缴纳会费每年为一先令,团体入会的会员每年三便士(约二十四芬尼多)。为临时开支需要,先在出席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中筹集一点经费;共筹得三镑三先令,第一国际就用这笔钱开始了自己的历史性活动。

这场关于国际原则的辩论以选举成立小委员会而结束。小委员会受权向下次总委员会会议提出一份草案。选入小委员会的有:英国人E·惠特洛克、约翰·韦斯顿和皮琴,法国人勒·吕贝、马志尼的秘书L·沃尔弗,波兰人J·E·霍尔托普,代表德国的是马克思;此外,奥哲尔以主席的身份,克里默以书记的身份作为当然委员。 [117]

三天后,小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马克思因长有疼痛不堪的痲而不能出席会议。沃尔弗提议,以意大利工人联合会马志尼主义联盟的章程作为国际章程的基础。他把它译成英语并加以宣读。约翰·韦斯顿——罗伯特·欧文的追随者,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称他为一个“和气有礼的人”^①——提出一份由他自己草拟的原则宣言。但是,10月11日再次举行会议的总委员会,提请小委员会对这两份文件进行进一步加工。

马克思很晚才接到要他参加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邀请。他没有参加小委员会对这些文件的修订。直到勒·吕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10月18日)宣读这些文件时,他才有了了解。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这是“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而对不少于四十条的章程草案,他指出,“至于其他错误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章程追求一个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成立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中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5页。——译者

央政府(当然是由马志尼在背后主持)”。^①总委员会也对这些文件的新的提法表示不满意,并委托小委员会重新修改。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决心设法“尽可能使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他用十条去代替那四十条的章程,写了新的序言,并草就了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名义而载入史册的“告工人阶级书”^②。

小委员会又召开了两次会议,然后采纳了马克思草就的两个文件,并作了几处小的补充。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章程的第二段说:“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统治。”^③按照小委员会的意图,在“而且”一词后加上“……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④。此外,在序言中有关参加国际各团体和个人的态度准则这一段里,也增加了关于他们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⑤作为准则的提法。11月1日,总委员会开会讨论章程和成立宣言。马克思宣读了这两个文件。在辩论中,只对唯一的一个字眼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反对“谋取利润者”这个词;会议否决了沃尔利和威勒尔的提议。

[118] 于是,这两个文件一致地,而且象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满意地指出的,“以很大的热情被通过了”,并经由威勒尔和德尔提议,向他表示了总委员会“对于这份令人赞赏的宣言”致以谢意。^⑥这些文件由勒·吕贝译成法文,方塔纳译成意大利文,马克思写这些文件用的是英文,现由他将其译成德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236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5页。——译者)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6页。——译者

③④ 同上,第16卷,第12页。——译者

⑤ 同上,第31卷,第439页。——译者

⑥ 比斯利教授称赞这份成立宣言“可能是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事业作出的最令人信服和最强有力的辩护”。《双周评论》1870年11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6—17页。——译者)

成立宣言的威力和光辉都不能同《共产党宣言》相比拟。它没有《共产党宣言》那种令人激昂奋发的气概、铿锵有力的语言和无限广阔的精神视野。这种视野本身包含着历史哲学、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分析和开展革命行动的热情号召力。

成立宣言一开始就冷静地论述了英国令人陶醉和不断增长的财富与工人阶级贫困化之间的显明对立。接着，描述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萎靡不振的局面。“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群众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漠状态之中。

马克思接着写道：但是，1848至1864年这个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方面”。他指出了“两件重大的事实”。

第一件事是1847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肯定了这一点，这不仅是由于对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了“非常良好的后果”，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因为如同马克思所写，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马克思接着写道：“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次更大的胜利，”——合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他说，“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因为试验不是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雇主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是能够进行的。试验证明，“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社会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全国范围内依靠全国的财力促进合作制的发展，合作制才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有效工具。这就【119】需要掌握政权。“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于是，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转而谈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问题。他说，工人阶级“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他又说：“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他提醒人们注意：经验已经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 他们 受到 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

马克思确认，正是这一认识，促使在圣马丁堂的大会创立国际协会的。

马克思指出，还可用另一种认识去理解世界工人阶级在他们斗争中的相互依赖性。他问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各国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他提到，由于工人阶级奋起反抗从而避免了英国对美国北方各州进行战争的危险，同时也提到“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

“这个时期的经验”，马克思最后这样写道——这里，他又重新找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的词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他用1848年《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了成立宣言^①。

马克思在序言，即章程的前言里已经提出了国际的原则。这些原则的依据是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而不是象空想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等待统治阶级的明智和善意。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这场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这些提法都出自马克思对于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因为工人阶级争取建立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与奴役的社会制度，它就必须消灭社会之划分为阶级，从而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

[120]

在章程的序言中，另一条原则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精髓。这条原则说，由于“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序言最终提到工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工人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现代社会所有国家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工人的国际。

以上就是在其章程的序言中所阐明的它的原则。这些原则指明了革命的目标，但却避而不提采取革命行动的直接号召。

^① 上述各段中的直接引语译文(除“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外)，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1—135页。——译者

章程以十条的篇幅规定了国际的目的和组织形式。国际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作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国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召开一次的由国际各分部选派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大会。每个地方性组织会员不满五百名者，不论其人数多少选派一名代表；超过五百名者，每五百名会员增派一名代表。

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于1865年在比利时召开，并“向欧洲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和确定总委员会会址。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并有权增加新的委员。总委员会应向代表大会作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报告。

章程的最后两条宣布，国际工人协会以真正兄弟般的关系“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协会保证每个迁居另一国家的会员，可“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①

^① 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866年9月于日内瓦召开)认真讨论了总委员会通过的临时章程，略经修改后予以批准；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章程最后的文本。该文本见本卷书末附录I。(章程各节所有直接引语的译文，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139页。——译者)

国际的实力——传说与事实

[121]

1

在敌人和崇敬者的传说中，国际似乎是一支巨大的组织力量和经济力量。在法兰西帝国对被指控为秘密结社的国际法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所进行的第三次审讯中（1870年6月8日），检察官宣称，国际已组织了八十一万一千五百十三名会员，即法国四十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五名，瑞士四万五千名，德国十五万名，奥匈帝国十万名，英国八万名，西班牙二千七百二十八名。他还说，一个公然宣布“只有通过革命和在民主与社会共和国才能实现其纲领”的组织，由于它的规模这样广泛庞大，所以国际已成为一种“社会性危险”。^①

一个月后，即1870年7月4日，十四名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因被指控犯叛国罪在维也纳出庭。检察官在起诉书中，一开始就描述了那种“对整个文明世界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绝对不容忽视的影响的重要行动，”——即1864年9月28日成立的国际。他说，从此以后，国际“就在各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完全秘密地发展成为和各国政府并存的第二国家权力，第二政府，它形成了一个危险的、令人更为担心的竞争敌手，作为这种第二权力和第二政府，它不仅只在本国，而且也在外国，也许不仅在一个外国，而且也在全世界得到它的经济来源和支援”。^②

^① 奥斯卡·特斯屠：《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里昂版），第310页；埃德蒙·维尔塔尔：《国际史》（1872年巴黎版），第313页。

^② 《维也纳叛国案》（1911年维也纳版），第648和650页。

【122】 检察官没有用数字对这个“第二权力”作出说明。几星期后，维也纳警察局在致内政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做到了这一点。警方在颇为详尽地对国际发展史作了一番叙述之后，得出结论说，国际“据悉肯定是一个旨在进行革命的、眼下拥有一百万以上会员、遍布欧洲和北美的联合会”。①

但为时不久，英国大资产阶级权威报纸《泰晤士报》就更正了巴黎和维也纳政府当局所估计的会员数字；据该报估计，国际会员的数字约为二百五十万名。② 不过，《泰晤士报》看来也弄错了，因为据奥斯卡·特斯屠——他曾以研究国际作为毕生任务，除编写一本附有丰富文件材料的关于国际的著作《蓝皮书》外，还发表了论国际在欧洲作用的两卷集研究著述③——的估计，会员数字为五百万左右。关于财政的来源问题，据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从“可靠方面”报道，国际“拥有在伦敦筹集的现款基金超过五百万英镑（一亿金马克）”。④

以上就是国际的敌人的传说，而国际的朋友们的传说之传奇性色彩也并不见得小。例如，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上，总委员会委员罗伯特·阿普耳加思代表英国报告有九万五千名国际会员，他们分别组织在二百三十个支部里，有一千七百万英镑的基金。J·P·贝克尔代表德语区的瑞士报告有三万名会员。塞扎尔·德·巴普代表比利时报告有六万四千名会员。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编辑A·C·凯麦隆以“全国劳工同盟”

① 路德维希·布吕格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史》（1922年维也纳版），第2卷，第46页。

② 1871年6月5日《泰晤士报》。

③ 奥斯卡·特斯屠：《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里昂版）、《国际蓝皮书》（1871年巴黎版）和《第一国际和雅各宾派被排挤出欧洲》（1872年巴黎版）。他的这些著作另有德文版简写本，书名为《国际及其性质与目的》（1872年莱比锡版）。

④ 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1867至1869年日记》（1901年莱比锡版），第8卷，第406页。

的代表身份，代表组织起来的八十万美国工人向代表大会致敬。国际比利时支部机关报《国际报》（1870年3月27日）报道，国际“在欧洲和美洲已把几百万工人集合在它的保护之下”。①

2

然而，客观事实与这些传说多少有所不同，特别是与国际神 [123] 话般的财政来源的传说有所不同。

实际上，国际的财政来源是十分可怜的。总委员会在它成立初的一次会议上规定，个人会员每年缴纳会费为一先令（一马克），由工会集体入会的会员每年会费为三便士（约二十四芬尼多）。但工会认为会费过高。总委员会把会费降低为半个便士（约四芬尼）。② 但是，即使会费降低了，工会看来也负担不起。总委员会只好满足于一年收一笔总会费。这里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有九千名会员的团结细木工联合会缴纳二英镑，有四千名会员的泥水工联一英镑，雪茄烟工联一英镑九便士，考文垂织带工联一千名会员五先令，书籍装订工联十七先令六便士，大风琴工联二先令一便士，工联伯明顿理事会一英镑。在国际的文件中未见有关于工会会费的年度报告；倒是有一份财务委员考威尔·斯特普尼整理的关于头六年中总委员会从个人会员收入会费的报告。报告说明收入金额如下：1865年二十三英镑；1866年九英镑十三先令；1867年五英镑十七先令；1868年十四英镑十四先令；1869年三十英镑十二先令；1870年十四英镑十四先

① 群众运动领导人为了提高自己的重要性而喜欢夸大其追随者的人数，这在政治斗争中也许一向如此。例如，有一次，厌恶任何蛊惑人心宣传的维克多·阿德勒对谢德曼说：“告诉你吧，对于使用‘几百万’这个词，我是从来不小气的。我不止一次地以几百万人的名义讲话，尽管只有几百人站在我背后。”菲利浦·谢德曼：《崩溃》（1921年柏林版），第125页。

②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年9月9日）。

令。在最后一份报告中，即恩格斯向海牙代表大会提交的1870至1872年的财政报告中，出现了“二十五英镑以上”的赤字——这是总委员会欠了它某些委员和其他人的款项。^①例如，总委员会1869至1870财政年度的总收入为五十一英镑七先令一便士，这一年的支出为四十七英镑七先令五便士，但还欠有四英镑四便士的房租未付清。

房租和总书记的薪金引起了总委员会的不少忧虑。房租每星期为四先令(四马克)；尽管房主一再提出警告，并扬言威胁说，要通过法院勒令其搬走，但房租几乎从来没有一次全部付清过。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抱怨说：“总委员会欠了五个星期的房租，还欠了自己书记的钱”(1869年7月24日)。^②书记的工资问题是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1866年9月)才出现的，因为在这以前，乔治·克里默任书记是尽义务的，不领工资(他有当建筑工联书记的收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建议，给他的继任人的工资定为每星期二英镑，总委员会只同意给一英镑。但还是经常无钱支付如此微薄的工资。于是，总委员会(1867年5月)^[124]月底把工资降低到十先令六便士，并决定在出席各次会议的总委员会委员中募集这笔钱。第一个星期募捐了十一先令；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募捐了：九先令、八先令、七先令、七先令六便士、零、六先令、零、三先令，最后一个星期是八先令，从此以后就停止了这种捐款活动。鉴于连国际总书记的十先令六便士工资也越来越无力支付，约翰·黑尔斯(1870年10月11日)提请把它减低到每星期五先令(不过提案以六票对一票被否决了)。

以下面几条会议记录为例，就可说明总委员会要为哪些开

^① 见汉斯·格思：《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附有有关文件资料》(1958年麦迪逊版)第2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251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25页。原文24日疑有误，似应为22日。——译者)

支发愁：“授权总书记垫付因他在德国为声援伦敦裁缝罢工而举行的团结活动期间通信所用的六便士邮票钱”（1866年3月27日）；或者：“授权秘书购买现金账簿一本”（1869年2月2日）。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并非开玩笑地说：“总委员会的财政情况处于零度以下，负方的数值持续增长”。^①伯恩哈迪将军，甚至阿普耳加思，对国际的财政来源都多少作了过高的估计。

3

但是，远为困难得多的却是，从关于国际组织了一支浩荡大军的传说中揭示出基本事实真相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国际会员人数的统计资料。国际个人会员的数字无疑很少，例如，截至1870年年底英国的个人会员不到二百九十四名，法国和瑞士的人数虽然高得多，但可能总共只有几千名。比方说，巴黎中央委员会报道，1870年法国只有三十六个基层小组。^②

在德国，看来发展国际的个人会员似乎特别困难。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1865年8月5日）抱怨说，李卜克内西“却不能在德国为国际协会建立一个哪怕只有六个人的分部”。^③奥古斯特·倍倍尔直至1867年才是国际的会员。贝克尔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的为国际吸收德国会员的工作干得比较出色。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09—1886）是一位性格豪放和思想坚定的革命家。1848年革命时，他当了志愿队指挥官，在巴登

①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1894年柏林版），第337页。

②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年7月19日）；E·多莱昂：《工人运动史》，第1卷，1830—1871（1936年巴黎版）。Y·M·斯蒂克洛夫：《第一国际史》（1928年伦敦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337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40页。——译者）

【125】打得相当漂亮。后来，他成为加里波第、拉萨尔、马克思和巴枯宁思想的狂热信徒。1865年年底，他在日内瓦创办《先驱》月刊。这份杂志是面向德国和瑞士的，并被国际总委员会承认为正式机关报。在1866年1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他就呼吁读者建立至少有三名会员以上的国际地方组织。于是，在莱比锡、斯图加特、佐林根、科伦、柏林、马格德堡、汉堡和其他德国和瑞士的城市，出现了这种联合在贝克尔领导下的国际德国人“语言支部”的组织。但是，地方组织人数寥寥无几，例如，柏林小组（1866年1月）只有六名会员，斯图加特小组（1866年2月）只有九名会员，科伦小组（1866年3月）只有十七名会员。至1871年年底，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了五十八个地方性小组，其中大约有一半在德国，不过会员总数只有三百八十五名。^①即使在1869年8月，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之后，国际的会员人数仍然踏步不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指出，“直接加入国际的德国工人人数一直很少”。“任何时候，都难于超过千把人”。^②

在奥地利，如同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在给英国驻日内瓦大使布卢姆菲耳德男爵的一封密信中所说，“尽管警方作了最为严密的监视，甚至在1870年的大规模工人叛国案中，都未能证明本国某个协会与国际有联系”。他又说，只是警察在抄家时，“在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的几个特别活跃的会员那里，抄到了国际的卡片”。^③

在意大利，马志尼控制了工人团体。他毕生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标就是民族统一。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的斗争中，他致力

① 见R·P·摩根依据极其丰富的资料来源撰写的内容精采的调查报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一国际1864至1872年》（剑桥大学学位论文）。

② 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3卷，第179页。

③ 转引自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100页。

于意大利人民各阶级的联合。因此，他拒绝作为工人的阶级运动的社会主义。他希望，能使国际为他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斗争服务。当这一努力失败时，他就反过来反对国际了。

但是尽管如此，国际还是顺利地开始在意大利南部扎下了根。1866年5月，那不勒斯意大利工人协会宣布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报告，1869年该协会大约有六百名会员。但是，推动国际在意大利发展的却是巴黎公社。意大利工人热烈拥护巴黎公社，然而当时还控制着意大利工运的马志尼却拼命诅咒它。相反，加里波第则拥护公社并愿意为之效力。马志尼控制的工人团体中的革命派对于他对公社所持的态度感到愤怒，纷纷离开他，在洛多维科·纳布鲁齐和埃尔米西奥·佩斯卡托里的领导下，于1871年12月波伦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反对派团体，即工人联合会。不久后，在波伦亚、都灵、米兰、腊万纳、法恩扎成立了国际支部。贝努瓦·马隆是公社失败之后，国际遭到镇压之前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因系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公社社员而被迫逃亡，并定居在意大利。他谈到，成立了大约一百个国际的和革命的小组。^①1871年正式报道，其会员总数为一万名；但据切萨雷·洛姆布罗塞估计，只有两千名。

两个数字之所以相差悬殊，其原因在于运动的独特社会结构。列奥尼达·比索拉蒂把当时意大利的国际描绘成一个学者、行为越轨者、诗人、狂热分子、博爱主义者和狂暴之徒的集团。他们没有固定的前进路线和明确的目标，而是通过深刻的革命感受和本能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是真正的特殊组织，毋宁说是形形色色的人员的收容所和为了伦理目标而战斗的集团。在其研

^① 贝努瓦·马隆：《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75年洛迪版），转引自罗伯特·米歇尔：《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第21卷，第358页。又理查德·霍斯泰特：《1860至1880年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1958年普林斯顿版）。

究论文中引用了比索拉蒂评论的罗伯特·米歇尔，同意这一点只限于就国际的领导层而言；而国际的广大会员则是由城乡无产阶级组成的。但是，即使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当时也还没有能力发展巩固的组织。在激动人心的事件或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的鼓动之下，他们蜂拥而来加入国际的各支部，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纷纷离去。

在西班牙，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直至1868年9月西班牙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一个月后，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致西班牙工人》的声明，在此以前构成共和党一翼的社会主义者，这时脱离共和党，创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处于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之下。1869年3月，在巴塞罗那成立了一个国际支部，不久后在马德里也成立了一个，在西班牙这几年的革命气氛中它们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和安达鲁西亚。据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的两名代表之一的法尔加-佩利塞尔报告，全西班牙约有两万名国际会员，一百九十五个支部，其中有七千零八十一名会员、三十八个支部在巴塞罗那。不过恩格斯断言——如他在总委员会所报告的，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也可能是由于政府的迫害而导致运动处于瘫痪状态。^①

[127] 在美国，1868年首先出现了国际的德国支部，不久后也出现了国际的美国、法国、捷克、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支部，而且是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新奥尔良、纽瓦克、斯普林菲尔德、华盛顿和威廉斯堡——1871年总共约有五千名会员，三十个支部。^② 但是，第二年无产阶级的会员与知识分子的会员之间发生争吵，国际北美联合会分裂了。它在1872年7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总共代表仅存的九百五十名会员、二十二个支部——即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年1月3日）。

② 莫里斯·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1906年斯图加特版），第135页。

十二个德国支部，四个法国支部，三个美国支部以及爱尔兰、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一个支部。^①

上述有关国际个人会员人数的概况，是认真审阅了总委员会会议收到的为数极其有限的各国支部的报告以及其他资料来源后得出的。

4

但是，对于估计国际运动的规模来说，重要的是不应忘记，个人会员仅仅是构成整个国际组织的两个部分之一。另一部分，即由工会和政治团体所组成的集体会员相比之下人数要多得多。

总委员会把争取英国工联看成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②它派遣代表团到各工联理事会去说服它们参加国际，或者至少争取它们对国际的同情。1866年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对国际“为通过友爱的共同纽带把各国工人联合起来所作的努力表示完全赞赏”，并推荐“参加代表大会的所有工联加入国际”。这是总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成就。当罗伯特·阿普耳加思向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报告英国的国际会员为九万五千名时，事实上已有二十八个工联加入了，其中有机械工联会员三万三千名和土工工联会员二万八千名。

并非罕见的是，在工会斗争严重到白热化的时刻，人们自发地集体参加国际。国际成立时，英国工联领导人向它提出的具体任务之一，就是防止由于外国派进工人而使罢工遭到破坏，以

^① 海尔曼·施留特尔：《美国的国际》（1918年芝加哥版），第177页；又见约翰·R·康芒：《美国劳工史》第2卷（1921年纽约版）。

^② 见乔治·豪威耳：《工人运动与工人领袖》（1902年伦敦版）；A·W·汉弗莱：《罗伯特·阿普耳加思》（1913年伦敦版）。

[128] 及组织团结行动支援罢工的工人。总委员会基本上就是英国工运的代办处。它的委员一半是英国工联的领导人，它的主席乔治·奥哲尔同时也是工联伦敦理事会的书记。国际的书记和财务委员一直是英国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德国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在内。总委员会几乎每次开会时都得讨论工会的斗争——罢工的工会来函或派遣代表团要求国际通过它的组织阻止外国派进破坏罢工者，或者募款支援罢工的工人。

总委员会事实上干预了无数次面临外国罢工破坏者威胁的罢工。例如，伦敦金属丝工人的罢工、爱丁堡裁缝的罢工、伦敦烟草工人的罢工、曼彻斯特裁缝的罢工、伦敦筭筐编织工的罢工和伦敦裁缝的罢工。总委员会通过它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支部和工人报纸，呼吁被英国企业家的代理人招来的、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给别人充当罢工破坏者角色的工人团结一致，并且通常都劝说他们拒绝英国的招工广告。总委员会在一份给英国各工联的通知（1869年7月）中说，“在审讯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中提出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们在英国铎工工人、裁缝和铁路员工罢工期间，阻止法国工人启程到英国去。”

这些有益的团结行动在千万个工人家庭中为国际赢得了声誉。大多数罢工工人在罢工集会上和报纸的报道中，可能还是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工人的兄弟同盟，这个同盟有力量通过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采取的行动，支援曼彻斯特、爱丁堡和伦敦工人的斗争。工人们感到自己属于这个兄弟同盟，乃是对这一经历作出的自然反应。

当人们知道，国际由于进行干预到处都能使工人的斗争得到圆满结果时，国际的威信就日益提高，并带上传奇色彩。

这一系列的行动是以国际干预1867年2月巴黎青铜工人的斗争开始的。企业主不让近一千五百名工人上工，并以同样手段对其他四千名工人进行要挟，因为他们拒绝抛弃他们不久前

建立的工会。不允许上工的工人向国际求援。总委员会呼吁工联伦敦理事会和大陆的国际各支部给予经济援助。小笔和大笔的捐款纷至沓来：例如，伦敦书籍装订工捐献十英镑，细木工伦敦支部捐献二十英镑，英国烟草工联捐献五英镑，法国工会的捐款四千英镑和英国制帽工联的借款一万英镑。这就是国际开展的第一次经济团结活动，它对工人和对企业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国际巴黎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弗里布尔在其著作 [129] 中①述及的一样。这种影响加强了工人的自觉性和他们的信心，使企业主为之愕然。大笔来自伦敦的汇款到达几天之后，企业主就放弃了他们原来提出的条件，打开了工场的大门。工人们成百地加入了国际巴黎支部。

1868年春，日内瓦建筑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从十二小时缩减到十小时）进行罢工，有谣言说，在伦敦的总委员会保证给日内瓦建筑工人在罢工期间每月贷款四万瑞士法郎，单是这个谣言就逼使企业主进行谈判并作出了让步。这次波动全城的罢工发展成资产阶级和国际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国际战胜了资产阶级。几天之内，约有一千人加入了日内瓦支部。

总委员会对里昂丝织工人罢工的干预产生了规模更大的类似影响。总委员会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报告说：“尽管警方进行恐吓，工人仍公开宣布加入国际。其他工人小组也仿效他们的榜样，我们争取到了一万名以上的新会员。”

国际进行干预成绩显著。这消息在许多国家传开。据总委员会会议记录记载，呼吁要求支援工人斗争的有鲁昂纺纱工人的斗争，莱比锡排字工人的斗争，巴黎翻砂工人的斗争（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由英国机械工联向他们提供一笔罢工贷款），纽约造纸工人的斗争（他们要求总委员会制止输入欧洲廉价工

① E·E·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版），第101页。

资的工人),法国维恩纺织工人的斗争,德国、比利时烟草工人的先后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要求给瓦尔登堡罢工的矿工提供贷款)。

我们已经看到,总委员会本身是没有钱的。即使是各工会的储备金,当时也少得可怜,国际各支部力量既单薄又贫穷。每次呼吁要求援助都给国际提出了问题。以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收到的向巴塞尔大约八百名被开除的染丝工人和织带工人捐款的报告为例,就能看到国际支援罢工的经济来源。由于这批工人公然加入了国际,该市的优秀公民感到惊惧,因而开除工人。工人们向总委员会求援,总委员会则对国际各支部发出呼吁。第一张募款清单金额为三百英镑。捐款的有:总委员会四英镑,伦敦纺织工联一英镑,伦敦德国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三英镑七先令,国际日内瓦支部三十法郎,巴黎某公开集会一百三十五法郎,巴塞尔某公开集会六十二法郎。此外,巴塞尔邻近两个村庄的居民送给被开除的工人土豆、苹果、青菜和木柴。还应补充说一句,这批被开除的工人终于坚持下来了,企业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工人参加国际。

在沙勒罗瓦矿区的工人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之后,比利时大批工人参加了国际。1869年春,煤矿巨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把矿井生产时间缩减为每周四天,同时减低工资百分之十。矿工进行罢工和上街游行以示抗议。军人插手干预沙勒罗瓦,向示威者开枪,打死十一人,甚至当街穷追受伤者。之后,许多工人遭到逮捕,其中也有国际比利时支部的领导成员。总委员会发表(1869年5月4日)一篇由马克思执笔的《致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宣言。宣言以激烈的语言向全世界控告比利时政府。^①同时,总委员会为斗争中的死难者组织募捐活动和为被捕的人组织辩

^① 宣言原文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工会》(1953年柏林版),第152页起一连几页。

护。煤矿区发生的事件激怒了全国工人。他们数以千计地加入了国际。

鲁道夫·迈耶尔声称，法国几次罢工——鲁昂棉花工人罢工，里昂丝织工人罢工和1868至1869年圣太田煤矿工人罢工——的结果是，国际会员的人数增加了五万多名。^①

但是，出于一时斗争的冲动而涌入国际的群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绝大部分又纷纷离去，不过仍保留了对这个在困难时刻帮助了他们的伟大国际工人同盟的感情。

5

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国际的关系是建立在多少比较牢固的基础之上的。但在第一国际时期，只有德国和奥地利有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雏型；在德国，有斐迪南·拉萨尔于1863年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及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在后一联合会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年8月）上，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两个党都没有正式加入国际，正如倍倍尔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所说明的那样，其理由是“德国必须自己首先建立社会民主党，因为除了国际组织之外，本国的组织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本国的组织，国际组织就只是一个影子”。^②但是，这两个党都声明与国际团结一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几乎全文采纳了国际章程的原则宣言，并声明，“就结社法所允许”，党“把自己看成

① 鲁道夫·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年柏林版），第1卷，第122页。迈耶尔的两卷集著作所叙述的第一国际及其各支部的历史，其全面性和纪实性居用德文撰写的同类著作之冠。又见古斯塔夫·耶克：《国际》（1904年莱比锡版）和J·M·斯蒂克洛夫：《第一国际史》（1928年伦敦版）。

② 梅林同上引书，第3卷，第368页。关于讨论由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两人确定的对国际持观望态度的策略原因，见摩根同上引书。

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此外，代表大会推荐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际。

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是随着1867年12月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的成立而出现，并很快就争取到大批支持者的，它也以类似的方式处理自己跟国际的关系这一问题。奥地利政府在此之前已宣布国际的“奋斗目标”“危害国家安全”，公开与国际建立组织联系就要以叛国罪受到刑事制裁。因此党不能正式参加国际，但却按国际的思想行事。这一点政府当然也看出来了，它在1870年7月指控十四名党的领导人犯有叛国罪，将他们交付法庭。起诉书虽然不能证明党与国际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却以如下事实作为控告理由，即安得列阿斯·肖伊和亨利希·奥伯温德（两人为主要被告）“以近十万名奥地利人的代表身份”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在公共集会发表的演说及撰写的报刊文章中宣布，他们“不仅完全赞同（采用国际基本原则的爱森纳赫纲领的）思想和基本原则，而且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①由于被告对此无法加以反驳，因而以犯有叛国罪而被判处六年重刑。

尽管奥地利的党没有加入国际，它的党员个人加入国际的人数特别少，而且肖伊和奥伯温德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时所代表的“十万名同志”的数字也许属于过分夸张，但仍然可以断定，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在感情上是与国际团结一致的。在部务参议施密特-察比罗夫为奥匈帝国和德国政府就磋商采取对付国际的措施而在1872年夏召开的会议所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在维也纳，作为国际支持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社会民主党追随者的随时可以投入行动的工人，估计有二万名，而纪律性还比较松弛的工人群众估计大约有十五万”。^②

① 《维也纳叛国案》，第278—279页。

② 1872年6月8日的“报告”，见布吕格爾同上引书，第2卷，第145页。

第一国际个人会员为数很少，而国际对工人感情上所产生的影响很大，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法国，表现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其他大城市。国际法国各支部充其量不过是基层组织，有些支部诚然有几百人。但是，通过国际个人会员在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工人组织及政治俱乐部中的影响，由于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有利作用，六十年代末，国际在法国以及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形成了群众运动。

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段插曲，也是说明国际发挥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如前所述，国际美国各支部在其短暂的兴盛时期只联合了几千名会员（据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其中有奴隶解放的伟大先驱温德尔·菲利浦斯）。^①但是，他们成功地赢得了—个拥有六十多个工会的组织全国劳工同盟的同情，这个组织是在威廉·H·西耳维斯领导下在1866年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869年5月，总委员会邀请它派遣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1869年8月在费城召开）接受邀请，选出A·E·凯麦隆为代表，并说，他代表八十万美国工人向巴塞尔代表大会致敬。一年后，全国劳工同盟声明（在1870年8月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它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是一致的”，而且宣布它将“很快加入”国际。^②不过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已由于1871年和1872年群众罢工遭到一系列沉重失败而导致工人阶级对它的冷淡而寿终正寝。

但是，美国工人运动的衰落看来并未减低公众对国际的兴趣。美国国会众议院关于设置研究工人现状专门委员会的辩论（1871年12月15日），为国际的威望提供了一份特别的证明。这项法案是由共和党国会议员、后来任克利夫兰内阁总检察官的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年8月15日）。

^② 希尔奎特同上引书，第181页。

R·霍尔提出的。霍尔在申述此项法案的讲话中表示他对国际
[134] 特别重视,他指出,“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遍及整个欧洲,到处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并使各阶层的人士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量的组织,它请求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措施”。他又说,“此外,欧洲工人和美国工人的国际协会也因此而有权要求得到重视,因为它使世界各国彼此之间接近了,因为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休戚相关,即由于共同的劳动纽带产生的休戚相关”。他提醒人们想起“我们自己进行战争的最黑暗岁月”,当时“英国统治阶级和法国皇帝”以进行干预美国北方各州相威胁,而这种干预只是“由于郎卡郡工人的怒火才得以制止”。最后,他让众议院秘书宣读倡议统计各国劳工阶级现状^①的1871年9月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和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附带说一句,再三表示欢迎霍尔讲话的众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参议院也同意设立调查委员会,但却延期对草案要求设立全国统计局一事作出决定。

以上就是关于国际会员动态及其影响大小的确凿资料。这些资料没有表达出完整的面貌。本想以统计的方式对运动作出概括,但由于缺乏资料来源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所谓由其伦敦总委员会指挥的严密组织起来的国际几百万大军的报道,纯属传说。国际没有指挥已组织起来的群众。如同伦敦《泰晤士报》所写,它是“思想发达而躯体细小”。但是它成功地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同国际团结一致的感情,并赢得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者的同情。这就是它之所以使统治阶级感到它的力量十分可怕的根本原因。

^① 施留特尔同上引书,第144—145页。

国际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

[135]

马克思在章程的序言的头三段中，提出了国际的一般基本思想——这些思想的依据是他的基本历史—哲学观和基本政治观。

但是，国际绝大多数的会员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一致接受了提交给国际代表大会（1866年于日内瓦举行）表决通过的章程。随后，他们拥护序言所阐明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①”的思想；他们和马克思抱有同样的看法，即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垄断者的支配，是社会贫困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最后他们也同意章程的提法：“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②”然而，对这些思想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国际内部的任何派别都根据各自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来解释这些思想。

国际内部的派别为数不少，有反政治的合作社会主义代表，改良主义、工团主义、革命派、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理论家的代表，蒲鲁东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卡贝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各种思想相互争论不休，乱成一团。

各种派别之间的争吵，反映为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关社会、政治和纲领问题所进行的辩论，而且在国际成立的头几年中是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之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为确立一

① 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页。——译者

② 同上。

种指导整个运动的共同思想和制定一个包括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实现方法的纲领而进行思想搏斗的历史。

1

[136] 根据圣马丁堂成立大会的决议，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于1865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但是，马克思担心，象他特别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所见到的那样，社会思想上和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可能使国际在全世界面前“出丑”。他说服总委员会最好等上一年再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里改为在伦敦召开一次不公开的代表会议。

1865年9月，在国际成立大会一周年的那天，这次代表会议开幕了。一开始，代表会议就暴露出它在组织方面的弱点。实际上只有四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代表法国的只有一个巴黎工人组织代表团（托伦、瓦尔兰、弗里布尔和利穆津）和法国通讯书记欧仁·杜邦。比利时代表（塞扎尔·德·巴普）和瑞士代表（J·P·贝克尔和弗朗斯瓦·杜普累）的报告只好谈谈争取开展国际运动的一些初步活动。德国本身根本没有代表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施韦泽虽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了国际成立宣言，但他的组织，如我们所知，没有加入国际。这次代表会议上的德国人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代表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和卡尔·沙佩尔，另外，还有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瑞士通讯书记海尔曼·荣克和总委员会副主席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伦敦波兰全国协会代表博勃钦斯基代表波兰。马志尼的秘书沃尔弗少校代表意大利。比较起来，代表性最大的是英国代表团团员；工联伦敦理事会主席乔治·奥哲尔和书记乔治·豪威耳、木工和建筑工人工联书记W·R·克里默，以及一批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的其他工联领袖。

这次代表会议(这是国际的第一次会议)即已预示马克思和蒲鲁东信徒在观点上的对立。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国际的组织和财务事情,但也要确定下一年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总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如工作日的长短问题、女工和童工问题、工会和合作社问题。不过,议事日程上也有政治问题:俄国在欧洲的作用。

马克思把沙皇俄国这个“野蛮强国”^①看成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关键所在。他感到,通过战争和象波兰那样的民族革命来削弱俄国,是欧洲民主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的一个主要要求。他曾支持与俄国发生冲突的任何政治流派、任何欧洲国家,甚至在克里木战争中支持专横暴虐的土耳其。在国际成立宣言中,他公开谴责了沙皇统治。因此,国际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也应提高它反对俄国的声音。

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关于向代表大会提出决议案的建议 [137]。决议案要求“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根据每一个民族拥有的民族自决权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以遏制俄国在欧洲的日益增长的影响”。

但是,法国代表团按照蒲鲁东的思想反对这项提案。蒲鲁东根本反对采用政治行动的方法。此外,象曾经反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争取实现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一样,就在1863年波兰起义中,他还几次三番地公开声明反对恢复波兰。因此,他的追随者也反对这次决议案。但代表会议却以多数票通过将它提交代表大会讨论。

在马克思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总委员会曾为向一年后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详细阐述了关于俄国帝国主义的决议案。决议案说,波兰问题对工人阶级争取自由的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4页。——译者

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沙皇政权，“这个黑暗的亚洲强国”^①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堡垒。但是，只有恢复波兰才能打破俄国在欧洲的势力。波兰问题的命运将决定德国究竟是神圣同盟的前哨或是共和制法国的盟友。只要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工人运动的发展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又将延缓。

但是，法国代表团在瑞士罗曼语区代表的支持下，想置身事外。E·C·弗里布尔提议，越过这个“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转入讨论议事日程，而对专制制度只进行一般的谴责就行了。英国代表团尽力说服法国人，但未见成效，出现了公开分裂的危险。为了避免分裂，代表大会一致同意J·P·贝克尔提出的一项让步的决议案：在一般谴责专制制度的范围内着重批判俄国帝国主义，要求恢复波兰。

2

波兰—俄国问题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唯一一个政治问题。对于议事日程上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拟就了一个纲领，正如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的，^②“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

[138] 马克思在撰写纲领时，不得不特别考虑到国际法国支部的理论立场。他感到，法国工人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联盟，对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22页。——译者

② 卡尔·马克思：《致库格曼》，同上，第31页。提交代表大会的题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的纲领全文，见《卡尔·马克思论工会》，同上，第114—121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60—361页。——译者）

他所看到的即将来临的革命命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期待着法兰西帝国迅速崩溃，希望法国革命如同1848年那样，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他认为，法英两国工人阶级的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现在，国际是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代表聚会的唯一基地；它是两国工人运动的唯一共同组织。马克思提心吊胆地考虑，不要因理论上互不一致的争论而危害国际。参加国际的英国工联领袖没有提出特别的理论；他们是实用主义者。相反，法国工人运动在精神上却处于蒲鲁东思想的影响之下。

蒲鲁东提出的关于建立社会关系新秩序的目标，就是公正。但是，如他所说，一个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社会要求取消社会生活国家化，因为他认为任何权威，特别是国家的权威，都是暴政，都在破坏公正原则。对他来说，国家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同一个权威原则的两个方面。因此，他也认为，正如他在致比埃尔·勒鲁的信中所写的，“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取消人统治人的制度是同一个公式”。但是他感到，共产主义绝不是一种可以实现公正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他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也是建立在权威原则基础上的。他说：“共产主义和专制制度是处在互为关系中的权威原则的两张脸孔”。^①他建议成立生产合作社，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建立交换的互保制度和创办组织无息信贷的人民银行，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行政区和合作社联盟，把人类从国家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为了避免发生严重冲突，他在起草时尽量不用触怒他人的措辞，但总委员会提出的纲领中有几点还是引起了法国代表的不满。这自然是避免不了的。

纲领首先提出了国际在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中的真正目的，

^① 转引自麦克斯·纳特劳：《从蒲鲁东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1924年柏林版），第6页。

这就是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它的一个特殊职能是，“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

[139] 纲领说：“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象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接着，纲领谈到了工时的问题。限制工作时间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为了“恢复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而且也是为了“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纲领要求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和禁止做夜工。

然而，纲领却承认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现代工业的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乎规律的趋势”。纲领又说，虽然在资本统治下它是“畸”形的，它“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由于工人的贫困”，而让他们“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和卖主”。纲领要求采取立法措施，把工人阶级的孩子“从现行制度的令人窒息的活动中的拯救出来”。纲领还提出一项把智育、体育与综合技术生产教育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教育计划。

马克思等待着蒲鲁东派抗议实现这一改革的立法措施，因为蒲鲁东认为任何法律都是个人自由的桎梏。马克思向代表们发出呼吁，请他们不要丧失基本的理智。他说：“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促进努力使之实现的改革，“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那种认为国家的强制暴力将加强这些法律本身的蒲鲁东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说：“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

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①

接着，纲领转而谈到工会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象他在给总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所写的每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马克思也把这个作为现行社会制度的现象和放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基本关系中来对待。

马克思一开始就确认，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个人的劳动力。工人这一边的唯一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因此，工会是防止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所必需的。此外，在资本与劳动的日常斗争——“真正游击式的斗争”中，在争取人类尊严的劳动条件以及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中，工会也是必需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后来指出的，还有一个远为重要的任务也落在工会的肩上——即作为“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本身的杠杆”的任务。工人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因此，工会应当支持为此目标进行奋斗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承认自己是整个阶级的进行战斗的战士和代表”，不仅是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而且是仍然处于落后的没有组织起来的阶层的代表，例如农业工人，以便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达到狭隘的利己主义的目的，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总的解放”。^② [140]

备忘录所拟就的提纲就是如此。它当然不能使法国代表满意。他们指责罢工的方法是“粗暴的斗争手段”，相反主张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样，按照蒲鲁东的理论，“工资”就变成“工作日”了。他们“以合同自由的名义”抗议通过法律实现八小时工作日

^① 以上记述纲领各段中的直接引语译文，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4—218页。——译者

^② 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22页。——译者

的要求，因为“干预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是与国际代表大会“不相称的”。关于纲领中妇女劳动问题，法国代表团提出一项“从体力、道德和社会关系上诅咒”妇女劳动的决议案。对纲领中有关工会的问题，法国代表团提出一点同样按蒲鲁东思想起草的纲领性补充，补充声称，“过去，由于行会制度和手工业者独自营业权，工人处于奴隶状态；现在，存在着法律上的责任，即无政府状态；而将来，工人将同时是生产者、资本家和消费者”。对于由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采纳了马克思在国际成立宣言中提出的思想，认为要解放群众，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协作制度，而且必须依靠全国财力的促进，法国代表团提出学习蒲鲁东的以“无偿信贷”为基础的国际信贷银行方案。

在代表大会开始辩论纲领之前，必须讨论总委员会通过的临时章程。对此，法国代表提出一项附带条款，规定只接受手工业者为国际会员，或者起码是手工业者才可入选总委员会或担任其他职务。假使这一提案被通过，马克思就不得不退出总委员会。但是，该提案并不是蓄意针对马克思的，它是出于法国工人对多次出卖过工人的知识分子表示不信任；基于法国的特殊政治条件，这种不信任是有其理由的。在法国，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领导的强大而积极的革命共和派运动，以及布朗基派领导的暴动主义俱乐部。法国代表致力于把工人运动建立在工会和合作社的基础上，并努力防止工会和合作社卷入政治行动。他们担心，资产阶级共和派或布朗基派暴动分子控制国际法国支部，并夺走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但是，英国和瑞士的代表完全不能接受这项提案。在这两个国家，工人运动向来一有机会就与激进的资产阶级组织和知识分子进行协作。在英国，不久之前（1865年2月）工联与激进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一起成立了争取改革选举法斗争的改革同

盟，并与资产阶级团体共同领导了争取普选权的集会游行。这次集会游行动员了数十万工人，最后终于赢得了选举法改革的胜利(1867年4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把改革同盟的成立视为国际的“伟大成就”。他告诉恩格斯说，“改革同盟是我们一手建立的，在由十二个人(六个资产者，六个工人)组成的小小的委员会里，工人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他还说：“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可以不声不响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用其他任何方式做出来的要多。”^①对于在总委员会中任职的英国工联领袖来说，这一行动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他们不能允许对他们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盟产生怀疑。法国的提案遭到否决，总委员会提出的章程略作修改就通过了。

正如马克思在前文提到的致库格曼一信中所写的，他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代表大会的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法国人的讲话和对纲领草案的附加提案无疑引起了他的恼怒。“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②

但是，代表大会最后还是采纳了马克思提出的全部纲领。代表大会赞成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废除工资制和建立以工人阶级政权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大会声明赞同从法律上实行八小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315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13页。——译者)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60页。——译者

[142] 工作日和国民学校教育的公开体制，并承认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国家政权是实行社会改革的工具。此外，代表大会也提高了反对沙皇制度的调子。

代表大会主席乔治·奥哲尔也在他给总委员会的报告中承认，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他以热情洋溢的词句描述了日内瓦工人欢迎代表们的情况。

代表们的确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大批群众排成队伍，举着旗帜喜气洋洋地把代表们领到代表大会会场。但是，出席代表大会的整个代表情况予人印象却不大深刻。事实上只来了三个国家的代表：英国、法国和瑞士。总共六十名代表中就有三十三名代表瑞士、十六名代表法国（他们之中除了托伦和瓦尔兰外也有贝努瓦·马隆）。来自英国的有奥哲尔、W·R·克里默和詹姆斯·卡特，埃卡留斯、荣克和杜邦是总委员会的代表。马克思不想中断《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工作，他没有去日内瓦。

代表大会批准伦敦为总委员会的会址，并改选了总委员会的委员。一星期后，总委员会开会，通过奥哲尔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组成新的总委员会。劳伦斯和卡特建议马克思担任主席，但马克思不肯担任，并提议再次选举奥哲尔。之后，奥哲尔被选为主席，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为副主席，彼得·福克斯为总书记，德尔为财务委员。

代表大会在报界，当然首先是在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的为数不少的工人报刊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正式机关报刊登消息的有：英国的《工人辩护士报》、J·P·贝克尔创办的日内瓦《先驱》、塞扎尔·德·巴普的布鲁塞尔《人民论坛报》，以及日内瓦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此外，还有一系列代表国际事业和报道代表大会情况的报纸，如在罗曼语区瑞士拉绍德封出版的、由代表大会代表皮埃尔·科勒里博士创办的《未来呼声报》、弗里布尔创办的巴黎《法兰西信使报》、

H·勒弗尔的巴黎《未来》、J·B·施韦泽的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巴塞罗那的《工人报》。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对代表大会发表评论；例如，《日内瓦报》赞扬“这次代表大会充满了真正世界主义的精神”。正如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大陆评论》和《现代评论》——法国两家声誉最高的杂志——刊登了“两篇关于国际的详细文章，它们都认为国际和它的代表大会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接着《双周评论》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①

3

1867年9月初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并未 [143] 使马克思完全感到不满。虽然代表大会力求调和矛盾，有时把它的决议案饰之以蒲鲁东的语言，甚至把这种或那种蒲鲁东的基本要求塞进决议案，但代表大会实际上还是接近于马克思为所讨论的问题拟定的解决办法。

在洛桑代表大会上，除了英国、法国和瑞士外，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也派有代表参加。但是，在与会的七十二名代表中，瑞士人又是超过一半以上——三十八名；法国代表团有十九名团员（其中有沙尔·龙格）。德国来了六名代表，其中有马克思的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唯物主义历史学家F·A·朗格和当时广为流行的《力量与物质》一书的作者路德维希·毕希纳。不过，德国代表只代表一些小的地方组织；德国两个最大的工人联合会没有一个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英国有两名代表参加，比利时有一名代表（塞扎尔·德·巴普），意大利有两名代表（加斯帕雷·斯塔姆帕和塞巴斯蒂诺·塔纳里）参加。总委员会委派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441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70页。——译者）

卡留斯、杜邦、列斯纳和卡特为代表。马克思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观点上的根本对立在辩论关于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时暴露出来了。这场辩论以讨论关于青年教育是否属于国家任务的问题开始。一些代表主张由国家法律保证和通过国家对儿童实行强制的普遍世俗教育。法国代表对此表示异议。龙格提出论据，认为由国家控制的学校如同任何国家机关一样，将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和政治权力的手段。托伦原则上反对国家有权对教育施加影响，认为这是家长的专有权利。但是，他又补充说，在家长无力担负其孩子的教育时，国家负有当然的义务对此进行干预。由于工人孩子的家长往往无力履行这个义务，因此，国家就应承担关心儿童教育的责任。代表大会就在这么一份文字多少有些含糊其词的决议案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它在形式上使蒲鲁东派感到满意，实际上是满足了马克思派的要求。

在讨论有一项决议案时，出现了异常尖锐的对立，随之而开始了一场看来是震动国际的辩论——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辩论，亦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辩论。

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决议案阐述了铁路和其他具有垄断性质的经济部门的国有化问题。当然，对于剥夺资本主义这些部门的要求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谁来接管这些垄断工业呢？由分散成无数地方性组织的生产合作社来接管吗？它们还没有为承担这一使命而准备好条件。那末由国家来接管吗？蒲鲁东派憎恨国家，认为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组织，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他们怎么会同意要求通过经济力量无限制地增强国家的权力呢？法国代表团表示愿意赞成这种决议案：虽然主张把铁路之类的垄断性质经济部门转为公有制，但不直接构成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同时也提出资本主义财政垄断的问题，主张必须打破

[144]

这一垄断，而且办法是通过把资本主义的银行转为具有公益性质的人民银行。

虽然法国模式的决议案得到了通过，但关于公有制的讨论并没有平息下来。巴普提议，把宣布土地转为公有制同样作为国际纲领中的一条。但蒲鲁东派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要求。他们认为，农民的所有制是农民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正如科勒里所说，农业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集体暴政”的形式。经过一场激烈辩论，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由下届代表大会讨论。

有关公制作作为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条件这一辩论，导致了一场关于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关系和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争论。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他们同经济奴役进行斗争的一个基本前提。蒲鲁东派恰恰相反，认为政权是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他们不是象马克思那样致力于夺取作为集中代表暴力的机构的国家，而是致力于取消和废除国家。

代表大会试图通过两项决议以解决这些矛盾。第一项决议说，“工人的社会解放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开的”；第二项决议说，“建立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需的”。

对第一项决议既可以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蒲鲁东主义的解释。所谓“政治解放”，可以理解为指蒲鲁东派主张的摆脱国家本身的解放，也可以理解为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通过夺取国家政权使工人阶级摆脱占有阶级政治统治的解放。但是，不论对第一项决议作何种解释，第二项决议却包括承认开展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既然认识到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需的”，那末除了通过政治斗争还能有什么方法争得政治

自由呢？

两派显然都把这两项声明看成具有至高无上的原则性意义。因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项决议规定，今后国际的每一届代表大会都要“郑重地重申”这两项声明，并使国际的所有会员人人知晓。

[145] 代表大会事先讨论了合作社在工人斗争中的作用。具有合作社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力争把现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改变为建立在生产合作社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制度。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和生产合作社只是零星的企业，合作化制度难道不会产生一个新的阶级，一个作为合作社社员而享有合作社劳动好处的工人贵族吗？德·巴普说明的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这种危险性提出警告，即合作社制度可能导致产生一个“第四等级”，同时留下一个极端贫困的“第五等级”；只有规定生产合作社的赢利不归社员所有，而是用来发展合作社事业，才能防止这种危险的出现。

此外，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总委员会提出的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利用它所借给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为自己的解放事业服务的问题。法国代表团就此问题向代表大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建议在“无息贷款”基础上成立人民银行。相反，英国代表团提议，要求工会将自己的基金交由生产合作社支配，使它计划提供给统治阶级的贷款为本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或者，如果这一要求过高，则至少参与合作社银行的建设。

最后，代表大会还辩论了一个政治问题。洛桑代表大会闭幕后几天，要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国际和平代表大会是由自由和平同盟召开的，它的中央委员会已邀请国际参加代表大会。和平同盟是一个由维克多·雨果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进步知识分子同约翰·布莱特等激进资产阶级政治家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民主国际，不过象加里波第、亚历山大·赫尔岑

这样的革命家，以及社会主义者J·P·贝克尔、巴枯宁和路易·勃朗也都参加在内；巴枯宁甚至是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此前，总委员会在接到邀请后已讨论了国际参加和平同盟的问题。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应将自己组成为独立的政党；但是为了争取政治和社会改革，他基本上不拒绝它同进步的资产阶级合作。因此，他欢迎英国工联同激进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参加改革同盟，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不过他却认为与和平同盟合作没有意义，因为正如他所说的，和平同盟“没有生命力”。①

但是，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事先总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一 [146] 样，支持国际与和平同盟合作。不过，他们要求同盟把它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声明，国际准备全力以赴地与和平同盟一起为争取废除常备军和保卫和平而工作。但它的宗旨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在欧洲建立自由国家联邦。

然而，这项决议案未能使法国代表团感到满意。他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激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任何合作。托伦在德·巴普的支持下，提议就此决议案增加一项附加条款，这项附加条款自然是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代表大会所不能接受的，即代表大会应声明：鉴于贫富悬殊的现有经济制度是战争的真正根源，所以仅仅废除常备军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以保证财富合理地分配给所有的人。

国际一个代表团在詹姆斯·吉约姆率领下，带着这个决议案出席了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虽然出乎托伦的意料之外，甚至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收下了决议案，但却就此为止，并未将它提交大会辩论。

新闻界对洛桑代表大会的反响比对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反响

① 关于国际对和平同盟的态度的详细论述，见N·梁赞诺夫：《旧国际的外交政策及其对战争的态度》。《新时代》第33年度（1915年），第463页起一连几页。

还大。国际已被人们尊敬地视为一种权力因素。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满怀胜利的喜悦写道：“本来想完全不理睬我们的那个卑鄙的《星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我们比和平代表大会更为重要……除了《法兰西信使报》，还有日拉丹办的《自由》，以及《世纪报》、《时尚报》、《法兰西报》等，都报道了我们大会的情况。”他在稍后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伦敦的《泰晤士报》，他补充说，“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①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次代表大会也意味着国际在意识形态发展中有了进步。代表大会承认工人阶级在其解放斗争中进行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并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辩论。

4

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代表大会，由于开展了这一辩论而在国际史上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此外，这次代表大会也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约一百人。虽然半数以上的代表——五十六名——代表比利时各支部，十八人代表
[147] 法国各支部，十二人代表英国各支部和总委员会——其中有最杰出的工联领袖之一的本杰明·鲁克拉夫特。瑞士代表八名，德国代表四名，其中有莫泽斯·赫斯，意大利一名（萨韦里奥·弗里西阿）和西班牙一名（萨罗·马加利亚）。总委员会曾邀请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J·B·施韦泽参加代表大会；但是，他当时因犯亵渎皇帝陛下罪而正在服刑，未能出席。相反，1865年以来一直亡命比利时的布朗基，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了代表大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同上，第3卷，第500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47—348页。——译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在于它公开承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目标。在此以前，马克思一直提心吊胆地回避在总委员会或代表大会上接触这一有争论的问题。不论在成立宣言中，还是在章程的序言中，都没有提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甚至在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为第一届代表大会起草的国际纲领中，也没有提及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关心的是，首先联合国际的一切力量，加深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思想，通过国际鼓励和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使它在未来的革命中能够起到它的历史作用。正如他所说，他并不怎么重视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召开了代表大会”，^①公开表明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

就这样，象前次在洛桑代表大会一样，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提出所有制问题来进行辩论的，也不是同样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而是塞扎尔·德·巴普。

德·巴普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所有制的决议案说明了详细的理由，并由国际比利时支部事先进行了讨论。决议案说，矿山、采石场以及铁路，在社会主义者争取建立的“具有良好组织的社会”中应属于“公有的，亦即属于未来的按正义原则组成的国家”。但是，这些经济部门不应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应在国家的参与下由生产合作社经管。此外，决议案说，“考虑到生产的土地能力是一切财富的第一个源泉……，土地应归还农民协会”，并由农业合作社经管。最后，决议案要求，森林应象交通工具那样“保持为社会的公共财产”。

法国代表团和罗曼语区瑞士代表团自然在激烈的辩论中反对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决议案还是以比利时、英国和德国人的票数获得通过。

国际的另一份决议阐明了它的纲领所认为的经济支柱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504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52页。——译者）

产合作社的性质。合作社社员不应谋取特殊的利益，例如，他们
[148] 向合作社投资的红利或利息。决议说，“一切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都拒绝任何以资本的名义提出的预先支付的要求，不论以租金、利息、利润的形式或以某种方式方法。劳动的全部权利和整个报酬必须仍归劳动所有。”

国际就是这样声明同意土地、矿山和铁路公有制的。它同时承认了这些经济部门不是直接由国家管理，而是由组织在生产合作社中的农民和工人管理的原则。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也因为讨论了一个使国际在其整个历史中不得平静的问题而引人注目——关于工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所持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德国代表团在感到德法两国可能爆发战争的紧张形势下提出来讨论的。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说，德法两国的战争将是一场“有利于俄国的内战”。工人有责任采用一切办法，而且是象德·巴普建议的那样，通过拒服兵役或拒绝从事一切劳动以反对任何战争。由托伦和贝克尔商定并经一致通过的决议案，建议工人一旦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立即停止一切活计”。决议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代表大会指望全世界工人团结一致支持各国人民此种反战罢工。”^①

资产阶级报刊以对一种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力量表示敬畏的态度对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对国际作了这样的描述：“必须追溯到基督教出现和古老世界因日耳曼民族而恢复青春的时代，以便找到一点相似之处，象北欧的野蛮人对古老世界作出贡献一样，看来现在的工人运动也在对今天的文明作出贡献。”报纸说，国际所追求的目标至少是使人类更新——《泰晤士报》还说，“很可能是历史上除了基督教会以外，一个机构给自己提出的最包罗万象的目标”。

^① 本书第三部分第6章《国际和战争》中详细记述了就这项决议案进行辩论的情况。

英、法、德、瑞士，特别是比利时的报刊，都详细报道了代表大会的情况，并且议论纷纷，面对关于土地与矿山社会主义化的决议骇然发出惊呼，这乃是意料中的事。

比利时政府为破坏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而采取的主要的由国家出面的行动遭到了失败。这也有助于提高国际的威望和增强它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在政府以武力镇压沙勒罗瓦区的矿工罢工之后，有数千名工人踊跃加入了国际比利时支部。政府对国际在比利时的迅速传播惊慌失措。当得知国际要 [149] 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时，司法大臣巴拉在议会提议实行对付外国人的特别法，使政府可以把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驱逐出境。他在众议院发表的阐明此项提案的演说中，把国际描绘成危害国家的密谋。但是，众议院否决了这个法案。随后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在报上公布一封致该大臣的公开信，对他为国际事业“大大效劳表示感谢”，“因为您，大臣先生，使众议院的会议讨论了国际的事情，从而使议会的年鉴用来为传播国际的原则效力”。①

还应提一笔，大会热烈地向《资本论》——第一卷在一年前发表——的作者致敬。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说：“卡尔·马克思建立了不可估量的功勋。他是第一个对资本作出科学分析的经济学家”。

5

1869年9月在巴塞尔召开的下一届代表大会，结束了同蒲鲁东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法国代表曾在总委员会抗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公有制的决议，因为如同他们所说，

① 转引自迈耶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216页。

决议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通过的。于是总委员会自己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把这个问题再次提交给代表大会讨论。

负责处理此项土地所有制决议案的代表大会原则问题委员会，将这个问题分成两点：一，社会是否有权把土地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二，这样做是否有必要。

对第一点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鉴于土地长期属于私人占有，所以产生了某些固定的权利，而且占有者经过对自己土地进行耕作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因此有权要求得到其更高的价值。与此相反，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则指出，土地本来就是公有财产，由于政治或经济的暴力而变为私人占有；因此，社会有权重新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对土地私有制转为公有制的必要性问题，意见也不一致。代表大会最后以五十四票对四票（十三名代表弃权）通过的决议说：“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集体所有制”。

但是，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经营农村公有制呢？委员会的
[150] 多数赞同由村区共同管理土地，少数人主张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最后，以埃卡留斯为代表的总委员会认为应由使用机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来经管。由于对这个问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所以把它提交给下一届代表大会解决。

巴塞尔代表大会承认拥护公有制。由于它是迄今以来历次代表大会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一次，因而这一点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德国是首次由两个工人党之一——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创建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奥地利的代表以及美国工会同盟——全国劳工同盟的一名代表也得以第一次出席代表大会。这也是巴枯宁第一次参加的代表大会，从而似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即将加入国际了。

出席的代表总共七十八名，即英国和总委员会代表六名，其

中除本杰明·鲁克拉夫特外，还有罗伯特·阿普耳加思，他同样是英国工联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二十五名代表来自法国，其中除托伦和不久前释放出狱的欧仁·瓦尔兰以外，还有代表里昂支部的巴枯宁。二十三名代表来自瑞士，其中有人认为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建人的海尔曼·格雷利希。德国代表十二名，其中除莫泽斯·赫斯外，还有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由塞扎尔·德·巴普率领的五名比利时代表。来自奥地利的有亨利希·奥伯温德和路德维希·诺马耶——他们不久就为了国际的事业而被当成“叛逆犯”受审。西班牙支部代表为加斯帕尔·散蒂尼昂和拉斐尔·法尔加-佩利塞尔。意大利支部代表为斯蒂凡诺·卡普卢索和巴枯宁(兼)。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代表为芝加哥工人报纸《工人辩护士报》发行人安得鲁·凯麦隆。

巴枯宁在加入国际之前，曾企图争取和平同盟支持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无政府主义纲领的一点基本主张是废除继承权。在他与同盟的关系破裂之后，就企图寻求国际承认这一主张。这个问题得到了法国各支部的支持，被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

俄国地主贵族的儿子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是革命无政府主义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是一位有魅力的演说家，循循善诱，激情奔放，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密谋者性格，一位热情洋溢的战士。他是自由事业的献身者。^①哪里爆发 [151] 革命，他就出现在那里——1848年2月在巴黎，1848年6月在布拉格，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德累斯顿起义被镇压后，他在逃跑中被普鲁士军队逮住，并两次——1850年被普鲁士军事

① 格奥尔格·施特克洛夫：《米哈伊尔·巴枯宁》(1913年斯图加特版)是一部简明而精彩的德文版传记。E·H·卡尔的《米哈伊尔·巴枯宁》(1937年伦敦版)则是一部内容丰富得多的英文版传记；此外，麦克斯·纳特劳也写了三卷大型传记，但只复制少数几部；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珍藏一部。

法庭和1851年被奥地利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这两次死刑都被改为无期徒刑。普鲁士人把他戴上镣铐引渡给奥地利，奥地利人又把他戴上镣铐送给俄国。在阿罗木次监牢里，他整整半年手脚被钉在墙上。沙皇将他单独监禁达七年之久，开始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关在施吕塞尔堡，最后把他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在伦敦流亡近三年之后，开始在意大利和瑞士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满载伟大革命家的盛誉，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

巴枯宁在一篇重要演说中论证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他的理由是，继承权是私有制和国家机构的基础。如果没有继承权，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整个社会制度就将瓦解。因此，废除继承权是废除私有制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社会革命应以废除继承权为先导。

马克思仍然未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受总委员会委托起草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由国际书记埃卡留斯在代表大会上提出。马克思说，继承权正如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并不是原因，而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得出的法律结论。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推翻建筑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但是，把生产资料纳入公有制将是实际地废除继承权。

这两种观点在大会上都未得到多数。赞成根据巴枯宁思想所作的委员会报告的有三十二票，二十三名代表反对，十三名弃权，七名缺席。赞成总委员会报告的十九票，三十七名代表反对，六名弃权，十三名缺席。问题悬而未决。不过，这次表决说明巴枯宁在国际赢得了影响。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影响,因为如同他所认为的,这种影响威胁着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命运,给工人阶级提出了空想的目标,并对工人阶级起着迷惑和瓦解作用。

巴枯宁是个凶猛的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任何限制个人自由的造反者。他和蒲鲁东一样,把国家及其中央集权、无限权力和机构看成否定自由的原则。在他看来,立足于以现存政治机构 [152] 和社会机构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按照他的理论,需要打碎一切现存的机构:“国家、教会、银行系统、大学、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一切机构”。他补充说,“这些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特权者为了对付无产阶级而设立的碉堡”。他指出,国家本身“不论其为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甚至共和国,都是统治和剥削。这是一种暴政对另一种暴政,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亦即对社会主义的公开否定”。不论一个国家有着什么样的宪法,哪怕它“用民主的形式装饰起来,对无产阶级来说它将始终是一座监狱”。他说,就某种关系而论,民主共和国甚至比独裁的君主制更坏。“正因为它有民主的形式护身,所以它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贪婪而富有的少数人可以安安稳稳地剥削人民的劳动。”

巴枯宁脑海中的目标,就是蒲鲁东的目标——蒲鲁东的思想对巴枯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种个人组成公社的自由联盟,公社组成地方的自由联盟,地方组成全国的自由联盟,最后是各国组成合众国的自由联邦——先从欧洲开始,然后是世界”。

巴枯宁拥护“集体主义”,反对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

巴枯宁说，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就是“国家共产主义”。他表白说，“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并且必然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的手中。而我却想消灭国家——彻底根除至今还在奴役、压迫、剥削和侮辱人的那种国家权威的原则”。

巴枯宁谴责任何不直接为社会革命服务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如参加议会选举，争取社会改革的政治斗争，争取在国家中的影响和权力的斗争。他诅咒这些政治行动是“对革命的背叛”，因为它们会在工人阶级中引起虚假的幻觉，认为自己可以不通过革命而用其他方法求得解放。他要求国际把力量全部集中用于进行社会革命。他所宣传的办法，就是布朗基提出的采用突然袭击、暴动和发动暴乱的方法夺取政权。他指出，“任何一次暴乱都是有益的，哪怕它毫无成就”。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对用暴力改变社会力量对比；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则号召使用暴力。

7

[153] 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国际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争执只局限于两派：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反集体主义的蒲鲁东主义派，和中央集权主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出现了第三派，即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的集体主义派。

如同我们所见，蒲鲁东派的影响在几届代表大会上逐步受到遏制。最后一次打击发生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决议是国际推翻蒲鲁东派基本原则的一个纲领性问题。此外，就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巴黎，瓦尔兰也成功地夺取了托伦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瓦尔兰尽管是个联邦主义者，但却背弃了他原来主张的蒲鲁东主义；不过他虽然是集体主义者，但

并未变成马克思派。在历届代表大会上，马克思都得到英国人、德国人、德语区瑞士人的支持，在集体主义问题上也得到比利时人和罗曼语区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德国代表团在历届代表大会上没有充分显示出力量来，因为德国的两个工人政党中没有一个加入国际，而且国际的地方支部及其个人会员人数很少。在奥地利，国际个人会员人数更少，那里正在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在德语区瑞士，工人联合会同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在罗曼语区瑞士和法国南部则巴枯宁的影响蔓延。意大利和西班牙支部几乎被他的影响所统治。塞扎尔·德·巴普领导的比利时支部也接近巴枯宁胜过接近马克思。这样，马克思在国际的地位实际上只是靠英国工联领袖和德国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小组的支持。

但是尽管如此，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路线之争中，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主要原则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行动的原则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不过，承认这些原则并没有结束路线之争。国际今后的历史，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争论的历史。

在国际成立至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五年期间，国际的影响迅速在欧洲工人阶级中得到了传播。虽然国际建立在薄弱的组织基础之上，但它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眼中却是一种力量。那么它果真是一种力量吗？路线之争没有使它的力量瘫痪吗？不久，即巴塞尔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一年，国际就面临着它的历史性考验——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考验。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国际

1

1870年7月12日，总委员会发出请帖，邀请代表们参加国际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定于9月5日在美因兹开幕。总委员会提交大会讨论的会议议程中有一点是，工人阶级应如何着手制止战争的问题。一星期后，即7月19日，拿破仑第三向普鲁士宣战。

当时，国际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制止战争的问题，战争机器已经开动，无论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还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力量使战争机器停止转动。号召工人阶级进行反战总罢工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几乎没有考虑到真正的力量对比。国际能够进行的工作主要就是确定对战争应负的责任，在沙文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使两个交战国的工人阶级清醒地保持团结思想，以及指明他们在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任务。

首先支持国际的是巴黎联合会，因为战争阴谋是巴黎策划的。还在战祸爆发之前的一星期，巴黎联合会就发表了一篇主要针对德国工人的《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这篇宣言指控迫在眉睫的战争是王朝的罪行。“……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宣言号召“德国弟兄们”要看到“我们之间的战争将是一场内战”。宣言提请德国工人注意，“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宣言以号召与德国工人团结一致的庄严声明结束，它说，“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

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①

但是，对待战争态度的问题，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比法 [155] 国社会主义者来得复杂。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次战争很明显是王朝的罪行。但德国却感到它是一场防御战。宣战的是路易·波拿巴，绝大多数德国工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应该拒绝支持保卫自己的祖国的任何行动吗？但是，工人有祖国吗？每次战争不都是相互争夺的统治阶级和王朝的战争吗？②

德国工人阶级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分裂了。国际柏林支部回答巴黎宣言说：“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③本着这一精神，开姆尼斯、莱比锡、德累斯顿、克雷费尔德和爱北斐特等地举行群众集会，示威反对法国和普鲁士王朝的这场罪恶战争。在开姆尼斯召开的萨克森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法国工人书说：“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这种情绪在德国工人中间并没有占支配地位。不伦瑞克的一次群众集会（7月16日）在其致法国工人书中说，大会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38页。——译者

②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对待普法战争的分歧的详细论述，见卡尔·考茨基：《社会主义者与战争》（1937年布拉格版），第188—214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40—341页。——译者

虽然驳斥任何敌视法国的民族对立的思想，但是由于波拿巴发动了这次战争，所以“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无法避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面对不负责任地破坏和平的人，眼下这是“第一个义务”。7月24日，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一篇宣言，更加急切地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爱国义务。宣言说，“只要恶魔把法国的士兵捆绑在波拿巴的脚后跟上，并以战争和蹂躏威胁我们德国的边境，我们就将毅然支持保卫德国土地的不可侵犯性，反对拿破仑的、以及其他任何人的一意孤行”。^①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认为，这次战争不单单是一场民族的防御战，而且也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以及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战争。该报这样写道，“波拿巴企图通过侮辱普鲁士从而巩固他那摇摇欲坠的王位”。“十二月王位是反动欧洲的基石。波拿巴一倒台，现代阶级统治和军人统治的主要支柱也得垮台。如果波拿巴胜利了，那就是法国的民主战胜了欧洲的民主。”

但是，难道俾斯麦的政权不也是阶级统治和军人统治的政权吗？战争的责任只是在于波拿巴，或者说，普鲁士的“铁血”政策对战争没有责任吗？

在7月19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军事预算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坐着五名社会主义议员，三名为爱森纳赫派，两名为拉萨尔派。他们必须通过投票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拉萨尔派直截了当地认为战争是防御战，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而爱森纳赫派——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则内心矛盾重重。因为，如果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岂不是意味着投俾斯麦的信任票吗？相反，如果投票反对军事预算，不也可以被理解成为波拿巴的卑鄙政策辩护，以及在道义上加强了他反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反对派的

^① 宣言全文见《叛国案》，同上，第859页。

地位吗？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用弃权的办法解决这种内心矛盾。他们由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宣读一篇声明，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声明指出，这次战争是王朝的战争，它“象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1866年的战争一样”，是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赞成预算就是对“用它1866年的行动为目前这场战争作好准备”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但是，反对预算又可能“被理解为赞同波拿巴的罪恶政策”。于是，声明说，“作为不分国籍反对一切压迫者并努力把一切被压迫者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兄弟联盟的社会共和派和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地宣布赞成目前这场战争”。

2

四天后（7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召开会议，目的是对这次战争表态。马克思起草了一篇“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①并在会上宣读，得到会议一致通过。

这篇宣言也承认：“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它随即提出战争罪责的问题：“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普鲁士在得胜之后，（1866年战胜奥地利）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 [157]

^① 总委员会的这篇宣言以及有关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另外两篇宣言，见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加写导言。

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①

至于法国，宣言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宣言对德国工人阶级提出了严重警告：“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

宣言以德法两国工人兄弟般地互通音讯时所表达出来的国际团结思想的历史评语结束。“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②

不到六个星期，帝国就土崩瓦解了。法国军队在色当战役中投降；波拿巴当了德国人的俘虏。两天后，即9月4日，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在首都的议员成立了“国防政府”。

^① 俾斯麦通过深思熟虑对“爱姆斯急电”作出“修改”，挑起了这场战争，这件事当年还不为人们所知。倍倍尔在许多年之后写道：“俾斯麦愚弄了全世界，并善于使人相信是拿破仑挑起了这场战争，而他，这位爱好和平的俾斯麦连同他的政策却处于被进攻者的地位……开战之前的种种事态一直使人产生错觉，以致人们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宣战的法国及其军队对这场战争是没有准备的。相反，外表上处于被迫应战的德国对战争甚至连最后一颗炮架钉都已准备就绪，动员工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倍倍尔承认，如果他和李卜克内西“在战争爆发前即已知道我们在后来几年中根据官方和非官方公布的材料所知道的情况”，他们在表决军事预算时是不会弃权的，“我们一定会直接投反对票”。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1907—1910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167、168页；第2卷，（1911年版），第167页。（据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无括号中“1866年战胜奥地利”这句译文。——译者）

^② 有关宣言的直接引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39—341页。——译者

第二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德国工人的宣言。宣言以“乌拉！”欢呼法兰西共和国诞生，并提醒人们注意，这场战争对德国是防御性战争，是一场由法国皇帝，而不是由法国人民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战争。现在，法国人民再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宣言要求使法兰西共和国获得“光荣的和平”。 [158]

宣言首先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民族主义的要求。宣言说：“际此我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宣言以承认拥护国际的团结结束：“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①中央委员会同时要求全国各地基层组织立即组织“声势尽可能浩大的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争取使法兰西共和国获得光荣和平的人民政治集会”。

四天后，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除身为国会议员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拥有豁免权外）被指控犯叛国罪而遭到逮捕，并被戴上镣铐押至东普鲁士勒特岑附近的博伊恩要塞。莱比锡、柏林、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抗议集会被警察强行驱散。

同一天，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同样由马克思起草的告国际各支部的宣言，表示反对策划好的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争取对法兰西共和国实现光荣的和平。这篇宣言——第二篇宣言——通过尖锐深刻的分析，驳斥了德国统治阶级企图用来为其掠夺法国土地而辩解的一切理由——历史的、战略的和民族的理由。宣言警告国际各支部提防这一灾难性步骤，它必然把法国

① 直接引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49页。——译者

推入俄国的怀抱,并使德国面临一场异常可怕的战争威胁。总委员会声明:“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么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接着,宣言转而提到法国。它欢呼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宣言说,因为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占多数的临时政府手中。不过,“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总委员会建议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①②}

① 有关国际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中直接引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48—350页。——译者

② 马克思担心,法国工人在战争期间可能出于革命爱国主义的激情而举行起义,以使法国免遭败局并建立一个“社会共和国”。这种忧虑象凶恶的梦魔压在马克思的心头。色当战役前一个月左右,他写信给恩格斯说(1870年8月8日):“当前使我不安的是法国本身的事态。下一次大战役除法国人失败外,未必会有别的结局……如果巴黎爆发革命,那末要问,这个革命是否拥有对普鲁士人进行认真抵抗的手段和领袖呢?……”色当战役后,恩格斯给马克思(9月12日)写信说:“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应当阻止工人在缔结和约之前采取行动……不管和约如何,它必然会在工人们有所行动之前就缔结。如果工人们现在为保卫国防效劳而取得胜利,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共和国的遗产,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并又会倒退二十年……但是,他们是否会在外国进攻的压力下,陷入迷津,并在攻打巴黎前夕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呢?假如德国军队需要对巴黎工人进行街垒战作为最后的战争行动,那是很可怕的,这会使我们倒退五十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同上,第4卷,第430和4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4页和64—65页。——译者)

在此期间，国际巴黎联合委员会直接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发表了一篇宣言，登在9月11日《人民国家报》上。宣言提醒人们注意，普鲁士国王在他向国会发表的开战演说中曾庄严声明，德国进行强加在它头上的战争，只不过是针对法国皇帝，并不是针对法国人民的。宣言说，皇帝目前已落入德国人手中，而法兰西已是共和国。“三千九百万善良的人众口一词……我们重申1793年我们向结成联盟的欧洲发表的声明：法国人民不同占领他们领土的敌人媾和。”宣言强烈呼吁德国人民：“退回到莱茵河对岸去！我们——德国与法国——各自在这条有争议的河流两岸相互握手吧！让我们忘记专制君主使我们相互犯下的战争罪行吧！我们宣告世界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宣言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确信，你们以世界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为消除国际性的仇恨，为普遍裁军与普遍和睦而进行工作。”①

《人民国家报》就此项宣言说：“至9月4日为止，战争对德国来说是防御战……德国的防御战业已结束。假如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它就是一场掠夺性战争，是君主政体反对共和国的战争，反革命对革命的战争——一场既针对德国的民主，同样也针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1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再次开会，讨论“关于战争进一步所需费用的法律草案”，这时，两个工人政党——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议会代表都投票反对预算，并在其提案中要求政府“放弃任何兼并法国领土的企图，尽快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约”。② [160]

国会闭幕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指控犯叛国罪而被捕，并由陪审员法庭判处两年要塞监禁。社会民主运动失去了它的

① 宣言全文见《叛国案》，同上，第408页起一连几页。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1907—1910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194页。

所有领导人。

但是，国际法国支部也遭受政府的迫害和忙于战事。赛拉叶向总委员会报告，他在9月到达巴黎之后不得了解到，“组织的所有成员不是身系囹圄，就是被分到各个团队去了”。^①

3

国防政府组织的法国抵抗德军入侵的活动很快就崩溃了。9月18日，德军兵临巴黎城下。10月底麦茨要塞失陷。军事局势眼看没有希望了。1月28日，临时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俾斯麦提出以巴黎投降、临时政府下台并立即选举召开国民议会，作为停火的条件。政府接受了俾斯麦的这些条件。

但是，法国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认为政府的投降是叛国行为。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战争，进行一场以1793年的革命自由战争为榜样的革命爱国主义战争。1793年这场战争曾把各国君王的联军赶出法国，并将革命引进他们的国家。

但是，法国的农民早已不再是革命的了，他们对战争感到厌倦，有产业的资产阶级异常害怕工人阶级。选举（2月8日）结果以左派惨败而告终。七百五十名议员中只有二十名社会主义者和两名国际会员——昂利·托伦和贝努瓦·马隆；约四百五十名议员表明自己是保皇派，其中一半是正统派，另一半是奥尔良派。其余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共和派。

阿道夫·梯也尔组成以茹尔·法夫尔为外长的政府。国民议会于2月13日开会——但是，由于害怕因革命爱国主义的激情而变得十分冲动的工人，会议不是在巴黎，而是在波尔多举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年2月28日）。

行,以便不久之后迁往凡尔赛。两星期后,梯也尔和法夫尔签订和约;他下令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同意巨额战争赔款和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 [161]

但是,巴黎拒绝投降。工人们已经武器在手,这是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临时政府组织国民自卫军(民兵)保卫巴黎时自己号召工人拿起武器来的。工人们有力量反抗政府了。

梯也尔企图解除巴黎的武装。1871年3月18日,正规部队计划夺取大炮,向蒙马特高地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阵地发起攻击。巴黎工人在欧文·瓦尔兰领导下奋起反击,政府军队被击退,政府逃往凡尔赛。之后,梯也尔从巴黎撤出国家和首都的全部行政机关,并恳求俾斯麦释放被普军俘虏的法国军队,用他们去镇压巴黎。

行政机关的撤走使巴黎变成真空。自从拿破仑第一上台以来,巴黎就没有选举产生的市议会;首都由政府委任的文官和武官管理。巴黎的二十个区虽然每区有一名区长,但这些区长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完备的权力。因此,在市行政机关撤走之后,只剩下仅有的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手中掌握过渡性政府权力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立即选举巴黎人民代表机构,并把政府移交给它。经选举产生的市政委员会在其5月28日的公告中,给自己采用了1792年巴黎革命市政委员会的象征性名称:“巴黎公社”。①

① P·O·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是巴黎公社历史的经典著作,尽管不是科学的著作。该书首次德译本于1878年出版。海因里希·克希林的《巴黎公社追随者心目中的1871年巴黎公社》(1950年巴塞尔版)一书,提供了一个了解公社各种思潮的非常有价值的来源。G·D·H·科尔:《1850至189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54年伦敦版),第7章,出色地探讨了公社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此外,见N·卢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研究巴黎公社史的材料来源》,载于《马克思主义旗帜》,第6年度(1932年)第1期。特别见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此外,有关评论性的研究见E·S·梅森:《巴黎公社》(1930年纽约版)。

公社并非密谋的成果，它不是事先计划产生的。公社的出现是为了填补梯也尔撤走行政机关后形成的真空。直至撤走之前还在巴黎行使权力的机构已无影无踪；必须由设有新机构的合法的新的权威取而代之，不然怎么能对这座城市进行管理呢？而除了一个由巴黎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委员会之外，谁又能有这种权威呢？

[163] 公社是经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大部分有财产的资产阶级逃出巴黎，公社就成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不过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当选的九十二名市政委员中只有十七名国际巴黎联合会代表。正如利沙加勒所指出的，公社也不是工人政府，公社委员会的成员三分之二是小资产阶级。

公社在政治上是由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控制的。正如法令所说，“考虑到信仰自由是一切自由中的首要自由”，所以公社规定教会从国家分离出来；另外又“考虑到教士们实际上是专制制度反对自由的同谋犯”，所以公社规定把不能变卖的永远管业的财产划归公有制。公社还采取一项象征性的行动——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的顶端铸有皇帝铜像的圆柱，4月13日法令称它是“野蛮的暴力和虚假荣誉的象征”。提议毁掉旺多姆圆柱的公社社员、国际会员、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就因此事而在公社陷落后遭到凡尔赛政府的迫害。

公社虽然在其《致法兰西人民书》(4月17日)中宣告“把结束奴役无产阶级和使祖国腐败、遭受不幸的剥削、垄断、特权和交易所中的投机操纵”作为它自己的社会目标。但是，它所颁布的法令并没有着手彻底改变所有制。这些法令表明公社具有社会改良主义倾向，而不是社会主义倾向——比如，关于取消面包房夜间劳动的法令、关于罚款和克扣工资的法令、关于停止拍卖典当物品的法令和关于免除某一阶段房租的法令。只有两项法令

具有社会主义成份：在旨在实现收入平等的原则的法令中规定，公职人员的薪金每年最高为六千法郎。另一项法令宣布，把所有业主在逃或已经停业的企业变为生产合作社；但应给予业主以补偿。

当然，应该考虑到，在公社存在的短促期间——两个月——是不可能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外加被围困的巴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场最后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斗争。

马克思认为，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如他在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中所指出——在于它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与集权主义的、等级制的国家政权相反的直接的民主形式。马克思说，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公社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通常立法与行政职能分开的权力的议会机构；它统一行使立法和行政职能。公社委员直接对其选民负责，并可随时被选民撤换，由他们组成并直接领导城市的各种管理部门委员会。所有公职、行政、司法和教育方面的职位一概经有普选权的人选举产生，而且可随时由选民撤换。 [164]

公社的基本思想是政权分权制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按照公社纲领的规定，法兰西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是各区的自由联合会。公社在它《致法兰西人民书》中承认各区有绝对的自治权：“国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应具有全民族的生命力的萌芽——是一个统一的蜂巢，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兵营。法兰西共和国的基层组织就是区、公社。”

在这一革命插曲中，国际巴黎联合会并没有象神史中记述的那样在工人群众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无论在9月4日宣布成立共和国，还是3月18日起义本身和3月28日宣告成立公社，都没有它的份。在反对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蒲鲁东派占绝对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8页。——译者

优势的情况下，联合会在开始时甚至对共和国抱着怀疑的态度。

此外，国际巴黎联合会的组织也极其薄弱。战争爆发前不久，波拿巴的警察已把它搞垮了，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它才慢慢地恢复起来。列奥·弗兰克尔在1871年2月15日巴黎联合会的会议上说：“我们尽管是一支道义力量——至少在巴黎，且不说在法国任何其他地方，但我们不是一支物质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组织。”3月14日，总委员会考虑在伦敦召开一次国际代表会议，赛拉叶反对这个提议；他说，巴黎联合会派不出代表，“因为它还没有自己的组织”。

[165] 总委员会敦促法国支部，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工人阶级的组织，不要在起义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因为没有有一个坚强的工人组织，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夺取政权的试图将必然以失败告终。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赛拉叶奉总委员会之命带着这一指示去巴黎。总委员会法国通讯书记欧仁·杜邦也尽力根据这一精神通过写信对法国各支部做工作。

巴黎联合会遵循这一指示；它没有支持10月31日和1月22日布朗基派在巴黎举行暴动的企图。在巴黎的国际领导人——如瓦尔兰、瓦扬、弗兰克尔和马隆——都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并在公社宣告成立之后任职。但是，公社的真正的政治职务都由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担任；在公社委员会中仅占少数的国际会员只分担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职务：瓦尔兰、贝累和茹尔德负责财政委员会，潘迪和杜瓦尔负责军事委员会，阿西和沙兰负责公安委员会，弗兰克尔负责劳动和商务委员会，瓦扬负责教育，泰斯负责邮电局，卡梅利纳负责造币厂，封丹负责电报局。

5月18日，国民议会批准了和约。三天后，凡尔赛军队向巴黎发动进攻。俾斯麦为凡尔赛政府提供了一万名被俘法军用于镇压公社。梯也尔现在可以以压倒优势进攻巴黎了。

5月21日，围攻巴黎的战斗打响了；这一仗持续了八天之久。凡尔赛军队不得不一个街垒接一个街垒地击溃工人们的顽强抵抗。公社武装力量指挥员沙尔·德勒克吕兹在巷战中牺牲。接过指挥权的欧文·瓦尔兰在最后一座街垒旁被政府军俘获，在军刀砍劈下——一只眼珠从眼窝里爆裂出来——被拖去按军法处决。他全身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地被枪杀，尸体受到侮辱和戮毁。当公社淹没在其保卫者的血泊之中的时候，胜利者以十九世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残忍手段疯狂地进行着残酷无情的报复。^①

公社失败后两天，马克思就在总委员会——以宣言应有的语言力量和政治文献中那种最打动人心的文件的巨大激情——宣读了关于这次内战的宣言。这是一份把公社的“刽子手”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起诉书，是一座丰碑，它颂扬了公社保卫者献身的伟大意义。它也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当列宁论述这份文件的时候，它已变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源泉。 [166]

这篇宣言不是对公社的评论。它只是描述了公社的成立和导致它被推翻的可耻背叛。此外，还探讨了公社性质的历史意义。马克思认为，公社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

^① “十万名受害者：死、伤和被放逐的人；妇女、小孩和老人无依无靠地被遗弃下来……”法国基督教工会运动创始人朱尔·齐恩黑尔德的《基督教工会五十年史》一书（1937年巴黎版），第19页，对受到反动派迫害的人作了这样的估计。

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马克思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梯也尔——跟他一起的还有欧洲资产阶级的报刊——控告国际是公社的主谋者。他下令成千地屠杀巴黎工人，并焚毁他们的房屋。但他却指控国际是“杀人放火”的教唆犯。对此，马克思回答说：“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马克思以拥护国际的声明迎击来自世界各个反动渠道向公社发出的一片咒骂和侮辱。“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①——宣言以这几句话作为结束。

① 宣言直接引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4、378和399页。——译者

讨伐国际的十字军战役

[167]

阿道夫·梯也尔欠下了一笔弥天血债。他自己通过撤走巴黎行政机关，从而迫使人们建立起公社。但是，他把公社看成早在1848年就使有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的“社会共和国”的幽灵。1848年6月，当时工人阶级要求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呼声被淹没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梯也尔决心照此办理。在对1871年2月13日至5月21日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不抱偏见的研究之后，今天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这是他一开始就策划好的。

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约束来制止执行这项计划。据麦克马洪将军估计，大约有一万四千名公社保卫者在巴黎街头被屠杀或任意被处死，一万零一百三十七名被俘者经军事法庭判刑，其中约有一半人流放去新喀里多尼亚，另一半人被判处徒刑。同时，梯也尔宣布全国戒严。此外，还指使议会通过一项镇压国际的特别法（1872年3月14日）。他说，特别法是旨在象西班牙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处置异教徒那样来处置国际的追随者。的确，这项法令的第一条宣布：“单是国际工人协会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构成对公众和平的危害”，因此，根据第二条规定，对任何在此项法令颁布之后“服膺国际工人协会原则而入会的人或仍然是该会会员的人”判以徒刑。

鉴于梯也尔迫害国际之残酷，为了在世界良知面前替法国进行开脱，必须对国际威胁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危险性极力加以渲染。

早在巴黎公社宣布成立之前，资产阶级世界就认为国际是威胁现行制度的一支咄咄逼人的力量。法兰西帝国曾三次以犯 [168]

有秘密结社罪起诉迫害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并在普法战争爆发前不久，指控所有在国内可以由警察抓到的国际会员犯有阴谋杀害路易·波拿巴的罪行，将他们加以逮捕。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资产阶级报刊，把掀起1868年的罢工运动归咎于国际。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的十四名领导人因同情国际的奋斗目标，被维也纳资产阶级陪审员法庭以犯有叛国罪而判处多年徒刑。

但是，使资本主义世界清楚地看到国际那令人感到恐惧不安的暴力的，首先是发生在法国的事情。资产阶级世界从其报刊的反映中看到，受伦敦总委员会指挥的国际不但同波拿巴分子，而且还和俾斯麦密谋策划，在发生战争时断然插手介入，煽动暴乱，最后把巴黎付之一炬。《科伦日报》报道说，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总委员会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并为国际法国支部提供二十万法郎作为战争宣传经费。巴黎《费加罗报》告诉读者说，国际从波拿巴分子手中领到了上述二十万法郎。路透社散布消息，声称总委员会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尔多，说服法国国民议会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一系列法国报纸，如《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报》和其他报纸报道，在普鲁士公使主持下在日内瓦和伯尔尼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总委员会的代表计划9月29日在里昂举行起义，以削弱法兰西共和国对德国入侵的抵抗。法国报刊还揭露说什么马克思是俾斯麦的私人秘书，他和他在伦敦的同谋曾策划成立巴黎公社。几个月后，在法国报刊断言国际已把巴黎付之一炬的同时，美国报纸揭露说，1871年10月将芝加哥化为灰烬的大火是由国际点燃的，电讯把国际这一新暴行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①。

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利用它的报刊对1871年5月流血的日

^① 恩格斯、马克思和黑尔在1871年2月28日、3月21日和5月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又见总委员会向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子作出的充分准备。这样一来，巴黎街头的大屠杀，就可以被颂扬成保卫文明而采取的值得赞赏的行动了。

但是，消灭在法国的国际还不能防止国际对文明的威胁。为了向世界告急，梯也尔的外长茹尔·法夫尔在镇压公社（1871年6月6日）几天之后，向欧洲各国发出一份照会，力图使这些国家意识到它们面临着来自国际的威胁的危险。 [169]

照会指出，国际是“一个战争的和仇恨的团体，它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作为基础，它的目标是消灭资本及其占有者，它所采取的手段是人多势众的残酷暴力”。照会这样警告说：“欧洲面对着一场旨在反对所有民族和一切文明所系的原则的破坏活动。”

法兰西为了拯救文明，做出了人类力所能及的事。但是，鉴于国际威胁着所有的国家，所以，如同照会所暗示的，象在法国那样仅仅一个国家消灭国际还是不够的；必须根除所有各国的国际。而这一使命要求所有欧洲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这份照会原意是用来作为“探针”，试探这些国家对所暗示的共同反对国际的想法究竟有何反应。因此，茹尔·法夫尔暂时只接触到公社逃亡者的问题。政治逃亡者的避难权是否也会适应于这些人呢？法国大使戴博纳维尔侯爵在递交照会时告诉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伯爵说，法国政府期待“这些逃亡者不能以政治目标的外衣掩盖其骇人听闻的恶行，而应受到象对待卑鄙的罪犯那样的对待，使他们无法逃脱自己祖国的判决。^① 茹尔·法夫尔的外交照会成为欧洲各国内阁讨论的议题。

照会递交后四天，奥地利内阁就在维也纳召集会议，就“引渡参与巴黎武装暴乱逃亡者的问题”——这是内阁会议议程对这一点的提法——作出决定。博伊斯特伯爵就此提出一份关于

① 转引自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191页起一连几页。

他和法国大使会谈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说，他不愿意抢在内阁决定之前行事。但他提请考虑，“巴黎的灾难不是出于局部性原因，而是主要由自诩为国际的那个欧洲密谋的杰作”。备忘录说，因此，除了防止产生一种印象，即“公社支持者只要逃到奥匈帝国，就能比在其他国家更感到安全”之外，“事实上很难有更大的、普遍的、政治上的和人道上的利益”。①

这时，俾斯麦提出了欧洲对国际采取行动的倡议。他在1871年7月1日致欧洲各国内阁的一份备忘录里倡议召开欧洲各国政府代表会议，讨论对付国际的共同措施和缔结反对国际的欧洲同盟。俾斯麦的《北德总汇报》说，“唯有这样一个欧洲同盟能拯救国家、教会、文明，一句话，能拯救欧洲各国赖以立国的一切。”这项计划首先在总委员会的所在地英国搁浅了。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耳伯爵直截了当地拒绝应邀参加反对国际的欧洲同盟：英国并没有感到受到国际的威胁。

但是，俾斯麦不放弃争取欧洲对国际采取行动的努力。他告诉奥匈帝国政府，关于“共同采取有效行动对付业已策划的国际颠覆运动”的会谈是值得欢迎的。随后不久，俾斯麦公爵和博伊斯特伯爵在加施坦会晤，如同博伊斯特后来在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中所说，就鉴于“国际的日益扩大和它开始，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施加反对现行国家与社会基础的危险影响……共同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和打击达成协议”。②

在加施坦会谈中，俾斯麦和博伊斯特不仅讨论了对付国际的刑事措施，同时也讨论了社会政治性措施。就刑事措施而言，博伊斯特说，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国际的首脑机构总委员会设

① 博伊斯特备忘录全文和1871年6月10日内阁会议记录，见布吕格爾同上引书，第2卷，第191页起一连几页。

② 备忘录全文及后来几次代表会议记录，见布吕格爾同上引书，第2卷，第103页起一连几页。

在伦敦，此外，德国还有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设在莱比锡，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因此，单凭这一点它就缺少任何合法的基础”；所以，它在奥地利将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受到镇压。至于对付国际的社会措施，博伊斯特提请考虑阶级斗争这个主意，即“是否可以雇主的普遍联合对付工人的普遍联合，用业主的团结对付非业主的团结”，他还说，因为“资本的力量还是公共生活中的一个可靠而巩固的因素”。博伊斯特和俾斯麦终于一致同意指示两国专门的部起草对付国际的具体措施，然后由奥普两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议对方案进行审议。

博伊斯特在加施坦与俾斯麦会谈回国后，先提请帝国国会批准一笔三百万盾的特别拨款，“作为政治情报经费”，如他所说，“由于国际危险地蔓延及整个欧洲”，这项拨款是必不可少的。

1871年9月1日，在博伊斯特伯爵主持下，在维也纳召开奥地利政府首届大臣联席会议。提交会议讨论的有茹尔·法夫尔致各国政府的照会，以及意大利、俄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政府询问奥地利政府采取何种措施反对国际的信件。但这次会议本来的目的是首先为采取的措施确定一个纲领性方针。1871年12月，在奥地利总理阿道夫·奥尔施佩格公爵主持下召开的第二届大臣联席会议上，研究了俾斯麦提出的召开欧洲各国政府代表会议的倡议。对此，奥尔施佩格指出，鉴于“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和瑞士，主要对国际的性质持有不同观点”，因此还是以先召开奥匈政府代表和德国政府代表的联席会议讨论“保护社会制度免受国际攻击的措施”为好。 [171]

下一次奥匈各部联席会议由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伯爵主持召开(1872年6月22日)，会上以最典型的奥地利官场作风提出了措施之一，即“由所有欧洲国家一致宣布”国际“有害于公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允许它在自己的国境内举行和召开代表大

会和总委员会”。对此，安德拉西说，他希望“即使瑞士和英国也不可能长期回避这样一项国际协议”。另外，会议还提议，象奥地利和匈牙利一样，德国也应宣布国际为秘密团体，并作为秘密团体加以打击之。会议最后倡议“根据国际所采取的行动的性質及其迅速壮大发展，有必要全部作为卑鄙的罪行加以处置，这样，就可以对它使用关于引渡罪犯的条约”。奥匈帝国和德国政府关于打击国际措施的会谈延期至 1872 年深秋。1872 年 11 月 7 日，德国和奥匈两国政府代表会议终于在柏林召开了；他们先后在十四次会议上讨论了一揽子的“社会问题”，并将其结果拟定为下列几条指导原则：

“1. 国际的趋向同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完全对立，并直接攻击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因此必须给予有力的反击；

2. 国际是滥用结社自由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联合会的趋向和计划具有国际性质；同样，国家为了对付它而采取的行动也具有国际性质，因此也应建筑在各国政府团结的基础之上；

3. 虽然不考虑发布一项法国那样的自己的法令，但应表达出这种愿望；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赞同在这里达成一致的原则和处理社会问题的一般性方式，从而尽可能使国际工人协会失去基础及其危害大众的作用的动机；

【172】

4. 必须指出，作为这种团结的必然结果是，其他同意在这里宣布的原则的国家，今后也不再容许国际及其所属的联合会自己的国境内举行总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

两国政府举行的会议既没有在德国也没有在奥匈帝国导致僵化现行的法令；仅仅对现行法令作出解释，就足以镇压这两个

国家中的国际了。如同在维也纳审讯肖伊和奥伯温德，在莱比锡审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犯有叛国罪时所表明的那样，只要承认国际的奋斗目标就可以作为叛国罪加以镇压。两国政府还不肯立即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拉下架子，充当法国报复判决的帮凶。它们“拖拖拉拉地”对待法国关于引渡公社流亡者协定的建议，当然这是在等待，指望政治犯所在的避难国——英国和瑞士——觉悟到它们在反对国际斗争中应尽的团结义务。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试图通过对基督教良知的呼吁加速这一觉悟的过程，试图劝说它们——如果说英国不行，那么至少是瑞士——取消政治避难权。梯也尔提出的要象西班牙宗教法庭处置异教徒那样来处置国际追随者的倡议，得到了教皇的同情和谅解，他在向瑞士天主教代表团致词时提到了这项倡议。教皇貌下说^①：“你们的共和主义政府坚持认为有责任为所谓的自由作出重大牺牲。它给一批坏透了的人以避难权。它容忍那个想要象对待巴黎一样对待整个欧洲的国际派别。这些国际的先生们是叫人担心的，因为他们在为上帝和人类永久的敌人的利益工作。保护这些人会得到什么结果呢？”^②1878年12月2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继任人利奥十三世发布的对教会的通谕《教皇职权所在》，和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如出一辙，咒骂国际。利奥十三世在通谕里严厉谴责国际是一个象他所说的旨在“动摇世界统治基础”的罪恶团体；他咒骂社会主义是“卑贱下流人的异端邪说”；他向基督教徒疾呼：“警惕！不要让任何天主教徒加入这个异教徒的团体，并胆敢以其他方式给它以支持。”

但是，尽管千求万请，在欧洲国家中，只有天主教的西班牙准备同法国签订关于引渡公社流亡者的协定。

在西班牙，国际早在1871年10月就被西班牙国民议会的

^① 即对教皇的尊称。——译者

^② 转引自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法令镇压下去。几个月后，即1872年2月16日，西班牙内阁首相萨加斯塔向各省省长下达了关于执行法令的通知；通知命令：“请您把国际看作是不符合国家宪法和应按刑事法典治罪的组织，因为它宣布自己是祖国安全的敌人和治安的破坏者，而且还由
[173] 于它否定国家，否定所有制和家庭；所以您必须从各方面制止——甚至采用暴力——力图在我们这里建立犯罪组织的一切公开活动。您必须立即派人逮捕国际的煽动分子并把他们交付法庭。”^①

同时，西班牙政府试图把俾斯麦在其1871年7月1日备忘录中所倡议的欧洲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对抗国际的思想，再次提出来讨论。它在一份致各国政府的照会（1872年2月9日）中，首先提请欧洲国家注意西班牙议会的一次辩论——如同照会十分谨慎地强调，它“也许是在历次立法会议上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辩论”。人们从照会中读到，西班牙国民议会在这次辩论中，“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真实性质下了定义”。西班牙国民议会认识到，“国际强大而可怕的组织及其迅速壮大，几年之内必然引起所有关心维护社会秩序的人们的严重关切”。西班牙国民议会确认，社会秩序“的基础深深地受到了国际的威胁”，因为国际“败坏人类的一切传统，抹去人们思想中的上帝，将家庭和继承权从生活中一笔勾销，不许各民族置身于文明世界”。

西班牙国民议会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即使是最自由的政治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样一个联合会存在”。国民议会讨论结果认为，不能容忍它的存在。但是照会又说，“单独一国政府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并在一国范围内镇压国际支部，那是不够的”；有必要由各国政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因为散布暴乱思想的大都是外国人。照会继续说，“既然事关扫除凶恶，

^① 通知全文见迈耶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118页。

那就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为此目标而通力合作”。照会暗示英国说：“假如某一大国有意承担这件事，以便为齐头并进采取行动打下基础，那么事情肯定会轻而易举得多。”

但是，英国政府象以前对待普鲁士的邀请一样，对待西班牙邀请它参加围剿国际的十字军征伐。不过格兰维耳伯爵这次认为，教训一下西班牙政府是适当的（他在1872年3月8日的照会中指出）：“按照大不列颠的现行法律，一切外国人均具有进入这个国家，并在这里逗留的不受限制的权利；他们在这里逗留期间，与英国臣民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英国，也只有触犯现行法律时，才给予外国人或英国人以惩罚，而且也只能由“根 [174] 据按照诉讼程序和依照公开法庭提供证据的正式法庭作出宣判”。英国政府认为，没有理由去麻烦议会通过特别法，如同照会所说，这是“议会和英国公众所抱的共同看法”。为了避免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纠缠，格兰维耳伯爵把西班牙和英国双方的照会公之于众。^①

英国政府的态度引起了俾斯麦的恼怒。《北德总汇报》（1872年4月17日）写道，如果“英国的土地在英国法律的保护下成为使其他欧洲国家感到不安的避难所”，那么，个别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采取对抗国际的“预防措施”又有什么用处呢？^②

俾斯麦倡议的、得到博伊斯特、梯也尔、罗马教皇和萨加斯塔支持的建立神圣同盟讨伐国际的主意，由于英国的反对而失败了。旨在从道义上消灭国际的外交和政治舆论方面的十字

① 《英国和西班牙政府关于国际协会的信件往来》（1872年伦敦版）。在1872年4月12日英国下议院会议上，内政大臣以同样的理由反对保守党议员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关于取缔国际的提议。就连《泰晤士报》在评论这一提议时也说：“我们不能任意采取措施去镇压一个就我们所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社团”。

② 西班牙与英国双方照会的全文和《北德总汇报》文章的全文，见迈耶尔同上引书，第1卷，第158页起一连几页。

军征伐，恰恰引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它出乎意料地使国际名闻天下。国际变成了欧洲各国内阁和议会及报刊讨论的题目。全世界都在谈论国际，谈论它的努力方向、目标以及它兄弟般地团结世界各国工人的性质。统治阶级当然把国际视为危及自己特权、财富和权力的威胁。但是，工人是不会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危险的”。尽管资产阶级报刊编造谎言，连篇累牍地围攻国际，但并不能掩盖住国际的性质——即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为了使自己从所受的贫困和屈辱中解放出来而建立的同盟。此外，诬蔑国际的谎言也过于荒唐离奇，以致没有人相信，而统治阶级的报刊向国际发出的一片咒骂声，却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同受迫害的人的团结感情。因此，原意旨在贬低国际的这场十字军征伐，实际上却提高了国际的地位，并使它在实力上具有一种其实际力量无法与之比拟的重要作用。

第一国际的终结

[175]

1

国际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中经受了考验，事实证明，它虽然不是一种实力政策的因素——因为它没有力量介入这些事件，但却是一个信仰坚定的组织，它的成员在历史危机的关头团结一致，忠于自己的原则。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顶住了由于战争在两国掀起的凶猛的沙文主义浪潮；战线阻碍不了他们发展兄弟般的友谊——一个“在过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事实”。在打败法兰西帝国和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时刻，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自豪地承受了“叛国罪”的诬蔑。他们在议会、宣言、群众集会以及自己的报刊中，要求对法国实现光荣的和平，并抗议掠夺法国的国土。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在其决议中说，“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了他们自己的义务”。

国际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它同巴黎公社团结一致。建立公社并不是国际应负的责任，总委员会曾警告法国工人不要干这种“绝望的蠢举”。但是，当公社宣布成立时，总委员会就把公社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情。公社还在抗击凡尔赛政府战斗正酣的时候，总委员会就在位于伦敦中心的海德公园（1871年4月12日）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以表示伦敦工人向公社的致意。公社陷落后，国际不管众多敌人的反对，它继承了公社遗留下来的事业。

这种自发的团结行动，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国际支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比利时司法大臣在议会诽谤公社

保卫者和建议引渡公社流亡者时，国际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1871年6月5日）宣告说：“我们热烈地向巴黎的公社致敬，尽管它现在已经失败了”。决议说，“我们赞赏公社对整个个人类作出了贡献，^①所有为它战斗过的人都有权受到一切人的出自内心的尊敬和同情。”当俾斯麦在帝国国会嘲笑巴黎公社时，刚刚新成立的德帝国第一届国会中唯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倍倍尔反驳他说：“但你们可以坚信，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和每一个怀有自由和独立感的人，都在注视着巴黎。”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它更能说明问题。当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要求社会民主党正式谴责公社的“暴行”时，《人民国家报》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几天写道：“我们声明同公社团结一致，并准备随时在任何人跟前为公社的行动辩护。”《人民国家报》在提到“哀悼死难的兄弟”之后，援引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凯旋曲回答了资产阶级的报刊的“天真幼稚的厚颜无耻”：

“我今后还是这样，将再次走在军人的前头，
把你们的脖子、脑袋，和你们的王冠踩在脚下；
解放者、复仇者和审判官，抽出了长剑，
我将伸起有力的臂膀，叫它把世界拯救。”

2

但是，这个希望，即革命将很快重新到来的希望，只是幻想，因为随着巴黎公社被镇压，唯一可以发动欧洲革命的革命力量中心也被摧毁了。1867年9月洛桑代表大会后，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下一次革命”，说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来得更快些”，^①当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法国。期待在法国出现一次革命，这在当时并不是革命的幻想；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认为这

是不可避免的。路易·波拿巴曾徒劳地争取工人和国民的好感；但工人和国民、奥尔良派和正统派，都鄙夷不屑地把他看成篡位者，仇视他那腐化和警察专制的化身的政权。路易·波拿巴急于追求荣誉而迫不及待地进行外交冒险活动，有朝一日必定使法兰西帝国陷入一场危机；特别是巴黎期待这场危机有可能使他垮台。

马克思当时还看到革命潮流重新高涨的其他迹象。六十年代，爱尔兰正处于民族革命的动乱之中。在爱尔兰，民族革命紧紧地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因为爱尔兰的土地——人民唯一的生活源泉——掌握在英国土地贵族阶级的手中；农村的贫困和饥荒年复一年地逼使成千上万爱尔兰人去美国或到英国出卖劳力。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也是新教贵族阶级对信奉天主教的居民的统治。芬尼亚运动(士兵)的民族革命秘密团体所酝酿的爱尔兰革命，旨在把爱尔兰民族从外国异教徒的政治奴役和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 [177]

起义定于1865年举行。但英国政府通过大规模逮捕芬尼亚社社员，破坏了这个计划。不过1866年和1867年在爱尔兰还是发生了几次革命暴动，暴动被镇压之后，芬尼亚社社员在英国采取恐怖活动。洛桑代表大会闭幕后几天，即1867年9月，武装的芬尼亚社社员大白天在曼彻斯特袭击押解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囚车，将警察击毙，救出了被捕者。12月，芬尼亚社社员试图用炸药炸开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炸死十二人，伤一百多人。英国惊惶失措。由于无法查出真正的作案者，便指控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群众犯有一系列谋杀罪。尽管缺乏确凿的证据，仍判处三人死刑，予以处决。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赞成支持战斗的爱尔兰人，虽然这种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50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48页。——译者）

度很不受欢迎。根据他的建议，总委员会在伦敦召开大会，抗议以公正和政治明智的名义计划杀害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还提议向爱尔兰人发表宣言，宣布国际同他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

马克思主张的对爱尔兰的政策是总委员会先后三次会议进行激烈辩论的议题。^①托马斯·莫特斯赫德反对爱尔兰独立。他说，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将因其地理位置而危害英国的安全，因为它位于英国与法国之间，如果英国撤出爱尔兰，法国就将乘虚而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移居波士顿的宪章运动元老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抗议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他写道，“爱尔兰是英国完整的一部分”。

但是，马克思说服总委员会，使它相信，英国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应把爱尔兰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因为为了推动英国的社会革命，必须在爱尔兰进行这关键的一击。他说，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一旦这个堡垒在爱尔兰崩溃，英国的这个堡垒也会随之完蛋。英国的土地贵族不仅将失去它的一个财富的来源，而且也将失去它作为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代表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只要英国土地贵族在爱尔兰的势力不打倒，英国无产阶级就永远无法伤及本国的土地贵族。马克思提醒说，克伦威尔领导下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178]灭的。“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人民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②

马克思当然没有期望爱尔兰的自由斗争反过来直接影响英国的工人运动。他所希望的是，爱尔兰的革命能摧毁英国土地贵族阶级政权的基础，英国工人阶级同革命的爱尔兰人的联盟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9年11月16、26和30日)。

② 卡尔·马克思：《致库格曼》，同上，第88、89和103、104页。(直接引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12页。——译者)

能鼓舞英国工人重新发扬宪章运动时代的战斗精神。浮现在他脑海中的英国工会运动的直接任务是，将自己建设成一个如同宪章派那样旨在夺取政权的独立的工人政党。他认为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特别重要，因为这又与英国工人阶级“通了电”，并为它开辟了进入议会这个政权要害地方的道路。他写道，革命的首创精神可能来自法国。但他认为英国是“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①的唯一大国，因为它的地产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又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和雇佣劳动者占居民多数的唯一国家。

3

但是，在公社失败后，短期内不可能再指望由法国首先发动革命。虽然公社的崩溃并没有同时把国际拖入深渊，但法国革命运动遭受到的可怕的流血伤亡——优秀分子在战斗中牺牲、被处决、流放或被迫逃亡——以及继反革命得胜后出现的恐怖统治，破坏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它曾经是国际的一个重要支柱。

当然，反动派不可能铲除工人心中的国际的思想。例如，瑞士《评论》驻巴黎记者报道（1872年7月20日）法国工人在他们失败之后的情绪说，“工人们不声不响。他们重建自己的工会，使章程同法律一致起来。但是他们的心在国际一边，在神甫公墓（公社英烈的墓地）和流放者的一边。”同一个月（1872年7月），维也纳《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也报道说，“工人中间活动频繁。工人们组织起工会联合会，以代替被解散的国际小组。联合会常常在一些地方集会。这些地方虽然可以呆上几千人，但还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09页。——译者

不能容纳所有到会者……演说的人激发起一种活跃的气氛，甚至是热烈的情绪，可以得出结论说，支配着巴黎人民群众的开朗乐天的观点还没有完全让位于较为冷静的看法。”^①

[179] 在意大利，恰恰是巴黎公社才推动了国际的发展。公社成立之前，国际在那里的发展情况十分可怜。虽然巴枯宁早在1866年把一批年轻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卡洛·甘布齐、阿尔贝托·图奇、萨韦里奥·弗里西阿、朱泽培·法奈利、斯蒂凡诺·卡普卢索——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工人运动还是受马志尼控制。公社的遭遇动摇了工人对马志尼的信任。公社的英勇斗争唤起了他们似火的激情；他们把公社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但是，马志尼（在《人民罗马》报上）放肆攻击咒骂公社，同时并咒骂他认为应该对公社负责的国际。加里波第同马志尼的关系就此破裂。加里波第把自己的佩剑赠送给公社；他把国际崇敬为“未来的太阳”。与此同时，巴枯宁也在两本措词激烈的政治性小册子中回敬马志尼的攻击。^② 这些事件加速了马志尼的意大利北部工人组织的垮台；它们加入国际，组成国际意大利联合会。

巴枯宁认为，国际在意大利的迅速发展已是革命临近的征兆；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所谈到的那样，巴枯宁把“怀孕的第二个月”看成是“第九个月”。当时，他认为意大利是最革命的国家。1872年4月，他写信给他的西班牙朋友弗朗西斯科·莫拉说：“意大利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地位、名不见经传、找不到出路的热情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精神上和智力上并未疲惫……今天，他们一心拥护革命的社会主义。”^③

① 转引自迈耶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734页。

② 米哈伊尔·巴枯宁：《一个国际会员答马志尼》、《马志尼的政治神学与国际》，这两本小册子于1871年同时以意大利文和法文发行。

③ 迈耶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192页。

自六十年代末以来革命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的西班牙，镇压法令仍然是一纸空文。国际不断地扩大，根据西班牙联合会向其1872年12月在卡多瓦召开的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它拥有一百零一个地方联合会，下属三百三十二个工会支部，六十六个其他部门分会和十个个人会员支部。

在德国，党对普法战争采取的大胆但不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反对态度，导致了党员人数的下降。爱森纳赫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871年8月于德累斯顿召开）只代表八十一个地区的六千二百二十五名党员；一年前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70年6月于斯图加特召开），还报告拥有一百一十三个地方组织，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七名党员。诚然，这一期间的德国工人运动还分裂成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卷入了一场激烈的、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挑动起来的兄弟阋墙之争。但是，两党在俾斯麦刚刚签订了对法和约为之感到得意洋洋的情况下于1871年3月3日举行的 [180] 帝国国会选举中联合行动，争取了大约十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三。在1874年1月的第二届帝国国会选举中，它们已争取了三十五万张以上的选票。

关于公社陷落后奥地利运动的情况，我们掌握有前文提及的1872年6月部务参议施密特-察比罗夫“报告”中的官方证明。报告提到，“尽管各国政府对整个欧洲工人运动采取断然的态度”和对工人运动领袖依法进行追究促使工人运动“变得审慎得多”，“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已停止或有所削弱”。“报告”说明，有一百九十七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教育协会、专业协会和工会。^①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纸有维也纳的《人民意志报》、新维也纳的《平等报》、格拉茨的《自由》和布拉格的《工人报》。

① 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142—143页。

瑞士几乎没有受到公社陷落后遍及欧洲的反革命浪潮的冲击。工人运动对公社的成立表示欢迎，为它的斗争感到欢欣鼓舞，并在公社失败后友好地接待它的流亡者。工人运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维护神圣的避难权，以回答梯也尔提出的把公社流亡者作为卑鄙的罪犯引渡给法国的要求。法国发生的事件和法国流亡者的涌入使国际各支部增添了生气，尤其是在罗曼语区的瑞士。

在荷兰，自从六十年代末以来，国际不断地得到了扩大。1869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荷兰支部，它为荷兰国际创办了一份机关报《人民旗帜》。不久后，在鹿特丹、阿纳姆、哈勒姆和乌德列支建立了支部，创办了另外两份报纸：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报》和鹿特丹的《人民报》。法国反动派对工人施加的白色恐怖暴政使工人群众更加激进了；国际的运动迅速扩大起来。

巴黎公社的失败促使丹麦成立它的第一个国际支部。1871年7月，社会民主党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号出版。一个月后，“国际工人协会”组成国际的一个支部。

但是，在公社失败之后，只有两个国家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可以说是活跃的；这就是比利时和英国。在比利时，同情国际的工人有几万人。当然，比利时联合会的固定会员人数少得多，但是从出版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来看，估计这个数字也不会小；当时布鲁塞尔出版《国际报》和《自由》，安特卫普出版《工人报》，韦尔维埃出版《米拉波报》，布鲁日出版《前进报》，列日出版《义务报》。

在英国，国际地方组织及其个人会员的数字很小；它的实力【181】是靠集体会员入会的工会。一些当时最杰出的工联领袖在总委员会中任职，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早

在 1866 年，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就建议它属下的各协会加入国际；阿普耳加思在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报告说，已有二十八个工会加入了国际。1870 年 11 月，工联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理事会会议宣布，它同国际及“其在世界各国采取的所有行动”团结一致。1871 年 1 月，工联伯明翰理事会以集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如它在决议中所说，它“相信，实现国际的原则将导致世界各国的持久和平”。的确，几乎总委员会的每次会议报告都谈到了工联所取得的进步。

当时，英国工联还没有形成为工人政党，也还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此外，直到 1871 年秋以前，加入国际的英国各协会还没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总委员会既是英国的联合会委员会，又是整个国际的执行机构。这样，总委员会就行使着在其他国家由联合会委员会（或者，例如在德国，是由社会民主党）行使的各种政治职能。总委员会曾是推动英国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的力量；在宣布主张土地公有制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它建议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1869 年 10 月），以便在英国贯彻巴塞尔的土地纲领；总委员会主动倡议组织群众大会，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反对德国咄咄逼人地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以及支持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

对英国工联来说，总委员会首先是履行了作为一个国际性机构指导它们进行斗争的职能。我们已介绍了一系列这样的行动。随着 1871 年 5 月纽卡斯尔机械制造业工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罢工，英国出现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工联斗争。它推动了九小时同盟的成立；该同盟的书记约翰·黑尔斯就是总委员会委员。

纽卡斯尔的工厂主企图先从丹迪和伦敦拉来一批工人。但是，当英格兰和苏格兰工人拒绝受雇充当罢工破坏者时，工业家

协会就派遣代理人去大陆招募外国工人。果然，有几百名德国、挪威、丹麦和比利时的工人在不了解罢工的情况下应招。于是，九小时同盟请求总委员会，通过国际渠道阻止外籍工人进入英国。总委员会派了它的两位委员詹姆斯·柯恩和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去大陆，在国际大陆各支部及其报刊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抵制了招募外国罢工破坏者的工作。在这之前抵达纽卡斯尔的外籍工人，一经对罢工有了了解之后，就纷纷回国去了。

纽卡斯尔机器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变成了全国的事件。工人在群众集会上抗议引进从外国招来的破坏罢工的人，而工厂主则在报刊上为他们有权招募外籍工人辩解。从1871年5月25日至10月11日，斗争持续了近五个月，最后以罢工者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九小时同盟胜利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引进外国罢工破坏者到英国来——这是由于国际发挥作用而取得的一次胜利。

4

国际在公社失败后的这一情况简要说明，公社的失败，甚至随后政府进行的迫害，并没有将国际摧毁。虽然国际受到了重大损失，因为它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法国的运动——彻底遭到了破坏。但是，它在大陆其他国家的影响几乎没有削弱。在英国，国际赢得了力量和威望，资产阶级世界感到它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然而，国际的强大和团结的形象是虚假的。由于内部矛盾和斗争，它自己拆了自己的台。

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在总委员会内部引起的令人痛心的个人冲突，以及两名最有影响的委员乔治·奥哲尔和本杰明·鲁克拉夫特退出总委员会，对国际的影响都是微乎其

微的。这一事件在英国报界引起了十分活跃的反应，在编写历史时被提到危机的高度。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实这一看法。会议记录也纠正了一种传说，即所谓马克思骗取总委员会同意了这项宣言，而不让其他委员知道就签上他们的名字。

会议记录表明，总委员会和马克思都以极端认真的态度处理这一文件。早在公社成立后十天，即3月28日，^①总委员会就委托马克思起草告法兰西人民书；总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编辑委员会——英国的米尔纳、法国的赛拉叶和瑞士的荣克——准备这份文件，另外还决定文件应由全体委员签名。由于马克思长期生病，起草文件的工作被推迟了；编委会不得不在他的病榻旁就此进行商讨。马克思直到5月30日才向总委员会提出这篇宣言。经韦斯顿和罗班建议，一致通过了这篇宣言，并委托书记立即付印，送发给议会和报界的成员。这份把公社保卫者称颂为英烈的宣言，在部分资产阶级报刊中引起了一片愤怒 [183] 声；几家报纸控告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说他们同公社的“流氓和纵火犯”勾结在一起。总委员会讨论宣言时，这两位工联领袖不在场，不过他们知道这篇宣言，而且郑重其事地表示同意，并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以同公社战士和总委员会团结一致的行动回答报刊的攻击。他们出席了6月20日总委员会的会议，声明他们拒绝对宣言负任何责任。接着就是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中首先是英国委员反对这两个人。之后，两人宣布退出总委员会。其他英国工联领袖谁也没有跟他们走。罗伯特·阿普耳加思写信给总委员会，对他未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他甚至这样认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名字就是总委员会的财产”，它有权以其全体委员的名义发表自己的声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

明。^①

总委员会撇开这个意外事件，转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次意外事件没有反过来对加入国际的英国工联直接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两位杰出的工联领袖的退出势必带来了与某些工联人士疏远的因素。但尽管如此，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英国最重要的工联之一——工程技术人员及机械制造业工人工联，其主席为总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还是宣布加入国际。当几个月后，即1871年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成立时，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的支部。^②总委员会也没有被奥哲尔和报刊对宣言的攻击弄糊涂而停止继续传播宣言。6月初发行的宣言第一版印了一千份，销售一空。6月底，总委员会决定第二版印两千份，7月底，第三版再印一千份；宣言也被译成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并在德国、比利时、瑞士和美国发行——在德国，不仅在《人民国家报》上刊载，而且也印了八千本小册子。

5

[184] 国际蒙受到的致命危机，其根源既不在于巴黎公社的悲剧，也不在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背叛，而是在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在社会主义目标、社会革命的方法

^① 关于宣言的辩论见1871年5月30日和6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关于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分歧，见6月20日和27日，以及7月18日会议记录。阿普耳加思的信见1871年8月8日会议记录。出席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宣布退出的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有下列英国委员：布恩、布列德尼克、巴特里、黑尔斯、哈里斯、鲁克拉夫特、莫特斯赫德、奥哲尔、罗班、唐森和韦斯顿；此外，还有非英国委员柯恩、埃卡留斯、恩格斯、荣克、科尔布、列斯纳、马克思和普芬德。

^② 见亨利·科兰斯：《第一国际英国支部》，载于《工人史短论》，由阿萨·布里格斯和约翰·萨维尔出版（1960年伦敦版）。

和国际组织形式观点上的冲突。但是，如同社会和宗教运动史上的一切意识形态冲突一样，国际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恶化成两派支持者之间的视同仇敌，特别是在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两股思潮的代表。

这是受狂热的强烈的救世欲所驱使的两位巨人之间的斗争。他们两人在思想气质上截然不同。马克思是一位有条不紊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则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和豪放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对对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引出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杂乱无章的乌托邦幻想。

马克思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有统治地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组织成政党的、思想成熟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工人阶级则是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提。

与此相反，巴枯宁认为，甚至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的半封建经济形式都是社会革命的普遍条件，认为社会革命的动力首先是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农民群众。因此，他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随时和到处发动革命；例如，他写道，俄国人民正处于“这样一种绝望的境地，以至可以不费力气地使随便哪一个村庄举行起义”。他认为，革命的支柱不是文化程度高的工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病毒的感染”。他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地位业已下降的资产阶级青年、农民群众以及大城市里无处安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阶级阶层，那不勒斯的行乞者，巴黎的流浪汉，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巴枯宁象布朗基一样，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①。

巴枯宁主张的社会革命方法是搞武装突然袭击，暴动。他谴责工人阶级为夺取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89页。——译者

责任何间接和直接为革命服务的政治行动。他认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砸烂国家，而不是占有国家，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摆脱任何外部强制和任何权威的、没有国家的公团联盟的无政府状态。

马克思也考虑以一个自由的、不受强制和没有国家的公团为目标。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未来不应再有国家，而只是一个自由人们的自由公团，“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但是，巴枯宁认为，这一理想不能通过革命的戏剧性的行动实现。马克思把国家的政治暴力看成是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一种职能，一种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职能，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因此他得出结论，国家只能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消亡”，这就是说，丧失了它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职能。“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他指出，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国家政权，并在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消亡之前，利用国家政权作为消灭阶级统治的杠杆。工人阶级必须“以统治阶级的资格”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阶级本身”，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②。马克思在一次同巴枯宁争论时写道，“在无产阶级的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3页。——译者

② 有关《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引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3页。——译者

但是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爆发冲突，其导火线并不是在于 [186] 理论上的对立，而是在于对国际组织问题上的对立。1847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讨论国际的思想的时候，马克思一开始就认为，国际是各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统一的组织，而且是作为民主政党，不是作为进行密谋暴动的秘密团体。这种思想指导着他在总委员会里工作。他把国际理解为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总的政党，一个由作为国际各支部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盟。因此，总委员会的地位就相当于这个总的政党的执行机构。

巴枯宁起初对国际的中央集权组织形式没有提出异议。他在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甚至积极赞同扩大总委员会的权

① 《总委员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82页。——译者)。恩格斯在致非力浦·范·派顿的信中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马克思和我从 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自行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上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438—439页。——译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1883年5月17日苏黎世)。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1954年柏林版)，第2卷，第1030页。

限，并投票赞成总委员会有权在下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前暂时开除国际支部。不过当时看来他就决心控制国际，把它作为推行他自己思想的工具，并篡夺马克思对国际的领导权，从大会闭幕后一个月他给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虽然承认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二十五年多来，他一直以明智、活力和忠贞纯洁为这个事业服务”。但是，他又说，可能“我开始与他发生了争吵，当然不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是为了一个原则问题，为了国家共产主义，其狂热信徒就是他和他领导的英国人和德国人。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马克思不用看这封他所不知道的巴枯宁的信，也能猜测到巴枯宁有意夺取国际的领导权。巴枯宁对待国际的态度，就使人产生这种怀疑。国际成立后不久，巴枯宁经马克思提议被邀请加入国际作为会员，并答应在那不勒斯为国际工作——1864年秋，他从伦敦前往那不勒斯。但是到达那不勒斯后，他没有建立国际支部，而是组织一个革命的秘密团体“国际兄弟会”。1867年他移居日内瓦，他不是参加那里的国际支部，而是带着他的秘密团体加入和平同盟，并企图使和平同盟为他效力。他在那里遭到失败后，又于1868年秋建立一个组织，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推行他自己政策的工具。他打算让这个组织作为国际的一个分会。要是责怪巴枯宁组织这个同盟是计划利用它作为夺取国际的手段，那也许是冤枉了他。当该同盟于1868年12月申请总委员会吸收它的时候，巴枯宁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①

① 转引自梅林：《马克思传》，同上，第430页和410页。

但是，巴枯宁给这个同盟确定的组织形式不能不使马克思 [187] 更加引起怀疑。按照同盟的章程，是要搞出一个国际中的国际，有它自己的支部、自己的各国局、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一个拥有两套相互竞争的支部、全国联合会、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国际，当然是维护不了自己的统一的。马克思不可能毫无根据地假设巴枯宁真的蓄意利用这个同盟来夺取国际。

如同巴枯宁后来在1872年春写信给其西班牙信徒时说的，他建立这个同盟的指导思想，是让它成为进行革命的总参谋部。他不相信国际“有能力组织和领导革命”。国际的目标是为革命提供军队，相反，同盟的任务是“使国际有一个革命的组织”。

按照巴枯宁的计划，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同盟必须建成为一个秘密组织。它的会员行动上必须“象在人民激情的风暴中不露面的领航员”。革命不能“由一种明显的权力进行领导，而是由同盟全体成员的集体专政进行领导”。巴枯宁要求，盟员必须准备以个人自由服从于一种严格的纪律，象耶稣会会员服从他们的纪律那样，使得“个性消失于集体意志、消失于组织及其活动之中”。①

按照巴枯宁的计划这样搞起来的同盟，在总委员会看来当然只能是一种使国际出现紊乱的因素，因此总委员会拒绝吸收它。于是，同盟声明愿意解散，不组成独立的国际性组织，而将它的支部变成国际的支部。总委员会对此不加反对，实际上总委员会一致决议接受巴枯宁领导的同盟日内瓦支部参加国际。巴枯宁以日内瓦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

同盟究竟是象巴枯宁的信徒所断言的那样，真的解散了，

① 转引自 E·H·卡尔：《米哈伊尔·巴枯宁》（1937年伦敦版），第422和423页。

或者象马克思及其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仍然秘密地继续存在下去，事实上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以巴枯宁那令人着迷的性格而言，是很容易把一群热心的使徒聚集在自己周围的；他当然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也掌握了他的信徒所控制的意大利、西班牙和罗曼语区瑞士的国际支部——在意大利是安得列阿·科斯塔，在西班牙是弗朗西斯科·莫拉，在罗曼语区瑞士是詹姆斯·吉约姆。^①

[188] 巴枯宁的影响在一系列为宣传他的政策出力的机关报中也占上风，例如，由吉约姆任编辑的勒-洛克尔的《进步报》，日内瓦的《平等报》——菲利浦·贝克尔是这个编辑部的人，巴塞罗那的《联盟》，那不勒斯的《平等》周报和波伦亚的《工人联合会》。

1869年9月巴塞尔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之后，巴枯宁向总委员会发起攻击。总委员会的活动受到《平等报》和《进步报》的挑衅性抨击指责，与此同时，罗曼语区瑞士的巴枯宁反对派则组织起来，企图夺取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领导权。在这场斗争中，罗曼语区联合会1870年4月在拉绍德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分裂了。因为在此之后《平等报》反对巴枯宁，所以巴枯宁在纳沙特尔创办了《团结报》，由吉约姆任编辑部领导。

7

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很可能是原定于1870年9月在美因兹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讨论题目。但是，普法战争的爆发使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开成。而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在法国、西班牙、

^① 詹姆斯·吉约姆的《关于1864至1878年国际的文件和回忆》（1905—1910年巴黎版）一书，包括四卷关于国际的回忆录和文件，是研究第一国际史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尽管该书对马克思怀有敌意。

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所受到的迫害，使总委员会认为，将代表大会延期一年，先行召开一次不公开的代表会议是恰当的。

1871年9月，这次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

这次有二十三名代表(其中六名比利时人，一名西班牙人和十三名总委员会委员)出席的代表会议，要研究的是比罗曼语区联合会的争吵远为严重得多的事情。它首先要讨论国际对付“肆无忌惮的反动派的有效措施”。后来受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只能作为阶级来和“占有者阶级的整个暴力”进行斗争，同占有者阶级组织的一切政党相反，它应将自己建成一个特别富于政治性的党，对争取社会革命胜利，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最终目的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

此外，代表会议还决定，把由总委员会代为履行的英国联合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由英国各支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这一决策象征性地说明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所处的政治形势。

早在1869年，总委员会就研究了自己和地区性的英国委员会分家的问题；^① 这个问题也成为《平等报》议论的对象。当时马克思还看到，法兰西帝国的危机有可能在欧洲创造一种革命的形势。他说服总委员会相信，放弃它以英国联合委员会身份对英国工人阶级施加政治影响的做法，是个蠢举。在1870年1月1日致罗曼语区瑞士联合委员会的通知中——通知谈到《平等报》提出的英国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总委会指出，不应该简单地象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待作为“资本的首都”^② 的英国，因为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唯有它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革命必然影响全世界；它是“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把

^①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9年10月5日和19日)。英国联合会会史，见科兰斯同上引书。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11页。——译者

这个杠杆交给别人，那是愚蠢的。①

但是，当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召开时，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法国，反革命取得了胜利，德国和奥地利工人运动已瘫痪。短期内欧洲大陆不可能有发动新的革命的希望。

可是，英国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情况也使马克思对重新出现新的革命形势的希望变得渺茫。总委员会在上面提到的由马克思执笔的致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通知中提到，英国人虽然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②。

英国工人能够具有革命的热情，这一点在他们的斗争史上一再地表现出来，例如在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中。但是他们在1848年失败后怀疑革命的方法，他们试图——并非完全没有成就——通过工会的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六十年代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虽然再次给他们“通了电”，但并没有使他们革命化。英国统治阶级也从欧洲革命运动以及英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可以用改革防止革命。英国工人阶级在1867年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中所以取得胜利，在不小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一考虑。英国工联领袖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结论，英国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工会的斗争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通过对资产阶级议员施加压力，逼使议会作出让步。选举法改革给了城市工人以投票权，从而也给了他们一个借以在议会中发挥自己影响的工具。鉴于按照新的选举法1868年的首届选举以工人候选人全部失败而结束，因此工联领袖寄希望于同资产阶级进步的一翼结盟——这个结盟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

由于现在短期内不再考虑英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

① “通知”见马克思：《致库格曼》，同上，第102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10页。——译者

伟大的杠杆”^①，所以，对将来的革命来说，国际英国联合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总委员会手中更加有利，还是掌握在英国联合委员会手中更加有利这一问题，也失去了意义。如上所述，代表会议决定任命一个英国联合委员会。 [190]

代表会议最后讨论了几个组织问题。它建议在国际受到镇压的国家中的国际支持者改换名称，重新组织起来，但同时强调，秘密团体不能加入国际。代表会议建议它的法国支持者按车间组织起来，并呼吁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的支部重新团结一致。决议说，“考虑到国际目前所遭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挥团结统一的精神，现在，工人应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具有这种精神”。

8

但是，伦敦代表会议的呼吁没有在巴枯宁阵营中得到响应。巴枯宁在罗曼语区瑞士控制的各支部——现已改名汝拉联合会的原来的同盟——在六个星期后，即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发表一份由吉约姆执笔的致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国际联合会所有各支部的通知，控告总委员会篡夺专制权力。通知说，总委员会以国际的“合法的首脑机构”自居；总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席位已控制在几个人手中，变成一种私有财产，他们企图把个人的教义强加给国际。通知说，“由于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政府，因此他们自然把个人的思想当成国际的正式理论，认为别人的思想不是合法地、地位平等地发表的意见，而是十足的异端邪说。”总委员会也企图把各独立支部的自由联合变成一种等级制的、建筑在权威暴力基础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10页。——译者

的组织。因此，通知提出控告：“我们控告总委员会，它的委员企图在国际内部采用权威的原则，以便使他们个人的教义得胜。”通知建议各联合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把总委员会降格为一个普通的行政办公机构，并“通过独立团体的自由联合实现有人企图以中央集权和专政建立起来的那种统一”。

不过，国际意大利支部对这项决议还感到不够满意；它在里米尼召开的自己的代表大会（1872年8月6日）上提出彻底同总委员会决裂，并联合抵制参加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191] 它在自己的决议中谴责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要求工人阶级自己建立政党的号召，决议说，这是企图把“极权主义学说，即德国共产党的学说强加于国际”。但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学说“有损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此外，决议还指控总委员会“进行欺骗和诽谤”，并“庄严地向全世界所有工人宣布，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即日起结束它与伦敦总委员会之间的任何团结行动”。

对于瑞士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把被欧洲反动派包围的国际分散到各个基层组织去的建议，马克思指出：“它宣布在无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①

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伦敦代表会议之后，巴枯宁反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斗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早在代表会议之前，他在给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信中就宣布这场斗争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理论，反对他们的专制傲慢和那种阴谋诡计、卑鄙人物的自命不凡、肮脏的诬蔑和可耻的诽谤，这一套也一向是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82—383页。——译者

乎所有德国人进行政治斗争的特点，而不幸地被他们带到国际中来了”。他写道，马克思“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者”，总委员会是一个“亲日耳曼的”代理机构，一个“受俾斯麦式的头脑指导的德国委员会”。

尽管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斗争方式所进行的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自己并未摆脱他指控马克思和恩格斯犯有的那些罪孽。不过这里可以撇开不谈巨人之间争斗的颇为令人不快的插曲，这一插曲只能由他们的传记去记述。可以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总委员会委托，在一份篇幅较大的文件——即前文提及的那篇“所谓的分裂”的通知——中起草了对巴枯宁和吉约姆的控告书，交由海牙代表大会作出判决。^①

9

国际各联合会以极为紧张的气氛等待着1872年9月2日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总委员会通过比利时联合会的建议，选定海牙为代表大会的会址，虽然海牙支部是所有支部中最年轻和最薄弱的支部。如同代表大会代表马耳特曼·巴里说的，这个支部只有不到二十名左右的会员。当然，海牙当时还是一个远离尘嚣的小城市，是宫廷、议会、内阁各部的所在地，不是商业和工业中心。因此，“令人生畏的国际”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这对该城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轰动一时的事情。巴里说，小孩被及时地警告：“国际来了，不要携带任何可以给他们偷去的

^① 对这一插曲公正而不偏颇的记述，见梅林同上引书，第7章第6节，第14章第5节和第7节；对梅林观点的评论，见N·梁赞诺夫：《社会民主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货色》。《新时代》第32年度，第1卷，第5、7、8、9、10和13期；此外，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伦敦版），由威廉·布洛泽译成德文，标题为《马克思和巴枯宁，民主或专制》（1920年斯图加特版）。

东西！”在从火车站到旅馆的途中，人群尾随着分批到达的代表：“马克思是他们特别注意的目标，人人都提起他的名字”。巴里记述了群众如何蜂拥而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密密麻麻的人群使通往代表大会会场的街道为之阻塞，以致代表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通过。当大门一打开，人群就涌入会场，坐满整个大厅，坐在窗沿上，走廊里也挤得透不过气来。”^①

出席本届代表大会的国家是迄今为数最多的了：德国、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荷兰、丹麦、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和爱尔兰；此外，还有四名美国代表（其中有F·A·左尔格）。意大利联合会遵照其里米尼决议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布朗基派第一次以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瓦扬、朗维耶、库尔奈和阿尔诺^②，他们都是总委员会收留下来的公社流亡者。代表大会总共承认六十一人具有代表资格。

代表大会必须就同盟和总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作出裁决，这在马克思看来对国际前途具有命运攸关的意义。“关系到国际的存亡，”他写信告诉库格曼说，“在我退出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③马克思亲自到海牙去；自从国际成立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出席它的代表大会。巴枯宁没有出席，由吉约姆代理他的事务。

随着马克思提议把同盟开除出国际，开始了关于这场冲突的辩论。代表大会选出一个五人委员会（三名法国人，一名德国人和一名比利时人），负责就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进行调查。

① 我们根据美国代表左尔格和巴里的记录和报告，对海牙代表大会作出记述。这些记录和报告附有一系列其他文件，标题为：《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附有关文件》（1958年麦迪逊版），由汉斯·格思校审，并从德语译成英语；该书也收入用德语写的记录的影印本。

② 原文为 Arnand，疑系 Arnaud 之误。下同。——译者

③ 《致库格曼》，同上，第13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03页。——译者）

接着，讨论关于总委员会的权限。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 [193] 出一份提案，要求授予它权力，在下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国际支部及联合会。比利时代表首先反对这一提案；支持比利时代表团的德吉烈·布里斯美说，许多比利时支部主张彻底取消总委员会，另一些支部赞成限制它的权力，没有一个支部赞成加强它的权威。吉约姆主张，国际根本用不着有个“头”。“总委员会什么时候进行过阶级斗争，什么时候筑过街垒？今后它会做这些事吗？”吉约姆说，总委员会毫无用处。左尔格提醒他注意，总委员会曾为法国罢工工人组织了团结行动；一个没有头的国际就是一种最低级的生物。与这种态度相反，摩尔根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他就要把他负责的西班牙联合会拉出去；总委员会的作用应限于处理日常信件。

代表总委员会立场的马克思说，与其把总委员会降格为一个“信箱”，还不如根本取消它好。总委员会有权暂时开除支部和甚至联合会，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存在着警察密探和间谍掌握国际某些支部的危险；这种情况在奥地利和法国已经发生了，俾斯麦就可能这样做。马克思说，总委员会没有掌握武器和军队，它是一支以国际会员的信任为基础的精神力量；即使赋予总委员会以无限专制的暴力，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它也是毫无力量的。

代表大会以三十六票赞成，六票反对，十五票弃权，通过了扩大总委员会的权限；德国代表团、法国代表团的多数（六比一）和总委员会的多数投票赞成总委员提案；英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代表团投票反对；瑞士代表两名赞成、两名反对。

恩格斯以几位代表的名义（马克思、龙格、赛拉叶、杜邦、列斯纳等）提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纽约。巴里在其报告中叙

述了恩格斯宣读提案时大会上所出现的震惊的情况。^①“接着，顷刻之间鸦雀无声。这是一次政变。代表们面面相觑，谁将第一个打破这个沉寂呢。终于瓦扬站了起来。”他说，迄今为止，国际在其领导人的领导下，发展得非常顺利，为什么要调换这些领导人呢？总委员会的会址也应设在斗争第一线的附近，设在靠近法国和德国的地方。如果总委员会迁往大西洋彼岸，它的影响就会受到削弱。瓦扬坚决要求总委员会这些曾经把“国际变成使皇帝和国王望之生畏”的人物，在他们迄今为事业作出牺牲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作出牺牲。

代表大会先就总委员会的会址究竟应否迁移的问题进行表决。二十六名代表投票赞成，二十三名代表反对，九名代表弃权。然后三十一票赞成迁往纽约，十四票主张仍留在伦敦，各有一票主张迁往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

在代表大会讨论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之前，瓦扬就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必须建立工人政党和进行政治行动的决议作了说明。由于法国革命的遭遇，这个问题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吉约姆代表无政府主义代表团重弹无政府主义者的老调，抗议工人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开展政治行动。他说，“我们要求彻底消灭作为政权化身的国家”。龙格回答他说，要是1870年9月4日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梯也尔就无法夺权。决议以二十四票对四票通过，九名代表弃权。

这时，调查委员会提出关于它调查同盟活动的报告。调查委员会（四票对比利时成员一票）确认曾经存在过一个秘密的同

^① 这项提案也给资产阶级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派的《曼彻斯特卫报》在其评述代表大会（1872年9月7日）的报道中写道：“这太奇怪了，就象似乎是罗马教皇建议，要把红衣主教会议和全体教皇内阁搬出罗马一样。”转引自科兰斯同上引书，第264页。

盟，但是还不足以说明，这个秘密同盟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可以证明，巴枯宁企图在国际内部组织一个秘密的团体。此外，巴枯宁还被指控进行欺骗活动——历史研究工作证实这一指控是错误的。经调查委员会提议，巴枯宁和吉约姆被立即开除出国际。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万-赫德盖姆，化名瓦尔特打进法国国际会员中间，后来被揭露，是个法国警察局的密探；代表大会代表丹特雷格，又名斯瓦尔姆，也是如此。

10

海牙代表大会是第一国际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它确定了国际的结束。实际上，自从1869年以来，国际就处于分裂的过程。它在罗曼语区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联合会已决定拥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比利时和荷兰联合会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法国的运动遭到了破坏，代表法国联合会的多数巴黎公社流亡者是布朗基派。总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表决时所取得的胜利，暴露了它本身基础的不稳固。总委员会之所以取得胜利，基本上是靠它自己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员的十六票和德国人与布朗基派法国人的票数；甚至连英国代表团也投票反对它。如果意大利联合会不抵制这次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可能要被击败。

实际上，马克思主要只能指望德国、德语区瑞士和公社的 [195] 布朗基派流亡者，即使在德国也只能指望爱森纳赫派；拉萨尔派不属于国际，他们同情马克思的敌人。甚至英国也脱离了他——迄今，马克思在英国得到了先是反对蒲鲁东派后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强有力的支持。1871年秋伦敦代表会议闭幕后成立的英国联合会虽然没有顺从无政府主义，但它声明反对马克思主张的国际在组织上的集中制，甚至国际书记黑尔斯也

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了。^①

国际的危机说到底还是欧洲工人运动发展中的危机。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愈是壮大发展，它就愈感到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令人厌恶地妨碍着自己的自治权。马克思认为，国际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总的政党，总委员是它的首脑机关。但是，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把自己看成独立的政党，愿意自己发展自己的思想，确定自己的政策。

早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马克思就决定退出总委员会。在他致力于撰写《资本论》这部巨著的同时，国际又给他压上了大量繁重的工作。马克思为国际写了数不清的信件，起草它的备忘录、通知和宣言。如果不是疾病缠身，他从不缺席总委员会的夜间会议，并为每一个因国际的事情希望找他商谈的人效劳。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上提到，“除了继续长疖子以外，也是累得不可开交；例如昨夜我到清晨四点才上床……国际协会也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在另一封信中他抱怨说，国际“也就好象梦魇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此外，国际的头五年是他一生中郁郁寡欢的年头。他被疼痛的脓疮所折磨，并因缺钱的苦恼而感到烦闷。他著书立说并致力于国际的工作，这就使得他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自己的生计。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使人更难忍受的要求纠缠着我。”几个月后，他又写道：“当铺（我的妻子已当尽了一切，以致她几乎无法出门）使人想到的就是它要利息。所以我不得不在伦敦左借一点，右借一点来维持最必要的现金开支。另一方面，给我们供应东西的人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其中有几个已经声明停止赊售，并且以向法院起诉相威胁。”就这样，他给恩格斯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恩格斯没

^① 这一分歧的政治原因见科兰斯的详细调查报告，同上，第249页起一连几页。

有拒绝帮助马克思；在这方面也体现了他们俩之间的友谊，正如梅林所说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结合”。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①然而，马克思 [196] 不顾及自己。他希望只要能国际卓有成效地工作，就不想摆脱这个“梦魔”。

现在，马克思再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了。他对自己提出的最后任务，如他在上面提及的致库格曼的信中所写的那样，“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他认为布朗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些“腐败分子”。因为布朗基派与无政府主义者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他们对总委员会所抱的态度而已。布朗基派把总委员会看成为将来革命的中央机关，因此才投票支持扩大它的权力；除此以外，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都是盲动主义者，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这样，马克思就首先要求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因为它在伦敦必定会先落入布朗基派的手中——他们是逃到伦敦并由总委员会收留下来的被人颂扬为公社的英雄，以后可能就落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手中。马克思担心，国际在这两派人领导下可能变成一个密谋的盲动主义组织而遗臭万年。他认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是他最迫切的任务。但是，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能迁到什么地方去呢？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均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这几个地方的联合会都起来反对总委员会的权威；意大利更谈不上，因为意大利联合会同总委员会的关系已破裂；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奥地利，国际被宣布为“危害国家的组织”，受到刑法制裁。因此，只有纽约可能作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马克思也认为，他看到的美国工业正在开始迅速发展的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同上，第3卷，第304、357、332、435页。（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01、102、165、184、264、414、135页。——译者）

势，将创造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中心。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是有意把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以便着手解散国际。这种看法和他在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第一天在阿姆斯特丹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的庄严声明有矛盾。他提请人们注意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他说，“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他以这样的声明结束了讲话：“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①

[197] 但是，解散的趋势已无法避免。在对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进行表决之后，布朗基派代表立即退出海牙代表大会。“国际不能适应履行它的义务的要求。它逃避革命；它逃往大西洋彼岸”。他们这样申述自己脱离国际的理由。而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后一星期不到，即9月15日，无政府主义者就在瑞士的圣伊米尔召开一次对抗的代表大会，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其中有巴枯宁、吉约姆、科斯塔、马拉特斯塔和卡菲埃罗）。这次代表大会谴责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承认选出的总委员会，并声明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合法代表机构。它得到了比利时、荷兰和英国联合会的承认。英国联合会为此而分裂。

海牙选出的纽约总委员会把所有谴责海牙决议的联合会开

① 说明马克思对革命所持态度的这篇极为重要的演说，全文见迈耶尔同上引书，第1卷，第159页起一连几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80页。——译者）

除出去，并于1873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马克思确认这次代表大会“失败了”。总委员会甚至无法为唯一的一名代表筹集路费，而且在到达日内瓦的二十八名代表中，只有两名代表外国的党——一名未提到名字的爱森纳赫党的代表，以及奥地利党代表亨利希·奥伯温德；其余的就是瑞士人或定居在瑞士的德国人和法国人。F·A·左尔格只是勉强地以及出于对自己朋友马克思的忠诚，才接受了书记的职务，并且在第二年就辞职了。1876年7月在费城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几乎只有美国联合会的代表参加，它郑重宣布国际解散。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①

11

“反权威的国际”的瓦解过程持续的时间长一些。^② 这个国际在1873年9月初，即马克思主义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在日内瓦召开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被宣告为国际工人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是在海牙召开的）。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事实上多数联合会都声明支持它。与会者有英国代表（黑尔斯和埃卡留斯），西班牙、[198] 法国代表（其中有保尔·布鲁斯和巴黎公社社员L·J·潘迪），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代表（其中有安得列阿·科斯塔）以及罗曼语区瑞士的代表。甚至由于法律上的原因不能参加这个国际的

^① 报告见《国际工人协会——1876年7月15日费城代表会议的协商情况》（1876年纽约版）和施留特儿同上引书，第353页起一连几页。国际会员人数的情况见施留特儿著作中的1876年6月25日总委员会通知，第351、352页。此时，国际只有两个联合会：北美联合会、日内瓦州联合会；总委员会同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联系，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有松散的联系。

^② 有关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概述，见G·M·施特克洛夫：《第一国际史》（1928年伦敦版），第二部分。

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同它团结一致。大会给国际规定了一项新的“反权威的”章程，以局取代总委员会，这个局没有任何权力，只负责处理通信事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会费。

“反权威的”国际是一个“没有头”的松散组织，如同吉约姆要求的那样，没有领导，而且实际上也没有纲领。它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詹姆斯·吉约姆和西班牙及意大利联合会的作品，但是属于它领导的也有那些尽管对总委员会的权威造反，却并不投靠无政府主义的联合会。英国人，当然还有出席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弗罗梅和克尔施滕所代表的拉萨尔派，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同无政府主义疏远，转而接近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甚至支持巴枯宁同马克思发生冲突的吉约姆，虽然谴责政治-议会斗争的方法，但也谴责无政府主义搞武装起义和政治谋杀。他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可以用来组织生产的机构。吉约姆与其说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不如说是工团主义的先驱。

反权威的国际另外还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1874年）、伯尔尼（1876年）和韦尔维埃（1877年）。当时，它无疑还代表着国际工人运动。它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支部已成为群众性组织，它的比利时支部在艰苦斗争中发动了几千名工人。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起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也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国际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由尤利乌斯·瓦耳泰希任代表）。

但是，它好景不长。这个群龙无首的国际不能使加入这个组织的任何党派感到满意。比利时的党要求重新建立原来的国际。在荷兰人和法国人支持下，德·巴普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提议，召开“社会主义世界代表大会”，以讨论重建国际的问题。虽然无政府主义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会反对，但提案得到了

多数的支持。

翘首企待的比利时工人极其隆重地欢迎1877年9月9日在根特召开的社会主义世界代表大会。“至少有一万人的”游行队伍通过这座城市，对代表大会表示敬意。在代表大会闭幕式的公开会议上，可容纳一千八百人的巴那萨斯大厅和楼座“在规定的时间内以前就挤得透不过气来”。^①比利时工人把这次世界代表大会看成原来的国际的宣告者。 [199]

实际上，这是海牙代表大会以后第一次真正的国际性代表大会，一次有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丹麦、瑞士、匈牙利和希腊等国代表出席的集会，他们之中有李卜克内西、格雷利希、德·巴普、贝特兰、安塞尔、黑尔斯、弗兰克尔这一流的工人领袖，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科斯塔、布鲁斯、吉约姆和巴枯宁死后——一年前去世的——他们的精神首领克鲁泡特金。

但是，代表大会打算重新创建一个广泛的国际的想法，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方法的对立——而流产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签订一项“团结协定”，作为向重建广泛的国际迈出的第一步，这一协定要求首先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内战，并促使各派社会主义组织相互团结。可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是背叛自己的原则，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一提案。

但是就在当天的晚上，德国、丹麦、比利时、德语区瑞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被邀请参加——的代表集会，不顾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讨论了如何重新筹建原有国际的准备事宜。但会议结果，只是发表一项关于各国工人组织在其反对占有阶级统治的世界性斗争中，必须统一和相互加强物质与道义支持的庄严声明。

^① 摘自内政部档案，维也纳警察局1877年9月18日和19日的“每日动态”，见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334和338页。

这样，“反权威的”国际就分裂了。留下的躯壳主要是代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1881年它在伦敦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反权威国际的领导人——吉约姆·科斯塔、朗朗、韦里康、T·G·莫拉哥——一个人也没有参加。它是彼得·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莫斯特、波伊克特、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梅利诺、J·内维斯、L·B·戈尔登贝格以及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召开的。一家由法国警方密探控制的巴黎报纸《社会革命报》，为这次代表大会鼓噪一番。此外，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使间谍分子感到十分高兴的决议，该决议向各组织及其成员建议为革命事业学习和使用化学——用炸弹进行阶级斗争。继伦敦代表大会之后，无政府国际在巴黎(1889年)、芝加哥(1893年)、苏黎世(1896年)召开了代表会议，以及阿姆斯特丹(1907年)代表大会。但是，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早在伦敦代表大会后不久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些国家中的派别。无政府主义的精神遗产——用没有国家的联盟社会制度的方案以及用总[200]罢工和“直接行动”的方法，取代工人阶级政治行动——被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会运动的革命工团主义所继承。

在这期间，比利时社会主义政党继续致力于争取重建原有的国际。1880年夏，它发表“致新、旧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号召书，倡议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重新恢复国际工人协会的实际步骤”。当时已合并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欢迎这一倡议，两党在1881年10月在瑞士的库尔召开了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

但是，不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只有比利时、德国、法国、丹麦和美国代表参加。经过长时间讨论，代表大会也认识到，重建国际的时间还未到来。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说，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丹麦和美国的工人政党正处于建设的过程，其他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党，则受到本国政府的迫害。而一个生气蓬勃的国际需要富有生气、有活

动能力和组织健全的各国政党。

这些条件在八十年代中业已具备。八十年代是在欧洲和美国巩固原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十年。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第二国际，是建筑在由各国党组织起来的国际运动的牢固基础之上的。

在各国工人阶级创立国际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第一国际是一个阶段。第一国际制订了指导当时工人运动的原则，它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壮大发展，并提出了工人运动斗争的最终具体目标——从未有过的大胆的最终目标：人类在没有任何人奴役人和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下获得新生。第一国际把团结的思想移植到工人的意识中，并给各国工人运动留下了对伟大事业的热忱。第一国际是卡尔·马克思的杰作。

[201]

第三部分 第二国际

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

[203]

社会主义运动从它最初开始活动起，就常常被政治著作家比之为成为国教之前的早期教会阶段的基督教运动。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新的救世教义，把工人领袖看成新教义的使徒，把他们许下的诺言看成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正象教会史上头三个世纪中感动基督教徒的信心一样。

在这相似的历史条件下第二国际出现了，它是社会主义使徒时代的顶点，是思想还没有成为政治力量之前处于通告和传播阶段的时代的顶点。

第二国际时期，这种思想变成为群众运动。与以不稳定的个人会员组织为基础的第一国际不同，第二国际在成立后的几年内就建筑在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的基础上。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开始了作为群众运动的社会主义史。

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进入社会主义群众的意识之中。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思想流派。即使在清除了无政府主义以后，也还形成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工联主义这些强大的逆流。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党在纲领上都拥护马克思主义，它们的原则声明都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他的历史哲学观、经济学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依据。

因此，第二国际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个革命的国际。它的各党不仅在纲领上以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变革为目标，而且把革命这个“历史的助产婆”看成是它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阶级统治，求得解放的斗争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

第二国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得以实现的观点。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91年——国际重建两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说：“我坚信，我坚信，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期不远了，这个大厅里只有少数人才会看不到这个日子。”^①正是这种胜利信心，罕见地激励着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

但是，这种乐观主义本身包含着国际的悲剧的萌芽。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国际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人数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工会会员人数，在1914年世界大战的前夜已达到几十万，在某些国家的议会选举中，他们得到的选票已有几百万张。不幸的是，运动这样迅猛发展，使得它的拥护者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作出了不切合实际力量对比的过高估计。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思想只掌握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着的是压倒多数的敌人。他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保守传统势力，过高地估计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思想和革命觉悟的力量。他们以为，国际有力量足以制止日益逼近的大国战争，并期待社会民主党对战争进行革命的抵制。这一期待的落空使人们深感失望，第二国际也因之而瓦解。

1

这种承担历史使命的乐观主义，早在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基调中就可以听出来。^②

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即攻占巴士

^① 《1891年爱尔福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协商记录》（1891年柏林版），第172页。

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会场“贝德尔大厅”里饰以红布，插上红旗，主席台上横挂着金光闪闪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席台前面的一条标语表明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目标：“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生产资料社会化！”代表大会的东道主是法国工人党、布朗基派革命中央委员会和法国工会最高组织机构——法国工团全国联合会。以那种激励自己的精神为标志，法国党在主席台旁边的牌子上写了一条标语，向大会表示祝贺：“以1848年6月和1871年3、4、5月的巴黎的名义，以巴贝夫、布朗基和瓦尔兰的法国的名义，向两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致敬。”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带着一只用不易凋萎的花卉编扎成的大花圈，由十六个人抬着，列队去拉雪兹神甫公墓瞻仰公社战士群葬墓地和布朗基的陵墓，以表示对社会革命先驱的敬仰；德国代表还瞻仰了亨利希·海涅和路德维希·白尔尼的陵墓——李卜克内西在墓前发表的一篇讲话称他们是“自由与世界主义的英烈”。保尔·拉法格以巴黎组织的名义欢迎作为“新思想使徒”的代表们。同威廉·李卜克内西一起被选为第一天大会执行主席的爱德华·瓦扬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是“各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李卜克内西说它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次世界工人议会”，是为了缔结一项“国际无产阶级神圣的同盟协定”而召开的。

② 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历史及其协商情况，见《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附有威廉·李卜克内西撰写的前言（1890年纽伦堡版）；维克多·阿德勒：《新国际的成立》，载于《演说和论文集》，由古斯塔夫·波拉切克出版（1929年维也纳版），第8卷，第58—64页；古斯塔夫·迈耶尔：《恩格斯传》（1933年柏林版），第2卷，第391—396页；G·D·H·科尔：《1889至1914年的第二国际》，载于《社会主义思想史》（1956年伦敦版）第3卷，第1—11页。又见莱奥·瓦利亚尼：《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1872—1889）》，载于作者所著的《社会主义历史问题》一书（1958年罗马版）。

但是，同代表大会开幕时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演说相比，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历史却是平淡无奇得多。1877年根特代表大会和1881年库尔代表大会重建广泛的原有国际的努力失败之后，^①保尔·布鲁斯领导的法国可能派党1883年和1886年在巴黎组织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党是由1880年创建的社会工人党联盟分裂出来的——社会工人党联盟的纲领在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的影响下拥护马克思主义。和盖得派相反，可能派党主张进化的社会主义思想，即一种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的“可能的政策”(possibilité)。

同可能派激烈争吵的盖得派没有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英国工联最高组织机构，它的领导人同自由党搞联合——派代表参加了两次代表大会。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决定，自己在1888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不过，参加大会的代表条件基本上仅限于工会。因此，象[207]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英国的两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都不能参加。出席代表大会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是代表他们国家的工会，而不是代表他们的党。代表大会决定第二年在巴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并委托可能派负责召开。

但是，英国工联领袖建议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犹如伦敦代表大会一样，主要是计划作为一次没有政党参加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可能派却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象邀请工会一样，都发出了请帖。于是，盖得派同可能派唱起对台戏来，自己也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为了避免演出一场两个同时召开、相互争斗的工人代表大会的闹剧，德国党试图使可能派和盖得派在代表大会问题上相互取得谅解。1889年2月底，它在海牙召开一

^① 见原书第198—200页。

次国际代表会议，邀请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两翼参加。可能派仍然没有出席。这时，海牙代表会议决定，以它的名义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把两个代表大会的合并问题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头一条。

这样，1889年7月14日就在巴黎召开了两个代表大会——可能派代表大会在兰斯雷街，马克思主义代表大会在贝德尔街。虽然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人数多于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可能派代表会有六百多人，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会有近四百人），但可能派代表大会只是昙花一现；它是可能派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贝德尔街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结果就是第二国际的成立。

还应简单地提一下，贝德尔街代表大会实际上在它开幕后就进行了关于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辩论。辩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的头两天时间。代表大会在一项由李卜克内西提议的决议中声明，表示愿意促进两个代表大会取得谅解和合并，并委托安得列阿·科斯塔和阿米尔卡雷·契普里昂尼负责谈判。但是，可能派坚持要求重新审查代表资格，正如科斯塔所说，这是坚持采取“一种不信任的行动”。谈判因此失败。

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团结了“两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代表。法国代表团阵营当然是最强大的；它有二百二十一名团员，其中有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布朗基主义者爱德华·瓦扬，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得、沙尔·龙格和保尔·拉法格（后两人是马克思的女婿）和一名无政府主义代表塞巴斯蒂昂·福尔。

尽管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还是派了八十一名代表出席，其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德国工会运动建筑师卡尔·列金、爱德华·伯恩斯坦、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赫尔曼·[208]莫尔肯布尔、克拉拉·蔡特金和威廉·普凡库赫。德国代表是由

工人选举产生的——部分是在一百二十五个公开集会上选出的，或者，在群众集会一直遭到警察镇压的地方通过工厂和车间选出的。如福尔马尔所说，参加选举的人数不亚于帝国国会选举。

第二个阵容最强大的代表团是英国代表团，有二十二名团员。代表团的领导是英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如苏格兰工人党创始人、五万六千名苏格兰矿工的代表凯尔·哈第，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英国有威望的诗人和艺术家威廉·莫利斯；斯图亚特王室蒙蒂特伯爵的曾孙、第一个进入英国议会的社会主义者R·B·肯宁安-格莱安，马克思的女儿、伦敦东头受人欢迎的演说家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革命工联领袖约翰·白恩士——不过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加入自由党并当了大臣，第一个工人出身的大臣、英国政府的成员。只有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H·M·海德门缺席，他是威廉·莫利斯的敌手，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去了。

比利时有十四名代表出席，其中有第一国际伟大人物之一的塞扎尔·德·巴普老人，比利时合作社运动建筑师爱德华·安塞尔，以及党的组织者让·沃耳德斯。意大利代表十二人，其中有前文业已提及的第一国际人物安得列阿·科斯塔和阿米尔卡雷·契普里昂尼，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萨韦里奥·梅利诺。奥地利有一个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八人代表团出席。

此外，还有由下列国家工人运动派出的小型代表团：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瑞士、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和阿根廷。^③某些代表团，如阿根廷代表团只代表社会主义小组，或者如俄国和波兰的代表团只代表在国外的社会主义流亡者小组。美国代表团的五名团员中只有一人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另一人代表衣阿华州的“联合兄弟会”，三人代表纽约犹太工会。不论如何，代表大会也收到

了一封由赛米尔·龚帕斯签署的美国工运最高组织机构——美国劳工联合会声明支持的贺信。

这次代表大会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人物聚会一堂。除了已提到的几位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人物以外，代表中还有如俄国社会主义两派的杰出理论家 G·V·普列汉诺夫和彼得·拉甫罗夫、在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者领袖费利克斯·达申斯基、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创始人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荷兰社会主义重要人物多梅拉·纽文胡斯和荷兰社会党建筑师威廉·许伯特·弗利根等一流的人物。 [209]

提交给代表大会讨论的实质性会议议程是关于国际劳工保护的问题。但在代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代表们汇报了他们国家的工人运动、艰难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斗争情况。这些报告非常有意义地反映了重建国际时刻世界工人运动力量的概貌。

2

当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德国党，而且直至第二国际结束它始终保持着这一地位。在1875年召开的哥达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两翼——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实现了合并。但是，三年之后就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俾斯麦为了消灭这个党而想出来的主意。他带来的灾难确实不小。在非常法统治的十二年中，有三百三十二个工人组织被解散，一千三百种报刊和小册子被查禁，大约有九百名党的骨干被逐出家门，一千五百人总共被判处一千年徒刑。^① 尽管遭到这一切迫害，但党的发展壮大速度之快反而更令人瞩目。在颁布反社会

^① 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2部分，第535页。

党人非常法之后的1881年第一次帝国国会大选中，党获得三十一万张选票，三年后再次选举，它获得五十五万张选票，1887年大选已拥有七十六万三千张选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取消后的1890年大选，票数几乎又翻了一番——党掌握了一百四十二万七千张选票，约占总选票的五分之一，三十五名社会党人进入了帝国国会。当时党也掌握了十九家日报和四十一家周刊。工会会员有十二万人。

3

英国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大大超过德国。凯尔·哈第向代表大会报告，他的国家的一千万产业工人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加入了工会。但是，英国工联不拥护社会主义。大多数工联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有害的学说。他们相信“阶级利益的和谐”。尽管他们在争取现代工会法的斗争中也力求在议会中取得影响。工联代表大会在1881年还设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和促
[210] 使工人代表选进议会。但是，他们同自由党联合进行竞选，工人议员——1886年大选产生的十一名议员和1892年大选产生的十五名议员——在自由党议会代表内部组成一个小组。只有哈第、白恩士和肯宁安·格莱安坚持自己的独立的工人代表地位。

但是事实证明，工联同自由党结成联盟，是不适宜于保护工人免受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英国遭到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损害的。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在群众集会上、街头游行和反饥饿示威中闹事。他们的激动情绪也传染给工厂里的工人和矿工，因为企业主企图降低他们的工资。凯尔·哈第、约翰·白恩士和其他工联领袖宣传解散同自由党结成的联盟，主张组织一个摆脱自由党的资本主义利益桎梏和代表工人阶级事业的独立工

党。工人内部的这一思潮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在 H·M·海德门的倡议下,这些知识分子在 1881 年组织成民主联盟。^①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1)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著名的演说家。优越的生活条件——他祖父在西印度群岛贩卖奴隶而发了大财——使他完全不必为生计烦恼,而献身于自己爱好的智育和社会活动。1879年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这部著作就象启示录一样对他产生了影响。他还通过经常同马克思交谈,悉心钻研社会主义思想。民主联盟成立的那一年,他发表了《大家的英国》一书,这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用于英国的通俗读物。两年后,他又发表《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这是一部探讨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内容广泛的作品。民主联盟成立时,浮现在他脑海中的目标,是首先恢复厄内斯特·琼斯和朱利安·哈尼式的宪章运动。但在三年之后,联盟就选择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

社会民主联盟最初是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英国社会主义史上最富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著名的乌托邦著作《无出处新闻》的作者威廉·莫利斯(1834—1896),这本书是英国社会主义文献的经典著作,也被译成德文,广为流传;学者和作家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少将的儿子亨利·H·秦平,他象父亲一样也是 [211] 英国军官,因抗议英国对埃及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离开了军队;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1874年运动分裂后移居英国的安得列阿斯·肖伊;上层贵族的伊顿公学教师、把海尔维格

^① 关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见贝尔同上引书,第3部分,第3、4、5章;G·D·H·科尔:《1889至1927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1932年伦敦版),第2卷,第8、9章;亨利·佩林:《工党的起源(1880—1900)》(1954年伦敦版)。

和弗莱里格拉特的作品译成英文的诗人J·L·乔因斯；沃尔特·克兰，他的木刻象征着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长达几代人之久地装饰着各国工人的纪念文集；后来移居印度并作为一名伟大人物而载入印度自由斗争史册的安娜·贝赞特；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工联领袖约翰·白恩士、本·提列特、汤姆·曼，以及青年时代当过放牛娃、成年时打过短工、后来任工联书记、最后是《正义报》编辑的哈利·奎尔奇。

《正义报》是英国第一家现代社会主义期刊，它的副标题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于1884年1月开始发行，是联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该刊的创办资金——三百英镑（六千金马克）——是社会主义作家爱德华·卡本特尔捐献的。由海德门和奎尔奇先后任主编。威廉·莫利斯、贝尔福特·巴克斯和安得列阿斯·肖伊撰稿。联盟发表政治性小册子——例如散发数量达万份的《社会主义浅说》。联盟的盟员天天晚上在街头巷尾和小型集会[212]上发表演讲。联盟的追随者日益增多，1887年它有三十个分会，主要在伦敦和纺织区郎卡郡，但它始终未成为群众性组织^①。

几年之后，联盟也分裂了。它过去联合的各派社会主义者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反议会政治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对联盟的宣传策略发生了意见分歧，反议会政治和无政府主义派在1884年分离出去，并在威廉·莫利斯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同盟，一年后创办了《公益》周刊，恩格斯有时也为它撰写文章。不过同盟也未能争取到大批支持者。当无政府主义者篡夺了同盟的领导权时，威廉·莫利斯就与社会民主派盟员在1890年一起退出同盟，他们重新靠拢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盟不久即告解散。

1884年初，第三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小组创办了费边社

^① 1884年盟员的数字达四百人，但在它成立后的十年中从未达到一千人；见佩林同上引书，第47页。

(Fabian Society), 这个小组成员中有殖民部官员悉尼·韦伯和戏剧家肖伯纳, 小说家 G·H·威尔斯^① 不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费边社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 “说服英国人民对他们的政体彻底进行民主化和工业国有化, 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完全不依赖于私人资本”。费边社的纲领更加清楚地阐述了这个目标。纲领说: “它的宗旨是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制下解放出来, 并将它们转为整个公团所有。”

费边社的社员不仅面向工人阶级, 而且也面向人民中的所有阶级, 努力“使社会了解现有的弊端, 以唤起社会的良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仿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模式, 撰写和传播文章; 他们说, 《资本论》“有大量经过详细审查核实的关于现代文明的事实”。这些著名的《费边论丛》及其传单印数达几万份, 并广为传播。它们就象肖伯纳的社会评论戏剧和 H·G·威尔斯的社会小说一样, 在不小程度上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了英国的道德和精神领域。

虽然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体没有一个能够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它们的宣传工作还是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随着八十年代末经济危机的克服, 这种斗志又重新高涨起来了。失业后备军大大减少, 不熟练工人大批涌入工会, 争取建立一个独立工党的运动方兴未艾。1887年初, 凯尔·哈第创办了《矿工》杂志, 两年后改名为在社会主义报刊文献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213] 的《工人领袖》, 1888年, H. 秦平的刊物《工人选民》和安娜·贝赞特的《链环》出版——这些工人刊物最激烈地反对旧工联领导, 要求解散它同自由党的联盟, 建立一个独立的工党。

没有一位工人领袖比凯尔·哈第更清楚地理解和更坚定地主张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必要性了。他被作为工人阶

^① 原文疑有误, 似应为 H·G·威尔斯(Wells, Herbert George)。下同。
——译者

级的先驱而载入英国社会主义史册。他是一位在某些特点方面可以使人想起奥古斯特·倍倍尔^①的神奇人物。

凯尔·哈第(1856—1915)来自苏格兰无产阶级的底层。他是造船木匠的儿子。由于父亲因工伤而失去劳动力,他不得不在八岁那年就去当跑腿的童仆,挣钱糊口度日。一段时间里,这孩子的劳动所得——一星期四先令六便士(四个半马克)——是父母亲 and 两个小孩这一家人的唯一收入。他进不起学校,靠母亲在夜间教他读书写字。十岁时,他就开始了矿工的生涯——起初在煤矿上“看通风口”,即开关调节井下空气的通风口。白天他要独自在地下深处凄怆的寂寞中工作十小时,只有跳动的矿灯偶而微弱地照亮一下这黑暗的深渊。由于母亲的勉励,他以非凡的聪慧通过自学获得了丰富的文学知识。苏格兰自由作家和穷苦人的诗人罗伯特·彭斯和卡莱尔的社会评论著作,以及古犹太先知的登山宝训——他们对社会不公正行为的愤怒呐喊——是他了解社会主义的源泉。他不是约翰·白恩士那样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家,他不习惯于鼓动人。他道德上严肃,说话坦率,他的讲话为他赢得了苏格兰矿工的心。1879年他还不满二十三岁,就被选为苏格兰矿工工联书记。1889年1月,他建立苏格兰工人党——独立工党(I. L. P.)的前身,这是英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

1889年实际上是标志着英国工运政治形势发展的转折点。这一年,伦敦码头工人进行了大罢工。它的导火线来自伦敦东头的煤气工人。这一年年初,煤气工人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只是凭着坚决的斗争态度,就将十二小时工作日一举缩短为八小时。这一战果激励了收入微薄的伦敦码头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要求被拒绝了,工人们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有上万名在

^① 他的传略见威廉·斯图亚特:《J·凯尔·哈第》德译本(1948年苏黎世版)。

约翰·白恩士、本·提列特和汤姆·曼的领导下于1889年8月举行罢工。罢工持续了五个星期，有力地表现了工人的团结精神。没有出现罢工的破坏者。居民也同情罢工的工人，公开捐募了 [214] 近五万英镑（一百万金马克）支持罢工。红衣主教曼宁居间斡旋进行谈判。最后，谈判以几乎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要求而结束。

非熟练工进行的这两次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英国工联运动。如同恩格斯指出，东头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藪”已不再是“死水潭”了；它“抖掉了绝望的冷漠”。^① 这里就成为一种新型工联，即非熟练工工会的诞生地。国际在巴黎集会的那年，大约有三十万名工人加入了工联，后来的两年中，又有五十万人加入。工联强力争取得到了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矿工工会增加工资三分之一以上，其他企业部门平均增加百分之十，而同一时期，生活费用上涨不到百分之四。

1889这一年，工联运动的领导权不小程度上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里，如凯尔·哈第、约翰·白恩士、本·提列特、汤姆·曼这些人。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有阶级觉悟的、不受制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自己政策的工人党。1893年1月13日，在凯尔·哈第主持下召开的布雷德福会议上，这个党诞生了。它称自己为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ei—I. L. P.）并在其纲领中声明，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制是它的目标。这个党迅速地壮大起来，据哈第在它成立两年后的报告中说，党员已达五万多人。^②

随着独立工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也在工人群众中得到了传播。但是，它不象在欧洲大陆各国那样，以相

① 迈耶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40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4页。——译者）

② 佩林同上引书，第173页。

互争夺的理论学派的形式出现。英国人民的禀性和传统对无政府主义是陌生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英国社会主义者只接受了关于以社会掌握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思想。诚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鼓舞了工人运动中的某些知识分子领袖,如海德门及其一帮人,但它在英国始终未成为世界观的源泉。通过独立工党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基督教伦理学和英国激进主义政治传统吸取它精神上的正确性的。

4

[215] 可是,在社会主义摇篮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分裂成各种相互争夺的学说。当法国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社遭难后重新复苏时,社会主义者领导人就考虑究竟应在哪一种理论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1879年,政府对遭到迫害的公社成员颁布特赦令,同年10月,在马赛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茹尔·盖得是发起人,党的领导权也由他掌握。^①

茹尔·盖得(1845—1922)从青年时期起就开始了他那作为激进共和派记者的生涯。经历了公社之役后,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由于写了一篇歌颂公社的文章,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当即逃往瑞士,从瑞士移居意大利,于1876年返回法国。一年后,他办了法国第一家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周刊《平等报》,李卜克内西和塞扎尔·德·巴普也为该刊撰写文章。茹尔·盖得在《平

^① 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史,见亚历山大·泽瓦埃斯:《1871年以来的法国社会主义》(1908年巴黎版);另外,见爱德华·多莱昂:《法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1939年巴黎版),第13页起一连几页;阿伦·诺兰:《法国社会党的成立》(1956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版),前言第1—33页;瓦尔·R·洛温:《法国工人运动》(1954年哈佛版),第2章和第3章。

等报》上宣传的思想，是仿效他所欣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在法国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他主持的马赛代表大会事实上宣告了同资产阶级的决裂，拥护“土地、矿山、劳动工具和原料公有制”。代表大会闭幕后，他前往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起草党章和党纲。由他和保尔·拉法格共同起草的这两份文件，被提交给1880年在巴黎召开的下一次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①

可是，在一年后召开的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党就第一次出现了分裂。这个党除联合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也联合了普鲁东的信徒，他们是摒弃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行动理论的合作社会主义者，另外，还联合了虽然象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主张阶级斗争，但却反对议会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两派起来造反，对抗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与党分手。

由保尔·布鲁斯(1854—1912)领导的党内第三种派别，同盖得所宣布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相对立，主张进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医学博士布鲁斯在公社失败后逃往瑞士，在那里碰上了巴枯宁，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派汝拉联合会工作。特赦令颁布后他返回法国，当时他已变成了改良主义者。虽然同盖得和拉法格为伍，但却在他的期刊《无产者报》上宣传市政社会主义思想，即通过市、省管理机构，而不是象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那样通过国家实行工业公有化。他还主张实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的政策——不论是结成选举联盟，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义者当选，还是参加各种代表机构，以贯彻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

在188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由于这个理论和策略问题，使

^① 盖得的传略，见亚历山大·泽瓦埃斯：《茹尔·盖得》（1929年巴黎版）和由乔治·布尔甘将其节译成德文的《茹尔·盖得》，《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第14年度（1929年）。

党发生了分裂。被称之为布鲁斯信徒的可能派占了多数，他们虽然都反对革命，但还在他们所篡夺的党的原有名称上冠以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称号。盖得和他的支持者组成法国工人党，这个党同加入工团全国联合会的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

法国工会运动直到1884年工会合法化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在此以前，根据法国革命国民议会颁布的、通过拿破仑法典变得更加严厉的1790年法令规定，^①成立工会要受到刑事制裁，工会只能伪装成疾病保险和社交性协会或以合作社名义组织起来。盖得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中诉说道：“我们的资产阶级，即所有资产阶级中最最肆无忌惮的和最最残忍的资产阶级——我们想起了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对工人的屠杀——把法国无产阶级打得稀烂，碾为粉末，通过镇压工会运动和禁止结社自由，使他们不致于采取任何共同行动。”^②

对工会禁令的取消，促进了工会运动的发展，从而导致它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即1886年在里昂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工团全国联合会。但是，在工会内部，两派争夺领导权：一派是反对议会政治的，主张以“直接行动”的政策，即总罢工的政策作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另一派是普鲁东思想占统治地位，他们不仅谴责总罢工，同时也谴责政治斗争的方法。不久，两派就同工人党发生公开冲突，工人党在纲领上赞同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反对不切实际的斗争方法，即总罢工。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这些矛盾而继续分裂下去。不到几年，工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政党。

这一期间，可能派的党也出现了分裂。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流放地的公社社员让·阿列曼，在回到法国后加入布鲁斯的行列，但不久之后，就在同资产阶级党派联盟的问题上同布鲁斯

^① 见原书第41页。

^② 《会议记录》，同上，第38页。

发生了冲突。让·阿列曼也承认总罢工是工人解放斗争的武器。1890年,他和他的支持者从可能派中分裂出来,建立工人社会革命党(此后,可能派把自己名称中的“革命”两字拿掉了)。

还应该提一笔,颁布特赦令后不久,在公社悲剧中扮演主角的布朗基派就在瓦扬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在社会革命党内。反动派无法将布朗基主义、巴贝夫思想和大革命传统斩草除根。布朗基派在巴黎和某些外省的中心区还有一大批追随者,他们靠拢工人党,但直到1905年才同工人党合并。

就这样,在重建国际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六个争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派别:布鲁斯派、盖得派、布朗基派、阿列曼派、工团派和无政府主义派。

但是,尽管法国工人运动这样支离破碎,它还是迅速地扩大着它的影响。社会主义选票从建党后第一次大选的三万张增加到1889年第二次大选的十七万九千张,1893年大选中再增加到四十四万张。

5

比利时工人运动象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一样,在其发 [218]展的第一阶段也经历了四分五裂的过程,不过它比法国工运较快地克服了分裂。第一国际结束后不久,比利时联合会——它在塞扎尔·德·巴普领导下在第一国际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支部,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瓦隆人和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佛来米人之间发生理论争吵的过程中分裂了。1877年出现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爱德华·安塞尔和E·旺·贝弗朗组织的“社会党”,以及瓦隆人的“布拉邦特社会党”。随着1885年4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工人党(比利时社会党)成立代表大会上两党的合并,比利时的社会主义分裂基本上得到

了克服。

不过,党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方法上所存在的对立观点,再一次损害了它的团结。由瓦隆社会主义者领导人阿尔弗勒德·德菲伊索写的一本小册子《人民教义问答手册》——这是一篇争取工人选举权的热情洋溢的战斗檄文,它流传之广令人惊异,售出不下二十六万册——于1886年在沙勒罗瓦煤矿区燃起了声势浩大的自发性罢工运动的熊熊烈火,迅速经列日传到博里纳日。政府出动警察和军队镇压罢工者。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描写罢工地区的情景道^①:“一连几天,埃诺省一片真正战争的景象。城市宣布戒严,市政厅被军队占领,士兵在厂房和矿山前的广场上临时扎营,骑兵队在街上巡逻。军队的炮火……恐怖结束了工人人们的反抗。”总罢工被镇压后,罢工领导人受到审讯,有的被判处二十年重刑。安塞尔也因号召士兵们的母亲恳求她们的孩子别向工人开枪而被判六个月徒刑。

罢工失败引起的绝望和对政府进行迫害的愤怒,再次激起了党内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派的斗争。在阿尔弗勒德·德菲伊索的兄弟和儿子(莱昂和乔治)领导下,1887年成立了一个自称为“共和派社会党”的反对党。它立即大肆宣传总罢工和工人阶级革命起义。但是,1888年底爆发的这次群众罢工也不得不毫无结果地中断了。这次的失败为在1889年卢万代表大会上两派重新合并开辟了道路。关于以总罢工作为斗争方法的意见争吵,在1892年4月那慕尔党代表大会上,由于通过了关于承认以总罢工作为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武器的决议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219] 事实上,过了不到几个星期,党就在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中号召进行总罢工。数十万工人响应总罢工的号召,国家武装

^① H·皮雷纳:《比利时史》(1932年布鲁塞尔版),第7卷,第305页,路易·贝特兰:《1830年以来比利时民主社会主义史》(1906年布鲁塞尔版)。

力量同罢工者又一次发生流血冲突。

总罢工于5月1日开始，直到5月11日议会决定召开制宪会议讨论选举法改革才结束。

但是在选举制宪会议时，天主教政党获得了多数，而这个党却反对平等选举权的要求。因此，1893年4月党宣布举行第二次总罢工。这次总罢工从4月11日延续至4月18日，结果以妥协而告终。选举法改革虽然使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了九倍，但是它同时又给指定的几种人以选举众议院的双重投票选举权，而不改变选举参议院的等级选举制。

在1894年10月第一次实行新选举法的大选中，党获得了三十五万五千张选票和二十八个议席——当选者中有爱德华·安塞尔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但是，在当时的双重投票选举权的规定下，党不能指望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争取平等选举权的斗争在继续。1901年列日党代表大会声明，要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一切手段，“必要时也举行总罢工和街头骚动”。1902年4月，党再次号召举行总罢工。这并不是比利时工运史上的最后一次。十一年后，党在争取平等选举权的斗争中重新宣布总罢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罢工才成为规律。^①

比利时工人党在其组织方面有别于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它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不是以地方组织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组织，而是一个由工会，消费生产合作社，工人疾病保险机关，各种形式的教育、大学生和社会主义协会组成的联盟。合作社是它的经费基础。继1880年由安塞尔在根特创办了著名的《前进报》之后，这种合作社在全国迅速得到传播，如同让·沃耳德斯向国际代表大会报告所说的，合作社将一定数额的盈余用于社会主义报刊建设和党的文化机构。沃耳德斯称赞比利时党是“整个

① 见原书第298—299页。

欧洲组织得最好的政党之一”。①

[220]

6

比利时工人党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及其街头示威游行和举行政治总罢工的斗争方法，在奥地利工人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强烈要求党的领导“说比利时话”。在集会上反复响彻着这样的歌声，

“权利要到大街上去争取，
我们比利时人学会了这一点。”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系由“温和派”和“激进派”在1888年底、1889年初的加因斐党代表大会上合并组成，比国际召开代表大会早半年时间。这次党代表大会结束了早在六十年代末即已开始大有希望的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内部激烈争吵。1869年12月，上万名维也纳工人在议会大厦前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给予组织工会的结社权。在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压力下，政府颁布了一项有关组织工会的权利的法律；可是在同时，它却加紧了对“争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镇压。“争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示威游行后十天被捕，他们之中有安得列阿斯·肖伊、亨利希·奥伯温德、约翰·莫斯特。半年后，他们以叛国罪被递
[221] 交法庭受审，判以重刑。几乎所有工人协会包括工会被迫解散。虽然不久后警方慑于工人重新上街举行示威游行的威力，同意重建工人协会和工会，将工人领袖赦免出狱。但工人运动及其

① 见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比利时工人党的内部组织》，载于《新时代》第18年度（1899—1900年）及路易·德·布鲁凯尔和亨利·德·曼：《比利时工人运动》，《新时代》第14年度（1910—1911年）第9期增刊。

报刊仍处于警察的淫威之下。

年轻的奥地利工运从创立伊始就以德国工运为榜样，认为自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争执也影响到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亨利希·奥伯温德(1846—1914)和安得列阿斯·肖伊(1844—1927)便是两派的代表。奥伯温德是拉萨尔派，他代表这样一种思想：在工业落后的奥地利，只有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强大的工人运动；因此，工人阶级应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暂时与资产阶级进步力量结成联盟，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他的追随者自称为“温和派”。肖伊是马克思派，主张以同资产阶级和贵族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广泛目标。他的信徒自称为“激进派”。

原则上的和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变成了个人之间的势不两立——历来如此，到处如此。1874年，肖伊离党回英国，奥伯温德重返德国。在英国，肖伊先后在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中工作，直至高龄去世始终忠于他青年时期的理想。而奥伯温德在德国却变得多少有异于自己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他先是加入普鲁士宫廷牧师施特克尔的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主持该党的党报；后来，他成了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创建的沙文主义“海军联合会”的先锋；最后当上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祖国联合会”最高组织“全国委员会”受欢迎的演讲人。^①

肖伊出走后，激进派的领导权落入了约瑟夫·波伊克特(1855—1910)之手，他是奥地利工运史上令人憎恨的人物，被他

^① 这一时期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史见安得列阿斯·肖伊：《回忆》，载于《维也纳叛国案》(1911年维也纳版)；安得列阿斯·肖伊：《叛逆的萌芽》(1923年维也纳版)；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200页。亨利希·奥伯温德的生平见《德累斯顿通讯者纪念文集》(1930年德累斯顿版)。梅林声称，有人揭发奥伯温德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在巴黎给德国政府当过密探，同上引书，第2版(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300页。

的信徒们“推崇、赞誉”为高大无比的天才，而两年之后，又被谴责成警方密探。^①此人原是装饰画家，生于波希米亚，通过自学
[222] 获得广博知识。在他流动卖艺的岁月里，来到瑞士和法国，与革命小组有了接触。1880年他被法国驱逐，迁居英国，这时他同莫斯特结为至交。

约翰·莫斯特(1846—1907)是奥地利工运领导人之一，1870年7月因叛国罪受审，被判五年监禁。服刑数月后，因政府更迭，他与他的同志被宽大释放，逐出奥地利。他回到家乡德国——他生于奥格斯堡，父亲是个贫穷的小军官。莫斯特在德国以工运领袖之一的身份从事工运七年，1874年和1877年两次被选为帝国国会议员。由于他发表了一篇有关巴黎公社的演说，1874年被判刑一年半。刑满后获释，他在群众集会上被称颂为英雄，当上了社会民主党党报《柏林自由新闻》的主编，从此，正如他的朋友爱德华·伯恩斯坦所说，他“在群众中声望极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他立即被赶出柏林，来到伦敦。1879年，他在伦敦同原来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合作，创办了计划秘密运往德国散发的《自由》周报。

莫斯特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新闻记者和言词动人的演说家，然而他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天才”——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称呼他，一个以“德国革命精神的拯救者”自居、自以为肩负救世使命的热情的革命家。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力图通过他的周报组织起一支力量，反对党的领导及其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面前的谨小慎微和畏畏缩缩。在与党的领导的争论中，他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例如，他称颂毫无意义的行刺老皇帝威廉一世，

^① 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3卷，第229页。波伊克特试图澄清这一嫌疑，见约瑟夫·波伊克特：《一个无产者对革命工运的回忆》（1913年柏林版），古斯塔夫·朗道尔出版，以及维克多·阿德勒：《波伊克特对斗争的回忆》，载于《斗争》，第7年度，第302页起一连几页。

致使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了求之不得的借口。在因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改在国外（瑞士的维登）秘密召开的1880年党代表大会上，莫斯特被开除出党。他领导的原意作为党的激进派在国外的喉舌的《自由》周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刊物。^①

尚需一提的是，莫斯特曾在《自由》周报上撰文为1881年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辩护，并建议对“从圣彼得堡至华盛顿”的国家元首都可采取类似行动，为此，他被伦敦陪审法庭判处十八个月徒刑，出狱后被逐出英国，移居到美国。在1882年12月纽约举行的一次欢迎他的群众集会上，人们欢声雷动，称赞他是“资产阶级司法的受害者”，接着他在美国作了一次鼓动旅行，从1883年初起走遍了美国各重要城市，有如一次凯旋之行。在莫斯特和由他重新出版的《自由》周报周围，集结着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裂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1886年5月的芝加哥悲剧——有人向企图驱散示威游行队伍的警察部队投掷了一枚炸弹，因而有四名无政府主义领袖被绞死——宣告了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莫斯特政治生涯的结束。^② [223]

波伊克特在伦敦成了莫斯特最亲密的战友，1881年回到奥地利时，激进派把他当作“真正的革命者”，给予热烈的欢迎。波

^① 见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幼年时期》（1928年柏林版），第14、15和20章。

^② 莫斯特生平见无政府主义作家R·罗克所著《造反者约翰·莫斯特的一生》（1924年柏林版）。关于芝加哥悲剧见希尔奎特同上引书，第235—245页；该事件是赤裸裸的阶级司法铸成的悲剧。被告均系无政府主义《工人报》编辑部成员，其中有德国人奥古斯特·施皮斯、阿道夫·费舍、格奥尔格·恩格尔、米夏埃尔·施瓦布、路易·林格，美国人艾伯特·R·帕森斯和英国人塞缪尔·菲尔登，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犯罪，但都“因以言论和文章煽动进行谋杀”罪被判绞刑。施瓦布和菲尔登后减刑为无期徒刑，林格口含雷管引爆自杀死于牢房，其余被告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时候到了，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将比公开的演说更为意味深长，”施皮斯在绞索套进脖子的时候这样说。帕森斯未被捕，后自动投案。

伊克特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呕心沥血地写了大量传单。可是，这种“积极宣传”却带来了可怕的后果。1882年7月，他的追随者们行劫杀害了一鞋厂主；1883年12月枪杀了两名警官，1884年1月又谋杀了一家兑换所老板，把兑换所洗劫一空。凶犯都被捕并处以绞刑，数不清的工人因藏有波伊克特的传单而被判重刑。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工业区宣布紧急状态。据维克多·阿德勒叙述，就在同一天晚上，“数百名同志在睡梦中被警察拉下床来，驱逐出国；谁被驱逐出国，谁就一辈子别想回来”。^①约瑟夫·波伊克特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前夜启程离家，前往美国。

紧急状态维持了七年，用于审理政治案件的陪审员法庭被取消，“可疑分子”由行政机关驱逐出国，无数协会被解散，只有得到警方批准并在警察监视之下，方可举行集会。十年前（1873年）已有八万多成员、遍及奥匈帝国各省的工人运动，毁于这次开始的镇压迫害之中。^②

但是，如同维克多·阿德勒在给国际代表大会的一篇报告中分析的那样，哈布斯堡政体是一种懒懒散散因而软弱无力的专制政体。“政府不论干正经事或是干镇压勾当都不能贯彻始[224]终，总是摇摆不定”。^③这种“懒散”给了工人运动以喘息的时机。1886年，工人运动已渐渐复苏，然而它没有领导，分裂成激烈争吵的两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即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试图使争吵的双方统一起来的努力曾经进行过多次，但都一一失败。八十年代末，维克多·阿德勒进行了一次该他成功的尝试。他是1888年除夕在加因斐成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实

① 维克多·阿德勒：《去加因斐的道路》，载于《斗争》，第2年度，第145页起一连几页。

② 关于1873年奥地利工人运动及其报刊情况的统计数字，见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2卷，第205、206页。

③ 《会议记录》，同上，第43页。

际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波希米亚犹太家庭,他们全家于五十年代从布拉格移居维也纳。他学过医,青年时代即投身于民主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运动,该运动以1848年革命的精神为指导,争取建立一个民族统一国家。给穷人治病的生活经历,使他了解到工人的疾苦,从而于八十年代初接近工人运动。1883年夏,他去英国研究英国工商管理体制,在伦敦拜访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生前一直和他保持友谊。①

1886年12月,阿德勒用他父亲给他的遗产创办了《平等》周报,即《工人报》的前身,旨在为工人运动的统一拓平道路。他智慧过人,热情,因此深得左右两派的信任,在奥地利是这样,在国际内部也是这样。他生前受到奥地利群众拥戴之深,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拟。他在国际中的声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在国际内部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得到人们的无比好感和友谊,”布朗基主义者爱德华·瓦扬这样描述他。改良主义者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也承认:“我认识许多人,按传统的说法,他们比维克多·阿德勒能言善辩;有些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较深的影响;还有一些人则由于更接近世界事件的中心位置,因而得以在范围更广泛的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我要强调说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集党的伟大领袖的理智和所有美好的品德于一身;胸怀理想和把握现实,对理论和实践有透彻的认识,能保持精神与心境的完全平衡,性格上对群众具有磁石般的吸引感召力,同时又有冷静的头脑,能够在群众激怒的时刻予以约制;除此之外,还特别善于选择有助于使不屈不挠的意志达到目标的方法。”②

① 见阿德勒和恩格斯的通信,载《维克多·阿德勒论文、演说和书信集》,由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出版(1922年维也纳版),第1卷。

② 爱德华·瓦扬:《来自法国的祝愿》,载于《斗争》,第5年度,第435页;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维克多·阿德勒和国际》,载于《斗争》,第12年度,第5页;生平见马克斯·埃默尔:《维克多·阿德勒》(1932年维也纳版)。

[225] 维克多·阿德勒为加因斐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原则声明由卡尔·考茨基作了修改,经通过后各派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了统一。原则声明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阐明了工人运动的目标,承认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这种斗争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摒弃。也承认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样被无政府主义者鄙视为“止痛药”而加以拒绝。可是,“声明”在有关议会政治的意见上却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宣称议会政治是“现代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尽管另一方面声明也主张争取获得普选权,说它是“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争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问题——这是造成分裂的根本原因,“声明”是这样解决的,它指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党“将采用一切有效的和符合人民固有权利意识的手段”——一种不排除任何斗争方法的提法。因此,“激进派”和“温和派”,即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纲领都感到满意,它在事实上结束了奥地利的无政府主义。

7

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找到了远比奥地利肥沃的土壤。当时的意大利还具有资本主义前期的特征: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业无产者,赤贫的城市无产者和广大社会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阶层。无政府主义主张的用暴力反对经济贫困的方法,很自然地反映了受压迫群众提出的社会抗议。在意大利,由巴枯宁移植的无政府主义,也能同复兴运动以来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传统挂起钩来。意大利爱国主义所尊崇的传统是密谋、秘密结社和暴动,是武装突然袭击和“积极宣传”的办法,这是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秘密团体不遗余力培植的、反对外国独裁统治的意大利民主斗争的传统。“暴

力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先驱之一的恩里科·马拉特斯塔在回顾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时写道，“是无政府主义者继承的民主传统……早在认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就对阿杰西劳·米拉诺、费利切·奥尔西尼（两人均是复兴运动的英雄）和马志尼的武装起义表示赞赏和欢迎。无政府主义者在加入国际之后，在这方面除了他们从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那儿已经学到的东西以外，没有学到任何新的内容。”^①

当热情支持巴黎公社的北意大利工人组织与谴责巴黎公社 [226] 的马志尼决裂并纷纷加入马志尼所反对的国际的时候，它们选择了巴枯宁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国际意大利联合会在 1872 年 8 月初的里米尼代表大会上，宣布断绝同马克思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的一切联系，并拒绝派代表团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② 意大利联合会成了无政府主义国际中最强大的支柱。

年轻的伊莫拉人安得列阿·科斯塔(1851—1910)是最卖力地发表演说，要求里米尼代表大会同总委员会决裂的人中的一个。他是意大利当时最杰出的诗人卓苏·卡杜奇的学生。当他还在波伦亚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深受巴黎公社鼓舞，全力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他帮助建立了波伦亚的工人联合会，这是从马志尼派中分离出来的人组成的一个工人组织，它在 1872 年 3 月举行的代表大会是意大利联合会脱离国际的起点。科斯塔是里米尼代表大会的书记和出席(1872 年 9 月)圣伊米尔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这次代表大会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总委员会，并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合法代

^① 转引自理查德·霍斯泰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1958年普林斯顿版)，第1卷，1860年至1880年，第288页。关于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想史简介见莱奥·瓦利亚尼：《意大利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世界呼声》，由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出版(1959年汉诺威版)。

^② 见原书第190页。

表。^①

圣伊米尔代表大会结束后，科斯塔在瑞士还逗留了几个星期，同巴枯宁讨论成立无政府主义国际的问题，计划把国际意大利联合会变为无政府主义国际的机构。他们两人拟订了一个纲领草案，就方针政策问题宣称：“因为我们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的本能，所以我们的革命方法是进行人们称之为狂热的策动和摧毁资产阶级所谓的公共秩序”。^②

此后，在无政府主义支配下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意大利社会革命的历史。

1873年至1874年，意大利（还有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由于一连两年歉收，这场危机更加恶化。面包和面粉价格暴涨，失业人数激增。他们受饥饿所迫掀起示威浪潮。示威和罢工浪潮波及全国，托斯卡纳地区各城市的面包坊和粮库被抢劫一空，政府动用武力镇压示威者。“革命形势”似乎已经出现。

意大利联合会领导决定开始行动，它任命了一个秘密的“意大利社会革命委员会”，作为这场革命的总指挥部。计划定于1874年8月中旬在波伦亚举行暴动，作为托斯卡纳、罗马涅和罗马等地暴动举事的信号。为了准备这次革命，巴枯宁于7月底从瑞士洛加诺来到波伦亚。

意大利联合会声称，它当时有三万二千四百五十名会员，分属一百五十一个支部，波伦亚是人数最多的支部之一。但是，在约定的时刻，没有看到革命总部联络的几千人，相反，在波伦亚、伊莫拉、佛罗伦萨、里窝那和罗马只来了几十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原计划的夺取军火库并带动群众起来革命。因此，事先充分掌握情况的警方轻而易举地挫败了这次起义。警方未放一枪，

^① 见原书第197页。

^② 霍斯泰特同上引书，第1卷，第312页。

逮捕了寥寥几个来不及逃走的举行起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藏在波伦亚等待革命爆发的巴枯宁大失所望，于当天上午化装成乡村牧师逃往瑞士。^①

这次起义尝试不光彩地失败了。此次失败在党内招来了一个以恩里科·比尼亚米和他的《人民报》为中心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要求放弃无政府主义的密谋和暴力方法，主张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工人党，用合法手段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人们称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为“合法社会主义者”。

但是，在这个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卡菲埃罗和马拉特斯塔已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卡菲埃罗、马拉特斯塔和科斯塔是当时领导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三巨头，他们都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忘我地献身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卡洛·卡菲埃罗（1846—1883）出身富裕的旧式贵族大地主家庭，在那不勒斯攻读法律，后从事外交工作。然而，不久他就放弃了令人神往的外交职业，迁居伦敦，在那儿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恩格斯交给他的在意大利组织国际支部的任务。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争论中，他站在巴枯宁一边。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坐过牢；为了革命运动，他献出了自己的巨额财产，分文无留，最后死于极度贫困之中。^②

恩里科·马拉特斯塔（1853—1932）也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象卡菲埃罗一样，他小时候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后来在那不勒斯大学攻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1868年冬天获悉那不勒斯穷人令人震惊的厄运之后，他的心“冰凉”，“我想起了格拉古和 [228]

① 有关“波伦亚起义”的详细情况见霍斯泰特同上引书，第1卷，第321—358页。

② 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对抱有理想主义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有关一系列无政府主义领袖的动人的性格描写，见彼得·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者的回忆》（1900年斯图加特版）和里卡达·胡赫：《米哈伊尔·巴枯宁和无政府思想》（1922年柏林版）。

斯巴达克斯，我意识到我的心属于护民官和造反者”。

卡菲埃罗和马拉特斯塔同科斯塔讨论了在1877年春再次举行起义的计划。科斯塔反对这一计划，拒绝参加行动。然而，卡菲埃罗和马拉特斯塔并未为科斯塔的反对所动摇，决定起义。在他俩的领导下，4月8日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莱蒂诺山村里，出现了一帮帽子上佩戴着红黑两色帽徽的武装人员，共有二十六人。他们在集市广场上树起红黑两色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宣布国王埃曼努尔已被推翻，并在农民的欢呼声中焚毁了该地的档案。接着，他们将“革命”引向邻村。就在这时候，步兵和骑兵包围了起义地区，起义者旋即被捕。

政府对起义者密谋的计划了如指掌，知道这些人在起义前几星期聚集在卢波村马拉特斯塔租住的一间房子里密谋的情况。政府没有去惊动他们，俾便当场抓住他们，进而狠狠打击整个工人运动。事情的发展果如政府所料。无政府主义国际被镇压下去了，它的支部被解散，“合法社会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大批被捕。

圣卢波的冒险行动加剧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合法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安德列阿·科斯塔在警察刚开始袭击的时候就逃到瑞士去了。虽然他在韦尔维埃“反权威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和在根特世界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仍然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方法辩解，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团结协定”，^①但是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已不再有把握了。1878年11月，那不勒斯发生了卓万尼·帕萨南泰行刺翁伯托国王的事件，警方借机随即再次掀起严厉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浪潮。这时候科斯塔终于认识到，“一旦暴动主义付诸行动，除了导致反动派胜利之外一无所成；而如果宣传暴动不继之以行动，鼓吹暴动的人

^① 见原书第198—199页。

又会被人们鄙夷不屑。”①——他这样写道。

根特代表大会闭幕后，科斯塔定居巴黎，可是没住上几个月即被逮捕，被控为受到查禁的国际成员，判处两年半徒刑。一年后他遇赦出狱，从此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方法一刀两断。1879年7月，他在卢加诺公开致信意大利的同志，谴责暴动的办法和巴枯宁的理论，即只有摧毁国家才能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没有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理论。他分析说，没有国家的社会制度既不能在暴力革命中诞生，也不能靠革命政府发布命令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一种设想，是“生产力和新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是“未来的目标”。 [229]

在讨论如何修正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科斯塔主张建立一个工人党，由工人党通过诸如缩短劳动时间，制订劳工保护法，限制女工和童工等社会改革纲领，争取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他也赞成议会政治，尽管只是将它作为社会主义宣传的一种工具。他与阿米尔卡雷·契普里昂尼一起，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际巴黎代表大会。

契普里昂尼参加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对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转变观点有着重大的意义。阿米尔卡雷·契普里昂尼(1844—1918)是意大利解放斗争革命传统的体现者，曾与加里波第一起参加过反对皮蒙特人的阿斯普罗蒙特战役，以及抗击土耳其的克里特战役，也曾参加过巴黎公社，与凡尔赛军队进行过决战。他在巴黎被捕，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六年流放生活并未使他的革命意志有所减退。刑满获释后一到意大利，他就参加了1877年的密谋活动。1889年，他到达巴黎，同“合法社会主义者”一起参加筹建国际的工作。

在建立科斯塔提出的“意大利革命工人党”之前，1882年5

① 转引自霍斯泰特同上引书，第1卷，第410页。

月成立了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朱泽培·柯罗齐领导下的“意大利工人党”(Partito Operaio), 该党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 而以保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为其唯一宗旨。

[230] 不过, 成立真正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还要经历十年时间。菲利浦·屠拉梯和安娜·库利绍娃主编的《社会评论》杂志是其开路先锋。该杂志于1891年初创刊, 是意大利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刊物。屠拉梯在1891年还发起成立了米兰社会主义者同盟。一年后, 即1892年8月, 该同盟与工人党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达成协议, 它们决定开除无政府主义者, 实现合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新的政党: 意大利劳动党。

1893年是西西里社会动乱最严重的一年。深受大地主压迫的农民起来造反, 占领了主人的土地; 硫磺矿的工人举行罢工, 军方和罢工工人在街头发生战斗。以“社会主义是敌人”为座右铭而接任政府首脑的弗朗契斯科·克里斯比于1894年初宣布戒严, 议会通过反社会党人法, 年轻的党同其他工人组织和工会一概被解散, 领导人遭逮捕。然而, 一年之后, 即1895年1月, 党就在帕耳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改名意大利社会党。在1894年5月的选举(给候选人规定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中, 党得票七万六千张, 比过去的二万六千张几乎多了两倍。

8

西班牙象意大利一样, 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堡垒, 因为它的经济结构, 它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以及暴动、发表宣言和密谋传统, 都是培育无政府主义的温床。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封建地主和主教手里。工业落后, 除加泰罗尼亚地区外, 还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被压迫的、灾难深重的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认为, 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精神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

对不堪忍受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奴役的无比愤慨。六十年代末，西班牙也由于王朝和宪政的危机，由于军事政变、无产阶级起义、农民造反、资产阶级革命和贵族阶级的反革命，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条件看来已经具备。

革命真的来到了。普里姆将军发出了革命的信号。在他的领导下，加迪斯海军和陆军于1868年9月18日举行起义。但是，1868年的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一爆发，就把资产者、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同可憎的波旁王朝和贵族及教会的统治进行斗争，同以伊萨伯拉二世女王为代表的统治制度进行斗争。可是，在伊萨伯拉二世女王垮台并逃走之后，革命阵线却在争取实现革命目标的斗争中分化了。大资产阶级试图建立一个摆脱封建和教会桎梏的立宪王朝，中间阶级力图建立共和国，而工人阶级则处于无组织和无领导状态。 [231]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痉挛并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革命爆发后，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发出告西班牙工人书，要求他们组织起来，联合资产阶级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共同奋斗。

相反，巴枯宁认为西班牙社会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1868年11月，他派朱泽培·法奈利去西班牙组织国际支部，想把它们当作进行社会革命的突击队。1869年12月，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出现了第一批国际支部。这些支部是无政府主义者于1870年成立和控制的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的基础。^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消除巴枯宁在西班牙联合会中的影响。受他们的委托，巴黎公社流亡者保尔·拉法格于1871年底去马德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反对巴枯宁派对联

^① 见麦克斯·纳特劳：《西班牙国际和全国联合会史（1868—1889）》，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第14年度（1929年）。

合会的领导。这个反对派聚集在霍赛·梅萨主办的《解放报》周围，但是，拉法格及其小组——其中有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霍赛·梅萨和西班牙社会党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莫拉——于1872年6月被开除出马德里支部。此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新马德里支部”，后来发展为西班牙社会党。

就这样，西班牙工人运动在其活动伊始时就出现了分裂，无论政治方面和工会方面都是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控制的工会合并为西班牙劳动联盟(C. N. T.)，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工会合并为西班牙工人总同盟(U. G. T.)。广大工人站在无政府主义者一边。

持续将近五年的革命危机于1873年达到了顶峰。2月，国民议会以压倒多数宣告成立共和国，但是正统派同时武装入侵西班牙；7月，工人举行起义，在加迪斯附近的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和亚尔科进行了浴血奋战。1874年1月2日晚至3日晨，马德里驻军司令官帕维亚将军占领了议会大厦，解散国民议会，将权力交给一个反动政府。这个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恢复镇压国际的法令。^①

[232] 但是，国际尽管遭到迫害，仍然继续进行活动，既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1878年10月发生行刺国王事件后，政府大批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在安达鲁西亚建立恐怖统治。这时，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声明采取恐怖主义的对抗行动。事实上是投掷了炸弹，纵火焚毁了贵族的宅邸。

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1850—1925)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反动派和无政府主义的凶涛恶浪面前毫无办法。他们虽然在1879年初已成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这个党主要得到马德里印刷工人工会的支持，身

^① 见原书第172—173页。

为印刷工人的伊格列西亚斯是工会的领导人。但是，党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直至1886年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问世。它在1888年才召开真正的成立代表大会。在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党员很少，发展很慢。它的实力来自由它建立的工人总同盟(U. G. T.)。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国际联合会已告解体，无政府主义者创建的劳动联盟(C. N. T.)也自行解散。试图把处于分裂的工人运动团结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一个以个人成员为基础的新党，加泰罗尼亚工会组织了一个不受任何党派制约的工团主义工会联合会。

9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受到来自瑞士，即来自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由他控制的汝拉联合会的促进。

可是，在巴黎代表大会期间，瑞士的无政府主义已几乎销声匿迹。年轻的手工业者海尔曼·格雷利希(1842—1925)于1865年从德国迁居瑞士，在伯尔尼自己创办的《日报》上宣传工会统一的思想，并在1873年真的把工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中央组织“瑞士工人联合会”。但是，这个工会联合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它的奋斗目标主要是扩大社会政治立法。

格雷利希在1870年就曾进行过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尝试，可是，党只存在两年就瓦解了。因此，他努力同亨利希·舍雷尔一起争取格留特利联盟拥护社会主义。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最早的全国性工人组织，是由阿伯特·加累尔和斐斯泰洛齐的朋友尼德勒尔博士于1838年发起成立的一个工人教育和疾病救济协会，参加者也有激进的资产阶级手工业师傅和知识分子。1878

[233] 年，联盟通过了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纲领。可是，直至1888年，伯尔尼的律师艾伯特·施特克才将德国工人协会——威廉·魏特林播下的种子——同其他社会主义地方协会合并起来，组成瑞士社会民主党。1901年，格留特利联盟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这时，党有近万名党员，在国民议会中拥有三名议员（在下一届1902年选举中得了七个席位）。

党在1904年制订了自己真正的纲领，并且在半个世纪中以它作为基础。这个纲领——起草人是苏黎世首席法官奥托·兰格——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基础，但是，与促使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受到德、法和俄国政治流亡者影响的六十年代罗曼语区瑞士——的革命劲头相反，瑞士党在思想立场和政策上倾向于改良主义。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海尔曼·格雷利希，象瑞士力量特别强大的消费合作社运动的先驱卡尔·毕尔克利（1823—1901）一样，也是沙尔·傅立叶的信徒；而苏黎世大学教授莱昂哈德·拉加茨（1868—1945），则是瑞士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举足轻重的代表^①。

10

[234] 荷兰的情况则不同，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运动在瑞士无政府主义运动销声匿迹之后延续了十多年之久。国际在荷兰的第一批支部成立于六十年代末。^② 它们派代表出席了海牙代表

^① 见罗伯特·格里姆：《瑞士社会主义运动史》（1931年苏黎世版）；马里奥·格里达齐博士：《瑞士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1935年苏黎世版）；弗里兹·卓瓦诺利博士：《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发展和行动》（1948年伯尔尼版）。有关格雷利希的思想发展史见维尔纳·库恩：《海尔曼·格雷利希和沙尔·傅立叶》（1949年苏黎世版）。

^② 见原书第180页。

大会，并且虽然支持反对马克思的一派，但并不代表无政府主义倾向。此外，国际荷兰联合会是在1872年后的反动时期瓦解的，直到纽文胡斯的《人人权利报》杂志——1879年该杂志每周出三期，1889年起每天出一期——提出倡议，荷兰工人运动才重新有了生机。在纽文胡斯的领导下，它于1881年合并为“社会主义者同盟”。

费迪南德·多梅拉·纽文胡斯(1846—1919)被当作荷兰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而载入史册，但他的无政府主义灵感并不是来自巴枯宁，而是来自旧约和新约福音书。维克多·阿德勒在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遇见他，把他描绘成“具有耶稣基督的思想和教派狂热信徒的感情的人”。纽文胡斯同他父亲一样是海牙路德教会的一个受欢迎的布道牧师，他所领导的教区的教徒都是有钱的人。他在一本阐述社会主义伦理基础的书中，^①谈到了他为什么急于在1879年放弃教会圣职，以献身工人的事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担任议员的经历——他是在给候选人规定财产资格限制的1888年普选制下唯一当选的社会主义者——决定了他成为反议会政治派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他的论点认为，议会是反动派和资本主义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工人阶级将力量花在政治斗争上毫无益处。工人阶级必须组成工会，通过“直接行动”的办法才能使自己挣脱资本主义的锁链。

社会主义者同盟由于对待议会政治的态度问题在1893年分裂。1894年，“十二个使徒”——其中有彼得·耶莱斯·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威廉·休伯特·弗利根(1862—1947)和H·H·万-科尔(1852—1952)——成立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组织楷模和爱尔福特纲领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民主工党”。该党

^① 多梅拉·纽文胡斯：《我与教会诀别》(1891年柏林版)。

在成立初期，以亨利·波拉克(1868—1943)组织的当时荷兰最大的工会——钻石工人联盟——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

11

当荷兰工人运动被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左右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运动却几乎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挪威工人运动开始于1848年，它的创始人是教员和热情的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拉内(1817—1890)，并以他的名字——特拉内运动——载入史册。它成立两年后，属下有二百七十个地方组织，已有近三万名成员——小农、伐木工、渔民、手工工人和教员。它并不是什么革命运动，它的斗争集中在重新分配土地、争取普选权和穷人的孩子上学念书上。但是，政府把它看成是革命的，是个威胁，予以镇压。特拉内于1851年被捕，1855年和他的一百二十六名追随者一起以“破坏国家治安罪”被判刑。特拉内被监禁八年，因为如同起诉书声称，他在运动中散布“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

特拉内刑满出狱后迁往美国，定居芝加哥，参加国际美国联合会的工作，他在挪威领导的运动被打了下去。但是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把革命思想送到了广大农村，从此以后，挪威工人运动象在城市里一样，也深深扎根于农村之中。

挪威工人运动直到三十年后才重新活跃起来。随着八十年代工业的发展，工会运动有了发展，1883年成立了挪威工会同盟；两年后，“社会民主联合会”诞生；1887年8月，挪威工人党(Det Norske Arbeiderparti)成立。

挪威工人党之父是印刷工人克里斯蒂安·霍尔特曼-克努森(1845—1929)。他把印刷工人组织起来，1876年当上了印刷工人工会主席，1883年任挪威工会同盟主席。1884年他开设一

间小工场,为运动创办了一份报纸——《我们的劳动》,这是挪威第一张社会主义报纸。他同妻子两人为报纸撰稿,自己排印,自己散发。1885年,他建立“社会民主联合会”,他的报纸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它是挪威工人党正式机关报《工人报》的前身。克努森在建立社会民主联合会和主办《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最亲密的战友是制刷工人卡尔·耶佩森(1858—1930),他曾代表挪威工人党出席国际巴黎代表大会。^①

12

丹麦工人运动是在巴黎公社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年轻的邮局职员路易·皮奥(1841—1894)在巴黎公社的鼓舞下出版了两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之页》;1871年7月,他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8月,与哈罗德·布里克斯和保尔·盖列夫一起建立国际支部:“丹麦国际工人协会”。

在这一年,工人运动和国家权力发生严重冲突。哥本哈根 [236] 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国际伦敦总委员会呼吁采取团结行动,哥本哈根街头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建筑工人罢工。警察驱散参加示威游行的人,皮奥和其他工人领袖被捕,国际丹麦支部在1873年由于紧急状态法的颁布而被取缔。

皮奥被判处服苦役四年,刑满释放后他仍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于1876年6月组织召开第一次地区性工会小组和社会主义协会联合代表大会。与会的七十五名代表共代表六千名成员。可是,在第二年,年轻的工人运动却遭到了“致命的一击”。运动的领袖、创建人和鼓舞者路易·皮奥被警方收买,永

^① 见沃尔特·盖伦逊:《挪威工人》(1951年纽约版)和《斯堪的纳维亚工人运动》(1952年伯克利版);又见托罗尔夫·埃尔斯特:《挪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世界呼声》,同上,第183—209页。

远离开丹麦。他和被同时收买的保尔·盖列夫于1877年春去美国。“没有新的人手能填补空缺的位置,党过于松散,组织很不严密,不能团结一致。协会纷纷自行解散或渐渐销声匿迹。”^①为了设法重新开展社会主义运动,1880年成立了丹麦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kratisk Forbund i Danmark)。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开会时,据P·克里斯坦森报告,党有两万名党员,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每期刊印二万二千份。在1893年的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丹麦代表团代表着三万七千名党员和工会会员。

13

瑞典的社会主义运动1882年才告开始。它的创始人是奥古斯特·帕尔姆(1849—1922)。他是个裁缝,曾在德国和丹麦做过几年工,1881年回瑞典时已是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第二年,他同阿克塞尔·斐迪南·丹尼尔森(1863—1889)一起,在斯德哥尔摩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三次徒步走遍瑞典全国,在集会上——常常是在森林里——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组织社会主义小组——第一个1882年组织于马尔默。不久,乌普萨拉的年轻大学生亚尔马·布兰亭(1860—1925)便追随他。布兰亭于1886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并成为在1889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的领袖。

[237] 瑞典党的基础是工会的地方小组,这些小组的工会会员集

^① 古斯塔夫·班格:《丹麦社会民主党党史一瞥》,载于《新时代》,第16年度,第1卷,第404—405页;又见鲁道夫·迈耶尔:《丹麦的社会主义》(1875年柏林版),第13页起一连几页;埃米尔·赫尔姆斯:《丹麦社会民主和工会运动》(1907年版);丹麦社会民主党史概貌见恩斯特·克里斯提安森:《丹麦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世界呼声》,同上,第20—28页。

体入党；在1898年成立瑞典工会同盟前，瑞典党同时也是工会运动的中央组织。在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开会时，党员人数不足七千，在以后的五年中发展缓慢。1895年起，该党开始发展成为群众运动。^①

14

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下，俄国和波兰当然不可能出现公开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八十年代这两个国家里发生了革命骚动。在国外代表机构的指导下和由它们提供地下报纸和传单的情况下，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和其他许多城市成立了秘密的革命小组。1881至1886年间，几万名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警察、大臣、甚至连沙皇自己都被革命恐怖分子刺杀。年轻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主义思想。亚历山大·赫尔岑早在六十年代就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在由他主办的在俄国秘密散发的《钟声》报上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本——《资本论》第一个外文译本，已于1872年出版，八十、九十年代，俄国出现了不计其数的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和盖得的著作。^②

俄国的社会主义集中反映为两大派别：社会革命党前身的农业社会主义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前身的马克思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分裂成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③

^① 有关瑞典社会民主思想史的概述，见弗兰斯·塞弗林：《瑞典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世界呼声》，同上，第236—261页；又见G·亨里克森·霍尔姆贝格：《瑞典工人运动发展史》，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第6年度（1916年）。

^② 见马尔托夫和T·丹：《俄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柏林版）和瓦伦丁·吉特尔曼：《俄国史》（1949年汉堡版），第3卷，第8部分。

^③ 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及其历史作用，本书第2卷关于俄国革命部分将作出阐述。

民粹派最杰出的理论代表是《资本论》的俄译者尼古拉·F·丹尼尔逊(1844—1918)和彼得·拉甫罗夫(1823—1900),俄国马克思派的头头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拉甫罗夫和普列汉诺夫分别代表民粹派和马克思派出席了国际巴黎代表大会。

[238] 普列汉诺夫是个小地主的儿子,在圣彼得堡大学求学时即参加革命运动,很快就在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沙皇警察的追捕,他于1880年流亡西欧。他在哲学、艺术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诸方面造诣极深,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最有教养的欧洲人。他的全集由俄罗斯国家出版社出版,共分二十四卷,实属巨著。1883年9月,他在日内瓦与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维拉·查苏利奇(1851—1919)和列夫·格里戈列维奇·多伊奇(1855—1941)共同建立“劳动解放社”。阿克雪里罗得出生于一个极端贫困的犹太家庭,因苦难深重不堪忍受,成为社会主义者。多伊奇在西伯利亚被囚十六年,后逃了出来。维拉·查苏利奇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时,就因同一个革命小组有联系而被判刑两年,刑满获释后不久,她于1879年2月行刺警察局总监弗约多尔·特烈波夫^①将军,因为他指使下属对被捕的大学生鲍戈廖波夫施以毒打。但一个陪审员法庭宣布她无罪,免于刑事处分。上千人聚集在法庭大楼前,从奉命立即逮捕她的警察手中抢走了她,朋友们将她藏了起来,不久把她送到瑞士。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萌芽,党的秘密成立大会于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可是,代表大会刚开完,所有与会代表及国内秘密社会民主小组的大部分领导人纷纷被捕,党随之瓦解。直至1900年12月底创办《火星报》,党才重新活跃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人名索引》(人民出版社)作费多罗维奇·德米特里·特烈波夫。——译者

起来。

15

在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发展现代工人运动的条件比俄国有利得多。波兰的工业革命在八十年代即已开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已集中在城市里，四分之一的从业人员是工厂、矿山和工场里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继承了1830年和1863年波兰革命的传统，作为两次革命主力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在1863年革命失败后已渐渐甘心接受沙皇的统治。因此，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社会运动。

波兰首批社会主义秘密团体成立于1878年。从1881年起，在国外出版的《黎明》月刊秘密传入波兰。1882年，秘密小组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可是，它的成员不久即被逮捕，秘密小组被取缔，四名组织领导人被绞死。后来建立了一些新的小组；在1892 [239]年巴黎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这些小组合并成为波兰社会党（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P. P. S.）。1894年3月在波兰国内——华沙——首次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

1894年年底左右，党的公开机关报《工人报》首次问世，由华沙一家秘密印刷所印刷。六年后，即1900年，俄国政治警察才发现这个印刷所，报纸主编约瑟夫·皮尔苏茨基被捕。

由约瑟夫·皮尔苏茨基领导的党认为自己是波兰三省——俄国波兰、奥地利波兰和德国波兰——所有社会主义者运动的一翼。作为1830年和1863年波兰革命遗志的继承者，党争取重建一个独立、民主的波兰共和国。

但是，在俄国的一个波兰国际社会主义者小组反对这一民族主义目标。他们以同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进行斗争推翻沙皇

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恢复独立的波兰，而是在民主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范围内实现民族自治。他们从波兰社会党中分裂出去，于1895年建立“俄罗斯波兰社会民主党”。在1900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并在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西斯领导下组成“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它的机关报是《工人事业报》。

16

九十年代，在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犹太无产阶级群众中，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组织。在亚历山大·克雷默和布罗尼斯拉夫·格罗塞尔领导下，这些组织于1897年在维尔纽斯召开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总同盟”，历史上称之为“崩得”^①。“崩得”象波兰社会民主党一样，认为自己是国际社会革命运动在俄国的一个分支，是参加1898年明斯克代表大会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之一。它是俄国犹太无产阶级的总组织，是犹太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政党、工会运动组织和文化组织。

旨在于1905年俄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崩得”，一开始就被沙皇警察采用不同于一般的迫害方法——集体屠杀——所镇压。

“崩得”致力于通过俄国革命以解放俄国、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工人，使他们摆脱经济和政治压迫以及强加给他们的民族歧视的双重枷锁。它希望，革命的胜利能使犹太人获得平等和文化自治，彻底根除反犹太主义毒瘤。它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光明未来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俄国。

^① “崩得”，即德文 Bund(意为同盟)的译音。——译者

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了一场向犹太工人阶级提出民族和社会主义双重目标的运动：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最早把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合在一起的是莫泽斯·赫斯，他在《罗马和耶路撒冷》(1862年)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纳赫曼·聚尔金在一篇名为《犹太问题和社会主义的犹太国家》(1898年)的论文中作了发展——该文在恩格尔伯特·别涅斯托费尔's《德语》杂志上连续发表。不过，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真正元老，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却是别尔·鲍罗霍夫(1881—1917)。他是波尔塔瓦一位希伯来语教师的儿子，中学时代就已参加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秘密活动；如他自己所说，十九岁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就能“背诵马克思的《资本论》”。^①他根据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指出，犹太工人运动的不幸，其根源在于犹太民族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被排斥在原料生产和大工业之外——决定了他们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社会斗争中软弱无力，但是犹太民族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正常化，要求发挥无比巨大的力量和开展非凡的创造性活动，这在犹太民族现有地位的废墟上是做不到的。要达到正常化，需要有一个能唤醒这些力量的民族思想，而且只能在历史的土地上——巴勒斯坦——发挥作用。在1900年9月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②由他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发起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约一百五十名工人和大学生参加的小组，社会主义以色列一脉的枝枝叶叶，

^① 别尔·鲍罗霍夫：《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选集，由门德尔·辛格尔出版(1932年维也纳版)，第331页。

^② 现名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译者

就是由这个组织的幼芽繁殖而成的。

18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六十年代,在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匈牙利“无声党”已派代表列奥·弗兰克尔和卡罗伊·法尔卡什出席。但是这个所谓的“党”实际上只是一小批社会主义者,而且不久就被警察解散。1873年,维克多·居耳菲尔迪和雅各布·施累津格尔再次进行成立工人党的尝试,可是他们的组织也被政府取缔。在此期间,工人协会纷纷建立,在1880年合并成为一个中央组织,并给自己确定了社会主义纲领。但是,又过了十年,才在1890年12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Magyarországi Szociáldemokrata Párt)。党的杰出的领导人除了埃代·鲍龙、伊斯特万·法尔卡什和阿道夫·基什三人之外,还有巴黎公社委员列奥·弗兰克尔。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任公社劳动委员的弗兰克尔逃到伦敦,【241】同马克思交上了朋友并担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6年他回到匈牙利,主编《工人纪事报》杂志。在1877年根特代表大会上和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他是匈牙利社会民主运动的代表。^①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以奥地利党为榜样,同它保持密切的关系,党把自己看作奥匈帝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它于1890年12月正式成立,并不加改动地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加因斐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直到1903年,党才制订了自己的纲领,卡尔·考茨基参与了纲领的起草工作。

匈牙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阻碍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匈牙利是一个农业国,土地为贵族阶级所占有,佃农和雇农

^① 有关列奥·弗兰克尔生平见马格达·阿兰约西:《列奥·弗兰克尔》(1957年柏林版)。

已沦为奴隶。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无法深入农村，因此影响几乎不超出布达佩斯及其近郊——实际上的工业中心。政治统治权掌握在上层贵族手里，他们对一切民主运动都进行暴力镇压。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境内实行选举改革，使八十二名社会民主党人进入了议会，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则直到1918年10月革命始终没有在议会中占得席位。

19

罗马尼亚象匈牙利一样，也是一个半封建的大地主国家，贵族同样使佃农和雇农处于奴隶般的状况，并通过选举议会的等级选举制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罗马尼亚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因而没有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是俄国犹太流亡者，其中有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和特别是C·多勃罗贾努-格里亚(1855—1920)，后者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罗马尼亚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先锋。

1879年，第一份社会主义报纸《比萨纳比亚》诞生，较大城市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报纸为核心纷纷组织小组。在1893年4月布加勒斯特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党——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它遭到政府镇压，骨干分子大批被捕，许多知识分子党员不相信能在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如此落后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办的《新世界报》上，主笔约瑟夫·纳杰日杰^①和V·莫尔宗——两人均为党的执委会成员——提出意见，认为党应该解散，党员争取加入自由党，在自由党内进行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工作。这一建议在党的(1899年4月)第六次代表大会 [242] 上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宣布了党的解散。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人名索引》(人民出版社)作者昂·纳杰日杰。——译者

在 I·C·弗里穆和格里亚的领导下,在代表大会上反对这一决议的少数派,同合作社和工会联合组成地区性小组;但直到 1906 年代表会议上,这些地区性社会主义协会才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1901 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Partidul Social Democrat in România)才再次正式建立。

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他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要人。他出身于保加利亚多布罗加一个大地主旧贵族家庭,1878 年多布罗加省并入罗马尼亚,他成了罗马尼亚公民。他在十五岁时因宣传社会主义被校方开除,后去法国念大学,当了医生,掌握了各种巴尔干语和四种欧洲语。他是个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在他一生中的各个不同时期,曾先后在法国、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俄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后来,他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最后命运注定他成了斯大林的反对派。^①

20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条件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略为有利。虽说保加利亚也是一个农业国,但土地并不掌握在贵族大地主手里,而是在自由农手中。保加利亚第一个秘密社会主义组织,是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和年轻律师尼古拉·加勃罗夫斯基在 1891 年建立的。可是这个组织很快就在建立政党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组织成员之一、在英国上过大学和深受英国社会主义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扬科·扎卡佐夫(1860—1941)认为,在斯蒂凡·N·斯塔姆布洛夫建立的专制政体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有发展前途,而且工人阶级建

^① 有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概况见瑟尔班·沃伊内阿:《罗马尼亚工人运动》,载于《斗争》,第 16 年度(1923 年)。

立政党的条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是首先组织工人参加工会。布拉戈耶夫是马克思主义者，曾在俄国领导过一个革命组织，由于沙皇警察追捕，于1886年回到保加利亚家乡。他主张建立一个革命党，主张工会应象党一样为革命事业服务。

1893年，斯塔姆布洛夫反动专制政体崩溃，减轻了社会主义 [243] 运动的压力，建党的问题有了较大的希望。189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两翼在联合举行的博斯鲁达代表大会上，达成一致意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在翌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两个席位，1899年选举中增至六个席位。可是这些成就却加剧了扎卡佐夫及其追随者和布拉戈耶夫及其小组之间的潜在分歧：前者主张奉行同民主派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进行社会改革的政策，后者要求社会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这些分歧，党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分裂。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分裂也破坏了工会运动的团结。社会主义的两派——以扎卡佐夫为首的“宽广派”和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紧密派”——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工会联合会，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①

21

西半球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是阿根廷和美利坚合众国。

阿根廷在当时有了一批工会和两个社会主义小组：一个由巴黎公社流亡者组成的法国小组，一个由被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逐出家园的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小组。法国小组出版《未来》杂志，德国小组出版《前进》杂志。强大的1890年五一节示威

^① 见T·齐佐夫斯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1931年）。

游行促使这两个小组同工会联合，建立阿根廷共和国工人联合会。一年后，在它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联合会”。1893年6至7月间，西班牙语《资本论》译者胡安·B·胡斯托(1865—1925)创办《先锋报》(Vanguardia)，为在1896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大会上党的成立铺平道路。阿根廷社会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会和政治性协会的联合会。

22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分子也是德国和法国的流亡者。他们组织起许多小组，这些小组在六十年代末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①但是国际北美联合会发生了分裂，几个脱离出去的支部与纽约、费城和其他几个城市激进的工人协会一起，于1874年7月联合组成“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这个党尽力联合国内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其成果就是1876年7月费城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弗·阿·左尔格和约瑟夫·魏德迈)、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代表、伊利诺斯工党和辛辛那提社会政治工人同盟的代表，均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美国工人党”，并通过了一个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党政名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尽管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道路坎坷不平，党始终站在前列。^②

工人党诞生时正值社会危机关头。从1873年财政恐慌起，美国遭到历时五年之久的严重经济危机。1877年，经济危机发展到顶点。据估计，这一年的失业人数达三百万，他们得不到任

① 见原书第127页。

② 有关党史见希尔奎特同上引书，第2章第3节。

何救济，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与此同时，企业主又削减工资。在1873至1877年间，铁路工人工资被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全国掀起罢工浪潮——率先行动的是处于绝望之中的没有建立组织的、无纪律的工人。1877年7月，铁路工人罢工，政府动用军队保护破坏罢工的工人。在马里兰、匹兹堡和里丁发生流血的街头冲突。货车被推出铁轨，铁路桥梁被炸，车厢和机车被砸毁——仅费城一地，就有一千六百节车厢和一百二十台机车被毁。圣路易斯的罢工工人在街头示威游行群众的支持下，甚至一度短时间占领这个城市。

社会危机促进了年轻的工人党的成长。党在各工业中心举行的集会和街头示威游行，吸引广大群众纷纷参加。党的报刊的发行量大得惊人，在1876至1877年间，办起了二十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其中有八份日报（用英语、德语、捷克语和瑞典语出版）。至1879年初，党下属有近百个支部，分布在二十五个州，党员达一万多人。当然，在危机过后经济繁荣阶段出现时，广大工人群众对党就不感兴趣了。许多党员离开了党，大部分新办的报纸关门停业，德语日报中幸存的只有《费城日报》、《工人报》、芝加哥《先驱报》和《纽约人民报》。

在这些报纸中，《纽约人民报》最值得一提。该报创刊号于1878年1月底出版，坚持办报六十七年，至1945年停刊，由美国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杰出代表之一的阿道夫·杜埃博士任编辑。他在1848年德国革命斗争中被捕并囚禁多年，获释后于1852年移居美国，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办了一张小报，为解放黑奴进行宣传。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他自己撰稿、排版、印刷和散发报纸。他成了白人败类恨之入骨的人，备受迫害和虐待，三年后终于被逐出圣安东尼奥。此后，他周游各地，宣讲社会主义，过了几年当上了《全国劳工同盟》杂志的编辑，^①杂志停刊后，任

^① 见原书第133页。

《纽约人民报》编辑。他是美国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去世后，由研究美国国际史的历史学家海尔蒙·施留特尔接替他的职务。

由于许多党员脱党，党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又于1880年底陷于分裂。其左翼从党中分裂出来，在1881年10月芝加哥代表大会上建立“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两年后，这个党在莫斯特的领导下与无政府主义者合并，组成“劳动人民国际联合会”。联合会的影响很快扩大，不到几年，无政府主义已成为美国激进工人队伍中的一股力量。直到芝加哥悲剧发生后，联合会才衰落。^①

在此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受到挫折后也慢慢恢复了元气。其所属支部数目曾经由1879年的一百个减少到1881年底的十七个，1889年又回升至七十个，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增为一百八十三。

可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重心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党，而在于工会。

1866年，威廉·H·西耳维斯（1828—1869）进行首次将无数分散的工会行业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联合成一个总组织的尝试。在由他发起召开的有六十多个工会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国劳工同盟。西耳维斯是弗·阿·左尔格的朋友，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保持通讯联系，致力于用国际的活动和精神武装劳工同盟。全国劳工同盟派了一名代表出席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声明团结一致并决定加入国际。^②但在西耳维斯1869年去世后，全国劳工同盟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丧失了它的阶级性，最后由于一连串罢工失败而分崩离析。它所残留下来的人马在1874年后停止活动。

全国劳工同盟被“劳动骑士团”（The Noble Order of the

① 见原书第223页。

② 见原书第133页。

Knights of Labour)所取代——它最初成立时是工会运动史上最奇特的群众运动。^①

在六十年代，一批裁剪师傅在费城组织了一个工会协会。在一次罢工后，企业主宣布不再雇用参加工会的工人。于是，裁剪 [246] 工工会协会的七名成员在尤赖亚·史密斯·斯蒂芬斯 (1821—1882) 的倡议下于 1869 年 12 月开会，讨论如何对付企业主联合抵制工会的行径。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共济会式的裁剪工秘密同盟。^② 斯蒂芬斯与詹姆斯·L·赖特一起，为这个团体的集会制订一套隆重的仪式，并规定每个成员必须宣誓的誓言。在成立大会上，斯蒂芬斯被推举为“大师工人”，J·L·赖特为“尊敬的哲人和长老军官”。这个团体只接收裁剪工人参加，在开始活动的那一年年底有六十九名成员。

第二年，这个团体决定也接纳其他行业的工人。从此它的队伍迅速扩大，不到几个月，仅在费城一地就有了十九个小组。组织扩大到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南卡罗莱纳、康涅狄格和其他州。

在 1878 年以前，骑士团一直是个严守秘密的组织，即使组织的名称也是严加保密的。但是，它不能一直不让别人知道，而且正是由于严守秘密，它受到新闻界和说教台的反对，说它是共产主义和其他暴乱密谋的策源地。有鉴于此，骑士团于 1878 年召开代表大会，公布它的名称、目标和纲领。

^① 见希尔奎特同上引书，第 287—292 页。

^② 组织带有宗教教规的共济会（亦译互济会或自由污工团。——译者）式的工会，是在英国工会运动遭到镇压之后由皮特于 1800 年至 1801 年推广的。由于工人建立组织属于非法，所以他们试图秘密地组织起来，规定参加组织的成员宣誓对组织的一切事情保守秘密。这种组织形式在 1825 年镇压工会法取消后仍然存在，直到 1834 年托尔普德尔的六名农业工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会——因强迫别人宣誓被判去声名狼藉的博特尼海湾流放区服刑七年，才最后取消。英国工人运动一直深深怀念“托尔普德尔烈士”。

这一决定加速了它的发展，特别是在矿工、铁路工人和其他非熟练工人中。1883年它有成员五万二千人；两年后，成员人数翻了一番；到1886年，估计有五十万到八十万。它甚至扩大到大洋彼岸的英国和比利时。

骑士团并不是社会主义组织，尽管它的纲领中有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纲领宣布，骑士团的任务是“确保工人充分享受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和建立“旨在争取实行合作工业制度以取代雇佣工资制”的合作企业；纲领也要求“国家的土地，人民的遗产应保留在真正的移民手中”，电报、电话和铁路收归国有。

【247】 社会主义工人党努力对骑士团施加影响。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党的书记菲利浦·范·派顿，早在1881年就参加了骑士团。1893年，工人党控制了纽约地区骑士团的集会。但是，为了争夺骑士团的领导权，骑士团领导和工人党的关系在1895年破裂了。社会主义者退出骑士团，工人党与劳动骑士团断绝了一切联系。

这时骑士团已趋没落。它作为美国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存在了近十年之久。但是，1886年罢工的失败和芝加哥投掷炸弹事件引起的反应，导致大批成员在失望和惊恐中纷纷离团。另外，骑士团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对手，即美国劳工联合会。

骑士团原来力图把所有工人联合组成一个唯一的中央集权组织，不是按行业而是按地区划分系统。有一批工会小组反对这种组织形式及其严格集中的结构，这些工会小组于1881年11月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美国和加拿大有组织的工会和工人协会联合会”。这个组织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的前身。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代表大会于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举行，它修改了原联合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赛米尔·龚帕斯（1850—1924）为第一任主席。在1887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美国劳工联合会有六十一万八千

名会员。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期望能争取它拥护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代表们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在从1885年至1889年期间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一直被以四分之三的多数所否决，因为这些代表大会都主张执行独立的工人政策的原则。在1898年代表大会上，劳工联合会终于发表纲领性声明，反对“承认或采用任何党派的政策”。美国劳工联合会虽然向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发了兄弟情谊般的贺信，并同第二国际自始至终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把自己看成国际工人大同盟中的一员，但它不承认拥护社会主义原则。

23

在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只有欧洲、北美和南美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出席。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九十年代已在一个亚洲国家——日本——扎下了根。

当时，日本正处于迅速进行工业化，现代工人阶级开始产生的过程之中。一些中世纪手工业行会，如印刷工人和造船工人的行会以欧洲为榜样改组成立了工会，某些新兴工业的工人开始建立工会，知识分子纷纷组织社会主义小组。 [249]

日本无产阶级先驱是片山潜(1858—1933)，他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他在强烈的求知欲的驱使下学会了印刷手艺。为了学得更多的知识，他甚至去当东京大学的看门人。可是，这个工作并不能满足他学习的渴望。1884年他到了加利福尼亚，一边在大学里攻读，一边做工以维持生计，直到十一年后获得学位才回日本，献身工人运动。1897年，他当上新成立的冶金工人工会书记，创办《工人世界》杂志，发起成立“工会建会联合会”

(Rodo Kunai Kiseikai), 同时与安部矶雄教授一起在东京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协会。翌年, 他建立了铁路工人工会, 并把建筑工人行会和木工工人行会组织成工会。

在日本, 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没有改变国家政治结构的极端封建的性质。大封建家族——幕府——的统治在 1868 年是被打垮了, 可是 1868 年革命只不过是一次王朝的革命。它虽然恢复了皇室在国家中的地位, 但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 他们照样指挥军队, 领导官僚机构, 同时垄断工业。工业革命仅仅改变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把日本原来的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结构变为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结构。

不过, 工业化的进程也造就了一个不断扩大、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在它的迫切要求下, 1899 年日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宪法虽然明确规定允许资产阶级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并未给它以丝毫权力。而工人阶级依然无法对公众事务施加任何影响。就在公布宪法的同一年, 颁布了一项镇压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的特别法, 工会受到禁止, 对号召罢工者处以监禁, 新闻受到严格检查, 结社和集会自由被取消。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 在片山潜、安部矶雄和幸德秋水(他在十年后死于绞刑架下, 无愧为工人阶级的烈士) 以及小说家木下尚江的领导下, 1901 年召开了日本社会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被警方没收, 党很快被取缔。可是, 没
[250] 过多久, 党又以“社会主义宣传联合会”(Shakai Shugi Kyokai) 为名恢复活动。翌年, 该党创办《平民新闻》日报, 首次刊载了日译本《共产党宣言》。毋庸置疑, 政府取缔了这家报纸。1903 年的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国际的决议, 并派代表片山潜出席 1904 年的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这一年正值俄日战争。为了向世界公众显示日俄两国工人在这场战争中团结一致, 片山潜和普列汉诺夫双双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而当两个交战国的

工人阶级代表在与会代表的欢呼声中握手互致兄弟般的问候时,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①

以上所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亚三大洲工人运动的概况,就是第二国际赖以发展的基础。

^① 见片山潜:《日本工人运动》(1918年芝加哥版),又见G·D·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第二国际》(1956年伦敦版),第930—940页。

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

1

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是试图恢复1864年成立的国际的尝试。从1872年第一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至第二国际召开成立代表大会期间,召开过多次工人代表大会,但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成功地重建一个国际组织。

即便是代表着社会主义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的第二国际,在它成立时也没有任何机构——没有中央领导或书记处,没有章程,甚至也没有名称。^①“第二国际”是报纸和历史学家给它的称呼,以表示是第一国际的延续。

回忆起来,第一国际在召开成立大会时就产生了一个中央领导——总委员会,并责成它起草组织原则和章程。总委员会在最初的会议上就讨论了原则和章程,作为临时章程立即颁布生效。这样,第一国际成立伊始就有宪法,就是一个有效的组织。

第二国际在成立后的十一年里却始终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直到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才委托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央委员会的问题。直至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才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的国际中央委员会”和一个“脱产的国际书记处”。在国际书记处成立之前,国际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才

^① 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所用名称很多:1889年巴黎成立代表大会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从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起才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存在。国际如要在某个国家召开代表大会，则委托该国家的有关党负责召开和进行筹备，代表大会所需的费用也由该党负担。除此以外，它便没有任何职能了。所以，第二国际在成立后的十一年间，除了每隔两年、三年或四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外，没有任何对党起约束力的组织，特别是没有可以用第二国际的名义讲话的机关。

直至1900年，第二国际才把它的中央委员会定名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并建立起这个机关。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它不仅负责同各党保持经常性的组织联系，自行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和准备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而且如同决议所说，还负责发表宣言，“对所有涉及无产阶级利益的急待解决的重大日常问题表示态度”。参与建立这个机关的维克多·阿德勒指出，这是国际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他说，“在1889年首次巴黎代表大会那个时候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么一来，就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经历了偶尔接触和热切同情的阶段，发展成为一个牢固的联盟”。^①

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外，巴黎代表大会还设立了一个国际议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成员国中参加了议会的党的社会主义议员小组组成。委员会的任务是，“保证（在议会中）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

所有政党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因此执行局的会议也就成了代表大会的缩影。章程规定执行局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但授权这个局的执委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召开非常会议。代表大会选定中立国首都布鲁塞尔作为书记处所在地。为了保证执委会成员的稳定性，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把执委会的主席、财务委员和书记等职务交由比利时代表担任。比利时工人

^① 《维克多·阿德勒论文集》，同上，第7卷，第23页。

党的卓越领导人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担任主席,直到第二国际结束。维克多·塞尔维任第一任书记,至1905年;继承者为卡米尔·胡斯曼。

第一国际曾经发挥了国际无产阶级尽可能严格集中的作用,“以便能在爆发经济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具体地方立即集中投入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①。它仿佛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总政党,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组织范畴”——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谈到第一国际时这样说。而【254】第二国际只不过是各个独立的、组织严密的政党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会。

2

尽管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几乎没有谈及它的组织问题^②,但它还是采取了一个行动——当然,这个行动会前没考虑过,也没列入计划,通过一次国际性的共同行动使广大群众意识到国际存在这个事实。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定于1890年5月1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游行,而且,”如同决议所说的那样,在这一天,“要使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工人同时向执政当局提出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

早在1888年,法国、美国和比利时的工会代表大会就曾提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的问题。1888年12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5月1日这一天,在美国组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示威游行。

① 凡古斯塔夫·耶克:《国际》(1904年莱比锡版),第218页。

② 诚然西班牙代表霍赛·梅萨和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曾提议设立一个中央委员会;但是当瓦扬表示,鉴于许多国家的法律这样一个决议不会被接受时,他们便撤回了提议。

法国工会领袖雷蒙·拉维涅曾提出由国际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组织国际性示威游行的决议，他建议按照美国工会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样在5月1日举行国际性群众集会。

拉维涅的提议原来未列入议事日程，是在代表大会将要结束之前突然提出来的，所以没有进行辩论就被通过了。但是，看来这时似乎没有一个代表认识到决议的意义和影响。他们直到回国以后，才考虑到应当采用什么形式组织示威游行的问题。决议对此未作规定，只是提到：由工人“根据本国情况决定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举行集会”。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决定在5月1日举行一天总罢工，德国人和英国人决定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群众集会，其他国家的党大多数则决定在5月1日晚上举行集会。而这些作法是不完全符合决议的精神和字面要求的，决议号召工人“在所有国家在规定的这一天同时”举行显示国际团结的活动。

然而，1890年第一个五一节却成了社会主义史上最了不起的事件。国际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第一次真正调动了“两个半 [255] 球”的几百万工人。5月1日这天，法国一百三十八个城市和阿利埃、加尔及卢瓦尔等地矿区的工人停止工作；在米兰、都灵、里窝那、卢戈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在比利时各城市有三十四万；葡萄牙有一万四千；即使在华沙和罗兹，也有八千人不顾沙皇警察的镇压参加游行；在巴塞罗那有十万人；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集会估计有十二万人参加，奥古斯特·帕尔姆和亚尔马·布兰亭到会发表演说；当天的社会主义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套红出版。

英国工人的五一节意义特别重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站在一辆货车上，观看了在伦敦市中心海德公园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的就有十多万人，个别参加进来的差不多也有

十万人——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恩格斯这样描述集会
说。这次集会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英
国工人阶级从漫长的冬眠中觉醒过来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
了战斗队伍”。①

在奥地利，五一游行也“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阿德勒报告
说，“无产者阶层从淡漠中被唤醒，本来他们同我们是格格不入
的……我们从5月1日得到一种好象耕翻尚未开垦过的处女地
那样的振奋人心的力量；在我们的纲领、我们最优秀的演说远远
未能到达的地方，五一节在无产阶级的中心牢牢地扎下了根，
而且是不会再被拔除了。”②单是党在集会上和工厂里进行的为
争取5月1日停工的宣传，就使全国为之激动。资产阶级报刊
对这一天可能带来的革命恐怖作了十分阴暗的描绘。皇帝召开
【256】了枢密院会议，商讨政府的对策。③枢密院会议记录（1890年4
月8日）证实，“陛下为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感到高兴……”，“要求
5月1日开禁是非法的……”，“皇帝陛下强调指出，政府将采取果
断行动……”，因为“对于不断高涨的、发展规模令人忧虑的运动
有必要严加打击。”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部队被调到维也纳，匈
牙利和波兰部队到达波希米亚，德国和捷克部队开赴波兰-加里
西亚，大炮也被拉上了各工业城市的街头。“士兵们处于战备状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伦敦的5月4日》，载于1890年5月23日《工人报》，
见《阿德勒论文集》，同上，第1卷，第14页。（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22卷，第74—75页。——译者）

② 《阿德勒论文集》，同上，第1卷，第73页及第6卷，第191页。

③ 转引自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4卷，第126页。根据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卡耳
诺基伯爵致奥地利总理塔菲伯爵的公函称，威廉二世皇帝也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对
付”。“我认为报纸所载，”卡耳诺基伯爵这样写道，“即威廉皇帝就五一游行所说的
有利于工人的话，是带有倾向性的捏造。我听到的刚好相反，他对有关罢工运动作
了郑重表示，在为改善工人命运采取了可能的措施之后，下一次再发生危及生命和
财产的工人运动时，他将不得不断然给予‘打击’，并已发出了相应的命令。”转引自
布吕格尔同上引书，第4卷，第124—125页。

态，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象围城前夕一样屋里贮备了干粮，商店门可罗雀，妇女和孩子不敢走进小巷，个个脸上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维也纳一家大报就是这样描写5月1日前夜资产阶级中的气氛的。^①

但是，奥地利的5月1日并没有发生严重不测事件。直到第二年，企业主才对工人的挑战进行报复，在波希米西、西里西亚和克恩滕开除了大批工人。法国的情况则相反，第一次五一游行工人就同国家武装发生冲突；第二年，在诺尔省的富尔米发生巷战，十名男女和儿童被打死，许多人受伤。“罪魁”被绳之以法，其中有保尔·拉法格，他被判处一年徒刑。

国际中历史最长、力量最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拒绝在五一节号召工人停工，它只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集会示威。它的态度使法国人感到愤慨，使奥地利人感到失望。在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这两个党提出一项决议案，规定各国党有责任在5月1日当天举行五一节活动。“5月1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共同举行示威游行的日子，”决议案说，“在这一天，由工人提出他们的要求和表示他们的团结。”决议案还敦促各国党在5月1日这一天号召工人罢工。“这个示威游行日应该是停工的一天，”决议案指出，“只要各国的情况不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话。”

但是，尽管德国人（其他国家的党也如此，只有英国人例外）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案，却仍然坚持拒绝停工，他们只是把5月第一个星期日的集会提前在5月1日晚上举行。在1892年柏林党代表大会上，以奥地利代表身份与会的阿德勒力图改变这一做法，但没有成功。他提请德国人考虑五一节的原义。他说，正

^① 《新自由报》，1890年5月1日。该报在作了这一描述之后，还补充说：“世界各国在这一天所庆祝的圣者名叫卡尔·马克思。”转引自布吕格勒，同上引书，第4卷，第126页。

是通过五一节活动才使人民意识到国际是一个组织机构，“只要
【257】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正是在同一时刻、同一时候，无产阶级具有同一思想的想法，比之仅仅考虑劳工保护的想法，意义要深远得多，革命得多”；这一想法包含着“一种可以说是宗教的因素”，“一种热情奔放的因素”，而运动是不能没有这种因素的。①

然而德国党把5月1日停工问题视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纪律问题，因为它把有争议的以总罢工作为政治武器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仍然使党内意见很不一致。此外，党看到自己面临反动派开始新的镇压行动的威胁。在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开会时，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仍然生效。1890年10月帝国国会解散，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随之取消。在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胜利，票箱中七百万张选票，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约有一百五十万张。事实证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无力制服社会民主的洪流。俾斯麦现在认识到，他搞的旨在争取群众拥护德意志民族国家思想的普选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并把改正这个错误作为他生命最后几年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他计划用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取代老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个法令旨在制止社会主义者进入帝国国会。他计划通过发动一场政变宣布新的选举法，剥夺每一个“证据确凿的有革命思想”的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并取消无记名投票。②

俾斯麦于1890年3月2日在枢密院宣读的政变计划，由于威廉皇帝的反对而告失败，因为他不希望他的政府挑起一场内战。但是政变的危险仍然存在。5月1日的大规模罢工会引起这

① 《阿德勒论文集》，同上，第6卷，第191页。

② 见汉斯·德尔布吕克：《政府与民意》（1914年柏林版），第61—64页，也见《普鲁士年鉴》，第147和153卷；埃格蒙特·策希林：《俾斯麦的政变计划，1890至1894年的威廉二世》（1929年斯图加特版）。

种危险吗？在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倍倍尔对此作了暗示，他分析了党为什么不能投票赞成责成它号召工人5月1日举行罢工的决议案的原因。他说，履行这一义务“将同资产阶级和政府发生一场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大战”。他还说：“如果我们要进行这样的战斗，那么战斗的日期也要由我们自己决定。”^①

苏黎世代表大会郑重地重申了布鲁塞尔关于五一节示威游行的决议，它责成各国党在5月1日这一天至少要“争取”停工。但是，不管这一天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已成了世世代代显示全世界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日子。^②

3

除五一节示威游行的形式问题外，第二国际成立之初还有 [258] 一个极需解决的问题——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基本原则，而且也涉及工人阶级斗争策略和方法这一现实问题，如工人阶级对国家和对议会的态度问题，对政治行动的态度、对社会改革运动的评价问题。这些问题曾经使第一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不得安宁，第一国际就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观点不和而瓦解的。

参加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权利并不受制于承认某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或实现这种理论的某种特殊方法。与会的邀请直截了当发给了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因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德国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于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在原则和方法问题上的矛盾，顿时再次爆发出来。

① 《会议记录》（1893年苏黎世版），第34页。

② 见M·多芒热：《五一的历史》（1953年巴黎版）。

代表大会事日程上列有争取劳工保护法的斗争问题，从社会民主的观点来看，这也是要求采取政治行动的斗争，即向立法机构、向议会施加影响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的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梅利诺，法国的塞巴斯蒂昂·福尔，荷兰的多梅拉·纽文胡斯——在发言中表示，拒绝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指责工人阶级参加议会选举，甚至也反对从法律上争取劳工保护。无政府主义者人数不多，与会代表的大多数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反动性更见锋芒。非实质性的关于代表大会进行磋商的方式问题，引起他们强烈抗议，最后导致一场大乱。对此，主席团决定采取一种极其难堪的作法，指令吵闹不休的无政府主义者离开会场。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即使下一次(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采取借口，宣布无政府主义代表的资格无效，也未解决问题。最后，代表大会不得不作出决定，究竟什么人有权参加代表大会。

这个问题由着手筹备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预备性会议进行审议。这次会议当然不能把承认某种社会主义理论定为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条件，因为那样一来就会危及国际的广泛性。在纽文胡斯领导下的荷兰工人运动的多数还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法国工会的多数崇拜工团主义，而英国的工联还根本没有声明拥护社会主义。因此，布鲁塞尔预备会议建议，允许工会无条件地参加代表大会，但对社会主义政党的与会权利则规定了一个策略性的条件——承认“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这一建议被以决议案的形式提交苏黎世代表大会讨论。

[259] 苏黎世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在于有以约翰·霍奇为首的英国工联的正式代表团参加，霍奇是议会委员会代表、工联代表大会主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受到代表

们的热烈欢迎并被选为代表大会闭幕式的名誉主席。

在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条件中，有争议的一点是要求各党承认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对此，倍倍尔、阿德勒、考茨基和奥托·兰格提议在决议案中加进下述说明：“所谓政治运动，是指各工人党尽力利用或设法夺取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夺取政权。”

这一提法当然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德国印刷工人W·威纳尔和作家古斯塔夫·朗道尔的竭力反对，他们俩是德国“青年派”和“独立者”小组的代表。但是，他们提出的反对理由并不令人信服。决议案以十四国赞成，两国反对获得通过（法国和波兰弃权）。无政府主义者在表决结果宣布后从会场和楼座站立起来，大呼抗议，试图占领主席台。磋商被迫中断。主席团这次又命令纠察把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赶出会场，其中有威纳尔和朗道尔。

无政府主义者对苏黎世决议不甘罢休，他们要求在下一代表大会上就参加会议的条件再次展开辩论。

下一次代表大会应英国工联的邀请，于1896年7月在伦敦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共有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七百七十六名代表到会，不过其中仅英国就有四百六十五名，他们都是工联和工人政治运动的重要领袖——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主席、本届代表大会开幕式主持人爱德华·考韦，英国独立工党主席凯尔·哈第，本·提列特和汤姆·曼，还有社会民主联盟的海德门、奎尔奇、乔治·兰斯伯里和贝尔福特·巴克斯，以及费边社的悉尼·维伯、比阿特里萨·维伯、肖伯纳和詹姆斯·R·麦克唐纳，唯缺威廉·莫利斯，他病了。

法国代表团计有一百三十三人，他们代表工人运动中的所有派别——马克思派、可能派、阿列曼派、布朗基派、无政府主义者和以费迪南·佩卢蒂埃、雷蒙·拉维涅及马塞尔·桑巴为首的

工团主义工会，此外，法国社会中四十九名社会主义议员组成的小组，也派了一个代表团与会，其成员有：亚历山大·米勒兰和勒奈·维维安尼。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让·饶勒斯，他的首次讲话“一再被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打断，英国人挥动手帕和礼帽向他致意”，会议记录这样写道，他赢得了在国际中应有的地位。^① 瑞典代表团团长为亚尔马·布兰亭，荷兰代表团团长为P·J·特鲁尔斯特拉和W·H·弗利根，比利时代表团团长为路易·贝特兰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西班牙代表团团长为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和西班牙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安东尼奥·G·克希多，瑞士代表团团长为卡尔·毕尔克利和海尔曼·格雷利希。由十八名代表组成的德国代表团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保尔·辛格尔为首，奥地利代表团以维克多·阿德勒和卡尔·考茨基(作为奥地利代表)为首。意大利代表中有康斯坦丁诺·拉查礼、恩利科·费里和亚历山德鲁·希阿维。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为普列汉诺夫、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拉·查苏利奇。波兰的十三人代表团中有费利克斯·达申斯基、约瑟夫·皮尔苏茨基和罗莎·卢森堡。

在以工会和以其他资格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人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中，也有几位是无政府主义史上的大人物，例如，除多梅拉·纽文胡斯外，尚有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领袖恩里科·马拉特斯塔、受欢迎的巴黎公社女社员路易丝·米歇尔——她参加过巴黎公社的街垒战，在新喀里多尼亚岛流放地服了九年苦役，回法国后又被判六年徒刑——，和著名的散文作家、神秘主义者和幻想家古斯塔夫·朗道尔。1919年，他作为巴伐利亚工人士兵苏维埃共和国委员，象罗莎·卢森堡一样被德国国防军杀害，成

^①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协商和决议》(1896年柏林版)，第19页；本书所述还参阅组织委员会编印的详细正式记录《协商记录》(1896年伦敦版)。

为一名烈士。

代表大会会场设在宽敞的圆形女王大厅。开幕前一天，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万名工人集会，作为大会的前奏。

祝贺会议召开的讲话刚刚结束，荷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代表C·科尔纳利森就提出，要求就苏黎世决议重开辩论。大会主席犹豫不决，这时大厅和楼座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纷纷站立起来，提出强烈抗议。会议不得不延期举行。代表大会秘书处立即开会，作出决定：为避免产生任何压制代表大会某一派的印象，提请再次就苏黎世决议进行辩论。

凯尔·哈第宣布这一决定，并呼吁大家采取忍让态度，汤姆·曼也提出，“任何人都不应由于见解的原因而受到排斥”。饶勒斯和海德门赞成决议。纽文胡斯却表示反对：接受这一决议就等于取消了任何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者象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也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逐出代表大会，只能表明唯恐“马克思派教父们的宗教会议受到干扰”。

于是，对决议重新进行表决，投赞成票的有德国、英国（二 [261] 百二十三人赞成，一百零四人反对）、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国、波兰、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投票反对的有法国（五十七人反对，五十六人赞成）和荷兰（九人反对，五人赞成）。意大利弃权，因为意大利代表中赞成和反对的人数相等。

英国代表近三分之一反对决议，并不表明他们同情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仅仅反映了扎根于英国民主传统的容忍各种意识形态思潮的精神。但是，表决也说明了荷兰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强大，说明了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工团主义势力的强大。

这一点可以从代表大会委员会起草的、由兰斯帕里提出的一个决议案的辩论情况中看出来。这个决议案为政治行动重新

下了定义。“代表大会认为，所谓政治行动，”决议案中这样写道，“即指以达到自身解放的目标，工人阶级在国家或地区内为夺取政权和充分利用立法机构及政府机构而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的斗争。”

约瑟夫·托尔泰利埃代表法国工团主义者反对这项决议案。他发表不同意见，认为议会政治在广大法国人民中信誉扫地，工人阶级对议会已无可寄望，他们只能通过直接行动的方法——首先是罢工，但也不仅仅是罢工——争得自身的解放；他举例说，如果房客拒付房租，房屋所有权就可以立即废除。

饶勒斯热切呼吁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以此作为对托尔泰利埃的回答。他说，罢工是“抄起双手同资本主义打仗”；政治行动是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武器，只有工人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才会劝告他们不要使用这一武器。接着，倍倍尔讲话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通过工人参加选举和政治斗争，才从一批为数很少的、受迫害的、遭到蔑视和诽谤的人，发展成为帝国最强大的政党。“十年前，我们所得的票数不足十万，而在上几届选举中我们得票已达一百七十五万张，是全部有效票的四分之一，”他说。“德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通过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政治行动、它的政治影响争取到的。”

决议案又以基本一致的意见获得通过。无政府主义的荷兰代表们在辩论之前就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反对这一决议案的只有法国代表团，当然只是他们中间微不足道的少数人。

【262】 代表大会希望能就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资格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代表大会正式把无政府主义者排斥在国际之外。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法国工团主义工会代表们反对通过的一项决议，声明今后的代表大会“只邀请”所有“争取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制

度,并把参加立法和议会活动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的组织的代表,以及“所有虽然自身不参加政治斗争,但承认政治斗争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工会组织”。决议还指出:“因此,不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

代表大会感到迫切需要采取这一步骤,如同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报告人李卜克内西所说,因为“我们不想在下一国际代表大会上再出现前两次代表大会出现的那种不愉快场面”。无政府主义者不满足于说明他们的观点,至少做到接受代表大会以多数作出的不符合他们观点的决议,而是相反多次试图破坏代表大会的工作。“因此,逼使我们进行历时数天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使代表大会丧失了威信。”伦敦决议结束了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进行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斗争。

进化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

国际伦敦代表大会重申了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这次代表大会也对存在激烈争论的、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斗争方法问题作出了决定。绝大多数党谴责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承认了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承认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和社会民主党的方法。

但是，现在党面临着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否只有通过一场推翻统治阶级权力的革命斗争才能消灭，还是可以在现有国家的范围内，在工人阶级影响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经过一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

1

进化社会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两种思潮的争论，使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得安宁。在法国发生的一个事件，把这一争论推上了国际舞台。1889年6月29日，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被任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他是欧洲政府内阁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阁员。^①这一事件意味着同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决裂，也使在绝大多数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问题。

^① 路易·勃朗是唯一的一个先于米勒兰任政府成员的社会主义者，那是1848年2月革命中产生的政府。

米勒兰供职的瓦尔德克-卢骚内阁是一个激进共和派内阁，它是在一场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根基产生动摇的危机中上台的。[264]“德雷福斯事件”——为总参谋部一名犹太人上尉恢复名誉的斗争，该上尉于1895年根据伪造的文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放逐死岛^① 服刑——引起教会、忠于王朝的新闻界和军队发动一场猛烈的帝制派和排犹主义的战役。共和国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在众议院结成反对这一危险的联合战线，由法国工人运动分裂而形成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也成立联合行动组织：“监督委员会”——这是雅各宾派的传统叫法。社会主义者在1893年的竞选中即已同激进派结盟，并因此而使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由原来的十二席增至四十九席。在1896年的地方选举中，也由于同激进派结盟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898年5月——正是德雷福斯事件的高潮时期——众议院改选。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再度联合起来参加竞选。然而左派只得到议会中微弱的多数。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左派才能组阁。受权组阁的勒内·瓦尔德克-卢骚邀请米勒兰入阁，担任工商部长。

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是律师，因捍卫工人的利益在工人中深受尊敬，早在1885年就已当选为议员，象饶勒斯一样渐渐地由激进派变成社会主义者。他代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进化社会主义思想。在圣芒德举行的庆祝1896年地方选举获胜的宴会上——出席这次宴会的有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各派的领导人，有盖得、饶勒斯、瓦扬等——发表的讲话中，米勒兰提出一个纲领——著名的“圣芒德纲领”，表示希望这个纲领能成为分裂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各派联合的基础。他在讲话中指出，把社会主义运动各派联合起来的，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战胜资

^① 指法属圭亚那海外的迪迪阿布勒岛，旧为重刑犯流放地。——译者

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这一目标，但是，不能真正期望，通过一次革命行动一举推翻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逐渐转变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是一个分阶段将大工业收归国有和地方公有的过程，是公共团体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不断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因此，用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工具不能是革命的暴力，而是体现为共和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应以争取人民的多数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为己任，在进行社会改革和垄断经济部门公有化的斗争中，同社会上所有进步阶层联合起来。

[265] 米勒兰同饶勒斯、维维安尼、白里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议员一样，是“独立社会主义者”小组的成员，但他入阁并不代表这个议员小组，而是自作主张，事先未同议员小组或“监督委员会”进行过磋商。他用共和国面临的危险为他的出人意外的行动辩解。他说，拯救共和国免遭教权主义反动势力的毁灭，是目前工人阶级最迫切的任务。他保证信守圣芒德纲领和根据纲领的原则从事政府工作。

瓦尔德克-卢骚政府的基础，是由激进派、新成立的一个激进社会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建立的联盟，指导这个政府的政治策略的原则是：“不在左派中树敌”。所以瓦尔德克-卢骚邀请了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入阁。但是，他也邀请了1871年屠杀公社社员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参加政府，担任陆军部长，因为他把将军看作一个有能力镇压帝制派的将军们造反，并对已变为反动派工具的军队进行改造的人。

对米勒兰入阁的惊人消息，右派报以愤怒的吼叫，布鲁斯派和独立社会主义者感到满意，而盖得派、布朗基派和工团主义者却表示震惊。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认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原则的背叛，鉴于这个政府中也有加利费，因此这种背叛尤其卑劣。他们发表宣言，声明米勒兰的行动与他们完全无关，同时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准备以法国工

人阶级的名义就米勒兰的行动作出裁决。所有承认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原则的工人组织都接到了邀请——代表大会于1899年12月举行，到会的有一千四百个政治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的八百名代表。

然而，代表大会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它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八百一十八票赞成，六百三十四票反对)指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第二个决议(一千一百四十票赞成，二百四十票反对)却说，在非常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可以考虑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决议还说，鉴于认识到在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情况下，在剥夺资产阶级经济权益之前必须首先剥夺他们的政治权益，所以占领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地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瓦尔德克-卢骚政府真的击退了教权主义帝制派的进攻，并批准了由米勒兰起草的一个有关劳工保护法和社会改革的大型纲领。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政府中的一员，米勒兰也对那些他虽未表示赞成但却无法制止的行动负有责任。这些行动激起社会主义者的抗议，可是他们又不得不拥护这些行动，以免政府被教权主义帝制派所推翻。例如，他们不得不忍受正式签订由前几届政府谈判的与沙皇俄国的同盟条约，并带着相当不悦的心情，眼看着商业部长米勒兰陪同沙皇——最残酷的反动势力的代表——参观巴黎世界博览会，接受沙皇亲手授予的俄国勋章。他们甚至也容忍一个有社会主义者任部长的政府，派军警驱散一队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一起为纪念公社烈士而来瞻仰联合会会员墙^①的社会主义工人。 [266]

社会主义者深深陷入其中的这种难以忍受的矛盾局面，在1900年6月的夏龙事件中揭开了盖子。夏龙的工人举行罢工，

① 指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会员墙，即通常称的巴黎公社社员墙。——译者

政府向罢工地区派出部队，发生了流血冲突。社会主义者在众议院提出抗议。右派看到推翻他们所痛恨的政府的机会已经来到，便提出不信任案。为了挽救政府，饶勒斯领导的独立社会主义者小组投票反对这一提案，而盖得派投了赞成票。这一事件加深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争执。争执引起的令人痛心的摊牌，导致两派于1901年秋天在组织上的重新站队。革命社会主义者——盖得派和阿列曼派左翼——联合组成法国社会党，改良派——布鲁斯派、独立社会主义者和阿列曼派右翼——联合成立法兰西社会党。^①

2

“米勒兰事件”的影响从法国波及到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不过首先是波及到德国。在1899年10月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积蓄的矛盾爆发了出来。两派矛盾的导火线，是列入代表大会议程表的“攻击党的基本观点”问题。不过受到“攻击”指控的不是米勒兰，而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在给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表示不同意米勒兰入阁，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希望党保持“严格中立”。^②

【267】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伯恩施坦辩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象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一样，德国工人运动也从一开始就被社会主义改良派和革命派在策略问题上的对立吵得不得安宁

① 有关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史见A·泽瓦埃斯：《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1947年巴黎版）。

② 《维克多·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通信集》，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出版（1954年维也纳版），第319页。

——即便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党完全失去活动能力的十二年间也是如此。政府宣布剥夺社会民主党人的公民权。社会党人倍受迫害，当然加强了党内革命派的力量。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赤裸裸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它在工人阶级中播下的仇恨现存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种子，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① 党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回答是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与拉萨尔代表的和经1875年哥达纲领采纳的民族社会主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党内深深怀念拉萨尔的感情并未消失，他的胸像和照片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胸像和照片一起，装饰着每一个工人家庭，工人们象唱赞美诗一样，在集会上唱着这样的歌：

“布勒斯劳有一座教堂，
墓地里有一位死者；
他在那儿长眠安息，
是他给了我们武器……”

但是，爱尔福特纲领反对工人阶级同民族国家的任何联系，而拉萨尔把这种联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纲领强调工人阶级同现存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承认毫不妥协的国际

^①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取消13年后，当倍尔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叙述社会民主党人在当时的遭遇时，他还象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天那样仇恨满腔。“打击接踵而来，”他说，“一切都被砸得粉碎，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一个接一个被宣布戒严。成百上千的同志失业了，我们象癞皮狗一样被赶出家乡……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继续说，“我们被命令到警察局集中，象罪犯一样量身高体重，给我们拍照，接着对我们说，限你们三天之内滚出德国。这一切我终身难忘。”他还说，“假如我能活到那么一天，我要对他们说：我现在要象你们当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你们——我会那样做的。”《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协商记录》（1903年柏林版），第217页。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纲领的基础，是期待进行一场将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统治制度扫除干净的革命。

[268] 可是，就在党发表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年，社会主义运动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1850—1922)打出了改良主义的旗帜。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他是个极左派。在两篇轰动一时的论述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的策略的文章中——文章登在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该报因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禁止，改在苏黎世出版，运往德国秘密散发——他说，党不能指望在某一天通过一次议会行动取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它只能通过革命行动予以废除。“社会民主党人与现存国家和现存社会的脱离，”他这样写道，“愈来愈彻底，我们同我们对手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愈来愈不可逾越……社会主义在今天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只是一个政权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议会中得到解决，只能在街头、在战场上得到解决。”他要求党向“我们的敌人”公开声明：“是的，我们是危害国家的人，因为我们要消灭你们。是的，我们是你们的财产、你们的荣誉、你们的整个制度的敌人……我们将以暴力对付暴力。”^①

可是，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终于与他的预料相反，被一次议会行动取消时，他便抛弃革命暴力的想法。他一点也不否认在历史性危机中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他提出论据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经历一个缓慢而有机的过程，党应该加速这个过程。党应该争取小农作为同盟者，和资产阶级进步力量一道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命运已表明，资产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反动群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年8月12日，转引自伯恩斯坦同上引书，第127页。有关福尔马尔的生平见R·扬森：《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政治传记》(1958年杜塞尔多夫版)。

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中央党人和自由党人的一翼拒绝对俾斯麦所要求的强化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投赞成票。为了扩大党在帝国国会、邦议会和乡镇代议机构中的影响，党应该不要害怕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事实上，他领导的党1898年在巴伐利亚同天主教中央党结成选举同盟，1904年同该党一起进行改革邦议会选举法的斗争。

福尔马尔在党内绝不是孤立的一个。但聚集在他周围的改良主义者只是反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策略，并不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反对这个原则的倒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构成爱尔福特纲领基础的根本观点提出了问题，他不仅指责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策略，而且也拒绝指导他们的理论。他不只是改良主义政策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3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一 [269] 场轩然大波。在他1896年发表批判性见解之前，他是党内受尊敬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他担任了十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代表社会主义运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非常感谢他的一个伟大成就，”倍倍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他提出指控时说，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倍倍尔补充道，“一个迄今为止有权享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声誉的人”。^①他取得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任和友谊，并且同倍倍尔一起被恩格斯指定为他的遗作的代管者。“直到那个时候，”李卜克内西证实说，他“无愧于是我们原则的捍卫者”。可是，现在他被党报上的许多文章斥之为背叛者。李卜克内西

① 《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协商记录》（1899年柏林版），第95页。

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正式否定社会民主原则”。倍倍尔也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你根本不再站在社会民主的立场上了。”伯恩施坦的青年朋友考茨基不再同他来往，倍倍尔考虑把他开除出党。^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成了造革命社会主义思潮反的国际性象征，成了修正主义派的创始人。但是他并未从这个由他扮演的角色中得到好处。他没有去想方设法扮演这种角色，这种角色与他的气质格格不入。他的干劲不是出于猎取政治名誉，而只是知识分子的正直。他不是当领袖的料，与其说他是政治家，毋宁说他是学者。他广博的知识是通过自学而积累的。他在柏林一个极端贫困的犹太小市民家庭中长大，^②父亲是个白铁匠，为了当火车司机而拼命工作。但是由于有十五个孩子，他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爱德华是第七个孩子，因此要进大学念书是根本谈不上的。让他上中学，至少读到十六岁，这对他父母来说已经是耗费不小了。此后，他得自己谋生。他在一家银行当学徒，满师后便在罗特希尔德银行当职员。巴黎公社的经历促使他信仰社会主义。他入了党，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奥艾尔及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交上朋友，并经他们推荐任社会主义杂志《未来》的出版人、作家卡尔·赫希柏格的秘书。

[270] 这份杂志在瑞士洛迦诺出版。1878年伯恩施坦迁居瑞士。三年后，党委托他编辑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警方发布对他的逮捕令，瑞士联邦委员会屈服于俾斯麦的外

① 《会议记录》，同上，第192页；维克多·阿德勒：《通信集》，同上，第5章，《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开始时期》，第264页；有关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的考虑，又见倍倍尔和考茨基的信，第258和309页；伯恩施坦致倍倍尔的信，第258页；以及阿德勒的信，第292、297—299页。

② 有关伯恩施坦生平和对他的作品的评价见彼得·盖：《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1954年组伦堡版)和伯恩施坦的回忆录，载于《社会民主党的学习年代》(1928年柏林版)及《我的流亡岁月》(1917年柏林版)。

交压力，于1888年将他和他的同事逐出瑞士。他同报纸一起迁到伦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取消后，报纸停办，因为这时党可以在德国国内自己出版报纸了。党在柏林创办《前进报》，作为它的中央机关报。仍然处在逮捕令威胁之下的伯恩施坦留在伦敦，当《前进报》驻英国的通讯员，并为卡尔·考茨基编辑的《新时代》撰稿。在流亡年代，他写了一本重要的、受到英国历史学家高度评价的有关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社会主义派别的专著，这是他写的一大批历史和理论书籍中的第一本。^①

伯恩施坦断言，他绝没有象控告他的人所说的那样背弃马克思主义；他只是对它的若干假设进行了批判性的验证；他没有背离他终生所要感谢的马克思。他在一封致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他只是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同现实取得一致”，“开扩”马克思主义的学说。^②

伯恩施坦的批判，实质上是针对马克思先是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后来又在他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理论中阐明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变成无产者，使工人阶级越来越贫困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再出现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危机，这些危机必然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最终突变为革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者是“铁的历史法则”的必然结果。马克思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划出轮廓的这一理论，构成了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③

然而，资本主义在这半个世纪中的发展，果真证实了马克思 [271] 的这些理论吗？这就是伯恩施坦提出的问题。他论证说，马克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伟大的英国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1895年斯图加特版）。有关伯恩施坦著作的目录见盖同上引书，第374—376页。

② 《维克多·阿德勒通信集》，同上，第260页。

思关于贫困化的学说与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不断提高的事实相矛盾；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崩溃不可避免的理论，已为资本主义正处在发展和壮大过程的事实所否定。他指出，资本主义造成的新的中间阶层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复杂化了——与马克思认为的社会将两极分化成为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的假定相反。伯恩施坦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结论，^③ 社会和经济过程本身包含了缓和阶级对立的趋势。他说，实际上丝毫看不到有出现革命形势或者资产阶级社会即将崩溃的迹象。因此，坚持革命意识形态和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危机制定党的策略是错误的。^④

他论证说，党的革命目标和言论也同它的实际政策，同它为进行社会改革、争取劳工保护法、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相矛盾。

③ 马克思把调查结论有力地概括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的结尾部分：“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1909年汉堡版），第1卷，第727—728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832页。——译者）

④ 早在1882年，倍倍尔就在与伊格纳茨·奥艾尔的一场争论中驳斥了这些理论；他在致奥艾尔的信中写道：“分歧点不是在于是否五年后要爆发革命。关于这一点可能有争论，这不是分裂的原因，把这一点当作分裂的原因至少是无聊的。分歧点宁可说是在于对作为具有而且必须具有伟大的、改造世界的目的的阶级运动的整个认识，因此不能与统治社会作任何妥协；如果它这样做了，那只有灭亡，或者以新的形式摆脱迄今的领导而再生。”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1907—1910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226页。

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使党和本来可以争取成为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斗争中的同盟者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疏远了。他写道， [272] 党的影响“会远远超过今天，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使自己从事实上已经过时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以它今天的实际面貌，即民主社会主义改良党的面貌出现的话”。^①

伯恩施坦进一步扩大他的批判范围。他对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的理论提出疑问，这一理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情的源泉，因为运动就是从它汲取胜利的信心的。伯恩施坦却说，社会主义可以是工人理想主义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一个权利意识的要求，一个文化要求，但绝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目标，运动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是通过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程。“人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他写道，“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②

如同对他的指控所说，伯恩施坦的这些批判，实际上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的攻击，也同党内的心情完全背道而驰。

4

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165页。本书初版于1899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社会主义的问题》为题连载于1896—1898年的《新时代》；见于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史》（1901年柏林版），第167—286页。有关对伯恩施坦观点的批判见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斯图加特版）和罗莎·卢森堡：《社会改革还是革命？》（1908年莱比锡版）。

②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同上，第169页。

重大分歧，最后以党迄今的原有基本观点得到郑重重申而告结束。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深深扎下了根，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德国社会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信仰问题，是一种世界观，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希望，是对光明未来的幻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胜利地经受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迫害，并在非常法被废止后把几百万大军团结在自己周围。难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或那一看法被证明有错，党现在就应背弃马克思主义吗？纵使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批判可以成立，它也不能动摇马克思提出的认识世界的伟大理论。有谁——政治经济学家除外——能对极为复杂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机械论分析提出批判呢？如果说连维克多·阿德勒也在一封致考茨基的信中承认：“对剩余价值史我一窍不通，它同我也毫不相干！”^①那么，它对广大社会主义者的作用是多么微小啊！他们的态度象威廉·莫利斯一样——有一天，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有人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究竟抱什么态度，他的回答坦率得令人惊奇：“我曾试图弄清它，可是没有成功。但是我相信，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继续说道，“我只要通过对政治经济的了解能够懂得贪图安逸的阶级富裕，劳动的阶级贫困，富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剥削穷人的基础上的，这就够了。我知道这些，因为我亲眼看到过。我不用看什么书，就能信服这一点。而且，我认为，究竟是通过所谓的剩余价值，通过奴隶制度还是公开的掠夺来进行剥削，那也完全无关紧要。整个制度是令人愤慨和不堪忍受的……”^②

① 《维克多·阿德勒通信集》，同上，第296页。

围绕解释马克思的贫困化学说的争论——这是由伯恩斯坦的批判引起的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程度的争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这一争论看来无关紧要，因为不论如何解释这个学说，不论是否产生新的社会中间阶层，资本主义社会分裂成有产者和无产者，分裂成资本家和工人的基本事实，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是否真有可能指望，象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通过一个和平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进程，克服这种分裂并使现今的社会长入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资本主义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法国、意大利和 [274]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在伯恩斯坦之前很久就提出来了；法国有马隆、布鲁斯、米勒兰和饶勒斯，意大利有屠拉梯，英国有费边社成员。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改良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修正主义的理论。法国改良主义头头饶勒斯虽然有时也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辩论，但有时也用马克思的思想来论证他的改良主义理论，例如他写道：“如果朝着马克思的极妙的提法‘革命的进化’方向引导进行改良的话，那么改良就不只是镇痛剂。这便是为新的社会制度铺路和作准备的改良，并由于它的有机力量而加速旧制度的瓦解。”象费边社成员，实际上象所有英国社会主义者一样，饶勒斯并不认为政治革命行动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关键。他说，革命处在法律之外；它是历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出路。“无产阶级不是通过无法预料的政治鼓动的冲击而取得政权，”他这样说，“而是通过在民主和普选制法律范围内，有计划地、合法地把他们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共产主义将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崩溃，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壮大渐渐地进入我们的社会。”^②因此社会主义的进化要求“用合法的

^② 转引自约翰·布鲁斯·格累西尔：《威廉·莫利斯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伦敦版），第32页。

^③ 让·饶勒斯：《理论和实践》（1902年柏林版），第42页。

手段争取人民的多数”。^①

1891年，恩格斯在一篇评述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论文中指出，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议会民主国家里，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着合法的基础。“可以设想，”他写道，“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他继续写道，“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②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反驳修正主义者的核心论据。俾斯麦给了德意志帝国一部保证普鲁士国王、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享有政治统治权的宪法。德国没有议会民主，
[275] 行政权不在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手中，而是在国王——而且是一个还死死抱住封建专制思想不放的国王的手中。^③ 他甚至对帝国国会也感到厌恶，他象容克地主和军官团一样，随时都想至少通过一次政变取消民主选举帝国国会的权利。

因此，可以想象，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容克地主、军队和

① J·汉普登·杰克逊：《让·饶勒斯》（195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8和91页。

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新时代》，第20年度，第1卷（1901—1902年）。（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3页。引文中方括号内的译文，原文中没有，系根据中文版所加。——译者）

③ 威廉二世明确地告诉德国人民他对王朝特权的看法：“我的祖父在这里就坐，再次靠自己的权力戴上了普鲁士国王的王冠，又一次明确强调：王冠是神的恩赐，而不是议会、国民议会和民众的决议授与他的；他把自己看作奉天承运的工具”；他还补充说：“我作为主的工具，不管任何世俗之见，走我自己的路……”

大资产阶级，会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自愿撤出半专制主义政府体制这个要塞、放弃三级选举制组成的普鲁士邦议会——这是防止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强大堡垒^①——吗？他们能不尽一切手段反对向议会民主过渡吗？1914年，保守的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还曾努力使社会民主党人懂得，“在人类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在德国是根本谈不上能“滑进议会政府”的。他说，真正的权力是以武器、军队为基础的，而且难以想象同国王有着活生生传统联系的普鲁士军官团，有朝一日会屈从于一个议会政府；他写道，只有战场上的“惨败”，即德国土地上的一次色当战役，才能摧毁这种反抗。^② 当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色当 [276] 式的失败后，这种反抗才真的被打垮了。那么是否能象伯恩施坦所希望的那样，头脑冷静地等待威廉德国的资产阶级准备同工人阶级结盟，去打破容克地主的权力呢？——德国的这个资产阶级，李卜克内西在辩论中提醒修正主义者说，“既未能在中世纪末，也未能在上世纪末和1848年从容克地主手中夺得它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并且在六十年代普鲁士产生宪法危机的那个时候，非常卑鄙地投降了俾斯麦！^③ 德国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

^① 普鲁士邦议会的三级选举制由于1849年5月30日的政变被强行通过。根据这个选举制，1908年的选民人数是：第一等级 293402人；第二等级 1065240人；第三等级 6324079人。在1908年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得票四十一万八千张，二百一十二席，社会民主党得票五十九万八千张，仅占七席。《社会民主党选民手册》（1911年柏林版），第165页。

^② 德尔布吕克同上引书，第136—141页。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在（1910年1月29日）帝国国会上再次强调德国军官团在国家中是最高统治者的私人工具这一特殊地位，他说：“军官在国家生活之所以有着完全不同于政府官员的地位，一个原因即已解释得清清楚楚：军官不向宪法宣誓，而是只向至高无上的统帅宣誓……”《手册》，同上，第156页。胡戈·普罗伊斯在一份非常透彻的报告中指出，军队是“旧专制国家的国中之国；它拥有自己的与平民百姓迥然不同的国家法……帝国国会和带领十二名士兵的少尉所说的话是十分凶恶的，因为它毫无顾忌和以讽刺的形式说出了真实情况”。胡戈·普罗伊斯：《德国人民和政治》（1915年耶拿版），第65页。

^③ 《会议记录》，同上，第155页。

对现存状况是满意的。它在军事君主政体下感到日子很好过，丝毫无意同工人阶级结盟，去拆毁阻挡社会主义洪流的堤坝——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和王朝特权。^①

伯恩斯坦论证说，如他所认为，由于马克思的贫困化学说是错误的，所以马克思有关阶级对立尖锐化的理论和危机理论，也不能不是错误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社会危机并非必然直接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冲突；它可以产生于大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帝国主义争夺，或者象倍倍尔反驳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在德国产生于统治阶级剥夺工人阶级夺得的权力，或拒绝给予工人阶级政治平等的试图。

这一想法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统治阶级一直用赤裸裸的暴力对付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首先用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从1878年至1890年禁锢社会民主党人达十二年之久；随后是1894年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防止政变法草案”；接着是1897年强行取消萨克森邦议会的平等选举制。两年后，容克地主和普鲁士军官团领袖冯·鲍古斯拉夫斯基少将要求放逐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通过政变取消组成帝国国会的无记名投票选举法。最后是1898年，即召开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前一年，威廉皇帝宣布提出一项“重刑监禁法案”，这是一项对“煽动罢工”处以重刑的法律。社会民主党人面临严重的、现实的、时刻存在的

^① 连最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把王朝特权视为反对社会主义立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保证。在一篇题为《普选权是王朝的权利》的文章（载于《黑森邦报》，第23年度，1907年第25期）中，马丁·拉德虽然也赞成帝国国会选举权，但只是因为“仅仅是我们国家宪法中的一部分”。“除它之外，还有高于它的参议院，”他写道，“没有帝国首相，没有皇帝和王公的同意，再小的条款也不能变成法律……这就是说尽管规定了普选权，还是有其限度的。我们掌握这两个立法机构就可以了。”转引自罗伯特·米歇尔：《论现代民主中的党性社会学》（1925年莱比锡版），第2版，第14页。有关争取议会民主斗争中德国资产阶级各派的分析见阿图尔·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和历史》（19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章。

暴力威胁。

在一届又一届的选举中，涌向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越来越多——在1890年的选举中几乎达一百五十万，1898年的选举中超过二百万。有一天——看来这一天也似乎指日可待——它会以多数进驻帝国国会。它还用害怕政府派“一名少尉和十二名士兵驱散”帝国国会，并通过政变毁掉帝国国会民主选举制吗？倍倍尔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假如危险一直存在，宁愿搞一次政变取消现有的权利，而不是扩大这些权利的话，那么我作为一个有头脑的人不得不说，如果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现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历史的发展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灾难”。^①

党的多数成员相信，德国统治阶级不会不加阻挠地容忍工人阶级充分利用宪法给予的自由和平地掌握政权，而是一旦出现这种危险，就会断然使用暴力摧毁这种自由权利，向工人阶级提出夺取权力的挑战。“我不相信，”1904年考茨基写道，“有人会允许社会民主党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它的政治力量越大，它就越应该准备它的对手推翻现有宪法，代之以一个用武力镇压无产阶级和用暴力行动摧毁它的组织的政权，一个挑起强有力的反抗的暴力政权。”^②党相信，这种灾难不可避免，并将迅速转变成一场革命。党终究坚信，工人阶级能胜利地经受这场革命，因为它深信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党放弃这一信念，发誓抛弃马克思主义，取消阶级斗争，坚决拒绝革命思想和听从伯恩施坦的劝告，宣布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它能赢得什么呢？——一个“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党。党是否能通过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作出妥协而扩大工人阶级社会改革的范围，这一点不能肯定；

^① 《会议记录》，同上，第231—232页。

^② 卡尔·考茨基：《形形色色的革命者》，载于《新时代》，第23年度（1904年），收入他的《政治性群众罢工》（1914年柏林版），第81和83页。

但是绝不会扩大民主权利的范围。不管党用什么语言说话，普
[278] 鲁士选举法也不会垮台，德国也不会变成一个以英国为榜样的
议会民主国家。但是，一旦放弃对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的
伟大历史使命的信仰，那么社会民主运动赖以蓬勃发展的热情
的根基就会萎缩。此外，这样“放弃信仰”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党
的统一和大大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

党的多数成员对修正主义所持态度的答案，可以从汉诺威
党代表大会上一个发言者引述的李卜克内西的观点中找到。李
卜克内西在一本驳斥伯恩斯坦的小册子中写道：“当伊斯兰教唯
一相信自己的时候，它一直是不可战胜的……从伊斯兰教同意
妥协的那个时候起……它就丧失了它的征服力。”李卜克内西继
续写道：伊斯兰教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拯救世
界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却是这样一种信念，他说，“如果社会
主义停止一心相信自己，它就不能征服世界和拯救世界。”^①

这种信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是一种现实的力量。甚至党
代表大会上的修正主义者也投票赞成——也许带着一定的怀疑
心理——决议案，决议案声明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
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们自身的事业”，以及党把“夺取
政权”视为自己的“历史任务”。因此，党“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原
则和基本要求，改变它的策略，改变它的名称”。

5

盖得派当然欢迎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证明
了他们对“米勒兰事件”的态度是正确的。1900年夏，在国际代
表大会开幕前夕，他们的党在伊夫里召开了代表大会，根据汉诺

^① 《会议记录》，同上，第149页。

威决议的精神宣布，党同阶级国家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的关系，因此，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和在有限的时间内“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行进”。

“米勒兰事件”提出的关于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看法上的分歧，迫使1900年9月底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展开讨论。有关这一点的议程是：“夺取国家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

对这个问题，由专门委员会提出两个经过预先讨论的决议案：一个是由考茨基起草和由王德威尔得作出说明的多数派决议案，一个是由费里和盖得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

对少数派决议案作说明的恩利科·费里是刑法学教授，犯罪人类学创始人切萨雷·洛姆布罗索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意大利社会党内革命派代表，同屠拉梯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对手。菲力浦·屠拉梯从一开始成立“米兰社会主义者同盟”^①起，就试图使意大利工人运动拥护改良主义思想。在竞选中和在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中，他赞成同自由资产阶级政党——共和派和激进派——结盟。由于这一结盟，反动的克里斯比内阁得以被推翻，取得了1900年6月选举的大胜；党（在给候选人规定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的情况下）的得票数由1897年选举中的六万八千张增至十七万五千张，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从十五席增至三十二席。屠拉梯策略的这一胜利，加强了改良主义派在党内的力量。在国际开会前两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授权各选区组织与左派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选举同盟。 [279]

考茨基的决议案在有关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选举同盟的问题上，接受了盖得派代表大会的提法。这个决议案没有引起异议，因为它与一系列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是一致的——在辩论中，

① 见原书第230页。

饶勒斯请大家注意这一点：与法国社会党人反对教权主义帝制派叛乱的斗争策略一致，与意大利社会党人反对反动的克里斯比内阁的斗争策略一致，与比利时社会党人反对双重投票选举制的斗争策略一致，与德国社会党人反对海因茨“法律”^①的斗争策略一致；饶勒斯说：“因此，他们得以使歌德的祖国未变成阿提拉^②的祖国”。^③

观点的分歧是在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上出现的。费里-盖得决议案断然拒绝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考茨基的决议案却认为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种临时的和例外的应急措施”，因此是允许的。至于是否存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这是个策略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而对于所属政党的策略问题，代表大会无权作出决定。决议案还指出，“这种危险的试验”，只有经过党的批准和社会主义部长以党在政府中的代表身份发挥作用，才能带来好处。

考茨基的决议案在阐明原则的引言部分中说，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能靠一次单纯的突然袭击，它只能是“无产阶级长期和艰巨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工作，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更新，以及逐步夺取乡镇代议机构中的和立法机构中的议席构成的结果”。但是由于夺取政权“不能通过蚕食实现”，所以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被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

[280] 不过，1900年代表大会讨论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政党——法国社会主义政党除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尽管当自由党总统卓万尼·焦利蒂1903年邀请菲力浦·屠拉梯及1911年邀请列奥尼达·比索拉

① 似指190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卖淫的伪善的资产阶级法律，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656页。——译者

② 阿提拉(约406—453)是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译者

③ 《1900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柏林版)，第20页。

蒂入阁时，这个问题对意大利社会党人很快也变得现实起来。但是，由于这两位社会党人感到有义务遵守国际巴黎决议以及党决定不让他们参加政府，所以他们拒绝了焦利蒂的邀请。

几年之后，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也遇到了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在1913年5月选举获胜后就是如此。他们成了丹麦最强大的政党，党的主席托尔瓦德·斯陶宁格应国王邀请组织政府。党虽然在1908年代表大会上援引国际的决议宣布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左派——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和激进派——的选举胜利，现在使党有可能着手改革1866年的选举制度——它成立伊始就为此奋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准备同其他左派政党联合组成政府。但自由党人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不过后来由特奥多尔·萨勒组成的左派自由党政府却是依靠社会党人支持的，这样，党虽然没有参加政府，仍然能够实现自己的改革要求。

在瑞典，党在1914年宪法危机中决定参加政府。在1911年代表大会上，瑞典党曾援引国际决议宣布，只允许在非常的政治紧急状态的压力下参加政府。这种情况在1914年出现了；国王解散自由党人的政府，并不顾议会中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多数的抗议，任命一个保守党人为首相。在争取议会大权先于王室特权的斗争中，党决定加入政府。

但是在国际巴黎代表大会期间，人们讨论的实际上只有法国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的问题。关于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选举同盟的决议案，在欢呼声中获得通过。在投票表决考茨基的决议案之前，科斯塔以意大利多数代表的名义声明他们将投赞成票；饶勒斯也以布鲁斯派和独立派的名义声明赞同决议案；盖得和瓦扬投票反对。此外，波兰、俄国和美国代表团也各自分成赞成和反对两派投票。决议案以二十九票赞成、九票反对获得通过（党不分大小，每个国家均为两票投票权）。投赞成票的有德

国、英国、奥地利、波希米亚、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根廷，投反对票的有保加利亚和爱尔兰。

6

[282] 然而，巴黎代表大会上有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问题的辩论，只不过是国际内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激烈争执的前奏；在1904年8月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这一争执才真正展开。要求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的建议是盖得派提出的，他们的1903年9月里尔党代表大会提议，将“社会主义策略的国际原则”列入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议程，并提出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进行讨论表决。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03年6月选举中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于8月在德累斯顿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党得票三百多万张，占选民的三分之一——比1898年增加九十万张，有八十一名议员进入国会。这次党代表大会要回答如何充分利用通过选举赢得的权力这一急需回答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工会在克服了初时的犹豫后也已接近这一派——从选举结果中引出结论，认为党现在终于应放弃对现存国家的敌对态度，把它发展得非常强大的力量投入争取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斗争，并首先在议会中充分发挥作用。伯恩施坦经历了二十年流亡生活，在1901年取消对他的逮捕令后回到德国，次年被选进帝国国会。他提出，为了增强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党应要求在帝国国会领导中拥有代表，即要求获得它应该有的合理合法的副议长职位。

可是，社会民主党任副议长的问题，却与一个深深触及党的自尊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帝国国会议长作为帝国国会的代表可以说是“面君资格的”，他们为了某些事情受帝国元首召

见。而这个帝国元首却是毫不隐瞒对社会民主党人憎恨和蔑视的威廉二世皇帝。他在讲话中把他们称作不听话的需要进行管教的臣民^①，并一再扬言要叫他的士兵枪杀他们。伯恩施坦 [283] 的建议指望，党的代表按照宫廷礼仪向这个自以为德国是他的庄园、工人是他的奴仆的头戴皇冠的容克地主表示尊敬，让党遭到诽谤——这正是这个反复无常的大人物求之不得的。

得到福尔马尔及其一帮人支持的伯恩施坦建议，在党的集会和多数党报上遭到愤怒拒绝。^② 但是，这一建议只是党内不断增长的修正主义思潮的一个征兆，党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辩论。

修正主义者把选举的胜利看作是他们代表的改良主义策略——党为争取社会和政治改革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他们断言，这一策略为党新赢得了几十万选民的支持。党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得越彻底，越是彻底地从事这样的改革工作，党就能吸引越多的群众。

然而，倍倍尔在辩论中对这一看法提出反对，指出修正主义者要求党把全部力量投入社会改革只不过是“多此一举”；党

^① “共和主义者本质上是革命者，所以理应受到同必须以枪毙的或绞死的人一样的待遇，”1895年底威廉二世在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上帝赋予我们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和皇帝的一个神圣职责是：维护神权的原则。”转引自埃米尔·路德维希：《威廉二世》（1926年柏林版），第175—176页。他在1895年色当纪念日向他的部队发表的演讲中，把社会民主党人诬蔑为“一帮不配称作德国人的人”，并号召同“这群大逆不道的人进行斗争，使我们摆脱这些不良分子的影响”。在1891年11月23日近卫部队新兵宣誓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他在谈到“内部敌人”之后说：“不信上帝和不满情绪在祖国抬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可能出现你们的亲戚、兄弟、甚至父母亲不免被枪杀或捕死的情况……”《手册》，同上，第25页。

^② 党在赢得1912年选举辉煌胜利——得票四百二十五万张，超过了总票数的三分之一——后，还是决定要求进入帝国国会领导。它提出菲力浦·谢德曼为副议长一职的候选人。他当选了，但拒绝进宫廷，并于几星期后辞职。

从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为工人阶级每一个微小的利益进行了斗争,并且在凡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时候,也同资产阶级的一翼进行了合作——例如在决选投票中,或在帝国国会就某些法案进行表决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矛盾的核心,不在于争取改革斗争的必要性问题——这种必要性是毋庸争辩的——,而是将这种斗争加以美化的思想。党在从事自己艰巨的近期工作的时候,不可失去它的伟大目标,以及给它的存在增添尊严和荣誉的历史使命。社会民主党同任何其他政党的区别就在于此,而且正因为党指明未来,是未来的担当者,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在它的旗帜的周围。因此,怎么能够期望党放弃它成长的基础,离开、而且恰恰是离开使它得到壮大的道路呢?

党代表大会拒绝这一思想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以二百八十八票赞成、十一票反对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谴责“修正主义企图改变我们迄今经受了考验并取得了胜利的策略,即以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对手夺取政权的政策”。决议继续指出,这样一种策略将使正在致力于争取尽快变

[284] 现存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党——因此它是“真正所谓革命的”——,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改良的党。决议声明,党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有政治和经济状况拒绝承担责任,因而不接受任何适合于使统治阶级得以保持其统治的手段。决议最后宣布,根据国际巴黎代表大会通过的考茨基的决议案的精神,党“不能争取参加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政权”。^①

^① 关于辩论和决议的全文见《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协商记录》(1903年柏林版)。

这就是盖得派提请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进行讨论表决的决议案。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以这一决议确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盖得派提议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策略的国际准则。

然而，在这一决议案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进行预备性讨论之前，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它虽然保留了德累斯顿决议的原则，但删掉了其中涉及德国党内矛盾的有关提法，即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的谴责。

对于德累斯顿决议的原则在辩论中——共进行了四天（委员会三天，全体会议一天）——没有出现反对意见，^① 它得到所有政党，包括饶勒斯小组的认可。由于盖得派提议将德国策略方针变为国际的策略方针，这就给辩论带来了分歧。比利时、瑞士、英国，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代表团——瑞典的布兰亭、丹麦的克努森、挪威的克里格尔——表示反对，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与左派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暂时的同盟，进行争取普选权或反对保守政府的斗争。

但是盖得派之所以提出这个提议，目的不是在于要国际对这些政党的策略作出裁决，而是对从米勒兰参加左派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政府以来、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饶勒斯小组的策略作出裁决。

虽然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期间“米勒兰事件”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米勒兰任职的瓦尔德克-卢骚政府已于1902年辞职，在接替瓦尔德克-卢骚政府的孔勃内阁中并没有社会党人，[285] 但尽管如此，饶勒斯小组仍是这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① 关于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上的辩论见《1904年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柏林版）。

饶勒斯曾经支持米勒兰，是为了制止由于教权主义帝制派反叛共和国所面临的致命危险。但是，随着孔勃政府的成立，这一斗争才真正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埃米尔·孔勃原是注定要厕身教士之列的，当上了神学教授，当他背离教会当了医生，并成为—一个致力于以政教分离为目标的运动的领导人的时候，他已经被授予低级的圣职。他是被急速发展的反教权主义浪潮推上台的。上台执政时，他决心彻底摧毁法国教会的世俗权力。在这场斗争中，政府要依靠议会中社会党人的选票。饶勒斯小组认为，在这一点上支持政府是自己的职责。

从1789年革命开始的、历时一个世纪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深深地激励了法兰西民族。这是一场教会反对革命，反对革命中产生的思想，反对思想自由、教育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在1789年以来法国进行的所有革命——1830年、1848年和1871年革命——中，教会的影响都受到了遏制；巴黎公社曾经宣布国家脱离教会。但是在反革命时期，教会一再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并壮大了它的力量。^① 实际上，它是一支同国内所有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巨大力量，是共和国的死敌。此外，它也是一种国际力量，隶属于罗马教皇政府的权威之下。

各派共和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教会势力，他们首先致力于剥夺1850年由《法卢^②法令》授予教会的对学校的统治权。这项法令是把学校视作培养激进主义场所的反革命势力的一个措施。在教会的统治下，学校成了仇视共和国的温床。1882年，茹尔·费里政府在法国实施普及世俗义务教育的法令，彻底改变

^① 从第二帝国开始的1851年至1878年，法国修女的人数从三万四千增至十二万八千，修士的人数从三千增至三万二千。在德雷福斯危机期间，法国有三千二百一十六个天主教主教会，成员近二十万。教会团体的财产达五亿八千一百万金法郎。J·P·伯里：《1814至1940年的法兰西》（1954年伦敦版），第161和199页。

^② 指弗雷德里克·阿尔索勒德·比埃尔·法卢（1811—1886），曾任法国教育部长、宗教部长。——译者

了公办小学的义务性质。但是，在德雷福斯危机期间，五百万小学生中仍有约两百万在教会学校上学。德雷福斯危机中反共和国的帝制派的暴乱，促使政府制定其他反对教权主义统治的法令。这次暴乱是教会策动的，将它的由教士、修士和修女组成的大军，投入反对共和国的进军。在1898年选举中，反共和国的教权主义帝制派的暴乱被挫败，瓦尔德克-卢骚毫不犹豫地颁布 [286] 法令，遏制教会的影响。天主教主教会——当时有三千二百一十六个——被置于结社法管理之下，它的存在需经国家批准，未经批准的天主教主教会不得授课。但是，其政府得到饶勒斯支持的埃米尔·孔勃，把反教权主义斗争的目标引向极端。他在1904年7月颁布法令，干脆剥夺所有天主教主教会的授课权，并在同一个月断绝法兰西共和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外交关系。1904年11月，他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政教分离、取消教育预算和没收教会财产的法案。1905年12月，这个法案以措词比较温和的形式获得众议院通过。

对饶勒斯来说，反对天主教会——他将天主教会刻划为“最强大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奴役势力”——的斗争，是争取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思想自由的斗争。对他来说，这也是一场保卫共和国真正基础的斗争。象资产阶级民主党领导人甘必大和革命的共产主义领袖布朗基一样，他在代表大会上说，他把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看成是民主的首要任务。

在这场斗争中，他同孔勃政府结成了联盟，并把他的于1904年4月创办的《人道报》锤炼成有力的武器。

但是，他所支持的孔勃政府象前任瓦尔德克-卢骚政府一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的基础是“右派集团”，即由饶勒斯领导的社会党议员小组和激进的社会党人以及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盟。尽管饶勒斯小组不是政府成员，但它变成了这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匿名内阁”。而这一立场却是与德累斯

顿决议相违背的。倍倍尔指出，德累斯顿决议谴责了同资产阶级政党“持久结盟”。

代表大会上很多人发言——如考茨基、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罗莎·卢森堡、丹尼尔·德·莱昂、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特别是茹尔·盖得，均以德累斯顿决议的提法作为根据，批判饶勒斯小组的策略。但真正的起诉发言是倍倍尔作的，饶勒斯作了辩护发言——一场杰出的而且事实上是意义重大的唇枪舌战，其影响从代表大会会场一直传播到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①

倍倍尔拒绝承认将德累斯顿决议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进行辩论的责任在于德国党；这是在德国党没有插手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但是既然现在决议已经讨论了，他就毫不迟疑地为它辩护，因为——如他所说——决议不仅仅适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德累斯顿决议反对的思潮不只具有德国一国的，而且也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些思潮——他说——存在于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尤其是法国。因此德国党认为，德累斯顿决议中确定的对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策略方针，也应该为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所承认。

饶勒斯却指出全部成绩，指出倍倍尔所批判的策略所做到的事情。“我们在一次反动政变随时都可能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挽救了法国的共和宪法。^②我们为自由思想准备了一个活动场所，我们击退了教权主义，我们主张世界和平，我们抛弃了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恺撒主义，”他声明说。

然而倍倍尔反问道：你们所拯救的共和国真的值得工人阶级为它作出牺牲吗？他说道：“不管我们多么羡慕你们法国人有自己的共和国，但我们不会想到为它去拚命。”君主帝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两者都是阶级国家，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

政体。他列举一大堆例子,说明在资本和劳动的冲突中,其存在取决于社会主义者支持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是怎样坚决代表资本的事业和动用国家武力对付罢工工人的。他说,共和制的阶级国家同君主制的阶级国家的区别在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阶级斗争的进行要公开化得多。

但是,饶勒斯在反驳中指出共和制和君主制国家之间,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军事君主帝国之间的某些本质性的区别。“你们生活在皇帝和封建的政权之下,”他对倍倍尔大声说,“我们却生活在民主共和的政权之下。我们的所有公共权力都来自民族主权,并且对民族主权负责。群众的普选权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

倍倍尔不否认这一点。他承认德国是“一个特别封建的警察统治的国家,除了俄国和土耳其之外,也许它是欧洲反动统治最厉害的国家”。

但是,饶勒斯回答道,如果说德国和法国之间存在这种宪法 [288] 上的差异,那么由此也就产生了党所负责的程度不同和有必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如何投票,这对一个政府的存在无关紧要,”他说。但是,在法国,是存在一个反动的或者一个资产阶级的进步政府,其决定权在社会党人手里。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问题和支持资产阶

① “一场政治辩才的出色表演,这是每个有幸亲眼目睹的人永生难忘的,”阿德勒在发表于《工人报》上有关代表大会的报道中这样写道。《维克多·阿德勒论文集》,同上,第7卷,第41页。

② 历史研究证实了饶勒斯关于没有社会党人的参加共和国就不能制止反动危险的说法。1899年8月,由帝制派、波拿巴分子和布朗热将军的追随者密谋试图发动一场政变。“如果社会党人在1899年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左派联合政府,那么右派就会成立联合政府……假如瓦尔德克-卢骚和他的朋友由于考虑到自己(在众议院中)的微弱多数而执行一种犹豫不决的政策,不逮捕八月密谋分子,不彻底改组总参谋部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不采取保卫共和国的果断措施,那么反动派仍然会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胜券在握地参加1902年的选举。”罗杰·索尔托:《十九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1913年伦敦版),第11章。

级政府，在德国也不同于在法国，法国的政治情况给工人阶级特别提供了直接或间接参加议会制政府的权力。

倍倍尔在他的赞成把德累斯顿决议国际化的发言中，对法国社会党的内部政策作了批判性的剖析。因此，饶勒斯也要求有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政策加以批判性的审议。对德国党他只能说钦佩的话。他说，这个党“给国际社会主义造就了几个最有力的和头脑最敏锐的思想家，树立了一个机构健全的和力量强大的组织的榜样。这个组织不怕任何牺牲，在任何打击下都毫不动摇”。他还转过脸对着德国代表们说：“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党。你们是德国的未来，是讲文明和能思维的人类的最崇高和最光荣的政党之一。”

他接着说，但是，这个党的伟大和光荣，同它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处于令人担心的矛盾之中。“在目前这个时刻，给欧洲和世界，给保障和平和确保政治自由、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进步造成重担的，不是所谓的妥协，不是法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拯救自由、进步及世界和平的冒险尝试，而是”——他在代表大会“非常激动”——代表大会记录上这样写道——的情况下这样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在六月选举中党赢得了三百万张选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啊！但是，在党的表面上的政治力量同影响和行动的实际力量之间，岂不是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矛盾，而且选举力量越大，这个矛盾也就越大吗？饶勒斯这样补充问道。

饶勒斯提出为什么德国工人阶级对政治和社会环境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的问题。他说，这是因为，无论是它的传统还是德国宪法的体制，都不允许这个党将它巨大的选举力量投入到政治行动中去。德国工人阶级缺少革命传统，他说，“德国工人阶级有令人钦佩的忘我献身的事例。但在它的历史上没有革命传统。普选权不是通过街垒战争取得的，而是由上面赐给的。但

是，如果说难以设想从亲自争得东西的人的手中夺走东西的话——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东西再夺回来，那么相反地，却可以设想从上面收回上面所赐给的东西。”他还提醒注意，党曾经容忍在“你们的红色王国，你们的社会主义王国萨克森”^①毫不反抗地被夺走普选权。 [289]

饶勒斯继续发表不同见解。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另一个根源，在于德国宪法的结构。“即使你们在帝国国会中占了多数，”他对德国代表们大声说，“你们的国家也将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力量虽占多数但不能当家作主的国家。因为你们的议会只是半个议会。一个议会如果手中没有掌握执行权、治理权，如果它的决议仅仅是一些可以被帝国当局任意勾销的意见，那就不成其为议会。”

倍倍尔的回答揭示了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心理学上的对立见解。饶勒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有三百万张选票却仍然无权。“饶勒斯到底希望我们在取得了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做什么呢？”倍倍尔问道，“难道要我们发动这三百万人开到皇宫前，把国王赶下台吗？”这一反问使会场活跃起来，但它没有触及德国党政治上无权的根本原因。不过倍倍尔继续说：“就我们来说，三百万张选票恰恰是不够的。等我们有了七百万、八百万张选票时，我们再来看吧。但是在资产阶级拥有八百万张左右选票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那我说不上来。”倍倍尔用这些话暗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略：通过赢得帝国国会中的多数，推翻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和帝国的个人统治。

但是，统治阶级会安心地等待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中赢得多数吗？它们不会在此之前取消普选权吗？

饶勒斯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此，倍倍尔作

^① 萨克森被称为“红色王国”，因为在1903年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占领了该邦二十三个选区中的二十二个。

了回答：“那就让我们等着瞧吧！”他的言外之意是，到那个时候，工人阶级就会用革命的武器进行自卫。但是法国无产阶级在1793、1848和1870年没有坐等成为议会中的多数，他们举行革命，在街头争得了他们的自由权利。

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国际所有其他政党也是一样，俄国党例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前后，变成了一个议会民主政党。它争取通过民主体制成为议会中的多数赢得国家的权力，然后再经过合乎宪法的立法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它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党，因为它决心在赢得议会中的多数之后，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290]看到了统治阶级进行反击的危险，这一反击会迫使它采用议会以外的方法保卫自己。但是，通过革命，即进行一场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权力的想法，在它的意识形态中已不再占有地位了。

据担任报告人的王德威尔得证实，代表大会上的辩论“没有任何个人之间为小事而争吵的痕迹，始终本着原则性分歧的高度”进行。但尽管如此，倍倍尔的一句话还是使法国代表团感到不悦。显然是饶勒斯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普选权不是通过街垒战争得的，而是上面赐给的这一说法伤害了倍倍尔。他回敬说，第三共和国也不是法国工人自己夺来的。他对法国代表们大声说：“是通过你们的敌人俾斯麦在色当战役后把拿破仑第三押到威廉斯赫埃^①，你们才得到了共和国。”法国代表们感到震惊，难道倍倍尔忘记了巴黎公社的战斗？

在决议案投票表决前，安塞尔向俄国、波兰、保加利亚、西班牙和日本等国不发达政党的代表发出呼吁，在表决这个仅仅对负有重大责任的政党才有意义的问题时弃权。

声明坚持社会主义策略的普遍原则而不提谴责改良主

^① 威廉斯赫埃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拿破仑第三被普军俘虏后被囚于此。——译者

义——象德累斯顿决议的提法一样——的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以二十一票对二十二票被否决。安塞尔的呼吁没有起作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比利时、奥地利、阿根廷、丹麦、荷兰、瑞典和瑞士等国各有两票赞成，法国、挪威和波兰各有一票赞成。德国、保加利亚、波希米亚、西班牙、北美、匈牙利、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各有两票反对，法国、挪威和波兰各有一票反对。

德累斯顿决议案接着以二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十二票弃权获得通过，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保加利亚、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波兰、俄国、日本和美国各有两票赞成，英国、法国和挪威各有一票赞成，有一票反对的是英国、法国和挪威，英国殖民地有两票反对。阿根廷、比利时、丹麦、瑞典、荷兰和瑞士各有两票弃权。

饶勒斯对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投了赞成票。他被击败，盖得获胜了。但是对他们两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分裂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问题。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呼吁所有陷于分裂的社会主义政党——决议首先是考虑到法国党的情况——把运动统一起来，并发出欢迎饶勒斯小组代表比埃尔·列诺得尔和盖得派及布朗基派代表瓦扬所作的他们准备联合起来的声明。1905年4月，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巴黎举行的联合代表大会上，真的实现了联合。新成立的党取名社会党，并经亚历山大·布拉克提议，为了尊重党最初的历史，再加上一个名称：国际工人法国支部(S. F. I. O.)。

国际关于总罢工的辩论

1

工人运动有史以来,每当其他手段失灵以后,总罢工的思想就一再激励着它。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总罢工,是1839年2月宪章派全国会议宣布的。英国工人阶级联合资产阶级为争取普选权搏斗了近二十年。但是,共同斗争的成果——1832年选举法改革——却被资产阶级所独吞,工人阶级得不到选举权。在斗争的最后阶段,资产阶级进行了一次金融罢工——他们从银行中提走自己的存款。这一武器产生了效果。而工人阶级的武器——集会、上街示威和向议会请愿——却失灵了。于是,群众被总罢工思想吸引。这一思想在三十年代宪章运动中被热烈地讨论过,而且在由二百二十八万三千多名工人签名的要求普选权的请愿书被议会拒绝之后成为了行动。虽然罢工的号召在群众中反响甚微,但过了三年,当第二份由三百三十多万名工人签名的宪章派请愿书再次遭到议会拒绝之后,工业发达的北英格兰的几十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①

这是工人运动史上首次政治性群众罢工。它不是有计划进行的,而是一次自发性罢工。它从1842年8月初开始,历时三个星期。可是,工会的财政储备少得可怜,无法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饥饿驱使他们返回矿山和工厂。

[292] 对这一点,宪章派领袖们早已料到。因此,一些人在他们的

^① 1842年宪章派请愿的时候,英国人口不到一千九百万,其中约有八百万住在城市里。三百三十万签名者代表了全国城市成年人口的几乎半数。

代表大会上及宪章派报刊上劝阻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另一些人赞成总罢工，指望由此发动武装起义和导致社会革命；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总罢工失败了，也是唤起工人群众阶级觉悟和接受革命教育的好办法。有关总罢工的各种观点——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作为武装暴动的杠杆，作为争取实现直接政治目标的武器，作为“革命体操”的办法以及作为“行动宣传”的手段——，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将这些思想概括成理论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把它们付之实际行动之前，宪章派已讨论了半个世纪。“人们认为自己已处于直接的现实之中，”麦克斯·贝尔在记述宪章运动中有关总罢工辩论的情况时这样指出。^①

2

宪章运动失败后，英国工人抛弃了总罢工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工人运动中，由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鼓动而重新活跃起来。当第一国际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人阶级是否有力量制止战争的问题时，代表大会毫无争论地通过了比利时和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这使马克思吃惊不小，决议案简单地声称：“因为如果生产在一段时间内停顿，社会就无法存在……所以停止工作足以使一场战争不可能发生。”它建议工人“一旦他们的国家真的爆发战争，即行停止工作”。^②

第二国际却认为，总罢工是一个比较复杂，对它的结果必须作出仔细思考的问题。在1889年国际巴黎成立代表大会上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一名法国代表提议，作出以总罢工形式举行五一节群众集会的决议——“作为社会革命的开端”。这项提案在临近代表大会结束前才提出，因而未能深入进行讨论，只有

① 贝尔同上引书，第262页和以后各章。

② 见原书第148页。

李卜克内西发表了意见。他说，总罢工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它首先要求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于是提案未被采纳。

国际就总罢工问题首次进行真正的辩论，是在下一届1891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辩论又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一个使国际在其整个历史上不得安宁的问题：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是否无法通过工人阶级的行动予以制止。辩论——见国际对战争问题的态度一章中的叙述^①——以多梅拉·纽文胡斯的提案为基础，提案要求“号召人民普遍停止工作来对付任何可能的宣战”。出席代表大会的十六个国家中，有十三个拒绝接受总罢工是可能制止战争的武器的观点；除荷兰外，只有英国和法国代表团的多数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

在此期间，比利时经历了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浪潮：1886年，1887年，1891年和1893年。这是为争取普选权斗争的群众罢工。1886年和1887年的群众罢工——工人们自发以暴动形式举行的罢工——是由阿尔弗勒德·德非伊索的战斗檄文《人民教义问答手册》发动的。1891年和1893年的群众罢工是党号召举行的，党在1891年代表大会上承认总罢工是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武器。^②

比利时的总罢工，特别是1893年的总罢工表明，总罢工并不象李卜克内西认为的那样，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工人们实际上使国家的经济生活陷于停顿，并炸开了禁止他们入内的紧闭着的议会大门。它们也证明，总罢工是工人阶级武库中的一件有用的武器。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法国工会代表提议，将“世界性罢工”问题列入1893年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议

^① 见原书第332页。

^② 见原书第278—279页。

程。

这一提案被指定由一个代表大会委员会事先进行讨论。但是考茨基起草的一个决议案反对“世界性罢工”的想法，因为“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它看来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决议案声明，总罢工在个别的工业部门可以成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不仅用于经济斗争，而且也可以用于政治斗争的极为有效的武器”。然而，由于代表大会议程上有其他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个决议案未能提交全体大会讨论。不论如何，群众性罢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得到了代表大会一个委员会的承认。

可是，法国工会领导人对苏黎世代表大会处理他们的提案的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又将它提交给下一次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辩论。他们说，就算世界性罢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等于说在个别国家中的总罢工也不可能实现，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认真审议。他们提议，由代表大会要求所有政党和工会研究这个问题，并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辩论。可是这个提案—— [294] 它交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也未能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欧仁·盖拉尔代表法国工会抗议一个对法国工人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因为据他说，他们认为总罢工是“他们拥有的最革命的武器”——问题得不到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辩论的应有机会。他还宣布，法国工会将把这个问题提请列入下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

3

总罢工问题事实上是法国工会运动的根本问题。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一次又一次——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巴黎代表大会(1893年)、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和里摩日代表大会(1895年)——就总罢工进行了辩论，并越来越强调拥护总罢工。不过对法国工会来说，总罢工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用来达到政治

目的的武器。它们拒绝议会政治和议会社会主义，即使是象盖得派所代表的具有马克思革命内容的议会社会主义也罢。

工团主义——唯工会行动论——是工人对以政治行动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感到失望的产物。法国虽然实行以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但议会民主并未实现工人的革命愿望。工人出于革命的急躁情绪根本摒弃议会政治。他们感到，社会主义政党为夺取议会权力进行搏斗毫无意义，而且只有害处，因为这种搏斗阻碍阶级斗争，消耗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使大好的工会事业变得疲疲沓沓。议会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圈子，是机会主义的滋生地，政治机构则是夸夸其谈者、骗子手和向上爬者的跳板。工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只有组织成工会进行“直接行动”^①，才能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在无政府主义观点的重重包围之中，工团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消灭国家政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种没有国家的、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团。

[295] 革命的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关于议会政治、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总罢工目的问题的争执，使1892年起的历届法国工会代表大会不得安宁。它动摇并终于破坏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统一。1894年9月的南特代表大会，确定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决裂。由茹尔·盖得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盟”宣告瓦解。

在南特代表大会上，茹尔·盖得在与革命工团主义精神之父费迪南·佩卢蒂埃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遭到败绩。佩卢蒂埃(1867—

① “直接行动”被工团主义者捧为一种“伦理原则”，“同谈判的策略、公事程序和代表制度相互谅解的策略相反，这种原则倾向于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并进一步通过直接自救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和集权下获得解放”。埃里希·米扎姆：《工人群众在解放斗争中的直接行动》，载于《总罢工》，《自由工人》每月副刊，第1年度(1906年10月)。

1901)出身资产阶级,父亲是邮政官员,祖父是律师,叔公是男爵。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受一股激情驱使投身政治。他作为一名激进的记者开始他的生涯,很快就加入了盖得派。但是出于对议会政治和政党活动的失望,他逐渐接近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他把工会看成未来社会制度的细胞,把总罢工看成社会革命的杠杆。在无数文章和小册子中,他将社会主义公团的性质和结构——按照他所想象的那样——解释为一种没有国家的社会,这个社会理当建立在组织成工会的生产者联合会的基础之上。他创立了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①

佩卢蒂埃于1894年成为劳动介绍所全国联合会——最初是劳动介绍所,逐步发展成为工人运动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中心——书记。一年后,在里摩日(1895年)代表大会上,工会联合组成劳动总联合会(C. G. T.),这时劳动介绍所全国联合会参加进去,作为劳动总联合会内部一个有自治权的组织,但于1902年的蒙彼利埃代表大会上与之合并。从此,劳动总联合会成了革命工团主义的支柱。

1898年,维克托·格里菲尔埃担任劳动总联合会书记。他以鞋匠为职业,是一个鲁莽、大胆而又有阶级觉悟的工会领袖,从思想立场来说属于布朗基派。他把布朗基派关于“有觉悟的少数”有任务带动“迟钝的群众”的理论,同工团主义的概念糅合在一起。他最重要的同事是埃米尔·普热(1860—1923),此人 [296] 是工会报纸《人民之声报》编辑、一位有才华的记者,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体操”思想最坚定的代表,他认为劳动总联合会

^① 在1906年工会代表大会上,工团主义的社会目标曾如此载入著名的亚瑟·克拉克的章程:“今天是一个战斗组织的工会,未来将是进行生产和分配(商品)的组织和革新社会的基础”。见瓦尔·R·洛温:《法国工人运动》(1954年哈佛版),第30页;又见欧根·内夫:《法国工团主义史初探》(1953年苏黎世版);J·保罗·维尔茨:《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1931年苏黎世版);Ed·多莱昂:《法国工人运动史》(1848年巴黎版),第2卷,1871—1936年。多莱昂曾亲身参加革命的工团主义运动。

首先是一所为革命准备条件的锻炼“意志的学校”。

1894年南特工会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具有非常权力和经费独立的特别委员会，着手准备总罢工。按照革命工团主义的计划，总罢工原是用来作为举行革命的最后信号，是由工人没收工厂、矿山和从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的信号；但也考虑到总罢工有任务对工人进行革命训练，增强他们的团结性，锤炼他们的斗争意志——一种“革命体操”的方法。由于相信若尔日·索列尔想出来的“总罢工的神话”，工团主义者找到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唤起意想不到的创造力的热情的源泉。按照索列尔的理论，历史上所有曾经促使人类社会更新的伟大运动——例如原始基督教、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复兴运动，它们的动力都是一种社会神话，一种唤起“史诗般精神状态”的完美无缺的违背理性的理想。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革，就是在神话的社会价值和现存社会制度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中完成的。索列尔说：总罢工的社会神话是更新社会、促使社会变革，摧毁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的基本动力——这种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工团主义者的领袖。^①

[297] 工团主义者也不怀疑总罢工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拥有巨大的权力机器，仍抵挡不住工人阶级的进攻。例如，欧仁·盖拉尔 1896 年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他们实际的设想。“工厂、车间和百货商店必须保卫，这将分散军队的力量，”他这样分析说。“单是害怕罢工的工人破坏铁路路轨和信号装置这一点，就将迫使政府派出部队驻守三万九千公里长的法国铁路网。假如派出三十万军队用来保卫三千九百万米长的铁路路轨，那么每一百三十米才摊到一名士兵——一名士兵和另一名士兵当中相隔达一百三十米远。这样一来，政府就无法同时保护仓库和工厂了。工厂主将失去靠山，只好自己照顾自

^① 见若尔日·索列尔著爱特华·A·希尔斯序：《对暴力的反应》（1950年格伦科-伊利诺斯版）。

己，而城市里的革命工人则可以放开手干。”^①

4

如同欧仁·盖拉尔在伦敦代表大会上预言过的那样，法国代表团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将总罢工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它以工会代表、阿列曼派和饶勒斯小组的名义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代表大会呼吁“全世界工人”“为总罢工而组织起来”。决议案说，总罢工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施加压力——这是导致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杠杆”；但是在有利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被用来进行革命”。

决议案由佩卢蒂埃的朋友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白里安是总罢工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他曾向1892年马赛工会代表大会提出过一份关于总罢工的意见书，并在1849年南特工会代表大会上反对盖得，主张总罢工的事业。他是国际运动史上总罢工思想的先驱者。如同他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所阐述的那样，他认为总罢工是整个工会组织的“革命的行动方式”，这一方式最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象在南特一样，他在巴黎也宣称：“对我来说，总罢工是革命的一种手段，但这是一场比过去更具有保证的革命，一场不至于再让个别人攫取胜利果实的革命，它可使无产阶级能够夺取社会的生产资料，并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是参加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团对 [298] 总罢工的胜利前景却极表怀疑。德国工会运动的建筑师卡尔·列金反驳白里安说，总罢工的先决条件首要的是强大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进行总罢工，只会叫资产阶级高兴，”他说：“几天之内资产阶级就会把它镇压下去，可能是使

^① 转引自路易斯·莱文(洛温)：《法国工人运动》，载于《历史、经济学和公法研究》，第26年度(1912年)，第89—90页。

用武力，这样数十年的工作就毁于一旦”。他还以多少有些高傲的态度指出：“但愿我们的法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注意必要的组织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将支持他们。”^①

赞成白里安-阿列曼-饶勒斯决议案的，只有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各投一票，以及葡萄牙和阿根廷各投两票。获得多数赞成的决议案确认了由伦敦代表大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承认“罢工和联合抵制是实现工人阶级的任务的必要手段”，但拒绝了国际总罢工的思想。可是两个代表大会，即伦敦代表大会和巴黎代表大会，都回避了原来的各国总罢工问题，它们没有就这一问题的作用进行探讨。

5

在此期间，在一系列国家——在比利时、瑞典和荷兰——总罢工已变成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这一次率先行动的又是比利时。比利时工人在1893年的总罢工中通过斗争进入了议会。但斗争的成果是妥协——双重投票选举权，这种选举权虽然使工人阶级的代表进入了原来一直被排除在外的议会，但却巩固了教权主义者的优势。在争取平等的选举权的斗争中，1901年4月列日党代表大会声明，“在紧急情况下也要发动总罢工和街头骚动”。

正好过了一年，即1902年4月初，比利时一些城市真的发生了街头骚动。它们是自发产生的。党没有号召工人们这样做。骚动的原因是议会中社会主义派和教权主义派议员之间关于选举

^① 《会议记录》，同上，第32页。白里安在1904年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也代表国际总罢工的事业。两年后，他因违反国际决议参加克利孟梭内阁而被开除出党。1910年他当上了总理，并于同年镇压了一次铁路工人罢工。他派军队占领大小车站，把铁路工人作为后备军征集入伍，用军事命令迫使他们停止铁路罢工。

法改革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议会的鼓动在大城市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中引起了反响，”王德威尔得报告说。“当右派议员开完议会会议晚上返回自己的住所时，对立派群众聚集在各地火车站等着他们。工人们从四处涌向街头。”^①工人和警察及宪兵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并开了火。随后党号召工人停止巷战，举行罢工。 [299]

但是政府对这场斗争事前已作了准备。除了六万名驻军部队外，它还征集了好几个年龄幅度内的预备役兵员和民团。4月18日晚，当获悉议院否决了选举法改革时，又发生了街头示威活动，与拥有武装的国家政权发生冲突。在勒文，民团向一部分示威群众开了火，六人死亡，许多人受伤。

党的总委员会现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它应该坚持总罢工进而发动革命起义呢，还是中断总罢工。因为战斗继续下去势必引起内战。鉴于国家武装力量的巨大优势，党不能就这一命运攸关的步骤作出决定。但与此同时党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即中断罢工——自认失败——是否会使运动丧失信心和动摇党的结构。党认为不能承担跳过内战深渊的责任。党也曾庄严地表示过有义务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党号召工人们回去复工。

这时出现了社会斗争史上最令人惊异的事情。一场深深地激发工人热情的火热的斗争有条不紊地转入退却。工人们以当初响应党的号召在矿山和工厂里放下工作的同样的纪律性，重新复工干活。党虽然失败了，但并未遭到灾难。党没有象列金害怕一旦总罢工失败将要发生的情况那样被消灭掉。工人们更加紧密地聚集在党的周围。

^① 转引自尤勒斯·梅西内：《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948年汉堡版），第67页；另见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902年比利时的选举法斗争》，载于《社会主义月刊》（1902年）和《1885年至1925年的比利时工人党》（1925年布鲁塞尔版）。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开始了以总罢工为武器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斗争，它选定另外一种策略——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新策略。它不象比利时那样让工人们自发起来发动罢工。它制定了总罢工的计划，并且规定了罢工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

瑞典社会民主党作出的以总罢工为武器争取普遍选举权的这一决定，早在该党 1894 年的哥德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可是那时党还弱小，当时它的党员还不到八千名，工会还没有中央一级的组织——直到 1898 年它才建立起来，取名瑞典总工会 [300] (L. O.)。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瑞典北部的工人运动也卷入了要求承认工会的激烈斗争。

1902年初，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不断鼓动的压力下，向瑞典国会提出选举法改革草案，这时党才又致力于选举法的斗争。该草案虽然扩大了有选举权者的范围，但始终还是把广大工人阶层排斥在选举权之外。党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抗议这个提案，并号召工人在国会开始辩论该提案的那一天——5月15日——起停止工作三天。

总罢工进行得非常圆满。工业和交通停顿了一天。按预定计划总罢工要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一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原指望总罢工将把国会的保守派多数压垮，这一点却失败了。因此，1902年的总罢工只是瑞典工人群众争取平等选举权的斗争的一段插曲；七年后总罢工才取得胜利。

与此相反，荷兰在1903年4月进行的一次总罢工尝试不仅最终一无成果，它还搞乱了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主义运动，把运动拉向后转。总罢工是由铁路员工在1月底进行的一次自发性罢工开始的，当时政府要求他们完成正在罢工的码头工人的工作。政府不能迫使铁路员工停止罢工，便收回了命令。但这一成果旋即受到政府的威胁。政府宣布要提出一项旨在剥

夺铁路员工和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的法律草案。

这一计划在工人群众中激起无比愤怒。荷兰工人运动分裂后形成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尼德兰社会民主党(S. D. P.)和社会民主工党(S. D. A. P.)，联合组织了一个抵抗委员会，它声明将号召全体荷兰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反抗策划的扼杀罢工自由的行径。在抵抗委员会中提出这一决议的社会民主工党主席特鲁尔斯特拉，在《大众报》上号召工人们“作好一切准备，以便抵抗委员会一旦发出号召，大规模的罢工就能表明荷兰工人宁愿粉身碎骨而不愿受人践踏。”然而这一威胁并未吓住政府。罢工象预告的那样宣布开始。在荷兰历史上发生了工人阶级和国家政权之间的最激烈的斗争。可是由于抵抗委员会害怕承担把斗争引向极端的责任，又迟迟不宣布停止罢工，因此罢工运动在混乱中瓦解。失败加深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对立并使之恶化，而且首先是使工会陷入了一场灾难。

6

比利时和荷兰的经验暴露出总罢工是一件能使敌我两败俱伤的武器。这两个国家的罢工领导很快就感到左右为难：要么把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暴动，要么就下令退却收兵。不过，离开合法的立场和由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的这一想法，无论比利时还是荷兰的罢工领导连一分钟都没有考虑过。而对于进行合法斗争，拥有庞大政权机器的政府的条件则比工人阶级来得优越。因此这两个国家进行的斗争都是以工人阶级的退却，而不是以政府的退却告终。 [301]

从这一经验也许可得出一点教训，即总罢工是最后的手段，是一次社会危机中的最后出路，是工人阶级在风暴来临前发出的最严正的威慑力量。所以只有下定决心进行一搏时，才能冒

险举行罢工。

显然，这种考虑决定了多数政党对总罢工问题的立场，这个问题在1904年8月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了辩论，尽管并未触及总罢工的合法性的观点。问题是由阿列曼派小组和饶勒斯小组提议列入议事日程的，饶勒斯本人对总罢工的价值持有怀疑。不过他重视工会和党之间尽可能紧密地配合工作，同时，由于总罢工问题对法国工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赞成只建议要求国际各党研究“合理的和系统的总罢工组织”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在专门委员会中和在全体大会上又由白里安提了出来：总罢工问题就是一个策略问题。如果说代表大会在策略问题上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那它也就必须批准具有最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总罢工这个武器。总罢工是威胁和施加压力，向资本主义社会争得改革的一种方法，是反抗剥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最极端的手段。“人们都说普遍选举权在德国受到了威胁，”他说。“那么无产阶级应该拿起什么样的武器呢？他们的武器只有罢工。”

经专门委员会通过和由罕丽达·罗兰-霍斯特作出说明的多数派的决议案，对总罢工和群众性罢工之间作了区分。决议案声明“绝对总罢工”是无法实行的，“因为它使一切生计、因而也使无产阶级的生计成为泡影”。专门委员会认为政治性群众罢工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只是作为“进行重大社会变革或抗击侵犯工人阶级权利的反动行径的极端性手段”。决议案警告工人提防“无政府主义方面进行的总罢工宣传”，它指出，这种宣传旨在“阻止工人参加工会、政治和合作社等方面的意义重要的小规模斗争”。它呼吁工人“通过发展自己的组织来加强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团结和实力地位”，因为一场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组织——如果说总罢工真的“有一天证明必要和有益”

的话。不过，决议案转弯抹角的笔调却掩饰不住各党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价值怀疑，掩盖不住它们对讨论政治性群众罢工提出的问题得出最后结论的反感。

对总罢工思想反对最激烈的是荷兰人和德国人。弗利根说，迄今以来的经验有力地否定了总罢工。“它既不是一种手段，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手段。”罗伯特·施密特在德国代表团的热烈掌声中声明，拥有九十万名成员的德国工会认为总罢工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不是取决于总罢工，而是取决于在政治和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进行连续不断的工作。”

投票赞成白里安决议案的只有饶勒斯小组和阿列曼派，盖得派投票反对。投赞成票的还有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瑞士和日本代表。由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以三十六票对四票获得了多数。

7

但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刚刚开完，意大利就爆发了一场政治性群众罢工，其激烈程度和规模在这个被社会风暴搞得十分动荡不安的国家里从未有过。首先发难的是西西里。那里的罢工在岛上的各个地方引起了骚乱，在布加鲁和卡斯特卢乔，警察向示威的人群开了枪。当这个流血事件的消息传到北意大利时——1904年9月15日，米兰的工人神情激昂，走出工厂，涌向街头游行示威。罢工运动席卷热那亚、蒙扎、罗马、里窝那，其势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

由阿尔土罗·拉布里奥拉领导的党的工团主义派虽然发出了罢工的信号，党的执委会在罢工爆发后立即发布了一项宣言，声明罢工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情。但是罢工既没有计划，也没

有组织。如同目击者奥达·奥尔贝格的记述^①，运动“十分混乱，声势十分浩大，致使所有身临其境的人感到，它仿佛是一场威力无比的事变，有如雪崩似地从我们头上凌空而过”。事实上这次罢工是一次“绝对总罢工”，就其广度和强度来说，是工人斗争史上第一次堪称典范的总罢工。它是工人对不平等感到愤慨而自发产生的，是他们胸中怒火的一次总爆发，是一次反对滥用国家武装力量镇压工人经济斗争的抗议性罢工。米兰工人们忘不了具有历史意义的1898年的“米兰四日”。当时，安东尼奥·鲁迪尼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反对面包涨价的群众性示威游行，近百名死者和五百名受伤者倒在街头。因此，米兰工人也是第一批无比愤慨地以罢工对西西里的枪声作出反应的工人。但是罢工没有直接的目标，只不过是要求政府保证在今后的劳资冲突中不动用武力干预而已。自由党总理焦利蒂毫不犹豫地答应做到这一点。他也没有提及动用军队镇压总罢工。^②就这样，几天以后工人们回到了他们的车间。

1904年9月的意大利总罢工主要是未曾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罢工。尽管如此，它并未象列金对这类罢工感到忧虑的那样陷于瓦解。那么，它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如同阿尔土罗·拉布里奥拉所说，工团主义者从罢工中取得的教训是：罢工“向群众证明，五分钟的直接行动的价值和四年议会的空谈相等”。^③运动中的以康斯坦丁诺·拉查理为领导的马克思派中心认为，罢工的主要成就在于这一事实，即象奥达·奥尔堡所写的那样，它表明了“无产阶级在保卫自己的权利中，随时都能使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上的群众召之而来”。

① 《新时代》，第23年度，第1卷（1904年）。

② 不过焦利蒂期望罢工损害社会主义党的声望，他在罢工结束后不久解散了议会。在新的选举中党果然失利，社会主义议员由三十三名减为二十七名。

③ 转引自威廉·萨洛蒙：《发展中的意大利民主》（1945年费城版），第51页。

然而意大利总罢工的特点却是群众的自发性。他们并不是从车间里“召之而来”。他们是深受激发自动离开车间的。人们没有宣布过罢工。它是群众内心积蓄的忿怒的爆发。它表明，群众——个人也是一样——是受行动和反作用的心理法则支配的。象拉萨尔在1854年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当时正值世界反动时期，工人阶级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群众“只有在使人怒不可遏的真实事件的撩拨下，才会随大流卷入运动”。

8

这一心理规则，在1905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结束后五个月的1905年俄国工人阶级起义中壮丽地显示了出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弗利根还曾以荷兰代表的名义完全拒绝总罢工思想，而罗伯特·施密特则声明德国工会认为总罢工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值”。现在，俄国上演了壮丽的一幕，展示出没有领袖和未曾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在使人怒不可遏的“事件的火热撩拨”下——1月22日圣彼得堡的可怕的大屠杀，“流血星期日”，将压抑已久的怒火发泄出来，形成此起彼伏的巨大罢工浪潮，直到在他们的威力下沙皇专制制度的大厦倒塌。①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这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革命起义，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是首次经历一场革命。它预告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吗？它是欧洲革命时代的先驱吗？

这个问题再次把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问题提到欧洲各社会主

① 这一心理过程的出色的描写见 L·托洛茨基：《1905年的俄国革命》（1923年柏林版），第63—96页。关于俄国群众性罢工性质的分析见罗莎·卢森堡：《群众性罢工、政党和工会》（1906年汉堡版）。

义党的议事日程上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场的突然改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国际中最强大的党，是使许多兄弟党为之钦佩的榜样。在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团勉强赞成承认以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捍卫工人阶级权利的最后斗争手段的决议案。继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党的不来梅代表大会，还否决了一项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以政治性群众罢工进行斗争的方式问题列入下届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1905年5月底在科隆召开的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也再次声明总罢工“没有讨论价值”，“因此，一切企图通过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来制定一项固定战略的尝试都应受到谴责”。代表工会总委员会就决议案作出说明的特奥多尔·伯默尔贝格说，他对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决议表示遗憾。他声明：“在德国工会运动中我们应注意使（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讨论不再出现。”①

可是从现在起已无法不让讨论了。俄国群众罢工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德国来，象在所有国家工人运动中一样②，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的报刊、党的集会和接二连三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耶拿（1905年）、曼海姆（1906年）、马格德堡（1910年）和耶拿（1913年）——对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这

① 转引自卡尔·考茨基：《政治性群众罢工》（1914年柏林版），第117页。该书详细记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情况。又见埃尔斯贝特·格奥尔基：《现代工人运动中总罢工的理论和实践》（1908年耶拿版）。

②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905年维也纳记录）》是一份能够说明俄国革命影响深远的文件。记录写道，在威廉·埃伦博根演说中途，“涅美茨同志把代表大会会场刚收到的一份通讯社发来的电报送给主席台上的演说者看。坐在前面几排的代表顿时相互窃窃耳语：‘俄国来消息了！’原来注意倾听埃伦博根演说时的寂静，突然被一片嗡嗡声所取代。埃伦博根中断了他的演说……开始用由于激动而变得颤抖的声音宣读沙皇的宣言。会场霎时间鸦雀无声。宣言的第一段——以许诺出版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结尾——刚刚宣读完，大厅和楼座中就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俄国革命万岁！革命万岁！……在埃伦博根开始宣读时，代表们即已从他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怀着意识到重大历史时刻业已到来的感情站着聆听。

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讨论，它充分展示了政治权力斗争问题及其 [306] 技术问题的整个广度和深度。

问题的根本是，德国工人阶级能否以合法的方法打破容克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即那个几百年来一直为普鲁士，为它的国王、它的军队、它的行政机关、它的法院、它的资产阶级效劳的庞大政权。容克大地主的堡垒是构成德国实际权力所在的、实行三级选举制的邦议会。只要容克大地主仍然控制着这个堡垒，德国发展为民主制和工人阶级起来掌握政权就受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容克大地主设置的障碍，只能通过普鲁士邦议会实行普遍选举制加以排除。可是经验证明，他们的城墙不可能象耶利哥的城墙那样，被喇叭声吹得倒坍^③。迄今以来用言词、用报刊和集会乃至用街头示威进行宣传的方法，都完全不起作用。促使党跃跃欲试的问题是，说不定政治性群众罢工倒真是争取普鲁士选举权斗争的一种有效武器哩。

但是随即又考虑到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规模问题。诚然倍倍尔认为，政治性群众罢工并无必要突然转变为一场革命。真要采取政治性总罢工的话，“那终究只是作为一种和平斗争的手段”，他在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中这样说。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象鲁道夫·希法亭试图指出的那样，由最强大的德国党用来反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和最团结一致的统

宣读。此时此刻代表大会沉浸在庄严动人的气氛之中。埃伦博根宣读了沙皇宣言的最后一句话……顿时，代表大会再次完全出于本能地找到了表达它的隆重气氛的正确方法。革命歌声一下子响彻代表大会会场。捷克人和波兰人高唱《红旗歌》，接着德国人唱《马赛曲》。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党代表大会决定号召工人在议会开幕的当天——11月28日——停工，举行公开大会示威游行争取普遍选举权。那一天，维也纳有二十五万名男女在议会大厦前的环形马路上游行。俄国革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又见卡尔·E·朔尔斯克的优秀论文：《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1917)》，载于《哈佛历史研究》，第65年度(1955年)。

^③ 耶利哥：古城名，据《圣经·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0—12节载：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士兵用吹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城攻不破的城墙坍塌。——译者

治机构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必然将导致一场决斗。“在德国，必须预料到总罢工——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将遭到最猛烈的抵抗，”他写道。尽管问题象以往一样由党提出来——例如普鲁士选举法改革问题，“统治阶级总会从中听出是活着还是死去”。因此，他说，就德国而言，群众性罢工是一场必须坚持到底的斗争中的一个阶段，不应以加诸工人阶级一场灾难而告终，“因为敌人把任何群众性罢工、任何一次哪怕十分和平和合法的反对他们统治的斗争，都看成是他们的末日的来临，因而将使用他们的全部权力进行抵抗”。①

是这一考虑，即考虑到一次政治性总罢工必然会突然转变为决定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使人们理解到每一次讨论总罢工不能不引起党的领导，首先是工会领袖的严重不安。德国工人运动在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可以说已发展成为国中之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选民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倍倍尔这个在社会低层中崛起的德国工人的伟大象征，在德国人民各阶层中被看成是“分庭抗礼的皇帝”和受到尊敬。他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运动紧紧地连在一起。②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这个群众基础上，出现了一套

① 转引自考茨基同上引书，第161页和123页。

② 下列统计数字（《工会运动第十次国际报告，1912年》）说明了德国工会运动在1912年欧洲工会运动中的地位：

	工会会员总数	参加世界工会同盟的会员人数
德 国	3317271 名	2553162 名
大不列颠	3023173 名	861482 名
法 国	1064413 名	387000 名
意 大 利	860502 名	320912 名
奥 地 利	649082 名	540662 名
比 利 时	231805 名	116082 名

关于英国工会运动应予说明，英国工会共有三百零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三名会员，但只有一百万零六千九百零四名加入英国工会总联合会（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庞大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运动为党和工会各式各样的组织积累了成百万资金，它是大型报纸康采恩、出版康采恩和大型印刷厂的老板；它拥有无数办公大楼和会议大楼；它与建筑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少不了有由上千名秘书、编辑、办事员、工人和官员组成的指挥部，照料部门繁多的工人运动和掌管运动的计划。^①

随着运动的巨大发展，它在国家和社会上的影响同时在增长。而一个巨人般官僚主义躯体的政治和工会上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国会议员、邦议会议员和县代表机构成员、乡镇行政机构成员、工会领导机关干部的人数越来越多。

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部运动的“机器”——一个服从自己的准则，服从发展要求和自我保存的准则的实体；运动本身变成了目的。由于运动的需要而形成的机器，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固有的发展本能和保存自己的本能，产生了某种保守的精神状态。为组织机构的安全和发展的可能性而忧虑，[308]影响着它的负责干部的政治态度。工人运动组织的原来目的是准备社会革命——挖墙脚，最终推翻现有阶级国家。但随着力量的增长和组织的强大，运动的革命活力就悄悄地消失了。组织越强大，在一场与国家武装力量进行决战中所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大。工人阶级几十年用十分巨大的牺牲建立起来的一切，有在一场历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的决战中被摧毁的危险。固然运动也有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挑衅而进行决战的危险。可是它打心底里希望避免这种较量。运动变得越是强大，它在人民中的支

^① 仅自由工会一年就拥有七千万马克的收入，1914年拥有八千万马克的财产。见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十四年》（1947年汉堡版），第12页。党有六十二家印刷厂和总发行量为一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十二份的九十二种日报，单是党的出版事业工作人员就达一万零三百二十名。见《党的执行委员会致1913年耶拿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协商纪录》（1913年柏林版），第28—29页。

持越多，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和帝国国会中的代表席位越多，在党的领导看来，统治阶级敢于进行较量的危险就越小。不管怎么说，党的领导，特别是工会最高领导，是胆战心惊地注意着不要挑起斗争的。它经常援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警告（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著名导言（1895年）中）：不要被“骗入巷战”。党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乃是不可阻挡的，他写道：“我们采取合法手段却比采取不合法手段或采取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而现在“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①

但是一场政治性群众罢工必定会导致同国家权力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党和工会领导害怕的就是这个。因此，哪怕只是对政治性群众罢工认真考虑一下，它也是不愿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只是在于它的目标的实质，而不是在于它的斗争方法。

然而，以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争取进入普鲁士邦议会的平等的选举权的进攻性武器这一思想，不单是为马克思主义左派——罗莎·卢森堡及其周围的人——所主张，而且出人意料地也为某些修正主义者，如爱德华·伯恩斯坦、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和艾斯纳·库特所主张。党的压倒多数否定了群众罢工的这一性质，他们聚集在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的周围，这个中心承认群众罢工只是一种防御性武器——是“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用以击退“扼杀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选举帝国国会）或结社自由的阴谋”，就象1905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09—610页。——译者

年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一样。要使工会同这项决议协调一致，还需靠倍倍尔的谈判天才和道义上的权威。

9

法国和意大利工团主义派把总罢工看成一种革命的进攻性武器，不过这一武器在第二国际期间始终未被采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将群众罢工视为防御性武器。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坚持以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革命的进攻性武器，虽然试图采取以群众罢工的方式击退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迅即卷土重来的反革命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芬兰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普选权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中也宣布总罢工。这次总罢工从1905年10月30日延续到11月6日，直到皇帝的宣言（宣告芬兰虽然自治，但处在俄国统治之下）宣告要召开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地方议会和取消新闻检查时，才停止总罢工。罢工是普遍性的。国家处在一个拥有管理铁路、贸易、工业和警察等部门的形同罢工政府的统治之下。诚然，关于普选法的法令直到一年以后（1906年10月1日），而且只是鉴于重新举行总罢工的压力才生效。^①

此外，在第二国际历史的最后十年中，还有三个党使用了政治性群众罢工这个武器：奥地利党在1905年11月举行一天示威性罢工，为了争取普选权；意大利党1911年9月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为了抗议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战争，1914年6月举行

^① 有关这次选举法斗争的详细记述见芬兰社会民主党致斯图加特社会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07年柏林版），第191—193页。在党的选举法的影响下，党员的数字由1904年底的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名（九十九个协会）增加到1905年底的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名（一百七十七个协会），1906年底再增加到八万五千零二十七名（九百三十七个协会）。见N·R·乌尔辛和卡尔·H·维克：《芬兰的工人运动》，载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卡尔·格律恩贝格出版，第7年度（1926年），第46页。

了保卫和平的大规模集会；比利时党在1913年4月举行了反对双重投票选举制的罢工——几天后政府答应修改宪法，罢工遂告结束。^①在所有这些政治性群众罢工中，各政党都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持它作为合法工具的性质，始终坚持进行合法的斗争，防止它突然转变为一场革命行动。

但是，在考虑各国党采取以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这个问题的同时，国际也给自己提出了以国际性总罢工作为制止战争的武器这一有深远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下文另行论述。

^① 1909年瑞典总罢工是一次经济性而不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它是由企图通过开除工人破坏工会力量的工厂主的进攻而引起的。

国际内部论殖民地问题

[310]

国际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系以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两个基本原则为基础：各种族的所有人一律平等，同样有权要求尊严、尊敬、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原则；一切民族和种族的被压迫者团结一致的原则——这是国际赖以产生的思想。

1

白色人种和黑色人种被剥夺继承权者之间团结一致的思想，第一次表现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六十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对美国国内战争的态度中。英国工人阶级把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进行的战争，看成是促使黑人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战争。它声明支持北方各州，在群众集会上和自己的报刊上抗议英国政府打破由北方各州采取的封锁南方各州棉花出口的计划，虽然这次封锁给数以万计的纺织工人造成了失业的痛苦。

第一国际就是在这次战争期间成立的，即在黑人解放斗争的象征和领袖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前的几个星期。总委员会第一批行动之一，是发出一封由马克思起草的致阿伯拉罕·林肯——“领导自己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的史无前例的工人阶级的儿子”——的贺信。贺信保证欧洲工人和他团结一致，并说他们“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困苦”，但是他们“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就本能地感觉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

因而“他们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①

[311] 美国国内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殖民战争，因为它是一场旨在保存殖民主义制度、保存奴隶制度的战争。因此，总委员会的贺信可以视为国际对殖民主义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是，大国的现代殖民政策，它们为占有殖民地的争夺，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才开始的，因此真正的殖民地问题直到第二国际才列入考虑范围。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在一项由乔治·兰斯伯里提议的决议案中，要求“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并谴责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论殖民政策拥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借口或文明借口，”决议案这样指出，“它始终只是旨在纯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

2

可是就在伦敦代表大会过后短短几年，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对自己在殖民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产生了怀疑。促使一些社会党人转变观点的，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各共和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899年开始，延续到1902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次战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殖民战争，是英国统治阶级为了将蕴藏丰富的南非金矿并入英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而发动的战争。本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在群众集会上和自己的报刊中抗议这场战争。然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费边社社员——却赞同和支持战争，并在一份由肖伯纳起草的宣言书中要求英国并吞布尔人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1页。——译者

共和国。^①

肖伯纳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一开始指出，有义务制止德兰斯瓦尔的本地人毫无防御地听凭布尔人的寡头政治奴役和灭绝。殖民地国家本地人的命运，是整个文明世界，而不单是统治他们的白人统治阶级的事情。从道义上说来，殖民主义只能用它所起的文明的作用来说明其正确性。“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如果妨碍传播世界文明，就得滚它的蛋，”他写道。也不能承认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权控制本国的自然资源而不考虑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地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人民利用自然生活资源的共同利益，高于自然生活资源所在地的本地区人民的利益。

从这些前提中肖伯纳引出如下结论：南非金矿应该归国际 [312] 共有和为了各国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开采。解决南非本地人安居乐业问题的理想办法是，由一个联合国来接管布尔人各共和国。但由于当时还没有联合国，所以从社会主义现实政策的立场来看，主张由一个大国，例如不列颠帝国，来兼并布尔人各共和国是合理的，因为“一个大国，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必定会按照有利于普遍文明的原则进行管理”。

肖伯纳的文章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怒。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谴责他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然而在费边社社员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多数人——首先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对他的立场表示赞同，而传播最广泛的社会主义周刊《号角报》的卓越发行人罗伯特·布拉奇福特，则在他的刊物上引用肖伯纳的论点，坚持主张兼并布尔人各共和国。

差不多与此同时，爱德华·伯恩斯坦也在他的《社会主义的

① 肖伯纳：《费边主义和帝国》。费边社宣言（1900年伦敦版）。

前提》(1899年)一书中,结合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殖民地问题所持的立场,阐述了类似肖伯纳的想法。这场争执的起因,是当时在帝国国会和报刊中热烈辩论的德国1897年强行租借胶州湾问题——德国在欧洲列强策划的瓜分中国中所攫取的利益。^①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中对这一帝国主义行径提出抗议,并出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共同财富”的原因而声明反对任何殖民政策。

伯恩斯坦反对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共同财富”。他虽然指责掠夺胶州湾的方式,但最后还是赞同租借胶州湾,因为如他所说,这使德意志帝国在瓜分中国时有了“参与决定性的发言”的把柄。他虽然不赞成攫取更多的殖民地,可是他认为“没有理由把这种攫取一开始就看成是什么可鄙的事情……关键不在于是否,而是在于怎样”,他说。他为殖民主义辩护,把它说成是开发热带自然资源的需要。“因为我们在享用热带产品……所以自己经营这些产品是无可指责的”。“野人拥有的对他们占住的土地的权利”也只能承认其为一种有条件的权利。“更高的文化在这里说到底也有更多的权利。不是掠夺土地,而是经营土地给占领土地赋予历史性的法律上的名义。”他援引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句话,作为他的立场的根据,即:“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的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传给后代。”^②

[313] 伯恩斯坦的观点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压倒多数所拒绝。在1900年美因兹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阐明了自己对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立场。决议指出,产生殖民政策的根源“首先是资

① 原书第334页。

② 伯恩斯坦同上引书,第147—150页。(译文见《资本论》1975年中文版,第3卷,第375页。——译者)

产阶级追求新的条件来投放不断膨胀的资本使之生息，以及渴望取得新的销售市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强占国外的土地并肆无忌惮地奴役和剥削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的民族”。它促使“剥削分子”本身变得野蛮和道德堕落，他们“用卑鄙的、甚至惨无人道的手段力求满足他们的掠夺欲”。社会民主党“作为一切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敌人，断然反对”这种“掠夺和征服政策”。决议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实现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值得欢迎和在所必须的文化和交往关系，只能通过重视和维护这些民族的权利、自由以及独立，只有通过引导和榜样才能争取他们参加现代文化和文明的任务”。^①

可是，并不是伯恩斯坦一个人要求奉行“现实的”殖民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同样为大多数修正主义者所拒绝，但一批运动中有声誉的作家（麦克斯·席佩尔、古斯塔夫·诺斯克、理查·卡尔韦尔、马克斯·毛伦布雷歇尔、路德维希·克韦塞尔和格哈德·希尔德布雷德，以及包括维也纳《工人报》对外政策编辑、奥地利议员卡尔·洛伊特纳）为殖民主义进行辩护，说它是挖掘生产力、传播文明和扩大欧洲各国人民生存空间所必需的。他们代表了一种大德意志殖民帝国思想。

3

然而殖民政策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来看。它本身包含着帝国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大国的军备竞赛、国际紧张局势的尖锐化、军事冲突的危险。1900年9月底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殖民政策问题与国际和平问题和军国主义

^① 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殖民政策所持立场的简要概况，见卡尔·考茨基：《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及古斯塔夫·诺斯克：《殖民政策和社会民主党》（1941年斯图加特版）。

问题联系在一起处理。

[315] 由H·万-科尔(荷兰)就此项议事日程作出说明的决议案无任何保留地否定殖民主义。它指出,殖民扩张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新形式即帝国主义而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帝国主义孕育着欧洲战争的危險,是沙文主义的策源地,并使各国人民承担日益沉重的军国主义负担。决议案说,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唯一目标是“提高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它浪费“创造一切价值的无产阶级的财富和血汗”,并“在凭借武力侵占的殖民地对土人施加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决议案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用一切手段“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进行斗争,严厉谴责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并抨击对受到鲜廉寡耻的资本主义掠夺欲摆布的土人所施加的不公正待遇和暴行”。

对这项决议案的辩论,是以英国代表就他们对尚在进行的布尔战争的立场发表声明开始的。社会民主联盟主席H·M·海德门说,他“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成员”,特别重视同国际无产阶级一道抗议大国的殖民政策,英国对德兰士瓦尔的战争,使“我们英国社会主义者感到沉痛和羞愧”。奎尔奇“使英国工人引以为荣”地说,“尽管英国资本家用尽种种有计划的腐蚀企图”,都未能使哪怕是一个参加组织的工人声明赞成战争,更不用说一个工人组织了。“工人们保持了自己的称号的纯洁性。”

可是代表大会感到,仅仅对殖民主义进行严厉谴责还不够。瓜德罗普——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島——社会主义总委员会代表里夏尔·热朗提议制订一个社会主义殖民地纲领,代表大会要求各国党在进行这一工作中研究殖民地问题,并推动各殖民地社会主义政党的建党工作。

在代表大会上由罗莎·卢森堡作出说明的关于国际和平和

军国主义的决议案，又回到殖民地问题上来。代表大会的两个专门委员会——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和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联合开会，因为如同罗莎·卢森堡所说，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是同一世界政策新现象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种世界政策的“疯狂性在近六年中发动了四次流血战争，并以持续的战争威胁着世界”。针对这种危险，各国工人党必须比以往更加加紧国际团结，不仅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常斗争中如此，而且在它们的最终目的方面也是如此，因为“可能性变得愈来愈大了”，罗莎·卢森堡预见到十五年后果然到来的危机说，“即资本主义制度将不是由于一场经济性的，而是由于一场政治性的、因世界政策引起的危机而崩溃”。各国工人阶级必须采取国际性行动对这一决定性时刻作好准备。

没有争议而一致通过的决议说，自上次国际代表大会在 [316] 1896年召开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布尔战争和欧洲大国入侵中国，赋予了军国主义一种新的含义，它已变成危害社会安宁和正常发展，加剧国际竞争和紧张以及“势必使战争变成持久状态”的殖民扩张政策的工具。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党“用加倍的力量和干劲与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作斗争……并以各国无产阶级的持久和平同盟来回答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世界政策的持久战争同盟”。决议责成社会主义议员在议会中“无条件地投票反对给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或殖民冒险以任何拨款”，并委托国际执行局，在发生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时“举行一次同时进行的、形式一致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抗议运动”。

4

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曾要求各国党研究殖民地问题，以便能对殖民地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表态。继巴黎代表大会后于

1904年8月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草拟了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政策行动纲领的第一批基本内容。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人H·万-科尔坦率地承认，
[317] 委员会中有许多复杂的疑难问题尚未澄清。“我们必须抗议强占殖民地和在殖民地推行的资本主义掠夺政策，因为我们反对一切征服掠夺行为，即使我们并不认为殖民占有本身一定是殖民国家的不幸，”他这样说。可是减轻殖民主义祸害的措施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者应该主张保留土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在殖民地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呢？“可是，我们这些权利和正义的捍卫者，能让数十万人陷于巨大痛苦和思想精神不开化的境地，而不使他们免受资本主义之害吗？”

然而，由万-科尔以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决议案，并没有触及殖民主义给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万-科尔暗示的问题：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是灾难还是福祈？它本身是否应受谴责？或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祸害是否就不能由一项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来克服？决议案只是责成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它们的议会代表拒绝一切帝国主义的和保护主义性质的法律草案，以及反对任何殖民掠夺战争和任何用于殖民的军事拨款。它要求反对垄断和在殖民地设立大型租界，并呼吁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对土人施加暴行，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土人免受军事压迫和资本主义剥削；在各国议会中提议制定增进土人福利的法律，特别要注意防止使用狡诈手段和武力夺取土人的财产。然而殖民地的任何改革其重点却是各殖民地人民的自治。决议案要求给予土人“以着眼于旨在使殖民地得到完全解放的、能适应他们的发展的自由和独立”。最后，决议案要求把对外政策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俾便抵制“金融寡头集团暗中施加影响”。

在代表大会磋商殖民地问题之前，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曾提出一份由英国代表团提议的、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的决

议案以供讨论。这个决议案，是对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在英国殖民帝国主义问题上所持立场作出历史性评论的重要文件，因此有全文加以记述的必要。该决议案说：

“代表大会承认，各文明国家的居民有权在那些居民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定居。但是，代表大会最强烈地谴责现今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并要求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推翻这一制度。这一制度的结果可以从诸如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这些欧洲文明国家的人民对非洲、亚洲等土人进行的压迫中看出来。英国在奴役异民族中是最富有成效的；因此，对英国-印度来说后果更加严重，也更加可怕。” [318]

“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代表会议已从英国和印度代表的介绍中获悉，英国正在剥夺印度人民的生计，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偷窃，在印度境内有两亿以上的人被置于极端贫困、悲惨和饥饿之中。

“代表大会要求大不列颠工人迫使他们的政府放弃现行的卑鄙的和不光采的殖民制度，并采取易于实行的措施给予印度人在英国统治下的自治。”

决议案宣读完毕后，主席 H·万-科尔请求代表大会“恭恭敬敬地注意听取印度代表，一位以其一生中的五十年贡献给为他的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的八十高龄老人的发言”。他是为了代表两亿人民的事业，从一个“要不是白人的利欲熏心而把它变成大多数居民受苦受难的地方，本来可能是人间天堂”的国家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记录报道了在讲这些话时代表大会深为感动的情况。代表们纷纷从他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对遭受苦难的印度人民表示同情”，并向登上讲台的印度代表、印度国民

大会党创建人和主席达达巴伊·纳奥罗哲发出“暴风雨般的、持续几分钟之久的欢呼声和鼓掌声”。

5

在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一期间的几年中，国际的两个党——德国党和比利时党——不得不把殖民地问题摆在它们的政策的主要地位。

在德国，它的两个非洲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后被并入南非联邦的西南非洲，和成为坦噶尼喀领土由英国委任统治的东非——的本地人纷纷起义，再次提出了殖民地问题。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修筑一条从海滨横贯赫勒洛人世代聚居的大草原到达奥塔维矿区的铁路——草原已划给铁路特许权享有者。赫勒洛人被赶出他们的草原，于是发生了暴动。起义蔓延开来，被德国殖民机构经过一场持续一年之久的战争，用特别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累德堡向帝国国会（在1905年12月[319] 2日的会议上）提出一份冯·特罗塔将军的公告——将军奉命在西南非洲镇压起义，公告规定凡见到赫勒洛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就予以枪杀；他们被赶到无水的奥马埃内草原，在那里困于饥饿和干渴，最后死亡。^①

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和自己的报刊中谴责了德国殖民机关在非洲的暴行。1906年12月，当政府要求议会再次拨款用于镇压本地人时，他们投票予以反对。拨款提案未获通过，因为中央

^① 将军对赫勒洛人发布的公告说：“在德意志境内的任何一个赫勒洛人，不论其携带枪支与否，不论有无牲畜，均格杀勿论。我不再收容妇女和儿童，而是把他们赶回到他们自己的人中去，或者下令向他们开枪。这是我要对赫勒洛人说的话。皇帝陛下大将军冯·特罗塔。”转引自诺斯克同上引书，第112页。总人口为八万的赫勒洛人中，估计有六万人死于这道关于杀绝的命令之下，东非参加起义的人数估计为七万。《手册》，同上，第94页。

党由于人事问题的缘故也投票反对，于是政府解散了帝国国会，并在德国人民中煽动起一股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恶浪。在新的选举——“霍屯督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遭到失败，这是1884年以来的第一次失败。它在帝国国会中失去几乎一半席位（原为七十九席，失去三十六席），虽然它增加了二十五万张选票，但占总票数的比例却由百分之三十二点六降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威廉皇帝得胜了，社会民主党人“马失前蹄，栽了下来”。修正主义者把选举失败归咎于党的“消极的殖民政策”，要求奉行一项“现实的、积极的殖民政策”。

6

比利时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殖民地问题的形式远为复杂得多。问题在于比利时应否成为一个殖民国家，比利时这个国家应否接受由比利时国王以私人身份在刚果建立起来的一个巨大殖民帝国。

如同拉·丰坦在他致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刚果自由邦”形成的历史，事实上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它开始于1876年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私人召集的一次似乎毫无恶意的、地理学家和传教士的科学工作会议，虽然应邀参加的也有对非洲贸易感兴趣的人士。会议成立了一个“考察与开化非洲国际协会”，该协会庄严宣布的目标是开发未曾考察过的具有基督教文明的“黑色大陆”，结束由阿拉伯人推行的猎捕奴隶和贩卖奴隶的活动。两年以后，这个协会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由利奥波德任命的、经过他的张罗以著名非洲探险家H·M·斯坦利命名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奉命以实际行动传播利奥波德所谓的那种基督教文明：它通过狡猾手段和武力，把酋长统治下一望无垠的地区的权力奉献给利奥 [320]

波德。为了剥削他在非洲心脏地区给自己创建的王国，他于1882年创办“国际刚果协会”，并依靠他同欧洲各宫廷的亲戚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各大国承认刚果协会为主权国家，这些大国在1885年的柏林条约中，只是巩固了自己在它们承认的独立的“刚果自由邦”的贸易自由。一年后，他凭借比利时议会授权任命自己为“由刚果协会创建的刚果自由邦的元首”，并于1889年在他的遗嘱中规定刚果邦——他为自己家族作为私有财产所保留的巨大“王室地产”除外——在他死后转归比利时所有。同时，利奥波德以刚果自由邦绝对统治者的身份，发布一项法令，并吞了所有并非真正殖民定居的地产——森林、草原和牧区——和全部矿藏的所有权，在橡胶种植园和矿山做工的土人被置于一种强制劳动制度下，与十足的奴役几乎毫无区别，对于本地人此起彼伏的起义则派出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进行血腥镇压。^①

这些都发生在内情难测的与外界隔绝的黑色大陆。然而1904年后，关于利奥波德在非洲中心建立起基督教文明制度的消息泄漏出来了。英国作家艾德蒙·迪恩·莫雷尔^②在无数文章中，特别是在两本小册子中——《利奥波德在非洲的统治》（1904年）和《血染橡胶》^③（1906年）——进行了揭露。这些揭露出来的情况成为英国报刊和英国及比利时议会讨论的内容，柏林条约签字国的英国和美国在一份联合照会中对这一丑行提出抗议。在文明世界的道义压力下，利奥波德宣布愿意把他的私有殖民帝国立即移交给比利时国家——换取一大笔补偿，而且“王室地产”除外。

关于兼并刚果自由邦的法律草案的最后定稿文本，直到

① 英国驻尼日利亚领事罗杰·凯斯门特受英国政府委托调查刚果的情况，他在报告中估计，刚果的人口数在比利时国王统治下的十年中减少了三百万。

② E·D·莫雷尔是自由党人，1914年加入独立工党，并于1922年以工党党员身份在同温斯顿·丘吉尔竞选对垒中被选入英国下议院。

③ 刚果盛产橡胶，小册子揭露了比利时的殖民剥削。——译者

1906年才交由比利时议会讨论。对于把“王室地产”转为王室家族私有财产当然再也没有提起，虽然议会坚持支付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补偿金。但比利时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究竟能否投票赞成接受刚果自由邦。它曾经谴责腐败的国王政权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化身。它能对比利时也变成一个殖民国家负责吗？

可是应该拿刚果邦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党内意见是有分歧的。党不能主张由当地人实行刚果自治，他们几乎还未渡过他们的原始部落组织发展阶段，他们将象成立刚果邦以前一样，再次成为处于高一社会阶段的阿拉伯人猎捕奴隶和贩卖奴隶的牺牲品。 [321]

党的多数派声明，赞成由 1885 年柏林条约国对刚果实行国际共管，但是由王德威尔得领导的党的少数派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际共管奉行的也将只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也许比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殖民政府更加不受拘束。王德威尔得为了了解问题真相，曾赴刚果作了一次考察旅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比利时国家接管刚果邦是祸害最小的办法——当然，其条件是由比利时议会对殖民机构进行监督，并通过议会立法以保护当地人的权利和自由。

可是，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按照他阐明的条件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兼并刚果的方案，被党的多数派拒绝了。他们提出理由说，因为比利时是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政府在刚果必将奉行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如果党投票赞成兼并刚果殖民地，它就得承担参与使当地人遭受资本主义政府殖民政策剥削的罪责，而“党的原则声明规定，社会党人有责任以律师的身份帮助一切受压迫者，而不论其为什么种族”，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样写道。

王德威尔得提出的“现实的、积极的殖民地政策”与党的多

数派思想和感情相抵触。王德威尔得的道德方面和理智方面的威望，在党内无疑是得到公认的。但是由于问题而引起的内心矛盾，使党的多数派与党的领导对立。它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听从他的指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王德威尔得的建议，声明不投票反对兼并刚果的社会主义议员“将有损于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原则”。于是王德威尔得提出辞呈，但未被党代表大会接受。

7

殖民地问题的矛盾没有动摇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可是却导致了意大利党的分裂。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内部斗争史。党的领导权于1902年落入改良派手中，但两年后又被“统一派”所夺走；改良派在190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掌握了统治权，恢复了从1902年开始奉行的与左翼自由党政府合作的政策。1910年选举中，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得到四十二个议席——净增加十六席；在1911年第三次组阁的焦利蒂，提出给比索拉蒂在内阁中安排一个席位。党虽然象1903年屠拉梯受焦利蒂邀请入阁时一样拒绝了这一提议，可是与政府合作得极为协调。

危机出现在1911年夏季，当时政府宣布决定兼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即今天的利比亚，并于1911年9月9日向土耳其宣战。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意大利将的黎波里塔尼亚看成是它未来的殖民地，认为通过当时即已预料到的土耳其帝国的崩溃，的黎波里塔尼亚将落入它的手中。可是1908年开始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使土耳其得到新生，并巩固了它在地中海省份的统治权。意大利只有发动一场战争才能得到的黎波里塔尼亚。

建立一个意大利殖民帝国曾经是民族主义分子的要求之一。当1911年7月1日德国炮舰“豹号”在摩洛哥西南海岸的阿加迪尔停泊时，意大利政府意识到，现在它可以占领的黎波里而不会遇到大国反对了。阿加迪尔港已经1906年阿耳黑西拉斯议定书^①确定予以关闭，一切国家不得入内；威廉皇帝对这个港口的“豹跃”，被英国和法国视为挑衅行为，并把大国卷入一场新的摩洛哥危机。民族主义分子催促政府利用这场纠葛，占领的黎波里。有影响的天主教人士也认为，占领土耳其在地中海沿岸的最后一个省份，以此结束一场持续千年之久的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不是不值得欢迎的；此外还有罗马银行，即“梵蒂冈之友”的银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投入了为数可观的资本。不过 [323] 战争在其他各界居民中也并非不受欢迎，人口过密的南意大利的农民希望，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后他们可望外迁移民，开拓迫切需要的大片垦殖区。

宣战后几个星期，党在摩德纳召开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面临着严重的形势。绝大多数党员谴责这场战争。可是就在行将开战之前，焦利蒂宣布改革选举法，这一改革将使具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原来的三百五十万增加到将近九百万。党是否应该为了抗议殖民战争而反对焦利蒂政府呢？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即使冒损害选举法改革的危险也同政府决裂，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然而右翼改良派领袖比索拉蒂和博诺米虽然原先同样谴责战争，后来还是以战火已经点燃和国家已经卷入战争为理由，投票赞成军事提案。

战争爆发时，党与工会同盟联合号召工人在1911年9月28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党与政府关系的破裂和宣布总罢工，反

^① 1906年1月，大国在西班牙的阿耳黑西拉斯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危机。俄、英、美等国支持法国，德国陷于孤立，议定书实际上承认了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译者

映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心情——首先是在由艾米利亚-罗马涅、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构成的红色地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肮脏的殖民掠夺战争，举行无数次罢工表示抗议，试图破坏军队和弹药的运输，掘翻路轨，纵火焚烧车站。

这些革命派和改良主义党的领导之间的冲突，在1912年党的勒佐-艾米利亚代表大会上揭开了盖子。年轻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发起攻势，他曾经在罗马涅组织过怠工活动，在他的故乡弗利任一家社会主义周刊的编辑。在措辞激烈的讲话中，他控诉比索拉蒂、博诺米和所有赞同殖民战争的人背叛社会主义的国际原则，要求开除他们并中断同政府的合作。他取得了胜利，要求全部实现。比索拉蒂、博诺米及其一帮人被开除出党，屠拉梯最亲密的同事克劳狄奥·特雷维斯被解除党的机关报《前进报》总编辑职务，墨索里尼当选接替他的工作。试图拯救党的统一的屠拉梯和特雷维斯屈从于代表大会决议，而比索拉蒂和博诺米则建立起一个新党——“改良派社会党人党”。社会主义议会党团的四十二名成员中，有十七名加入这个党。

8

[324]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曾要求各国党成立殖民地问题研究委员会，俾便深入一步了解这个问题。1907年8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再次讨论殖民地问题，它收到了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党就它们国家殖民政策提出的详细备忘录。^①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辩论，系以由万-科尔

^① 英国备忘录由H·M·海德门撰写，荷兰备忘录由H·万-科尔撰写，法国备忘录由保尔·路易撰写，比利时备忘录由维克多·德尼、拉·丰坦、L·菲尔内蒙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撰写。各国备忘录收集在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出版的《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1907年)的提案和决议案及其说明》汇编中。

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为中心，即是否应该对殖民主义从原则上进行谴责，或者说是否应承认殖民主义是从经济上和文化上开发不发达地区和人民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形式，是发展人类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东西。

由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多数派提出的和由万-科尔作出说明的决议案，再次表示原则上否定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但是，决议案导言部分有两个句子却反对给一切殖民政策以原则性谴责。决议案虽然声明“殖民地的益处或必要性一般说来——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而言——被作了过分的夸张”，但它随即又指出，社会民主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

这两个句子构成了辩论的基础。辩论持续了三天，一天在委员会中，两天在全体大会上。几个殖民政权国家的党——德、英、法、比利时和意大利党——内部产生了深刻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和累德堡发言反对伯恩斯坦和大卫；奎尔奇反对拉姆赛·麦克唐纳；布拉克反对鲁阿奈^①；武尔姆反对别涅斯托费尔；卡斯基反对万-科尔。 [325]

代表大会委员会多数派决议案的反对派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指出它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否定。例如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一概念本身就有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任何殖民政策都是外来统治，因而它否认各国人民有权享有自由和独立的社会主义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殖民政权同样也是外来统治政权，是一种建筑在暴力和压迫基础上的好心好意的专制政权。

可是世界经济少得了取自殖民地的原材料吗？能否认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对殖民地的生产力起到发展作用吗？殖民地人民在达到社会主义之前，不是也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吗？

^① 原文为Rounanet，疑系Rouanet之误。下同。——译者

这些就是主张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代表——万-科尔、伯恩斯坦、大卫——提出的问题。大卫提议发表声明：“考虑到社会主义要使全世界的生产力为人类服务和引导不同肤色和讲不同语言的各国人民达到最高文化水平，代表大会认为，作为这种内容的殖民思想是社会主义运动广博的文化目标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

代表大会既没有采纳委员会决议案导言部分中的句子，也没有采纳大卫的决议案，而是一致通过了下列声明：

“代表大会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说必然要导致奴役、强迫劳动或灭绝殖民地的本地居民。

资本主义社会主张的传播文明的使命，只不过是供资本主义社会用来一心进行掠夺和剥削的借口。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将给一切国家的人民提供充分发展文化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不去提高集体的力量，而是通过奴役本地人并使他们贫困以及通过残暴的和破坏性的战争，毁灭由它将其方法移植进去的那些国家的自然财富。这样，它就减慢或阻碍了各文明国家自身贸易和工业品市场的发展。

代表大会谴责资本主义进行殖民的野蛮方法，并要求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挥而奉行一种能确保和平地发展文化和将世界地下资源用来为全人类的高度发展服务的政策。”

【326】 决议责成社会主义议员在各国议会中反对剥削和奴役本地人的方法，主张旨在改善本地人的命运，防止任何危害他们的权利并“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教育他们争取独立的工作”的改革。

决议作为国际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宪章存在了二十年之久。直到 1928 年，国际才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自己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殖民地纲领，声明以所有殖民地人民自治和民族独立作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目标。

国际和战争

社会主义是启蒙时代人文哲学理想的继承者，是各国人民友好和世界和平理想的继承者。实现这些理想乃是社会主义国际的伟大的、真正的最终目标。它致力于把被强行拉开处于各个行使主权的国家中的人类团结在一个联邦制的社会主义世界共和国里，以彻底根除人类仇恨的恶习和永远消灭战争。它认为，战争是现存社会制度最令人憎恶的表现形式，是统治阶级在世界舞台上争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对外政策的野蛮工具。国际为保卫和平所作的努力及其反对战争的斗争，是它反对现存社会制度——产生战争的根源——的斗争的一个基本成份。事实上，工人阶级如何制止战争的问题几乎是国际历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由第一国际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揭开序幕的。这次代表大会于普奥战争结束后两年召开。普奥战争是普鲁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室之间为争夺德意志联邦——由三十七个享有主权的德意志邦组成的联盟，其中最强大的邦是奥地利——统治权的一场强权战争。战争是俾斯麦挑起的，旨在把奥地利逐出德意志联邦，将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统治下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战争出人意外地迅速结束了。宣战后几乎还不到三个星期，奥地利即在凯尼格列茨附近被打败。

国际总委员会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工人阶级应如何对待这次战争的问题。它得出一致的观点，即这是“一场政府之间的战争”，并劝告工人们“保持中立”。^①

[328]

可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本身孕育着1870年普法战争的种子。可以预料，拿破仑第三要设法挫败德意志各邦的统一计划，因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必然要削弱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法国和普鲁士之间从1866年起紧张局势不断加剧，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期间已经预告了两年后果然爆发的普法战争。

在这一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下，由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率领的瑞士德语区代表团，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议讨论战争问题——即“工人阶级在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待战争的策动者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由贝克尔提出的决议案指出：“和平得不到保证的原因仅仅在于不公平的社会状况，在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暴力主义……进行大规模战争不总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大国的利益和贸易利益……一场这样的战争，尤其是普法战争，应该被看成是纯粹的内战。”决议案要求国际组织工人阶级采取有效的行动，把发动战争的任何试图消灭在萌芽状态。决议案要求国际致力于使“各国工人不仅公开和坚决地表示反对一切民族战争”，而且也“拒绝为杀人和毁坏财物的行径效力，以及拒绝为作战部队供应给养进行一切工作”。决议案要求立即开展一场有力的宣传活动，“以便特别是向每一个不得不参加常备军的工人说明人的职责，并给他规定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正式表明态度”。

^① 1866年6月19日、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和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然而军事罢工的想法在辩论中未被采纳，因为这种想法看来是行不通的。“假如我们有能力使工人个个都拒服兵役，”比利时代表希尔施说，“那么战争问题就根本不再存在了。”法国蒲鲁东派代表托伦发言反对贝克尔的决议案，也因为他们只是出于勉强才承认罢工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他们要求致力于“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来制止战争。

代表大会最后对一项由塞扎尔·德·巴普提议的和由沙尔·龙格作出说明的确定战争性质以及防止战争的方法的决议案取得一致意见。这项决议案声明，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内战，是“兄弟与同志之间”的斗争。决议案认为，战争的“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原因，在于“缺少经济上的均势”。但是战争的另一个根源“在于由集权和专制产生的独断独行”。各国人民可以“通过他们反对那些宣布和进行战争的人”来减少战争的次数。决议案说，进行这种反抗有“一种有效的、合法的和可以迅即付诸实行的手段”：总罢工。因为“一旦生产停顿一段时间，社会就无法存在”，所以决议案指出，劳动居民停止工作，“就足以使个人和专制统治的计划无法得逞”。因此，决议案建议工人“在他们的国家一旦爆发战争时”停止一切工作。（这样，由贝克尔提出的军事罢工的想法就未被采纳。）

2

但是，普法战争——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就是在其迫在眉睫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决议的——爆发得十分出人意料和异常突然，人民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思考。不论在法国或德国，工人罢工都无从谈起。虽然两国社会主义者都本着布鲁塞尔决议的精神并以它为根据发表声明和举行群众集会，抗议直接面临的咄咄逼人的战争。他们公开谴责这是一场王朝的战争，李卜克内西

和倍倍尔在北德意志国会——他们声明系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身份——拒绝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可是当战争成为现实时——如同德国人民所认为的一场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对德国的进攻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压倒多数都主张保卫他们的国家。^①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与国际对于战争的设想——即布鲁塞尔决议中写明的——并不一致。布鲁塞尔决议直截了当地谴责了战争，号召工人阶级反对一切战争。它没有划分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的区别，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战争情况，即它是以一场进攻战出现，因而也可能迫使社会主义者保卫自己的国家。

相反，国际总委员会划分了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的区别。它不否认社会主义者有权保卫他们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它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在普法战争第二阶段的立场，都没有违反工人的国际团结义务。由马克思起草并经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签署的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330]（它于7月23日，即宣战后四天发布）承认，“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② 他的第二篇宣言赞许地确认，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③ 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④

恩格斯认为，另外一种态度是绝对“不行”的——他在1870年8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

① 关于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及国际对德法战争所持立场的更详细的介绍，见本书第二部分，第5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页。——译者

③ 原文为“德国”，疑系“法国”之误。——译者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291页。——译者

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表示了投入这场斗争的决心。”他作出分析道,如果德国在这次战争中遭到败绩,“那么,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如果德国胜利了,那么,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参加民族运动……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它光荣媾和;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①

这些想法事实上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的策略。当它是防御性战争的时候,他们一直支持它。在法国失败和拿破仑第三倒台的第二天,他们就成了战争的反对派。他们发表宣言——著名的不伦瑞克委员会(爱森纳赫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它构成了控告委员会成员叛国的依据——,谴责继续进行战争,郑重抗议策划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和缔结光荣的和约。当俾斯麦紧接着在北德意志国会宣布继续进行夺取亚尔萨斯-洛林的战争时,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并提议要求政府“在放弃兼并任何法国领土的条件下与法兰西共和国尽速签订和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同上,第4卷,第439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2—43页。——译者)

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也是如此。他们曾经谴责波拿巴的战争。但是，当以法国进攻德国开始的战争转变为德国掠夺法国的战争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拿破仑倒台后与共和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德国的掠夺战争。布朗基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两天创办《祖国在危急中》报，并在一篇由他和他的一些重要追随者签署的号召书中声明：“面对着敌人不允许有党派存在……从9月4日大规模民族起义中产生的政府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和保卫祖国的决心。”国际的一封信件——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号召法国工人在保卫他们的国家中“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①并坚决请求他们，不要把那场虽然推翻了拿破仑但却让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9月4日的政治革命继续发展成一场社会革命。“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②总委员会说。

这样，不论德国社会主义者还是法国社会主义者，都行使了抗击侵略战争保卫祖国的权利，而国际也承认了这一权利。

3

但是，使第二国际整个历史不得安宁的问题，却不是各国人民保卫自己民族生存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从来不曾受到否定的，而是如何防止各国人民被强迫进行自卫。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一再辩论工人阶级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可是，如何防止战争爆发的问题很快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它首先反对设立常备军，认为常备军的存在本身就危害各国人民的和平。

①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50页。——译者

由瓦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谴责常备军不仅“否定一切民主和共和制政权”，是“君主制或寡头资本主义政权”的军事上的表现形式，以及“进行反动军事政变和社会压迫的工具”，而且首先是侵略政策的工具——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决议案要求废除常备军和建立普遍的人民武装。

当然，决议案并不寄予幻想，以为单有普遍的人民武装就足以消灭战争。决议案说：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劳动解放和社会主义世界胜利让出地位时”，战争——“这个目前经济关系的产物”——才会消失。但是国际认为，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民兵至少能排除进攻性战争。

【332】 然而国际深深怀疑制止资本主义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下一届代表大会——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直截了当地说，因为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以在战争的经济原因未被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根除以前，一切确保和平的试图都只能是“软弱无力的”。

可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战争是先天造成的，而工人阶级又还不具备克服它们的力量，那么工人阶级是否还能通过群众行动制止战争？这个问题构成了国际历次代表大会辩论关于制止战争问题时的主要怀疑所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战争问题委员会就战争一旦爆发时的这类群众行动——应召入伍的后备役军人的罢工和总罢工——进行讨论。可是，如同委员会发言人李卜克内西所说，这些想法“立即恰恰被那些首当其冲遭受军国主义压迫之苦的国家的代表一致宣布为办不到”。由瓦扬起草和由李卜克内西作出说明的决议案（它认为“持续不断的——公开和隐蔽的——战争状态”的根源，“在于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阶级斗争”）只是要求工人不停顿地和坚决地抗议一切好战企图和为好战企图服务的同盟”。

在辩论中，多梅拉·纽文胡斯对这一决议案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对战争进行谴责是不够的；国际必须对工人阶级在战争爆发时如何行动作出决定。他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提议，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应该“用号召各国人民普遍停止工作来回答”宣战。然而代表大会的多数认为，这是建议采取威胁手段，而国际是无力将其付诸实现的。在有十六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上，只有荷兰、法国和英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赞成这个决议案。

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前夜，国际历次讨论关于防止战争问题时所进行的争论都贯穿着这种悲观失望的基调。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只是重申了社会党人“竭尽全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贪婪”的职责；可是未了决议又说，只有“结束阶级统治，战争才会消失”。“推翻资本主义就是世界和平，”决议最后这样指出。而在就决议案进行的辩论中，荷兰代表团重新建议的关于总罢工的想法和有后备役兵役义务的人拒绝服役的想法，再一次被代表大会的多数所否定。普列汉诺夫(俄国)、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波兰)、李卜克内西(德国)、阿德勒(奥地利)、艾威林(英国)、屠拉梯(意大利)、拉柯夫斯基(保加利亚)、沙尔·博尼埃(法国)和路易·艾里提埃(瑞士)发言指出，单纯军事罢工的试图将遭到集体枪决而失败，甚至连工人罢工在战争爆发时也将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流血的失败而告终。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丹尼尔·德·莱昂正确地说，军事罢工在开始的时刻必然会具有一种暴力革命的性质。但是国际深深害怕——如同在它就以总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方法举行的辩论中曾经暴露出来的——革命的想法。在西欧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中，国际始终感觉不到自己有力量对阶级国家进行暴力反抗。 [339]

以战争问题委员会发言人身份代表其多数派决议案的普列汉诺夫，在以往反对把军事罢工作为防止战争方法的论点之外，再补充了一点理由。他说，一次军事罢工，即使它确实可行的话，

也只有~~在交战的双方同时和以全力开始进行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此，举行战时军事罢工的思想要求所有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开展同样强大的群众运动。西欧有这样的群众运动。在工业落后的俄国，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它是不可能开展的。而在今后的战争中，俄国将作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出现在战场上。普列汉诺夫说，因此，一次军事罢工将会“恰恰首先解除各文明国家的人民的武装，而把西欧交给俄国的哥萨克。俄国的专制主义将使我们的整个文明付诸东流，取无产阶级自由而代~~之的~~——总罢工应是无产阶级自由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将是俄国的强权统治。因此，荷兰提出的这种表面上看来十分革命的提议，将转化成它的反动的对立面”。

然而，这一理由被多梅拉·纽文胡斯严厉谴责为沙文主义的理由，他说，这是一条特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盛行的理由。他提请注意倍倍尔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倍倍尔在发言中说过：“如果俄国，这个残暴和野蛮的庇护地，所有人类文明的敌人，为了肢解和消灭德国而侵犯德国的话……我们就同它进行斗争”。纽文胡斯说，这种思想是沙文主义的流露，沙文主义扼杀国际主义感情。他自己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曾经反对区分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如他所说，区分的根源就在于沙文主义的思想。社会党人听信这种宣传，是对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精神犯罪。

荷兰的决议案再次被代表大会的压倒多数所否决。战争问题委员会的多数派决议案，经比利时代表团提议作了补充，它责成参加一切立法代表机构的工人阶级代表有义务“否决军事预算、抗议军国主义和赞成裁减军备”。

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再一次讨论战争问题，拟定了一系列
[334] 防止日益逼近的战争危险的具体要求。伦敦代表大会象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一样，要求废除常备军和代之以民兵。此外，它还

要求任命成立一个国际仲裁法庭，负责调停各国之间的冲突；如果哪个国家的政府拒绝接受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那么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就交由公民投票表决。

4

伦敦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欧洲各大国开始了一系列加剧世界战争紧张的帝国主义行动。1898年法国人从西非进犯苏丹的法绍达，英国和法国处于一场战争深渊的边缘。法绍达危机一年后，爆发了德兰士瓦尔的布尔战争和1900年大国对中国的十字军东征。^①肢解这个懦弱无能的亚洲大帝国，是以日本人1894年侵占朝鲜和福摩萨(台湾)开始的。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俄国占领了满洲^②、大连和旅顺港；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并把山东省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英国强占威海卫，并宣布长江流域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和取得在云南省的特权。当1900年8月国际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大国军队刚于几天前开进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起义——被凌辱的中国人对瓜分肢解他们国家的外国侵略者仇恨的爆发。

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发生的这些事件揭露了战争的一个新的性质。战争不再是民族战争——象1859年的意奥战争，188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德法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是统治阶级占领殖民地、争夺市场及亚洲和非洲的势力范围的战争。

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就战争是大国殖民地政策的基本因素问题进行了辩论。^③它确认了前几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采取行动反对战争危险的决议，特别要求“教育和组织青年进行反

① 指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译者

② 指我国东北。——译者

③ 见原书第313—316页。

对军国主义的斗争”。

5

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思想首先在法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但它也传到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335】 在德国，反军国主义宣传——最卓越的先锋战士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仅限于在有兵役义务的青年和士兵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看法。但是，如同李卜克内西在青年近卫军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宣传“不言而喻”是保持在“合法界线”以内的，“在任何地方都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对军国主义拒不听命”。①李卜克内西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内容，也没有超出党代表大会确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路线策略范围。

在法国，反军国主义的思想却形成一个运动，它掌握了远远不限于青年人的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并致力于使党的原则和策略都成为问题的政治目标。这一运动的领袖古斯塔夫·爱尔威——一位教师，由于他的和平主义思想而受过处分——不仅宣传工人总罢工和后备役军人军事罢工的思想，而且也宣传一旦宣战就举行武装暴动。他崇拜纽文胡斯，因为纽文胡斯“保持了革命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精神的真正学说的纯洁性”②。象纽文胡斯一样，爱尔威也拒绝区分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要求以

① 转引自《社会民主党选民手册》(1911年柏林版)，第639页。当报告以小册子形式出版时，尽管李卜克内西强调他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合法性，仍以“图谋叛国”罪于1907年10月被判处一年半要塞监禁。

② 古斯塔夫·爱尔威：《他们的祖国》(1906年巴黎版)，第201页。在这本在法国轰动一时的书中，爱尔威阐述了他的反爱国主义的理论，象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对他说来，他们的祖国指富有者的祖国，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因此，不受任何爱国主义义务的约束。

国内战争反对任何战争，而不论哪一方是宣战者。工人没有祖国；他在1907年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建议要求通过的决议案中宣称：对无产阶级来说，“不论什么样的民族爱国主义和政府的爱国主义提出在一个国家的居民中存在着利益共同体这一骗人论断”，都是“无关紧要的”。^①

爱尔威和纽文胡斯的反军国主义思想根子都在于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它的追随者早在第一国际时代即已认为，“一切国籍和民族本身都是陈旧的偏见”。当这一见解在总委员会提出来时，受到了马克思的嘲笑。^②他虽然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了：“工人没有祖国”。^③可是用这句著名的和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言，他只是肯定了一个事实，即工人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前夫或前妻的孩子，按照奥托·鲍威尔的话是“民族的遗物”，他们被排除在构成民族本质的文化共同体之外，不许他们参加享受他们创造的民族财富，不给他们以共同决定民族命运的权利。如同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时所看到的那样，祖国是统治阶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祖国。^④ [336]

但是，马克思从这个事实没有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应该摧毁祖国，而是必须掌握祖国。工人阶级必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⑤，他紧接着那句名言之后写道。

① 爱尔威在1906年创办《社会战争报》，用来宣传反军国主义和武装暴动思想。可是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把报名改为《胜利》，热情地主张保卫国防和爱国主义思想。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同上，第3卷，第408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0页。——译者

④ E·H·卡尔在其所著《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卷中，研究了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同民族自决权的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关系，他引述了和马克思的名言相似的罗伯斯比尔的话。罗伯斯比尔在一次演说中指出（《罗伯斯比尔演说和报告集》，C·弗莱出版，第328页）：“在贵族统治的国家里，祖国这个词除了对那些窃据主权的贵族家庭以外，毫无意义。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才真正是大家的祖国。”第410页。

诚然，马克思曾经设想——如同他进一步阐明的，“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⑥相反，奥托·鲍威尔在他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本质的社会学研究中却指出，工人阶级分享民族文化财富的比例愈高和愈是成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员，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差别就愈大。^⑦

不论如何马克思了解各民族的存在是历史事实。因此，对他来说，以民族自决权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乃是不成问题的。在他为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并经总委员会通过的纲领中，要求给予波兰以——马克思这样强调——“属于每个民族”的自决权。^⑧可是，如果各民族自决权，亦即民族独立的权利，被国际承认为民主的原则，那么它就不能否认各民族有权保卫他们的独立。第一国际在总委员会关于德法战争的宣言中提出了这一权利，第二国际在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的决议中重申了这一权利。

因此，爱尔威的反爱国主义与国际的传统是相矛盾的。他的鼓动在法国工会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翼中掀起了一阵反爱国主义浪潮，但在法国社会主义政党中只引起微不足道的共鸣。

同爱尔威的宣传鼓动进行斗争的首先是饶勒斯，他的坚强
[337] 性格，十分奇妙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融为一体。他给自己在1904年为开展社会主义运动而创办的日报起名《人道报》——他以此报献给人类。可是在他看来，人类这个概念不是一批由个体组成的没有定形的群众，而是各民

⑥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0页。——译者

⑦ 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维也纳版），第1卷，第9节。

⑧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5年9月27日）》。又见第142—143页。

族的共生。他认为，各民族是经过历史长河而形成的有机的单位，这个历史长河在一个大的人民群众的内部创造了心理上的以及思想和谐的相同性。摧毁民族不单意味压抑和摧毁一个大型的生存集体，而且也意味——他这样写道——“个人活力的衰退，心灵的空虚，精神上的没落和机体的痛苦”。他还指出，工人阶级甚至将比任何其他阶级失去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将丧失自己进行解放斗争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即使进行侵略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国家内废除了资本主义专制政治，那么对这个既得到解放又遭受暴力侵略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仍将意味着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将在经济上取得明显胜利的同时，认为自己受到了奴役，不会感觉到在公平合理的新制度下的自由和自身非凡创造力的乐趣。”^①

饶勒斯把人类比作一颗从民族的闪烁的磨光面中吸收其光泽的王冠钻石。可是人类还不能作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存在，他在《人道报》创刊号社论中这样写道，因为阶级的对立使各民族的统一产生了诸多裂痕，民族的自私心理使人类的统一产生了诸多裂痕。消除这些对立是社会主义的本来的任务。“人类必须在自主的和兄弟般的民族结成的自由联盟形式中完成它的真正的生活统一。”^[338]而社会主义却只能——奥托·鲍威尔也指出过——在民族的历史范围内实现。“爱尔威要摧毁祖国，”饶勒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则要通过把生产资料变为全民财产，使得祖国社会主义化从而有益于无产阶级。因为民族是人类天才和进步的宝库，而且毁坏这个宝贵的人类文化的贮藏器，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不相宜的。”^②

法国党虽然批驳了爱尔威的反爱国主义思想，但并非没有受到他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法国党1906年里摩日代表大

① 1901年12月24日《小共和国报》，转引自杰克逊，同上引书，第171页。

② 《会议记录》，同上，第89页。

会的决议反映了这种情绪。

人们就制止战争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由爱尔威宣传的军事罢工的想法虽然遭到抵制，可是迄今由茹尔·盖得领导的社会党多数派，也拒绝以总罢工这一方法作为政治武器。而饶勒斯却承认它是防范致命危险确保工人阶级未来的最后手段。他认为这个危险就是战争。为了防止这一危险，他主张工人阶级可以不惜采取任何斗争手段。他毫不犹豫地甚至在法国议会的讲坛上宣布这一警告。在1905年12月众议院关于摩洛哥危机的辩论中，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和平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每天加强每个国家工人的团结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俾使欧洲无产阶级针对各国政府采取共同的和一致的行动来防止战争爆发。”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爆发了战争，那么，他进一步提出警告：“无产阶级就要从欧洲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把发动进攻的罪恶的各国政府置于无能为力的境地”。^①饶勒斯坚持认为，国际工人阶级事实上有能力采取行动制止战争。

由盖得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派反对饶勒斯在里摩日代表大会上所主张的这种观点。由盖得提交大会讨论的决议案声明，军国主义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因此，只有通过摧毁滋生这种祸害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结束这一祸害。然而，反军国主义宣传却束缚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它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宣传，从而在无产阶级充分组织起来的和强大得足以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战争的时候贻误了戎机。决议案建议，工人阶级应该“在此期间”通过他们争取缩短军队服役期的斗争，通过拒绝批准陆军、舰队和殖民地的预算，以及通过宣传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使战争“尽可能打不起来”。

盖得在里摩日提出的决议案遇到了饶勒斯和瓦扬主张的决

^① 转引自杰克逊同上引书，第164页。

议案的反对。饶勒斯-瓦扬的决议案虽然同样把军国主义看成 [340] 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现象,看成“是由国家组织的、使工人阶级处在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奴役之下的军备”。但它完全没有那种支配着盖得的决议案的悲观主义基调。饶勒斯也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最根本原因。“资本主义酿成战争,犹如乌云酿成雷阵雨,”他写道。可是战争的爆发不象雷阵雨是由自然力的紧张而产生的,战争产生于一种人类的意志行为,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以工人阶级的意志行为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为,战争就可以防止。工人阶级具有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防止战争灾难的力量。本着这一信心,决议案要求采用一切手段防止战争——“从议会干预、公开鼓动直到群众性罢工和起义”。

同爱尔威的反爱国主义针锋相对,决议案拥护民族和它的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致性。决议案声明,民族的独立受到威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也就受到威胁。此外,决议案不仅强调保卫自身独立受到进攻性战争威胁的民族的权利,而且也声明,击退这种威胁乃是一个民族及其工人阶级的“天职”。各民族独立的原则被宣布为国际的一项基本要求。由此而得出在决议案中公布的准则,即独立受到威胁的民族“有权要求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

饶勒斯-瓦扬的决议案获得了代表大会多数的赞同,它以一千九百六十票对一千一百七十四票得到了下一届(1907年)法国党的南锡代表大会的批准。同时,代表大会要求将该决议提交给1907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进行讨论。

6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与会

国和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二十五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六名代表聚会一堂——这是一次“十分辉煌和伟大”的集会，如同倍倍尔在他的贺词中所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还从未有过”。这是在德国土地上召开的首次国际代表大会，当然是在普鲁士政府势力范围之外。据倍倍尔自己承认，如果“在毕洛夫公爵和柏林警察的眼皮底下”的德国首都“召开这次代表大会”，那将是冒险行为。

列于议事日程首位的是“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由饶勒斯-瓦扬和盖得（包括爱尔威的一个决议案）提出的两项法国决议案以及由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① 构成了讨论的基础——讨论用了六天时间，五天在专门委员会上，一天在全体大会上。

倍倍尔的决议案象盖得的决议案一样，把战争看成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决议案声明：“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要求付出的人力和财力以及由于军备激起各国人民的愤怒而迫使消灭这种制度时”，战争“才会停止”。决议案强调，工人和他们的议会代表有责任竭尽全力反对扩充海陆军备，拒绝为此目的而开支经费。此外，决议案重申要求民主组织防务，这是“使进攻性战争不能得逞的一个基本保证”。

在把自己的决议案提交给专门委员会讨论之前，倍倍尔还曾声明，饶勒斯-瓦扬的决议案对德国代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该决议案将使党陷入“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境地”。他当然不

^① 即使处在普鲁士警察势力范围以外，国际代表大会在开会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受到干扰。英国代表哈利·奎尔奇在代表大会讨论期间被符腾堡政府驱逐出境，因为他在一次演说中，把同时在开会的欧洲政府海牙和平会议称之为“一次窃贼的晚餐”(a thieves' supper)。空出来的坐椅被饰以他的代表大会证和月桂树枝，挂了一块牌子，放到英国代表团的桌上，牌子上写着：“这儿坐过哈利·奎尔奇，他在昨天被符腾堡政府驱逐出境。”《会议记录》，第49页。

反对决议案强调的各民族及其工人阶级有权保卫他们的独立的思想——除了爱尔威外，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对这种权利提出疑问。有争论的只是饶勒斯-瓦扬决议案中关于防止战争的手段的下列声明：

“应通过工人阶级采取从议会干预、公开鼓动直到群众性罢工和起义等一国和国际行动预防和制止战争。”

对这一措辞，倍倍尔主张改用如下提法：

“如果出现爆发战争的危险，那么在有关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就有责任竭尽全力，通过使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制止战争爆发，或者，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则保证尽快结束战争。”

由于工人阶级采取行动制止战争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此它要求得到整个代表大会的一致同意，首先是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一致同意。欧洲已分裂成两个营垒：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和法俄同盟。因此，欧洲的和战取决于柏林和 [342] 巴黎。只有成功地将德法两国政府置于无法抗拒的压力之下，才能预防一场欧洲战争。只有德法两国的社会民主党就反对战争危险采取共同行动达成协议，才可望成功地防止战争危险。

饶勒斯在就自己的决议案所作的说明中，提出理由反对贯穿在倍倍尔的决议案中的宿命论基调。“有人告诉我们，”他说，“反对战争的斗争是徒劳的，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要产生战争。可正是这样，资本主义有着无穷尽地加紧剥削和无休止地延长劳动时间的内在趋势，而我们却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并且取得了成果。”国际在制止战争的手段上不应该满足于含糊其

辞的提法。反对战争的斗争方法必须十分明确地确定下来，以便使工人阶级对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作好准备。社会民主党不能让自己被战争——这场无产阶级的同室操戈——的危险搞得惊慌失措。“必须防患于未然，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结成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他继续说，“假如我们除了倍倍尔的话以外说不出更多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有肯定的方法制止民族煽动和民族杀戮”，那是可悲的。他提醒大家注意，倍倍尔曾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1905年）宣布，一旦剥夺选举权就发动群众性罢工。那么，能够允许社会民主党不试图作出最大努力，而听任法德两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指使和为资本家所用自相残杀吗？“假如我们不试图这样做，我们就是不光采的，”他说。^①

倍倍尔回答说，这种努力肯定是少不了要作出的；他的决议案并不排除任何适当的制止战争的手段。但宣传饶勒斯-瓦扬决议案所提出的那种斗争手段——群众性罢工和起义，在德国却是“不可能的和没有讨论价值的”。他描绘了战争爆发的时刻国内将出现的形势。六百万男人，其中有二百万社会民主党人，将立即被征集入伍。“我们哪儿还能有人来进行群众罢工呢？……四百万家庭将处在极度困难之中，这比任何一次总罢工都要严重。你们想想这种情况吧，想想这些群众的情绪吧！”倍倍尔进一步指出，一场战争将会引起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粮食一大部分来自国外；宣战的当天粮食就要停止进口。我们没有工业产品可供出售，因为由于出口不成，我们的大部分生产就变得无法进行了。这意味着更严重的失业和苦难。会引起物价大幅度上涨，也许要爆发饥荒……”倍倍尔引证一位德国将军的话，这位将军说过，在现代大规模作战中，“我们将不知道我们该

[343] 在什么地方收容伤兵和埋葬死者”。他补充道：“在这种情况下，

^① 《会议记录》，第90页。

我们应该搞群众罢工这类玩意儿吗？在我们为此而发出第一个信号时，我们就将受到嘲笑。”^①他听天由命地表示：“我们除了进行解释、清醒人们头脑、宣传鼓动和组织诸工作外，别无其他办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力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不能硬性接受对党的生活和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对党的生存可能造成灾难的斗争方法。”他建议任命一个小委员会，由它试行起草使法国和德国的观点都能感到满意的决议案的措辞。

小委员会达成一致的决议案——一份内容相当丰富的文件^②——指出，战争现象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责成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全力进行反对军备的斗争，并以各国人民兄弟友好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工人阶级青年一代。

决议案说：但是，国际没有能力“把不同国家内自然而然各不相同的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统一成为固定不变的形式”。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工人阶级为了防止战争爆发或结束战争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行动：例如，英国和法国工会在法绍达危机后为保障和平和恢复英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达成了谅解；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党在两国议会中和在群众集会上采取的行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为防止两国之间的冲突在的里雅斯

^① 《会议记录》，第33页和100页。四年后，倍倍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1911年）以同一理由阐述了他对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举行群众性罢工的态度：“数百万工人从他们的无隔宿之粮的家庭里被召走。数十万名小业主可能宣布他们破产，因为他们没有继续营业的足够资金。所有有价证券的行情暴跌，数以万计的富裕之家由此而沦为乞丐。出口贸易停顿，我们的强大世界贸易被中断。无数工厂和工商企业，但凡不是为军需服务的，都得停工。失业和无工资收入现象充塞各个角落。粮食进口完全或者大部分停止。粮食价格腾贵。这将事实上意味着普遍的饥荒。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将不是叫喊要求群众性罢工，而是要工作和面包！”《耶拿党代表大会协商记录》。

^② 决议案全文见附录。

特发表的联合公告；瑞典社会主义工人干预制止对挪威发动的进攻；“最后，是俄国和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和农民为反对由沙皇[344]政权所发动的(对日)战争，使战争结束并利用国家的危机争取劳动阶级解放而进行的英勇的和无私的斗争。”决议案还说：“所有这些努力，证明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正在增长，他们通过坚决进行干预确保维护和平的力量正在增长。”

决议案以下述由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联合提议的声明作为结束，这一声明在国际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说：

“如果出现爆发战争的危險，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执行局总的活动的支持下，竭尽全力通过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制止战争爆发，当然这种手段视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情况而改变。

“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

决议案被一致通过。代表大会记录注明，决议受到“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阵阵掌声的欢迎，特别是法国代表团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事实上代表大会深信，法德双方观点上的矛盾已经消除。辩论中强调指出由倍倍尔建议的采用“认为最有效的手段”防止战争的提法包括一切手段，因此也包括群众性罢工在内。然而各党能否采用这种手段，则必须由各党自行作出判断。不论如何，各党都承认了有责任竭尽全力反对战争。

可是，决议在结尾一段中要求不只是为反对战争或者为迅速结束战争而斗争，假如战争仍然终于爆发的话。它责成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党利用由于战争而产生的社会危机，使之变成社

会革命。这一责任的意义在辩论中根本没有触及。例如，饶勒斯从斯图加特回国后，在巴黎特弗里谷会堂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解释决议时，只是谈到防止特大洪水。他说：“国际宣布了两条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不容分开的真理。第一条真理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有权利和义务全力维护他们的自治。第二条真理是，为了防止工人不仅要为之流血而且也要损害自己良知的突然爆发的杀戮行为，工人有责任制止战争。你们将会明白，”他继续说道，“这些不是光靠诅咒，不是靠无济于事的怨愤和不关痛痒的咒骂所能做到的……而是要靠他们的全力行动。他们必 [345] 须通过议会的或社会的行动，踏死灾难性战争的苗子……”^①但是，关于国际宣布的“第三条真理”，关于一旦特大洪水遍及世界时应采取的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行动，再也没有提及。

7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大国政策的发展，加深了战争恐惧感——战争曾经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主要辩论的问题。同一时期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由于威廉皇帝拒绝将普遍限制军备问题——只不过是——列入讨论范围，或接受一项提请仲裁法庭调解消弭冲突的协定，而告失败。英国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谋求与德国达成协议，也毫无成果。威廉二世决心在他所掌握的强大陆军以外，再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海军。他那关于“钢甲拳”和“磨得犀利的剑”的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词，是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虽然在大国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威胁它们“切身利益”和进行战争言之成理的冲突。但大国疯狂进行军备

^① 转引自杰克逊同上引书，第174—175页。

竞赛,给欧洲布下一派仇恨、猜疑和首先是恐惧的气氛,产生了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紧张局面。

国际进行集会商讨的下一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底在哥本哈根召开,主持者为亚尔玛·布兰亭——有二十四个国家八百九十六名代表出席,当时,海军军备竞赛十分激烈,即英国和德国竞相建造大型新式战列舰——“无畏”号。^①一种新的战争危险,即英国和德国之间为争夺海上霸权的海战的危险出现了。

由卡尔·伦纳起草并终于一致通过的决议案只限于提议会的反对行动。它再次责成议会中的社会主义政党议员全力反对军备和拒绝批准军备开支,但却把成立仲裁法庭的斗争作为首要任务。社会民主党议员应该不断要求提请国际仲裁法庭解决国家之间的争执。

由仲裁法庭调停国际冲突这个问题,已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联系保卫国防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这一点上得到倍倍尔赞同的饶勒斯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中的态度应取决于有关政府的态度。试金石是政府对仲裁法庭的态度。如果政府拒绝把它同其他国家政府的冲突提请国际仲裁法庭调解,工人阶级就应拒绝给予政府以支持,并全力同政府进行斗争。相反,如果他们的国家在政府愿意接受仲裁法庭的情况下仍然受到敌对

^① 德国扩充海军在英国引起了一阵由沙文主义报刊煽动起来的惊慌:英国认为受到了德国入侵的威胁。在英国政府谋求与德国政府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之后,几位有声望的英国社会党人——其中有海德门、贝尔福特·巴克斯和布拉奇福特——反对独立工党和工党的抗议,拥护英国扩展海军。考茨基提到与海德门进行的关于这件事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向海德门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德国海军军备的斗争,由于海德门支持英国海军军备而变得难办了。“海德门问我,”考茨基说,“我是否能向他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制止德国军队入侵英国。我不得不回答他说,作出这样的允诺是轻率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的爆发……好,海德门回答说,一俟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强大到足够制止一场侵略我们的战争时,我们在英国将反对任何扩充军备。但是在无法相信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另外的因素……”卡尔·考茨基:《社会主义者与战争》(1937年布拉格版),第398页。

国家的进攻,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全力支持政府。

此外,决议要求社会主义议会代表通过“不断提出新的提案”要求普遍裁减军备,首先是要求缔结一项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协定。最后,决议确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发生战争冲突时工人阶级行动的决议——决议的结尾两段全文照录,并指示执行局,“在出现战争危险的威胁时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在有 [347] 关国家的工人党之间就防止战争采取统一行动取得一致”。

然而,凯尔·哈第-瓦扬的提案重新引起了关于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防止战争的辩论。提案要求代表大会宣布军事工业、矿山和运输业工人罢工“特别适合”于制止战争。瓦扬在就提案作出说明时声称,如果没有议会外的群众性行动支持,建议采用的议会手段将是毫无作用的。但是,这种群众性行动只有在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从一开始就向工人阶级指出自己拥有的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我们的提案不是要宣布群众性罢工,而是要组织群众性罢工,”他说。凯尔·哈第还指出,单是矿工的罢工就足以制止战争。

这项提案在委员会中就进行了讨论,并以一百十九票对五十八票被否决——在否决以前,奥迪诺·莫尔加利代表意大利代表团表示,这样一个决议是“党的自杀”。累德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明,决定将使党背上非法的罪名和导致“组织被毁”。在全体大会上,代表大会终于就王德威尔得提出的建议取得一致意见,把提案交给执行局研究,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讨论。

8

在哥本哈根曾决定,1913年夏在维也纳召开下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但这一点再也无法做到了。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结束一

年后，意大利对土耳其宣战。意大利工人阶级力量过于软弱，无法制止这场强占的黎波里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他们虽然与工会在战争刚要爆发前联合发布了举行二十四小时总罢工的号召，但这个“置身事外不参与任何暴力行为的庄严抗议”——号召书中是这样宣布的——未能制止这场灾难。尽管意大利工人举行无数次自发性罢工和街头示威游行，试图阻止战争的进行，战争仍持续了整整一年。它引起了一场首先席卷巴尔干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灾难的危机。

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之前，国际形势即已显得十分咄咄逼人，致使维克多·阿德勒怀疑——他在致倍倍尔信中这样写道，定于1913年夏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大会能否举行。倍倍尔对阿德勒的忧虑抱有同感。“通过长期观察欧洲形势，我认为，”倍倍尔在1912年10月6日致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明年可能使我们陷入一场欧洲战争，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愚蠢的对英政策搞出了一个国家集团，这个集团几年前还没有人认为是可能的，而且内部不自然到极点。我感到，英国人不会长期忍受这种形势，而会急于要求摊牌……事情的这一整个情况和你所述及的理由联系在一起，使得断然有必要延期举行代表大会。如果在土耳其发生冲突，那么我不相信战争会孤立地限于土耳其一地。事情有其本身的逻辑，而引起爆发的因素又比比皆是；人们将不由自主地继续走下去。后事如何，就非笔墨所能形容了。”^①

倍倍尔所担心的土耳其冲突一周后发生了。10月13日，巴尔干国家向土耳其宣战——这是信奉天主教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大动乱的一场战争。自从1878年大国柏林会议以来，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为了摆脱令人憎恨的奥斯曼奴役，不断举行起义；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则等待机会，发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打垮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

^① 《维克多·阿德勒书信集》等，同上，第550页。

意大利的利比亚战争提供了这个机会。尽管过了一年之久，巴尔干各国政府才就作战取得一致意见和为此作好准备。战争是在1912年10月上半月开始的。使全世界感到意外的是，巴尔干各国的军队在短短几星期后已直捣君士坦丁堡大门口的恰塔尔沙线。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已告完结。

可是这时候看来，象倍倍尔所担心的那样，似乎巴尔干战争要迅速转化为一场欧洲战争。奥地利政府曾经认为，如同毕洛夫公爵证实的，“土耳其将轻而易举地被它的敌手击败”。^①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巴尔干国家的胜利，被奥地利政府视为帝国的失败。它把虽然只有几乎还不到三百万人口的塞尔维亚这个小国看成是它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这是一块对处于哈布斯堡统治下的七百万南斯拉夫人具有吸引力的磁铁。使塞尔维亚屈服和无力自持，以便有朝一日对这截“欧洲的盲肠”进行“手术摘除”，乃是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的指导思想。^②1908年，奥地利并吞了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从而激起了塞尔维亚人 [349] 的仇恨，他们努力争取与被并吞省份内的同胞兄弟实现民族统一。俄国曾经支持塞尔维亚的要求，德国曾经支持奥地利的要求，巴尔干危机在1909年即已有迅速转变成一场战争的危险。但当时的俄国在对日作战后精疲力尽，冒险进行一场决战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它下定决心不回避再次一决胜负。

① 伯恩哈特·冯·毕洛夫公爵：《言行录》，弗兰茨·冯·施托克哈默出版（1931年柏林版），第3卷，第112页。

② 早在1907年，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就在一份条陈中要求，把“并吞包括尼施这片中心地带在内的塞尔维亚”作为奥匈政策的目标；因为“一个独立的塞尔维亚是旨在分裂所有南斯拉夫人地区的奢望和阴谋的永久性策源地”。在1908年并吞危机期间，他曾迫不及待地要求发动进攻和并吞塞尔维亚。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建议，耐心等待出现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利的欧洲局势”。见奥托·鲍威尔：《奥地利的革命》（1923年维也纳版），第12页。该书第1部分第1章是了解当时巴尔干问题的最好的导言。又见奥托·鲍威尔：《巴尔干战争和德国的世界政策》（1912年柏林版）。

但是，现在巴尔干危机之火再次燃起来了。塞尔维亚以对土战争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力图在亚得里亚海获得一个港口，而奥地利却决心不容忍塞尔维亚搞领土扩张。它动员军队，以武装干涉相威胁，要求占领旧土耳其省行政区①——穿越塞尔维亚领土的走廊。在反对哈布斯堡帝国取得巴尔干霸权的斗争中，沙皇俄国又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这次，看来似乎奥地利和俄国之间，三国同盟和俄法同盟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和平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国际执行局在巴尔干战争(10月28日)爆发后两星期在布鲁塞尔开会，按照所收到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给它的指示，定于11月24日至25日在巴塞尔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同时它还决定，把原定于191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大会延期到1914年举行。

巴塞尔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一次和平示威——也许是国际史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这次代表大会于星期日早晨在布格福格泰大厅由爱德华·安塞尔宣布开幕，与会者有二十五个国家的五百五十五名代表。来自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的巴尔干各国人民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他们当中有索非亚的扬科·扎卡佐夫，他是保加利亚议会中唯一对战争表示过抗议的议员，直接从马其顿战场来参加代表大会。塞尔维亚党在一封信中以自己国内的战争状态为由，说明未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并坚决恳求代表大会“结束在巴尔干的流血杀戮”。

在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的时候，来自巴登、亚尔萨斯和瑞士

① 指波斯尼亚以南法律上属土耳其地区的诺维·巴查尔省(亦译新帕扎尔州)。1878年7月柏林条约同意奥匈在此驻军，用作奥匈南下萨洛尼卡的通道；1909年2月，奥匈曾撤出它的部队，以换取土耳其正式承认它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译者

各地的专车抵达巴塞尔，好几千人挤满了明斯特大教堂大厅和四周的广场。两点钟，代表队伍从巴塞尔街头向明斯特大教堂进发。队伍前面是一群白衣儿童，他们举着桦树枝做旗杆的红旗。队伍走近大教堂的时候，教堂钟声开始齐鸣，当队伍的先导进入大教堂时，管风琴奏起了巴赫的《C小调弥撒曲》。

对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来说，这一次有些不同凡俗。诚然，在这所哥特式大教堂拱形屋顶下已经召开过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可那已是五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是一次红衣主教、[351]主教和教士的代表大会，即1431年的普世基督教会议。据加尔文教派牧师特施勒在集会的当天上午在明斯特大教堂讲道中通知，教堂的大门能否也为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开启，应由教区主管们决定。“我们明斯特教区的教堂主管部门已经对此表示一致同意，”他报告说，并补充道：“下午要在这儿召开的集会也是一次富于基督教精神的集会，即使演说的人采取一种使我们听来感到不习惯的表达方式。可是由于这次代表大会要宣布基督教的准则和思想，因此我们也以诚挚的同情向部分从远方来到我们这儿的人士表示欢迎。”①

明斯特大教堂的集会沉浸在欧洲面临可怕的危险、使人感到压抑的严峻气氛中。阿德勒说：“我们来自一个国家，它的统治者此刻正在作出决定……而我们则在这里商讨争取和平。”如何才能防止这场不幸呢？这一使人五内俱焚的忧虑贯穿着所有的演说。工人阶级有能力防止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吗？“代表着一千五百万社会民主主义选民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保卫欧洲和平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凯尔·哈第表示道。但阿德勒警告说：“可惜战争发生与否，不取决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每天都在增长，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是我

① <1912年11月24日至25日国际社会主义者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柏林版），第52页。

们不能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唯一的希望是，统治阶级出于害怕国际坚持不放松的革命而不敢发动战争——即如同阿德勒说的，希望各国政府自己感到，“历史罪行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这种罪行开始之日，将顺理成章地就是犯罪者的统治开始垮台之时。”饶勒斯深为激动地说出了代表大会在这一时刻的心情。“就是在这座教堂里，”他说道，“我感到刚才欢迎我们的钟声是在呼吁普遍和解。它使我想起了席勒为他那首光辉诗篇《钟之歌》所写的序言：‘我呼唤活着的人(Vivos voco)，我为死去的人哀悼(Mortuos plango)，我制服闪电(Fulgura frango)！……’ Vivos voco——我呼唤活着的人保卫受到杀戮威胁的生命！ Mortuos plango ——我为躺在欧洲另一尽头可怕的战场上的无数死者哀悼，他们的尸体腐烂而发出的气味向我们袭来，好象是对恶行感到悔恨。 Fulgura frango ——我要粉碎照亮云层和预告危险临头的战争闪电！……”饶勒斯在演说结束时提出警告：“各国政府应该想到，如果它们执意挑起一场战祸，各国人民定能很容易地算出，他们自身进行革命比对方的战争要求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少！”

代表大会按计划于翌日举行大会讨论。国际老战士，四十年
[352] 三年前即已代表瑞士社会主义运动出席第一国际 1869 年 巴塞
尔代表大会的海尔曼·格雷利希担任执行主席。

在 10 月 28 日布鲁塞尔会议上，执行局曾起草一份与以往各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不相同的内容全面的宣言。它不仅象迄今为止的所有决议那样严厉谴责战争和要求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假如战争果真爆发的话，而且还阐明了一项国际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具体纲领，用来防止迫在眉睫的战争，致力于和平解决欧洲陷入其中的危机。

宣言首先声明支持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巴尔干各国建立一个民主联邦的要求。宣言号召巴尔干社会党人，不仅要

反对在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之间重新挑起旧有的敌意，而且也要反对对另一个战争营垒内的巴尔干人民，即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施加任何侵犯行为。“巴尔干社会党人有责任反对任何剥夺这些国家人民的权利的行为，同不受约束的民族沙文主义针锋相对，宣布所有巴尔干人民，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内的兄弟情谊。”

接着，宣言向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民主党发出呼吁。它们的职责是继续全力采取行动反对多瑙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反对以武力夺取塞尔维亚的战果和把塞尔维亚变为奥地利殖民地的计划。

宣言公开谴责沙皇政权的阴谋诡计。它在自己无数次背叛了巴尔干各国人民之后，现在又准备以巴尔干各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利用这一幌子在战争中夺回它在巴尔干的霸权。宣言号召俄国、芬兰和波兰工人反对沙皇政权的一切战争冒险行为，并制止俄国染指亚美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一切阴谋活动。

宣言指出，但是最重要的任务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肩上。它们必须要求它们国家的政府不仅不支持奥匈，而且也不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任何企图，不去插手巴尔干的纠纷，保持绝对中立。“三个为首的文明大国的人民为了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争夺港口而进行一场战争，那是荒谬的举动。”但是，如果土耳其的军事崩溃可能动摇奥斯曼在近东的统治的话，那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的任务就是全力反对必然直接导致世界大战的侵占近东的政策。宣言继续说，但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危险却是大不列颠和德国之间人为造成的敌对情绪。宣言要求两国社会党人加紧努力促使两国就停止海军军备达成协议。克服以德国为一方和以英国和法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将为世界和平消除最大的危险，动摇从这一对立中进行渔利 [353]

的沙皇政权的实力地位，使奥匈帝国无法入侵塞尔维亚和确保世界和平。“因此，国际应该首先致力于这一目标，”宣言声明说。

最后，宣言率直无隐地警告欧洲各国政府注意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宣言指出，让各国政府不要忘记，“在欧洲当前局势和工人阶级的激愤情绪下，它们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而对它们自身没有什么危险”。宣言提醒各国政府记住，德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动员了俄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陆军和海军军备竞赛使得英国和大陆上的阶级冲突空前尖锐和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如果各国政府不懂得，只要想到世界战争这个罪恶的邪念就必然会引起工人阶级的义愤和恼怒，那将是荒唐的。”

宣言以庄严的声明结束：“无产阶级意识到，这一时刻自己是人类未来的主宰。”宣言热情洋溢地呼吁，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竭尽全力“制止毁灭各国人民的繁荣，这一繁荣正受到种种可怕的大规模屠杀、饥荒和鼠疫的威胁”，以各种形式和在各个地方表达无产阶级的和平意志。“以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来同进行剥削和进行集体屠杀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①

宣言的法文本、德文本和英文本分别由饶勒斯、维克多·阿德勒和凯尔·哈第宣读并作了说明。

在辩论中，胡果·哈阿兹代表德国党，弗兰蒂舍克·肖库普代表捷克社会民主党，特鲁尔斯特拉代表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荷兰社会党人，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国际妇女运动，扎卡佐夫代表巴尔干社会党人，瓦扬代表法国党和格雷戈里奥·阿格尼尼代表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代表团发言。没有讨论

^① 宣言全文见《会议记录》，同上，第23—27页。

关于制止战争的策略和方法问题。但凯尔·哈第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中已经表示,他希望,如果政治行动还不足以防止战争的爆发,那么工人阶级就将拿起他们的经济武器——即“世界性的革命的反战罢工”。而瓦扬则强调,虽然宣言未触及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反对战争的问题,但绝非“既不排除反战起义,也不排除总罢工”。

代表大会结束时奥古斯特·倍倍尔讲话。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由于身染重病,这位七十二岁的人以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当宣布他讲话以及他走向主席台时,据记录记载,“代 [354] 代表大会向他欢呼达好几分钟之久”。倍倍尔深为感动地赞扬代表大会,它将用“金色铅字载入”国际的年鉴,使“所有有幸与会的人难以忘怀”。

9

人类总算勉强回避了一场灾难。但是,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云并没有驱散。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受到威胁,但所有国家都认为自身受到了威胁。欧洲积蓄的没有消弭的紧张气氛在制造仇恨、猜疑和恐惧。大国纷纷加速进行战备。俄国在它的西部边界上敷设战略公路网,法国政府要求众议院把军队服役期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德国政府增加自己的炮兵部队,同时并扩充舰队,而英国则建造多于德国一倍的装甲巡洋舰。

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灾难性的事件——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被塞尔维亚密谋者行刺身亡。各国人民当然没有料到,这位大公之死竟会造成生灵涂炭的恶果。大公被刺在巴尔干毕竟不是什么希罕事,凶手波斯尼亚公民是奥地利的臣民,而且并没有证据说明塞尔维亚政府参与了这场行刺事件。皇储在奥地利也不是深受欢迎的人,甚至

哈布斯堡王室对大公之死也并不怎么悲伤。但哈布斯堡政府把塞尔维亚看成是民族统一党的集中地，他们以分裂南斯拉夫人的省份来威胁帝国，并已下定决心推翻帝国。1912年，各国制止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这一次它再也不想让别人来阻止了。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提供了借口，不仅要凌辱塞尔维亚，而且，如同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1914年7月7日在枢密院所说的，要“通过显示力量永远消除祸害”。贝希托尔德毫不怀疑地告诉枢密院，“同塞尔维亚兵戎相见可能引起同俄国的战争”。但是据他说，由于他“得到了一旦发生战争纠纷德国给予完全支持的明确保证”，因此可以大胆冒险干。^①

可是，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必然要引起欧洲战争。俄国已同法国结盟，而英国则不能容忍德国在一场大陆战争中战胜法国和俄国。那样一来，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和从彼得堡直至布勒斯特海岸线的主人——推翻了“强国的均势”，这是英国认为的对它的安全和未来的威胁。虽然英国并未通过正式结盟而受法俄同盟的约束，但英国政府还是让法德两国政府都知道：一旦爆发大陆战争，英国将同法国和俄国一起对付德国。^②

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全世界亦然——都感到，德国为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纠纷甘冒风险跳进一场同俄、法、英三国开战的深渊，这是无法理解的。它们不相信会发生一场欧洲战争，它们根本不相信萨拉热窝的意外事件能发展成一场战争。萨拉热窝的枪击发生在6月28日。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一事件，维克多·阿德勒之子、身为奥地利党的书记受委托负责筹备定于

① 见《从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至1918年战争爆发时止的奥匈外交政策》，路德维希·比特纳和汉斯·于贝尔斯伯格编（1930年维也纳版），第8卷，第343页。

② 维斯康特·霍尔丹在1912年2月即已对贝特曼-霍尔韦格表示：“如果德国突然侵犯法国，英国不能保持中立束缚自己的手脚”。见Th·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展望世界大战》第1部分：《战前》（1919年柏林版），第53页。

8月23日举行的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还是继续他的工作。直到三星期后，即7月21日，奥地利新闻检查机关从《工人报》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的一篇报道中，删掉了谈到凯尔·哈第-瓦扬决议案的部分，这时他才怀疑，将这一决议案列入议事日程的国际代表大会能否不受警察的干扰在维也纳举行。他考虑建议把代表大会改在另一个国家召开。但是，他可以与之讨论他的考虑的“党的执委会成员，当时几乎一个也不在维也纳”；他们正在度假。直到7月23日，他才能召开一次会议，商讨他的建议。然而，“同志们大多数，首先是伦纳博士，根本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①阿德勒说。会议结束后两个钟头，全世界知道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了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

可就是这样，国际的领导人仍然确信，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看来无法避免的战争将是局部性的。最后通牒发出五天后，即7月28日，国际布鲁塞尔执行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同日，[356]奥地利宣战。但会议还是认为，一场欧洲战争可以制止。会议非常自信地作出决定，代表大会的地点虽然从维也纳移至巴黎，但提早于8月9日开幕。

会议于7月29日结束它的全体会议。三天后，即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对法国宣战。第二天英国也加入

^①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特别法庭上》（1923年耶拿版），第197页。对战争可能性的怀疑，由于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家的态度而得到加深。这些政治家也无视萨拉热窝事件而仍去度假——他们当中有为了给世界造成一种安全的幻觉而密谋策划了战争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也有法国人和英国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事情会发展成战争。威廉皇帝乘他的游艇去畅游挪威的狭窄海湾；奥地利总参谋长康德·冯·赫岑多夫以及冯·毛奇将军故意引人注目地前去休假；7月15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彭加勒偕同总理维维亚尼去彼得堡作国事访问，两人直到7月29日才回国；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原文为Gray，疑系Grey之误。下同。——译者）爵士则在乡下钓鲑鱼，度过了危机四伏的几周。

战争。

10

象整个人类一样，社会主义者遭到了战争的突然袭击。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就突然面临战争了。

7月14日，即战争爆发前两星期左右，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在巴黎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说明他们对临头大祸毫无思想准备的例证。代表大会虽然完全用来讨论防止战争问题，但却不是针对已经等候在大门外边的战争而言。议事日程上列着经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交由定于8月23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讨论的凯尔·哈第-瓦扬提案。法国党代表大会是在假设德国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讨论问题的；在这样一场战争的力量对比中，它根本没有把俄国沙皇作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因素来考虑。辩论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政党通过哪种形式，直接的群众性行动能够制止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变成一场世界大战——这时，除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国务总理办公厅外，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这种可能性，而是可以说是学究式的问题，即群众性罢工究竟能不能制止战争，是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在爆发后举行群众性罢工能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同两个星期后国际布鲁塞尔执行局将要举行的辩论相比，这次辩论特别有趣。孔佩尔·莫雷尔曾经提出警告，不要作出党无力付诸实行的决议。而饶勒斯却相信，工人阶级将会响应党举行罢工的号召，群众性行动实际上能够制止战争。但是据他说，罢工不应该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举行，“因为那样一来，就把世界送进了大大小小的地狱”。国际必须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在那些卷进冲突的国家宣布总罢工，然后发表声明：“我们允许在

愿意向另一个国家提出接受仲裁法庭的那个国家停止总罢工。”马塞尔·桑巴同样主张在战争爆发前举行总罢工，只要战线另一方的工人阶级肯定也起来举行总罢工的话。不过如他所说，[357]他坚信，一旦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急转直下，罢工就会自然而然到来。

但是党代表大会没有考虑，假如战争起因于德国同俄国之间的冲突，而法国作为俄国的盟友卷入战争的话，工人阶级应采取何种态度。党代表大会没有考虑，被沙皇政权镇压下去和组织受到沙皇政权摧毁的俄国工人阶级是否有能力制服他们的政府。

以总罢工为防止战争的手段的思想是以这种假设为基础的，即陷入冲突的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是相等的；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力量有效地进行总罢工，因为不然的话，将恰恰是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一场总罢工使得它的军队的战斗力瘫痪的话——成为那个能够放手将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国家的牺牲品。茹尔·盖得说，总罢工简直是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危险。“组织程度较高的国家将被摧毁。”^①

法国党代表大会没有结合两星期后世界面临的具体形势讨论防止战争问题，这显然是因为奥地利—塞尔维亚的冲突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的想法看来太难以置信了，哪怕花一点点时间认真讨论也没有必要。

直到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公诸于世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首先是奥地利党和德国党——才感到巨大的危险威胁着欧洲。就在同一天，奥地利的德裔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表一项宣言，在宣言中，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指出那些“想

① A·泽瓦埃尔：《1904年以来的法国社会主义》（1934年巴黎版），第54页。

出……这一灾难性的一步……”的人应承担战争罪责，“人民得不到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机会……代表人民工作和说话的议会默不作声。集会和言论出版政治自由受到钳制……”事实上宣言几乎全文被新闻检查机关扣发。

同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表了一项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公开发表意见，国家还未处于战争状态，新闻出版还未受到检查，议会没有象奥地利那样默不作声。宣言谴责“奥匈帝国政府寡廉鲜耻的战争挑衅”，“断然要求德国政府对奥地利政府施加它的影响以维护和平，并且不进行任何军事介入，如果卑劣的战争无法制止的话”。宣言号召工人立即举行群众集会，表明他们保卫和平的意志。“严重的时刻已经来到，”宣言说，“比近几十年中的任何时刻更为严重。危险近在眼前！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三天以后的7月28日，即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当天，德国各地城市几十万群众示威游行，反对咄咄逼人的危险——仅柏林一地就举行了二十七次群众大会。^①

11

同日，国际在布鲁塞尔人民大厦召开了一次在其历史上最为命运攸关的会议。这是一次欧洲运动最杰出的代表的集会：饶勒斯、盖得、龙格、阿德勒、王德威尔得、考茨基、哈阿兹、罗莎·卢森堡、凯尔·哈第、布鲁斯·格雷西尔、阿克雪里罗得、莫尔加利、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娃、格里姆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代表

^① 对这次和平集会，威廉皇帝在第二天收到沙皇的一份电报（7月29日）上作了旁批：“社会民主党人在街头搞反军国主义勾当，这是不能容忍的，现在决不允许；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将宣布戒严并下令把头头们统统关起来。”转引自考茨基同上引书，第441页。

着好几百万人。^①但是他们怀疑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采取直接的群众行动来制止近逼的战争。虽然凯尔·哈第匆促间提到了总罢工问题,但会议没有就此进行讨论。 [359]

会议首先需要弄清各潜在的战争强国中的社会主义政党——奥地利党、德国党、法国党和英国党——的态度。据陪同父亲参加会议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说,维克多·阿德勒的报告“显示出完全消极、对战争没有任何办法的无能思想”。“我们已经在打仗了,”维克多·阿德勒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反对战争……但是,不可能指望我们采取任何行动了!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我们的报刊被取缔了。我们已宣布紧急状态,后面就是军法……”他还说:“我到这里来不

① 战争爆发时,卷入战争的欧洲各强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实力情况如下:

	党员人数	1914年前最后一届 议会选举得票数	社会主义 议员人数	议会议员总数
德 国	1085905 名	4250329 名	110 名	397 名
法 国	90700 名	1397337 名	101 名	595 名
奥 地 利	145500 名	1041000 名	82 名	516 名
大不列颠	1559032 名	370302 名	42 名	670 名
比 利 时		600000 名	39 名	185 名
俄 国		800000 名	14 名	442 名
塞尔维亚		25000 名	2 名	166 名

《1956—1957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年鉴》,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出版(1956年伦敦版)和《1913年社会主义年鉴》,J·布鲁斯·格雷西尔出版(1913年伦敦版)。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反动派的斗争遭到失败后尚未恢复力量。1907年有一百五十九个、1908年和1909年各有约一百个工会被解散,工人运动报刊机构几乎全部被查封。当1912年国际执行局请鲁巴诺维奇告知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党员人数时,他回答说:“我能给你们的一瞥的一些数字,是作为沙皇囚徒生活在要塞监狱、监狱和流放地的我党党员人数:我们估计他们的人数是三万,其中约有一万名妇女。”转引自A·W·汉弗莱:《国际社会主义和战争》(1915年伦敦版),第22页。在给候选人规定财产资格限制的第四届杜马的1912年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得票约八十万张,四百四十二名议员中有七名孟什维克、六名布尔什维克和一名波兰社会党人当选。战争爆发时,列宁在克拉科夫(加里西亚):他立即被捕,但经维克多·阿德勒进行干预后被释放,获准出国去瑞士旅行。因此他未能参加布鲁塞尔会议。

是要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而是要向你们报告真实情况，在已经有数十万人正在开赴边境的途中和家里实行军法统治的这个时候，采取行动是不可能的……”几年后，王德威尔得记述阿德勒——1914年夏天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一天之间老了十岁”——在演说中一再重复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出现一次奇迹……”从布拉格来的捷克工人领袖安东尼·涅美茨则绝望地大声叫喊：“我们能干什么呢？议会已经解散。举行集会遭到禁止，谁要发动反抗，就要被绞死……”

德国的情况如何呢？胡果·哈阿兹关于强大的和平示威游行的报告，给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断言“皇帝不要战争，不是出于人道，而是出于害怕”，这也使会议重新燃起了灾难将被制止的希望。

饶勒斯同样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集会上说，灾难还能得以制止。“政府还在犹豫。阿提拉正站在深渊的边缘上，但他的骏马还在迟疑，不肯往下跳……我们必须看到政府正在犹豫的这个有利机会，设法争取和平……”关于法国党的态度，他说：“对我们法国社会党人来说任务十分简单。我们用不着把和平政策强加给我们的政府。政府已经在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曾犹豫，通过我坚持主张法德接近，把我国沙文主义者的仇恨引到我的头上……因此，我更有权利断定，法国政府要和平。”但是他补充道：“我们的职责是坚持要求法国政府郑重劝说俄国不要宣战。如果不幸俄国不听劝说，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声明：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协定，即我们应对人类负责的协定。”

这种乐观主义的基调也贯穿在凯尔·哈第的报告中。他表示，大不列颠被卷入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如果终于出现这【360】种情况，那么工会将竭尽全力加以反对，乃至进行总罢工。

就这样，德国、法国和英国代表团的报告加深了会议的信

心，认为咄咄逼人的危险将会得以制止。“虽然欧洲全面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构成了磋商的主要议题，但是没有人认为，甚至连德国代表也不认为，强国之间有可能立即决裂，”布鲁斯·格雷西尔这样记述会议气氛说。会议执意深信欧洲战争可以避免，以致定于8月9日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会议在一项号召中要求所有受到战争威胁国家的工人，在此期间加紧举行争取和平和通过仲裁调解奥塞冲突的群众大会，同时会议通告，“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对他们的政府做工作，促使德国对奥地利施加适度的影响和使法国叫俄国不插手冲突”。^①

会议以在皇家杂技场举行的大型集会宣告结束。成千上万布鲁塞尔工人排成整齐的队伍前去参加，“在战争中进行战争！”的呼声响彻全市。王德威尔得、哈阿兹、哈第和饶勒斯向人群发表演说。这是饶勒斯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了。他真的把沙文主义者的仇恨引到了自己的头上，就象他在集会上说过的那样。沙文主义者的报刊公开号召爱国者杀害他。从布鲁塞尔回国后两天，7月31日夜，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羊角面包咖啡馆”共进晚餐，被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手枪子弹击中身亡。

12

在去世前不多几个小时，饶勒斯还曾和布拉克、龙格及马塞尔·加香前往外交部，催促政府对俄国进一步施加最大的压力。

^① 关于布鲁塞尔会议的这些叙述根据下列材料写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同上引书，第198页；《维克多·阿德勒演说集》等，同上，第9卷，第165页；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维克多·阿德勒和国际》，载于《战斗》，第12年度（1929年），第7页；考茨基同上引书，第370—374页；杰克逊同上引书，第232页；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娃：《回忆录和经历》（1927年柏林版），第55—57页；爱德华·伯恩斯坦：《让·饶勒斯》，载于《新时代》，第33年度（1915年），第559页。

阿贝尔·费里部长代表维维安尼总理接见代表团。饶勒斯谈了他担心法国政府对俄国施加影响不够坚决有力。在加香发言后，饶勒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力、善辩和断然的语气”，坚持要求法国政府在圣彼得堡应该特别有力地提出异议，制止俄[361]国进行动员。“从危机开始以来，我们这些人一直注意，不使我们的片言只语妨碍您忠实的和平活动，”他说，“我们有权在危险近在眼前的时刻就此向您大声疾呼，即使您要按戒严法枪毙我们……”^①当代表团离开凯道赛^②时，传来了德皇宣布战争状态的消息。翌日早晨——8月1日，德皇向俄国宣战，同时德国军队侵入中立的卢森堡。

法国党曾发表声明，它不受把法国拉进一场“以塞尔维亚作赌注”的冲突的“从未听见过的义务”的束缚，它反对法国为了塞尔维亚的缘故进行战争。就在德国对俄宣战的第二天（8月2日），瓦扬在瓦格朗大厅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还声明，只有在法国受到进攻的情况下，党才支持政府作战。在大会上同样发言的龙格报告了国际布鲁塞尔执行局开会的情况，特别是报告了哈阿兹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庄严声明反对对法国进行战争的演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法国的态度，”龙格说，“意味着殷切希望和解。法国社会主义者将为维护和平斗争到底。”然而他又说：“但是，如果法国受到袭击，社会主义者有什么理由不应当首先起来保卫革命的、民主的、百科全书派的法兰西——饶勒斯的法兰西呢？……”^③

英国代表团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后回国的当天，公布了一份由凯尔·哈第和阿瑟·韩德逊签署的宣言，以国际社会党执

^① J·S·：《战争爆发时法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新时代》，第33年度（1915年），第577页；杰克逊同上引书，第234页。

^② 凯道赛为巴黎街名，法国外交部所在地，此处即指法国外交部。——译者

^③ J·S·同上引书，第576页。

行局的名义号召英国工人阶级，通过“在伦敦和在每一个工业中心举行大型集会”来制止英国卷入战争。“要迫使统治阶级中那些企图诱骗你们去同俄国专制政权进行合作的人保持沉默……在我们的时代，俄国胜利将意味着世界的灾难，”宣言指出说。两天后，即8月2日，英国各地城市大批群众响应号召。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这“是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大会”，工联和社会主义政党最著名的领导人、工联伦敦理事会主席J·斯托克斯，以及乔治·兰斯伯里、威尔·梭恩、阿瑟·韩德逊、凯尔·哈第、肯宁安·格莱安讲了话。

在外地举行的一次这样的集会上，矿工工联主席罗伯特·斯迈利声明，如果还有可能通过全欧洲举行群众性罢工来制止战争，他将毫不犹豫地号召矿工这样做……①

13

四十八小时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分别在 [362] 帝国国会和众议院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这个行动给了国际当头一棒。国际成了世界大战的第一个牺牲品。它原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兄弟联盟，本着国际团结的精神，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而现在，卷入战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同它们唯一应对战争负责的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被统治阶级推入战争的各国人民。各国人民之间兄弟般情谊的纽带被扯断，国际主义团结精神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贵族及王朝之间的国内和平所扼杀。

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直到最后一刻钟都竭尽全力反对战争；

① 威廉·斯图亚特：《J·凯尔·哈第》（1945年苏黎世版），第264页。

防止战争危险曾经是它们进行搏斗的基本内容。鼓舞它们急切努力争取群众拥护社会主义，从而扩大社会主义运动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影响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唯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存在才能防止战争。

社会民主党在同时间赛跑中遭到败北。它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在最后一刻钟起来抗拒灾难。而战争爆发之快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处在交战国形成的悲剧性的连锁结构中，各地工人阶级都眼见自己受到了可怕的反动政权入侵的威胁——在德国和奥地利受到沙皇俄国入侵的威胁，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受到半专制军事君主政权德国入侵的威胁。战争产生于统治阶级帝国主义的对立，并为它们的帝国主义的对立，为它们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但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不仅把战争看成是交战国的统治阶级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的冲突，而且把战争首先看成为一场争取本民族生存的斗争。

国际原来认为，战争同社会主义根本思想有着巨大的、不可逾越的矛盾，战争是对社会主义中一切体现出人类未来希望的事物的否定。但是，当战争来临时，社会主义政党对它们政府进行的、它们自己无力加以制止的战争却并未拒绝；它们为战争效力，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战争。由于这一点，国际这个象征工人阶级战斗和目标一致的组织就瓦解了。

世界大战使社会主义史上一个轮廓鲜明的阶段告一结束。从1864年国际成立至1914年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仿佛是个社会主义的使徒布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而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党过去把国家看成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拒绝参加政府，并认为自己对国家命运不承担责任。它们可以以毫不妥协的绝对性，也可以说是

以它们的纯洁性来坚持它们的原则和理想。

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西欧和中欧开始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一体化的时期，紧接着，在俄国开始了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分裂的大革命。

1914年8月国际的历史，将变成西方各社会主义政党民族一体化和东方布尔什维主义发展成专制共产主义危机重重的历史。

附 录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①②}

[366]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③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④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⑤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⑥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⑦，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 [367]

① 本章程于1871年9月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马克思所写的、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并经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临时章程是本章程的基础。

② 本章程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139页。——译者

③ 原文这一句重新起段。——译者

④ 原文为“占有者”。——译者

⑤ 原文为“最终目标”。——译者

⑥ 原文为“工人阶级”。——译者

⑦ 原文为“任务”。——译者

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①，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

协会认为^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③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④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⑤总委员会委员。这样选出的^⑥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① 原文为“准则”。——译者

② 原文没有这四个字。——译者

③ 原文为“进步”。——译者

④ 原文在“合作”之前有“有计划的”几个字。——译者

⑤ 原文为“任命”。——译者

⑥ 原文为“任命的”。——译者

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 [368] 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①，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行动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②，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③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④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⑤，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七条(a)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

① 原文为“为一切团体所接受”。——译者

② 原文为“为了方便与支部的联系”。——译者

③ 原文为“根本上”。——译者

④ 原文为“取决于它同……而不是同……”。——译者

⑤ 原文为“每一国家的特殊法律”。——译者

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
【369】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①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个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

① 第七条(a)是根据1872年9月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补入本章程的。

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斯图加特决议 [370]

国际社会主义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

1907年8月18至24日

代表大会批准以前各届国际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议，并再次确认，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同整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不能分开的。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般说来是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相争夺的结果，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力图不仅确保销售市场，而且也主要通过奴役其他民族和国家夺取新的销售市场。此外，这些战争也是军国主义不停顿地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统治和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在文化发达的民族中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系统地培植起来的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偏见有利于战争，这种偏见旨在使无产阶级群众背离他们自身的阶级使命和国际阶级团结的义务。

因此战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由于军事技术发展要求付出的人力和财力以及由于军备激起各国人民的愤怒而迫使消灭这种制度时，战争才会停止。

所以，首当其冲提供兵源和主要作出物质牺牲的工人阶级，是战争的天然反对者，战争违背他们的目标，建立一种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实现各国人民团结的经济制度。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在带有资产阶级社会阶级性标志和动

机在于保持民族对立的情况下，劳动阶级和——特别是——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的职责是，竭尽全力反对扩充海陆军备，拒绝为此目的而开支经费，以及用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友好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青年和使他们具有阶级觉悟。

代表大会认为，军事组织的民主化、以人民武装取代常备军，将是使进攻战成为不可能和有助于克服民族对立的一个基本保证。

国际不能把不同国家内自然而然各不相同的、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统一成为固定不变的形式。但是它有义务尽可能增强工人阶级的反战斗争和使他们保持联系。

从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来，无产阶级事实上已通过拒绝为海陆军备拨款，通过力图实现军事组织的民主化，在他们孜孜不倦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愈益强调并卓有成效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方式制止战争爆发或结束战争，以及利用由于战争唤起的社会觉醒来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

例如，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工会在法绍达事件后就确保和平和恢复英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取得谅解；德国和法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在摩洛哥危机期间的行动；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举行目标相同的群众集会；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的里雅斯特开会，采取联合行动防止两国发生一场冲突；其次，瑞典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有力地干预制止向挪威的进攻；最后，是俄国和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和农民为反对由沙皇政权发动的战争，使战争结束并利用国家的危机争取劳动阶级解放而进行的英勇的和无私的斗争。所有这些努力，证明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正在增长，他们通过坚决干预确保维护和平的力量正在增长；愈是通过相应的行动从精神上作好准备并通过国际对各国工人政党加以鼓励和把它们团结在一起，工人阶级的行动就愈能卓有成效。

代表大会坚信，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通过认真运用仲裁法庭取代各国政府的微不足道的组织，可以保证为各国人民做裁减军备的好事，它能使被战争军备吞噬的巨大财力和人力的靡费用于文化事业。如果出现爆发战争的危險，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执行局总的活动的支持下，竭尽全力通过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制止战争爆发，当然这种手段视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情况而 [372] 改变。

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表

第一国际

1864年	伦敦(成立大会)	1869年	巴塞尔
1865年	伦敦(代表会议)	1871年	伦敦(代表会议)
1866年	日内瓦	1872年	海牙
1867年	洛桑	1873年	日内瓦
1868年	布鲁塞尔	1876年	费城(代表会议)

反权威国际

1873年	日内瓦	1876年	伯尔尼
1874年	布鲁塞尔	1877年	韦尔维埃

社会主义世界代表大会

1877年	根特	1881年	库尔
-------	----	-------	----

无政府主义国际

1881年	伦敦	1896年	苏黎世(代表会议)
1889年	巴黎(代表会议)	1907年	阿姆斯特丹
1893年	芝加哥(代表会议)		

第二国际

1889年	巴黎	1907年	斯图加特
1891年	布鲁塞尔	1910年	哥本哈根
1893年	苏黎世	1912年	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896年	伦敦	1914年	布鲁塞尔(执行局非常会议)
1900年	巴黎		
1904年	阿姆斯特丹		

第一国际临时总委员会^①

[373]

总委员会领导人：

主席：乔治·奥哲尔 波兰书记：J·E·霍尔托普
财务委员：乔治·W·威勒尔 法国书记：P·V·勒·吕贝
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 瑞士书记：海尔曼·荣克
意大利书记：G·P·方塔纳 总书记：威廉·R·克里默

英国代表团成员：

威廉·沃尔利 亚历山大·迪克 乔治·豪威尔
约翰·贝德福德·莱诺 克思里克 詹姆斯·卡特
约翰·朗梅德 理查逊 约翰·奥斯本
E·惠特洛克 梅里曼 E·格雷
彼得·福克斯 瓦斯邦太 乔治·威廉·威勒尔
布莱克莫尔 W·特雷姆利特 威廉·斯坦斯比
罗伯特·哈特威耳 约翰·罗伯特·泰勒 M·摩尔根^②
皮琴 乔治·波特尔 格罗斯密斯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威廉·朗达尔·克里默
约翰·韦斯顿 罗伯特·肖 托马斯·格兰特·费赛
威廉·德尔 雷克 查尔斯·戈达德
希尔曼 詹姆斯·巴克莱 赛德
约翰·D·奈伊斯 乔治·奥哲尔 亨利·诺布尔

① 第一国际临时总委员会于1864年9月28日召开的国际成立大会上选出，1864年10月5日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总委员会领导人。这两个机构的组成人选在第一国际历史进程中经常吐故纳新，有所变动。见L·E·明斯编：《第一国际的成立，一份文献性记录》（1937年纽约版）。

② 疑系W·摩尔根之误。下同。——译者

[374] 法国代表团成员：

德努阿尔·茹尔	勒鲁	让·巴蒂斯特·博凯
P·V·勒·吕贝	昂利·勒弗尔	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
G·茹尔登	博尔达日	欧仁·杜邦
莫里索		

德国代表团成员：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卡尔·普芬德	卡尔·马克思
沃尔弗	格奥尔格·罗赫纳	考布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奥托·布赖特施韦特	亨利希·博勒特

意大利代表团成员：

鲁伊治·沃尔弗	C·赛塔奇	多梅尼科·拉马
朱泽培·P·方塔纳	阿耳多夫兰迪	T·索鲁斯特里

瑞士代表团成员：

G·努斯佩利	海尔曼·荣克
--------	--------

波兰代表团成员：

J·E·霍尔托普	累布钦斯基
----------	-------

人名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系指正文页旁所注原书页码)

- Abe, Isoo (安部矶雄), 249
Abicht, Henryk (阿比希特, 亨里克), 95
Adam, W. E. (亚当, W·E·), 90
Adler, Friedrich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15, 224, 355, 359, 360
Adler, Victor (阿德勒, 维克多), 122, 204, 208, 221, 223, 224—225, 234, 252, 259, 260, 266, 332, 355; über (关于): 1. Mai (5月1日), 255—257; Mehrwerttheorie (剩余价值学说), 273; Regierungsbeteiligung (参加政府), 284; Rede auf dem Baseler Kongreß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350, 353; auf der Brüsseler Bureausitzung (1914) (在1914年布鲁塞尔执行局会议上), 360; Intervention für Lenin (干预营救列宁), 385
Agnini, Gregorio (阿格尼尼, 格雷戈里奥), 353
Aldrovandi (阿尔多夫兰迪), 114, 374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58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222
Allemane, Jean (阿列曼, 让), 217, 298
Andrassy, Gyula Graf (安德拉西, 居拉, 伯爵), 171
Annenkow, P. W. (安年柯夫, P·W·), 74
Anseele, Edouard (安塞尔, 爱德华), 199, 208, 219, 290, 349
Antonelle (昂托纳尔), 48
Applegarth, Robert (阿普耳加思, 罗伯特), 122, 124, 127, 183
Aquino, Thomas von (阿奎那, 托马斯), 39
Aranyossi, Magda (阿兰约西, 马格达), 241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41
Arnaud (阿尔诺), 192
Assy, Adophe-Alphonse (阿西, 阿道夫-阿尔丰斯), 165

- Auer, Ignaz** (奥艾尔, 伊格纳茨), 269
Auerbach, Berthold (奥艾尔巴赫, 倍尔托特), 69
Auersperg, Fürst Adolf (奥尔施佩格, 阿道夫, 公爵), 171
Aulard, A. (奥拉尔, A.), 23, 41, 48
Austen (奥斯滕), 65
Aveling, Edward (艾威林, 爱德华), 332
Axelrod, Paul Borissovitsch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238, 241, 258, 260

Babeuf, François Noël (巴贝夫, 弗朗斯瓦·诺埃尔), 45页起一连几页,
 81, 96, 206; über Güterkommunismus (关于平均共产主义), 47—48;
Klassenkampf (阶级斗争), 52; **proletarische Diktatur** (无产阶级
 专政), 52
Bach, Johann Sebastian (巴赫, 约翰·塞巴斯蒂安), 349
Bakunin, Michael (巴枯宁, 米哈伊尔), 125, 145, 150—151, 153,
 179, 184—188, 191, 197, 225, 226, 227, 234; **Gründ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llianz (建立国际同盟), 186, 187; über: **Staat**
 (论国家), 184; **Staatskommunismus** (国家共产主义), 186; **Erbrecht**
 (继承权), 150—151; **spanische Revolution** (西班牙革命), 231;
Marx (马克思), 186—187, 191; **Brief an Marx** (致信马克思),
 186; **Ausschluß aus der Internationale** (被开除出国际), 194
Balabanoff, Angelica (巴拉巴诺娃, 安吉莉卡), 358, 360
Ballie-Cochrane, Alexander (贝利-柯克伦, 亚历山大), 174
Bang, Gustav (班格, 古斯塔夫), 236
Bara, Justizminister (巴拉司法大臣), 149
Barbès, Armand (巴尔贝斯, 阿尔芒), 63, 65, 92
Baron, Ede (鲍龙, 埃代), 240
Barry, Maltman (巴里, 马尔特曼), 192
Bauer, Heinrich (鲍威尔, 亨利希), 65, 66, 71, 75, 77, 85
Bauer, Otto (鲍威尔, 奥托), 336, 339, 348
Bax, Ernest Belfort (巴克斯,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211, 259, 346

- Bebel, August** (倍倍尔, 奥古斯特), 124, 131, 132, 150, 158, 213, 259, 260, 261, 340, 347—348, 353; über: **Massenstreik am 1. Mai** (论5月1日群众性罢工), 257; **Generalstreik** (总罢工), 306; **Revisionismus** (修正主义), 286—290; **Zusammenbruchstheorie** (崩溃理论), 271, 277; **Bernstein** (伯恩施坦), 269; **Staatsstreich** (政变), 277; **Sozialistengesetz**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267;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普法战争), 156—157; **Krieg gegen Rußland** (对俄战争), 333; **Massenstreik gegen Krieg** (反战群众性罢工), 341, 342—343; **internationale Schiedsgerichte** (国际仲裁法庭), 346
- Becker, Bernhard** (贝克尔, 伯恩哈特), 95
- Becker, Johann Philipp** (贝克尔, 约翰·菲力浦), 66, 122, 124—125, 136, 137, 142, 145, 147, 188, 328
- Beer, Max** (贝尔, 马克斯), 32, 74, 86, 210
- Beesly, Edward Spencer**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103, 108, 111
- Berchtold, Graf Leopold** (贝希托尔德, 莱奥波尔德, 伯爵), 354
- Berker, Ernest** (伯克, 厄内斯特), 40
- Bermbach** (贝姆巴赫), 76
- Bernard, Martin** (贝尔纳, 马丁), 63
- Bernhardi, General Friedrich von** (伯恩哈迪, 弗里德里希·冯, 将军), 122, 124
-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施坦, 爱德华), 207, 222, 266, 268—270, 282—283, 308, 324, 360; über: **Revisionismus** (论修正主义), 270—272; **Kolonialismus** (殖民主义), 312—313
- Bertrand, Louis** (贝特兰, 路易), 199, 218, 260
- Besant, Annie** (贝赞特, 安娜), 211
- Beslay, Charles** (贝累, 沙尔), 165
- Besson Alexander** (贝森, 亚历山大), 93
- Bethmann-Hollweg, Th. von** (贝特曼-霍尔韦格, Th·冯), 355
- Beust, Graf Ferdinand**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 伯爵), 169, 170
- Bignami, Enrico** (比尼亚米, 恩里科), 227
- Bismarck, Otto von** (俾斯麦, 奥托·冯), 114, 157, 160, 165, 168,

- 169, 170, 174, 176, 179, 193, 243, 257, 274, 276, 290; und
Emser Depesche (和爱姆斯急电), 157; Kampf gegen die Interna-
tionale (反国际斗争), 169, 170, 174; Staatsstreichpläne (政变计
划), 257
- Bissolati, Leonida (比索拉蒂, 列奥尼达), 126, 280, 322—323
- Bittner, Ludwig (比特纳, 路德维希), 354
- Blackmore (布莱克莫尔), 373
- Blagoeff, Dimiter (布拉戈耶夫, 季米特尔), 242, 243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21, 31
- Blanc, Louis (勃朗, 路易), 64, 68, 75, 145, 263
- Blanqui, Louis-Auguste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52, 63—64, 66,
92, 96, 113—114, 147, 184, 206, 286, 331
- Blatchford, Robert (布拉奇福德, 罗伯特), 312, 346
- Bloomfield, Lord (布卢姆菲尔德男爵), 125
- Bloss, Wilhelm (布洛斯, 威廉), 191
- Blumenberg, Werner (布卢门贝格, 维尔纳), 14
- Bobsynski (博勃钦斯基), 136
- Bocquet, Jean Baptiste (博凯, 让·巴蒂斯特), 374
- Bogoljubow (鲍戈廖波夫), 238
- Boguslawski, Generalmajor von (鲍古斯拉夫斯基少将), 276
- Bolleter, Heinrich (博勒特, 亨利希), 374
- Bömelberg, Theodor (伯默尔贝格, 特奥多尔), 305
- Bonaparte, siehe Louis Bonaparte u. Napoleon (波拿巴, 见路易·
波拿巴和拿破仑)
- Bonnier, Charles (博尼埃, 沙尔), 332
- Bonomi, Ivanoe (博诺米, 伊万诺埃), 322—323
- Boon, Martin (布恩, 马丁), 183
- Bordage (博尔达日), 374
- Börne, Ludwig (白尔尼, 路德维希), 206
- Borochow, Ber (鲍罗霍夫, 别尔), 240
- Boulanger, General (布朗热将军), 287
- Bourgin, Georges (布尔甘, 乔治), 215

Bracke, Alexander (布拉克, 亚历山大), 290, 324, 360
Bradnick (布列德尼克), 183
Branting, Hjalmar (布兰亭, 亚尔马), 236, 255, 260, 284, 345
Braunthal, Julius (布劳恩塔尔, 尤利乌斯), 225, 358
Breidtschwerdt, Otto (布赖特施韦特, 奥托), 374
Brettschneider, W. (布雷特施奈德, W.), 65
Briand, Aristide (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 265, 297—298, 301—302
Briggs, Asa (布里格斯, 阿萨), 183
Bright, John (布莱特, 约翰), 145
Brismée, Désiré (布里斯美, 德吉烈), 193
Brissot (布里索), 30, 45
Brix, Harald (布里克斯, 哈罗德), 235
Brouckère, Louis de (布鲁凯尔, 路易·德), 219, 336
Brousse, Paul (布鲁斯, 保尔), 198, 199, 206, 215—216, 273
Brown, Anthony (布朗, 安东尼), 32
Brügel, Ludwig (布吕格尔, 路德维希), 66, 75, 122, 125, 133, 169,
170, 180, 199, 221, 223, 255
Brugger, Otto (布鲁格尔, 奥托), 67
Brumov, Baron (布鲁莫夫男爵), 60
Büchner, Georg (毕希纳, 格奥尔格), 66
Büchner, Ludwig (毕希纳, 路德维希), 143
Buckley, James (巴克莱, 詹姆斯), 373
Bülow, Fürst Bernhard von (毕洛夫, 伯恩哈德·冯, 公爵), 348
Buonarrotti, Philippe-Michel (邦纳罗蒂, 菲力浦-米歇尔), 47, 48, 49,
51, 53, 64
Burke, Edmund (伯克, 埃德蒙), 29, 30, 33, 34
Bürkli, Karl (毕尔克利, 卡尔), 233, 260
Burns, John (白恩士, 约翰), 208, 210, 213, 214
Burns, Robert (彭斯, 罗伯特), 21, 213
Bury, J. P. (伯里, J·P·), 285
Buttery (巴特里), 183

- Cabet, Etienne (卡贝, 埃蒂耶纳), 67, 68
 Cachin, Marcel (加香, 马赛尔), 360
 Cafiero, Carlo (卡菲埃罗, 卡洛), 197, 227—228
 Calwer, Richard (卡尔韦尔, 理查), 313
 Cambon (康邦), 25
 Camélinat, Zéphirin (卡梅利纳, 泽菲兰), 165
 Cameron, A. C. (凯麦隆, A·C·), 122, 133, 150
 Campanella, Thomas (康帕内拉, 托马斯), 52
 Campbell, Lord (坎贝尔爵士), 86
 Canning, George (坎宁, 乔治), 60
 Caporusso, Stefano (卡普卢索, 斯蒂凡诺), 150, 179
 Carducci, Giosuè (卡杜奇, 卓苏), 226
 Carpenter, Edward (卡本特尔, 爱德华), 211
 Carr, E. H. (卡尔, E·H·), 150, 187, 336
 Carter, James (卡特, 詹姆斯), 142, 143, 373
 Casement, Roger (凯斯门特, 罗杰), 320
 Castlereagh, Robert St. (卡斯尔里, 罗伯特·St·), 60
 Chalain (沙兰), 165
 Champion, Henry H. (秦平, 亨利·H·), 211
 Chapelier, Isaak, Le (列沙白里哀, 伊萨克), 41
 Christensen, P. (克里斯坦森, P·), 236
 Churchill, Winston (丘吉尔, 温斯顿), 320
 Cipriani, Amilcare (契普里昂尼, 阿米尔卡雷), 207, 208, 229
 Clark, Thomas (克拉克, 托马斯), 82
 Clarke, W. (克拉克, W·), 41
 Clemenceau, Georges (克列孟梭, 若尔日), 64
 Cloots, Anarcharsis (克罗茨, 阿那卡雪斯), 25
 Cobden, Richard (科布顿, 理查), 88
 Cohen, James (柯恩, 詹姆斯), 181
 Cole, G. D. H. (科尔, G·D·H·), 13, 40, 82, 89, 161, 204,
 210, 250

Coleridge, S. T. (柯勒律治, S·T·), 21, 36
Collins, Henry (科兰斯, 亨利), 183, 188, 195
Combes, Emile (孔勃, 埃米尔), 285—286
Condorcet, M. J. A. (孔多塞, M·J·A·), 30
Cooper, Thomas (库伯, 托马斯), 81
Corneille, Pierre (科尔内耶, 比埃尔), 41
Cornelissen, C. (科尔纳利森, C·), 260
Costa, Andrea (科斯塔, 安得列阿), 187, 197, 198, 199, 207, 208,
226, 228—229, 280
Coullery, Pirere (科勒里, 比埃尔), 142, 144
Cournet (库尔奈), 192
Cowey, Edward (考韦, 爱德华), 259
Crane, Walter (克兰, 沃尔特), 211, 253
Cremer, William Randal (克里默, 威廉·朗达尔), 102, 103, 105,
107, 108, 116, 117, 123, 136, 142, 373
Crispi, Francesco (克里斯比, 弗朗契斯科), 230, 279
Croce, Giuseppe (柯罗齐, 朱泽培), 229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奥利弗), 40, 177
Cunow, Heinrich (库诺夫, 亨利希), 41, 42
Czartoryski, Fürst (查尔托雷斯基国王), 83

Dambach, Oberst (达姆巴赫上校), 26
Dan, Theodor (丹, 特奥多尔), 237
Danielson, Nikolai F. (丹尼尔逊, 尼古拉·F·), 237
Danielsson, Alex Ferdinand (丹尼尔森, 阿克塞尔·斐迪南), 236
Danton, Georges (丹东, 若尔日), 23, 41
Darthé, A. A. (达尔特, A·A·), 49, 51
Daszynski, Felix (达申斯基, 费利克斯), 208, 260
David, Eduard (大卫, 爱德华), 324, 325
Defuisseaus, Alfred (德菲伊索, 阿尔弗勒德), 218, 293
Defuisseaux, Georges (德菲伊索, 乔治), 218

Defuisseaux, Léon (德菲伊索, 莱昂), 218
Delbrück, Hans (德尔布吕克, 汉斯), 257, 275
Delescluze, Charles (德勒克吕兹, 沙尔), 165
Dell, William (德尔, 威廉), 108, 118, 142, 307
Denis, Victor (德尼, 维克多), 324
Denoual, Inles (德努阿尔, 茹尔), 374
Desmoulin, Camille (德穆兰, 卡米尔), 41
Deutsch, Lev G. (多伊奇, 列夫·G·), 238
Dick, Alexander (迪克, 亚历山大), 373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 45
Diehl, Karl (迪尔, 卡尔), 113
Dixon, William (狄克逊, 威廉), 82
Dobrogeanu-Gherea, C. (多勃罗贾努-格里亚, C·), 241
Dolléans, Edouard (多莱昂, 爱德华), 215, 295
Dommanget, M. (多芒热, M·), 257
Douai, Adolf (杜埃, 阿道夫), 244
Doyle, Charles (多伊尔, 查尔斯), 82
Dreyfuß, Alfred (德雷福斯, 阿尔弗勒德), 264
Drouet, Jean-Baptiste (德鲁埃, 让-巴蒂斯特), 49
Duplay, Simon (迪普莱, 西蒙), 48
Dupleix, François (杜普累, 弗朗斯瓦), 136
Dupont, Eugène (杜邦, 欧仁), 136, 142, 143, 165, 193, 374
Dürer, Albrecht (丢勒, 阿尔勃莱希特), 65
Duval, Emile Victor (杜瓦尔, 艾米尔·维克多), 165

Eccarius, Johann Georg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77, 107, 108,

128, 136, 142, 143, 150, 181, 183, 374

Eisner, Kurt (艾斯纳, 库特), 308

Ellenbogen, Wilhelm (埃伦博根, 威廉), 305

Elster, Torolf (埃尔斯特, 托罗尔夫), 235

Emanuel, König (埃曼努尔国王), 228

- Engel, Georg (恩格尔, 格奥尔格), 223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53, 66, 69, 72, 75, 77, 81, 84, 87, 91, 107, 114, 117, 124, 126, 137, 141, 142, 176, 191, 214, 215, 224, 227, 237, 259, 267, 269; üb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论普法战争), 159, 330; über: Absterben des Staates (国家的消亡), 185; Reformismus (改良主义), 274;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德国革命), 308; Londoner Maidemonstration (伦敦五一节示威游行), 255
- Ermers, Max (埃默尔, 马克斯), 224
- Ewerbeck Herman (艾韦贝克, 海尔曼), 63, 77
-
- Facey, Thomas Grant (费赛, 托马斯·格兰特), 373
- Fanelli, Giuseppe (法奈利, 朱泽培), 179, 231
- Farga-Pellicer, Rafael (法尔加-佩利塞尔, 拉斐尔), 150
- Farkas, István (法尔卡什, 伊斯特万), 240
- Farkas, Károly (法尔卡什, 卡罗伊), 240
- Faure, Sebastian (福尔, 塞巴斯蒂昂), 207, 258
- Favre, Jules (法夫尔, 茹尔), 160, 168, 170
- Fenier (芬尼亚社社员), 177, 181
- Ferdinand IV. (斐迪南四世), 56
- Ferdinand VII. (斐迪南七世), 58
- Ferri, Enrico (费里, 恩利科), 260, 303; über Refomismus (论改良主义), 278—279
- Ferry, Abel (费里, 阿贝尔), 360
- Ferry, Jules (费里, 茹尔), 285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21, 22
- Fielden, Samuel (费尔登, 塞缪尔), 223
- Firth, C. H. (弗思, C·H·), 41
- Fischer, Adolf (费舍, 阿道夫), 223
- Fontain, Henri (封丹, 昂利), 165
- Fontaine, La. (丰坦, 拉), 324

Fontana, Giuseppe P. (方塔纳, 朱泽培·P·), 114, 118, 373, 374
Fourier, Charles (傅立叶, 沙尔), 67, 68, 233
Fox, Peter (福克斯, 彼得), 142, 373
Frankel, Leo (弗兰克尔, 列奥), 164, 165, 199, 240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23, 30
Franz Joseph I.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92, 255—256
Freiligrath, Ferdinand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90, 211
Fribourg, E. E. (弗里布尔, E·E·), 129, 136, 137
Friedrich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 26
Friedrich Wilhelm IV.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20, 55, 75, 76
Frimu, I. C. (弗里穆, I·C·), 242
Frischia, Saverio (弗里西阿, 萨韦里奥), 147, 179
Fromme (佛罗梅), 198
Furnémont, L. (菲尔内蒙, L·), 324

Gabrowsky, Nikola (加勒罗夫斯基, 尼古拉), 242
Galeer, Albert (加累尔, 阿伯特), 233
Galenson, Walter (盖伦逊, 沃尔特), 235
Galliffet, General (加利费将军), 265
Gambetta, Léon (甘必大, 莱昂), 286
Gambuzzi, Carlo (甘布齐, 卡洛), 179
Garibaldi, G. (加里波第, G·), 59, 102, 108, 110, 111, 125, 145,
 225, 229; über die Pariser Kommune (论巴黎公社), 179
Garnier-Pages, Louis (加尔涅-帕热斯, 路易), 85
Gay, Peter (盖, 彼得), 269
Geffroy, Custave (热弗雷, 居斯达夫), 63
Geleff, Poul (盖列夫, 保尔), 235—236
Gentz, Friedrich (根茨, 弗里德里希), 29
Georg III. (乔治三世), 35
Georg IV. (乔治四世), 60
Georgi, Elsbeth (格奥尔基, 埃尔斯贝特), 305

Gerrald, J. (杰拉尔德, J.), 34
Gerth, Hans (格思, 汉斯), 123, 192
Gigot, Philippe (日果, 菲利浦), 74
Giolitti, Giovanni (焦利蒂, 卓万尼), 280, 303, 322
Giovanni, Fritz (卓瓦诺利, 弗里兹), 233
Gitermann, Valentin (吉特尔曼, 瓦伦丁), 237
Glasier, John Bruce (格累西尔, 约翰·布鲁斯), 273, 358, 360
Goddard, Charles (戈达德, 查尔斯), 373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干格·冯), 21.

22

Goldenberg, L. B. (戈尔登贝格, L·B·), 199
Gompers, Samuel (龚帕斯, 赛米尔), 208, 247
Gooch, G. P. (古奇, G·P·), 20
Goya, Francisco (戈雅, 弗兰西斯科), 58
Gracchus, Gaius (格拉古, 凯尤斯), 47
Graham, Cunningham R. B. (格莱安, 肯宁安·R·B·), 208, 361
Granville, Lord (格兰维耳伯爵), 173—174
Gray, E. (格雷, E·), 373
Gray, Sir Edward (格雷, 爱德华, 爵士), 355
Greene, General (格林将军), 30
Greulich, Hermann (格雷利希, 海尔曼), 150, 199, 233, 260, 351—
352
Grey, Sir George (格雷, 乔治, 爵士), 75
Grizardzi, Mario (格里达齐, 马里奥), 233
Griffuelhes, Victor (格里菲尔埃, 维克托), 295
Grimm, Robert (格里姆, 罗伯特), 67, 233, 260
Grisel, George (格里泽尔, 乔治), 49
Grosser, Bronislaw (格罗塞尔, 布罗尼斯拉夫), 239
Grossmith (格罗斯密斯), 373
Grünberg, Carl (格律恩贝尔格, 卡尔), 309
Guérard, Eugène (盖拉尔, 欧仁), 294, 297
Guesde, Jules (盖得, 茹尔), 206, 207, 215, 216, 217, 237, 264.

- 280, 290, 357, 358; über: Reformismus (论改良主义), 278—279, 286; Generalstreik (总罢工), 297, 356; Resolution über Krieg (关于战争的决议案), 339, 341
- Guichen, Vicomte de (吉尚, 维孔特·德), 59
- Guigot, Philip (吉戈, 菲力浦), 84
- Guillaume, James (吉约姆, 詹姆斯), 146, 187, 190, 191, 193, 197, 198, 199; Ausschluß aus der Internationale (被开除出国际), 194
- Haase, Hugo (哈阿兹, 胡果), 353, 358, 359, 360, 361
- Haldane, Viscount R. B. (霍尔丹, 维斯康特·R·B·), 355
- Hales, John (黑尔斯, 约翰), 168, 181, 183, 195, 198
- Hammonds, Barbara (哈蒙兹, 巴巴拉), 78
- Hammonds, J. L. (哈蒙兹, J·L·), 78
- Hardie, Keir (哈第, 凯尔), 208, 209, 210, 212—213, 259, 260, 353, 358—359, 360, 361; Resolution Hardie-Vaillant (哈第-瓦扬决议案), 347, 355, 356
- Hardy, Thomas (哈第, 托马斯), 32, 34
- Harney, George Julian (哈尼, 乔治·朱利安), 31, 53, 79, 80—84, 86—88, 89, 91, 106, 177, 210
- Harris, G. (哈里斯, G·), 183
- Hartwell, Robert (哈特威耳, 罗伯特), 373
- Hazlitt, William (哈兹利特, 威廉), 45
- Heeringen, von, Kriegsminister (黑林根, 冯, 陆军大臣), 275
- Hegel, Georg W. F. (黑格尔, 乔治·W·F·), 21, 69
- Heilberg, Louis (海尔堡, 路易), 74
- Heine, Heinrich (海涅, 亨利希), 69, 206
- Helms, Emil (赫尔姆斯, 埃米尔), 236
- Helvétius, C. A. (爱尔维修, C·A·), 40
- Henderson, Arthur (韩德逊, 阿瑟), 361
- Henriksson-Holmberg, G. (亨里克森-霍尔姆贝格, G·), 237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赫尔德, 约翰·哥特弗利德), 21

Héritier, Louis (艾里提埃, 路易), 332
Hervé, Gustave (爱尔威, 古斯塔夫), 337
Herwegh, Georg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 72, 85, 90, 211
Herzen, Alexander (赫尔岑, 亚历山大), 92, 145, 179, 186, 237
Hess, Moses (赫斯, 莫泽斯), 53, 69, 74, 147, 150, 240
Hetherington, Henry (赫瑟林顿, 亨利), 80, 83
Hildebrand, Gerhard (希尔德布兰德, 格哈德), 313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亭, 鲁道夫), 306
Hillmann, Hugo (希尔曼, 胡果), 95
Hillquit, Morris (希尔奎特, 莫里斯), 127, 133, 223, 244, 245
Hirsch (希尔施), 328
Hoar, R. (霍尔, R.), 133, 134
Höchberg, Karl (赫希柏格, 卡尔), 269
Hodge, John (霍奇, 约翰), 259
Holbach, Paul H. D. (霍尔巴赫, 保尔·H·D.), 40, 69
Hölderlin, Friedrich (荷尔德林, 弗里德里希), 21
Holm, Peter (霍尔姆, 彼得), 82
Holtorp, J. E. (霍尔托普, J·E.), 117, 373, 374
Holyoak, George Jacob (侯里欧克, 乔治·杰科布), 92
Hostetter, Richard (霍斯塔特, 理查德), 126, 225, 226, 227
Hötzendorf, General Conrad von (赫岑多夫, 康拉德·冯, 将军),
348, 355
Howell, George (豪威尔, 乔治), 102, 103, 108, 127, 136, 373
Hubert, Henri (许伯特, 亨里), 82
Huch, Ricarda (胡赫, 里卡达), 227
Hugo, Victor (雨果, 维克多), 92, 93, 94, 145
Humbert, König (翁伯托国王), 228
Humboldt, Wilhelm von (洪堡, 威廉·冯), 56
Humphrey, A. W. (汉弗莱, A·W.), 358
Hunink, Marie (许宁克, 玛丽), 15
Huysmans, Camille (胡斯曼, 卡米尔), 252
Hyndman, H. M. (海德门, H·M.), 208, 210, 211, 259, 324

über: Burenkrieg (论布尔战争), 315; englische Flottenausrüstung
(英国扩充海军), 346

Iglesias, Pablo (伊格列西亚斯, 帕布洛), 208, 231, 232, 254, 260.

286

Ireton, Henry (爱尔顿, 亨利), 41

Isabella II. (伊萨伯拉二世), 231

Jackson, Hampden J. (杰克逊, 汉普登·J·), 274, 361

Jaekch, Gustav (耶克, 古斯达夫), 131, 252

Jakob I. (詹姆斯一世), 20

Jakob II. (詹姆斯二世), 39

Jansen, R. (扬森, R·), 268

Jaurès, Jean (饶勒斯, 让), 259, 261, 264—265, 273, 274, 284, 289,
302, 358, 359, 360; über: Reformismus (论改良主义), 273—274,
286—290; Revolution (革命), 273—274; Klerikalismus (教权主
义), 286; die Nation (民族), 337—339; Krieg (战争), 339—340,
342, 343, 350; internationale Schiedsgerichte (国际仲裁法庭),
346; Generalstreik gegen Krieg (反战总罢工), 356; Resolution
zur Kriegsfrage (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案), 340—341, 342

Jeppesen, Carl (耶佩森, 卡尔), 235

Jogiches, Leon (约吉西斯, 利奥), 239

Jones, Ernest (琼斯, 厄内斯特), 31, 53, 65, 79, 82, 83, 89—93,
94, 103, 106, 210

Jourdain, G. (茹尔登, G·), 93, 95, 374

Jourde, François (茹尔德, 弗朗斯瓦), 165

Joynes, J. L. (乔因斯, J·L·), 211

Jung, Hermann (荣克, 海尔曼), 136, 142, 182, 183, 373, 374

Justo, Juan B. (胡斯托, 胡安·B·), 243

- Kaler, Emil (卡勒尔, 埃米尔), 67
- Kalnoky, Graf (卡耳诺基伯爵), 255
-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努尔), 21
- Karl, I. (查理一世), 39
- Karl, X. (查理十世), 62
- Karski, Julian (卡斯基, 朱利昂), 324
- Katayama, Sen (片山潜), 249—250
- Kaub, Karl (考布, 卡尔), 374
- Kautsky, Karl (考茨基, 卡尔), 155, 225, 241, 259, 260, 270, 305, 316, 324, 346, 358, 360; über: Bernstein (论伯恩斯坦), 269; Revisionismus (修正主义), 272; Reformismus (改良主义), 278—279; Staatsstreich (政变), 277
- Kersten (克斯滕), 198
- Kethrik (凯思里克), 373
- Kinkel, Gottfried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74
- Kiß, Adolf (基什, 阿道夫), 240
- Kitto, H. D. F. (基托, H·D·F·), 41
- Klinkowström, Alfons von (克林科夫施特勒姆, 阿尔方斯·冯), 55
- Klopstock, Friedrich G. (克洛普什托克, 弗里德里希·G·), 21, 23
- Knudsen, Christian Holtermann (克努森, 克里斯蒂安·霍尔特曼), 235, 284
- Koehlin, Heinrich (克希林, 海因里希), 161
- Kol, H. H. van (科尔, H·H·万), 234, 313—315, 316—318, 324
- Kolb (科尔布), 183
- Koller, B. (科勒, B·), 75
- Kossuth, Franz (科苏特, 弗兰茨), 88
- Kotoku, Shusui (幸德秋水), 249
- Krapotkin, Peter (克鲁泡特金, 彼得), 199, 227
- Kremer, Alexander (克雷默, 亚历山大), 239
- Krieger (克里格尔), 284
- Kugelman, Ludwig (库格曼, 路德维希), 111, 137, 141, 143, 178.

- Kuhn, Werner (库恩, 维尔纳), 233
- Külföldi, Viktor (居耳菲尔迪, 维克多), 240
- Kulischoff, Anna (库利绍娃, 安娜), 230
- Labriola, Arturo (拉布里奥拉, 阿尔土罗), 302, 303
- Lafargue, Paul (拉法格, 保尔), 206, 207, 215, 216, 231, 237
- Lafayette, M. J. (拉斐德, M·J·), 23, 30, 62
- Lake (雷克), 373
- Lama, Domenico (拉马, 多梅尼科), 114, 374
- Lamennais, Félicité (拉梅耐, 费里西德), 67
- Landauer, Carl (兰多尔, 卡尔), 14, 15
- Landauer, Gustav (朗道尔, 古斯塔夫), 221
- Lang, Otto (兰格, 奥托), 233, 259
- Lange, F. A. (朗格, F·A·), 143
- Lansbury, George (兰斯伯里, 乔治), 259, 261, 311, 361
- Lardaux, François-David (拉尔多, 弗朗索瓦-达维德), 95
-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斐迪南), 95, 114, 125, 131, 267
- Laurent (罗朗), 199
- Lavigne, Raymond (拉维涅, 雷蒙), 254, 259
- Lawrence (劳伦斯), 142
- Lawrow, Peter (拉甫罗夫, 彼得), 208, 237
- Lazzari, Constantino (拉查理, 康斯坦丁诺), 229, 260
- Ledebour, Georg (累德堡, 格奥尔格), 324
- Ledru-Rollin, Alexandre (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 85
- Lefèvre, G. (勒费夫尔, G·), 46
- Leforts, Henri (勒弗尔, 昂利), 142, 374
- Legien, Karl (列金, 卡尔), 207, 298, 299
- Lehning, Arthur (莱宁, 阿瑟), 53, 92, 95, 96
- Lenin, Wladimir I. (列宁, 弗拉基米尔·I·), 52, 166, 344, 358

- Leno, John Bedford (莱诺, 约翰·贝德福德), 373
- Leo XIII. (利奥十三世), 172
- Leon, Daniel de (莱昂, 丹尼尔·德), 286, 333
- Leopold II. (利奥波德二世), 319—320
- Leroux, Pierre (勒鲁, 比埃尔), 138
- Lessing, G. E. (莱辛, G·E·), 69
- Lessner, Friedrich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65, 77, 95, 107, 136,
143, 183, 193, 374
- Leuthner, Karl (洛伊特纳, 卡尔), 313
- Levine (Lorwin), Louis (莱文[洛温], 路易斯), 297
- Liebknicht, Wilhelm (李卜克内西, 威廉), 95, 124, 131, 150, 158,
199, 204, 206, 207, 215, 254, 260, 261, 322; über: deutsch-
französischen Krieg (论德法战争), 156; Millerand (米勒兰), 266;
Generalstreik (总罢工), 292—293; deutsche Bürgertum (德国资产
阶级), 276; Sozialismus als Glaube (社会主义信仰), 278
- Limousin, Charles (利穆津, 沙尔), 107, 139
- Lincoln, Abraham (林肯, 阿伯拉罕), 102, 310
- Lingg, Louis (林格, 路易), 223
- Lissagaray, P. O. (利沙加勒, P·O·), 161
- Lochner, George (罗赫纳, 格奥尔格), 374
-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28, 29, 30, 39, 40
- Lombrose, Cesare (洛姆布罗塞, 切萨雷), 126
- Lombroso, Cesare (洛姆布罗索, 切萨雷), 278
- Longmaid, John (朗梅德, 约翰), 373
- Longuet, Charles (龙格, 沙尔), 143, 193, 194, 207, 328, 358, 360,
361
- Lorwin, Val R. (洛温, 瓦尔·R·), 215, 295
- Louis Bonaparte (路易·波拿巴), 155, 156, 157, 176
-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 92, 93
- Louis, Paul (路易, 保尔), 48, 63, 324
- Louis, Philippe (路易, 菲利浦), 62, 64, 85
- Lovett, William (洛维特, 威廉), 79, 80

- Lubez, P. V. Le** (吕贝, P·V·勒), 108, 117, 118, 373, 374
Lucraft, Benjamin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 147, 181—183, 184, 373
Ludwig XVI.(路易十六), 22, 37, 40, 49
Ludwig XVIII. (路易十八), 55, 58, 60
Ludwig, Emil (路德维希, 埃米尔), 282
Lukin, N. (卢金, N·), 161
Luxemburg, Rossa (卢森堡, 罗莎), 239, 260, 272, 286, 304, 308,
 344, 358

Mably, G. B. de (马布利, G·B·德), 41, 43, 45, 47, 52
MacDonald, James Ramsay (麦克唐纳, 詹姆斯·拉姆赛), 259, 324,
 325
MacMahon, General (麦克马洪将军), 167
Magallan, Sarro (马加利亚, 萨罗), 147
Malatesta, Enrico (马拉泰斯塔, 恩里科), 197, 225
Malon, Benoit (马隆, 贝努瓦), 126, 160, 165, 273
Man, Hendrik de (曼, 亨利·德), 219
Man, Tom (曼, 汤姆), 211, 214, 259, 260
Mänchen-Helfen, Otto (梅恩兴-黑尔芬, 奥托), 72, 74
Manning, Kardinal (曼宁红衣主教), 214
Marat, Jean Paul (马拉, 让·保尔), 43, 51, 52, 64, 81
Maréchal, Sylvian (马雷夏尔, 西尔万), 48
Margarot, M. (马格罗特, M·), 34
Maria Theresia, Kaiserin (玛利亚·特利萨女王), 45
Markov, Walter (马尔科夫, 瓦尔特), 42
Marr, Wilhelm (马尔, 威廉), 67
Marrast, Armand (马拉斯特, 阿尔芒), 85
Martin, Kingsley (马丁, 金斯利), 60, 92
Martow, Julius (马尔托夫, 尤利), 237, 344
Marx-Aveling, Eleanor (马克思-艾威林, 爱琳娜), 208, 211
Marx, Jenny (马克思, 詹妮), 72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52, 53, 64, 66, 67, 68—72, 77, 83, 87, 91, 95, 101, 107, 108, 110—111, 113, 114, 118, 120, 123, 125, 133, 136, 142, 144, 147, 149, 168, 200, 207, 210, 215, 227, 237, 240, 241, 256, 265, 267, 365, 373, 374; über: Rußland (论俄国), 136—137; amerikanischen Bürgerkrieg (美国内战), 310—311; irische Frage (爱尔兰问题), 176—178;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普法战争), 156—157, 158—159; Pariser Kommune (巴黎公社), 163, 165—166, 329—330; spanische Revolution (西班牙革命), 231; Anarchismus (无政府主义), 191; politische Gewalt (政治暴力), 184—185; »Absterben des Staates«(“国家的消亡”), 185; »Revolutionsspielerei«(“把革命当成儿戏”) 73—75; Zusammenbruchstheorie (崩溃理论), 270—271; Verelendungstheorie (贫困化学说), 276; kapit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prozeß (资本主义集中过程), 270—271; Mehrwertstheorie (剩余价值学说), 272—273; Nation (民族), 336—337; Eigentumsrecht auf die Erde (土地所有权), 312; Genossenschaften (合作社), 118; Gewerkschaften(工会), 139—140; englisches Zehnstundentagesgesetz (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令), 118; Arbeitszeit (劳动时间), 139; Frauen- und Kinderarbeit (妇女和儿童劳动), 139; Gruppe Willich-Schapper (维利希-沙佩尔派), 73—75; Fraternal Democrats (民主派兄弟协会), 84; Manchester Arbeiterparlament (曼彻斯特工人议会), 91; Bakunin (巴枯宁), 184—188; Friedensliga (和平同盟), 145—146; Finanzen der Internationale (国际的经费), 124; Befugnisse des Generalrats (总委员会权限), 193; Marx' Stellung in der Internationale (马克思在国际中的地位), 153, 196; Krankheit und Geldsorgen (疾病和经济困难), 195

Maurenbrecher, Max (毛伦布雷歇, 马克斯), 313

Mäurer, German (莫伊勒, 格尔曼), 63

Mason, E. S. (梅森, E·S·), 161

Mathiez, Albert (马蒂茨, 阿尔贝特), 25, 46

Mayer, Gustav (迈耶尔, 古斯塔夫), 204, 214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 朱泽培), 96, 117, 125—126, 136, 179,

- 225, 226; über die Pariser Kommune (论巴黎公社), 179, 226
- McGrath, Philip (麦克格雷, 菲利浦), 82, 85, 87
- Mehring, Franz (梅林, 弗兰茨), 66, 76, 84, 114, 125, 132, 186, 191, 209.
- Mendelson, Stanislas (门德尔森, 斯塔尼斯拉夫), 332
- Merlino, Francesco Saverio (梅利诺, 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 199, 208, 258
- Merriman (梅里曼), 373
- Mesa, José (梅萨, 霍赛), 231, 254
- Messine, Jules (梅西内, 尤勒斯), 299
- Metternich, Fürst Klemens (梅特涅, 克雷门斯, 公爵), 29, 55, 56, 58, 59
- Metternich-Winneburg, Richard (梅特涅-温内堡, 里夏德), 55
- Meyer, Rudolf (迈耶尔, 鲁道夫), 131, 173, 178, 179, 196, 236
- Miall, Edward (迈奥尔, 爱德华), 94
- Michel, Louise (米歇尔, 路易丝), 199, 260
- Michelot, Jean (米歇尔, 让), 82
- Michels, Robert (米歇尔, 罗伯特), 126, 276
- Mignet, F. A. (米涅, F·A·), 45, 50, 51
- Milano, Agesilao (米拉诺, 阿杰西劳), 225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145
- Millerand, Alexandre (米勒兰, 亚历山大), 259, 263, 264—266, 273, siehe auch »Fall Millerand« (又见“米勒兰事件”)
- Mins, L. E. (明斯, L·E·), 373
- Molkenbuhr, Hermann (莫尔肯布尔, 赫尔曼), 207
- Moll, Joseph (莫尔, 约瑟夫), 65, 66, 69, 71, 72, 81, 85
- Moltke, General von (毛奇, 冯, 将军), 355
- Montesquiou, General (孟德斯鸠将军), 26
- Mora, Francisco (莫拉, 弗朗西斯科), 179, 187, 231
- Morago, T. G. (莫拉哥, T·G·), 199
- Morel, Compère (莫雷尔, 孔佩尔), 356
- Morel, Edmund Dene (莫雷尔, 艾德蒙·迪恩), 320

- Morelly (摩莱里), 43, 45, 47
Morgan, M. (摩尔根, M·), 373
Morgan, R. P. (摩根, R·P·), 14, 15, 125, 132
Morgari, Oddino (莫尔加利, 奥迪诺), 347, 358
Morles, John (摩里, 约翰), 88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208, 210, 212, 259, 273
Morrissot (莫里索), 374
Mortzun, V. (莫尔宗, V·), 241
Morus, Thomas (莫尔, 托马斯), 52
Most, Johann (莫斯特, 约翰), 199, 220, 222—223, 245
Mothershead, Thomas (莫特斯赫德, 托马斯), 177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多斯), 65
Mühsam, Erich (米扎姆, 埃里希), 294
Muir, Thomas (米尔, 托马斯), 34
Müller-Lehning, A. (米勒-莱宁, A·), 92, 95, 96
- Nadejde, Joseph (纳杰日杰, 约瑟夫), 241
Naef, Eugen (内夫, 欧根), 295
Namier, L. B. (纳米尔, L·B·), 59
Naoroij, Dadhabhai (纳奥罗哲, 达达巴伊), 318
Napoleon I. (拿破仑第一), 45, 161
Napoleon III. (拿破仑第三), 102, 103—104, 114, 154, 157, 290,
329, 330, 331
Némec, Anton (涅美茨, 安东尼), 305, 359
Nemeth, August (内梅特, 奥古斯特), 82
Nettlau, Max (讷特劳, 麦克斯), 67, 68, 70, 150, 231
Neumayer, Ludwig (诺马耶, 路德维希), 150
Neves, J. (内维斯, J·), 199
Nieass, John D. (奈伊斯, 约翰·D·), 373
Niederer, Dr. (尼德勒尔博士), 233
Nieuwenhuis, F. Domela (纽文胡斯, F·多梅拉), 208, 234, 258,

260, 332, 333

Nikolajewsky, Boris (尼古拉也夫斯基, 博里斯), 15, 65, 72, 73, 74

Nikolaus I. (尼古拉一世), 56, 59, 92

Nikolaus II. (尼古拉二世), 282

Noble, Henry (诺布尔, 亨利), 373

Noiland, Aaron (诺兰, 阿伦), 215

Noske, Gustav (诺斯克, 古斯塔夫), 313, 319

Nusperly, G. (努斯佩利, G.), 374

Obermann, Karl (奥伯曼, 卡尔), 75, 77

Oberwinder, Heinrich (奥伯温德, 亨利希), 132, 150, 197, 220—
221

Oborski, Louis (奥博尔斯基, 路易), 79, 82, 83, 95

O'Brien, Bronterre (欧布林, 布朗太尔), 53, 80—81, 86, 91, 94

O'Connor, Feargus (奥康瑙尔, 菲格斯), 79, 83—84, 86, 87, 90,
91

Odger, George (奥哲尔, 乔治), 102, 103, 105—106, 107, 108, 116,
117, 128, 136, 142, 373; **Konflikt mit Generalrat** (同总委员会的
冲突), 182—184

Olberg, Oda (奥尔堡, 奥达), 302, 304

Orsini, Felice (奥尔西尼, 费利切), 102, 225

Osborne, John (奥斯本, 约翰), 373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68, 78, 79

Paepé, César de (巴普, 塞扎尔·德), 122, 136, 142, 143, 144,
146, 147—148, 150, 153, 199, 208, 215, 218, 328; **über Gemein-
eigentum** (论公有制), 150, 153

Paine, Thomas (倍恩, 托马斯), 23, 25, 28页起一连几页, 33, 78,
81, 96

Palme, August (帕尔姆, 奥古斯特), 236, 255

Palmerston, Lord (帕麦斯顿勋爵), 60, 92, 102, 103, 104, 111
 Parrachon (帕拉雄), 107
 Parsons, Albert R. (帕森斯, 艾伯特·R·), 223
 Passanante, Giovanni (帕萨南泰, 卓万尼), 228
 Patten, Philipp van (派顿, 菲利浦·范), 185, 247
 Pavia, General (帕维亚将军), 231
 Peletier, Felix Le (佩尔蒂埃, 费利克斯·勒), 49
 Pelling, Henry (佩林, 亨利), 210, 212, 214
 Pelloutier, Ferdinand (佩卢蒂埃, 费迪南), 259, 295—296, 297
 Pernestorfer, Engelbert (别涅斯托费尔, 恩格尔伯特), 240, 324
 Pestalozzi, Heinrich (裴斯泰洛齐, 亨利希), 23, 233
 Peukert, Josef (波伊克特, 约瑟夫), 199, 221—222, 223
 Pfänder, Karl (普芬德, 卡尔), 77, 183, 374
 Pfannkuch, Wilhelm (普凡库赫, 威廉), 207
 Philips, Wendel (菲利浦斯, 温德尔), 133
 Pidgeon (皮琴), 117, 373
 Pilsudski, Josef (皮尔苏茨基, 约瑟夫), 239, 260
 Pindy, Louis Jean (潘迪, 路易·让), 165, 198
 Pio, Louis (皮奥, 路易), 235—236
 Pirenne, Henri (皮雷纳, 昂利), 218
 Pitt, William jun. (小皮特, 威廉), 33, 34, 35, 246
 Pius IX. (庇护九世), 172
 Place, Francis (普累斯, 佛兰西斯), 36
 Plato (柏拉图), 41, 52
 Plechanow, G. V. (普列汉诺夫, G·V·), 208, 237, 250, 260,
 332—333
 Poincaré, Raymond (彭加勒, 雷蒙), 355
 Polak, Henri (波拉克, 亨利), 234
 Pollard, A. F. (波拉德, A·F·), 59
 Pollatschek, Gustav (波拉切克, 古斯塔夫), 204
 Postgate, Raymond (波斯特盖特, 雷蒙德), 86
 Potter, George (波特尔, 乔治), 373

- Pottier, Eugène (鲍狄埃, 欧仁), 205
- Pouget, Emile (普热, 埃米尔), 296
- Preuß, Hugo (普罗伊斯, 胡戈), 275
- Price, Richard (普莱斯, 理查), 28, 29
- Prim, General Juan (普里姆将军, 胡安), 230
- Proudhon, Pierre-Joseph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68, 94, 112,
113, 137, 140, 141
- Pyat, Félix (皮阿, 费里克斯), 93, 94, 112
-
- Quejido, G. (克希多, G·), 260
- Quelch, Harry (奎尔奇, 哈利), 211, 213, 259, 324, 341
-
- Rade, Martin (拉德, 马丁), 276
- Ragaz, Leonhard (拉加茨, 莱昂哈德), 233
- Rakowski, Christian (拉柯夫斯基, 克里斯蒂安), 242, 286, 332
- Ranvier, Gabriel (朗维耶, 加布里埃尔), 192
- Renaudel, Pierre (列诺得尔, 比埃尔), 290
- Renner, Karl (伦纳, 卡尔), 346, 355
- Richardson (理查逊), 373
- Rjazanov, D. (梁赞诺夫, D·), 101, 111, 145, 191
- Robespierre, Maximilian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23, 43, 45,
81, 336
- Robin (罗班), 182, 183
- Rocker, Rudolf (罗克, 鲁道夫), 223
- Roland-Holst, Henriette (罗兰-霍斯特, 罕丽达), 301—302
- Rosenberg, Arthur (罗森贝格, 阿图尔), 276
- Röser, Peter Gerhardt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 72
- Rothstein, Th. (罗特施泰因, Th·), 79, 80, 88, 95
- Rounanet (鲁阿奈), 324
-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39, 40, 41, 43, 45, 69

- Roux, Jacques (卢, 雅克), 43**
- Rubanowitsch, I. A. (鲁巴诺维奇, I·A·), 358**
- Rudini, Antonio di (鲁迪尼, 安东尼奥), 303**
- Rüter, A. J. C. (勒特尔, A·J·C·), 14, 15**
- Rybczinski (累布钦斯基), 374**
-
- Sagasta, Ministerpräsident (萨加斯塔内阁首相), 172, 174**
- Saint-Simon, Graf Claude Henri (圣西门, 克洛德·昂利, 伯爵), 68**
- Sakasoff, Janko (扎卡佐夫, 扬柯), 242, 243, 349, 353**
- Salomone, William (萨洛蒙, 威廉), 303**
- Sand, George (桑, 乔治), 64**
- Sassinari, M. (萨西纳里, M·), 114**
- Sassulitsch, Wera (查苏利奇, 维拉), 238, 260**
- Saville, John (萨维尔, 约翰), 65, 89, 90, 91, 93, 183**
- Schapper, Karl (沙佩尔, 卡尔), 65, 66, 68, 70, 71, 72, 73—75, 79, 82, 83, 85, 95, 136**
- Scheidemann, Philipp (谢德曼, 菲力浦), 122, 283**
- Scherzer, A. (谢尔策尔, A·), 95**
- Scheu, Andreas (肖伊, 安得列阿斯), 132, 211, 220—221**
- Scheu, Heinrich (肖伊, 亨利希), 221**
- Schiavi, Alessandro (希阿维, 亚历山德鲁), 260**
- Schiller, Friedrich von (席勒, 弗里德里希·冯), 21, 23, 65**
- Schippel, Max (席佩尔, 麦克斯), 313**
- Schlesinger, Jakob (施累津格尔, 雅各布), 240**
- Schlüter, Hermann (施留特尔, 海尔曼), 127, 134, 197, 245**
- Schmidt, Robert (施密特, 罗伯特), 302, 304**
- Schmidt-Zabierow, Ministerialrat (施密特-察比罗夫部务参议), 132, 180**
- Schorske, Carl E. (朔尔斯克, 卡尔·E·), 305**
- Schoyen, A. R. (斯科延, A·R·), 81**
- Schwab, Michael (施瓦布, 米夏埃尔), 223**

Schwarzenberg, Felix Fürst von (施瓦尔岑堡, 费里克斯·冯, 公爵),

75

Schweitzer, J. B. von (施韦策, J·B·冯), 114, 132, 136, 142, 147

Sembat, Marcel (桑巴, 马塞尔), 259, 356

Sengier, Georges (桑吉埃, 乔治), 53

Sentinon, Gaspar (散蒂尼昂, 加斯帕尔), 150

Seraillier, Auguste (赛拉叶, 奥古斯特), 164, 165, 182, 193

Serwy, Victor (塞尔维, 维克多), 252

Setacci, C. (塞塔奇, C·), 114, 374

Seton-Watson, R. S. (塞顿-沃森, R·S·), 60

Severin, Frans (塞弗林, 弗兰斯), 237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65

Schaw, Bernard (肖伯纳), 212, 259; über Burenkrieg (论布尔战争),
311—312

Shaw, Robert (肖, 罗伯特), 373

Shearmen (希尔曼), 373

Shils, Edward A. (希尔斯, 爱德华·A·), 297

Side (塞德), 373

Siéyes, Emanuel J. (西哀士, 艾曼纽尔·J·), 40

Silberer, Edmund (西尔伯尔, 埃德蒙德), 69

Singer, Mendel (辛格尔, 门德尔), 240

Singer, Paul (辛格尔, 保尔), 260

Smillie, Robert (斯迈利, 罗伯特), 361

Soboul, Albert (佐布尔, 阿尔伯特), 42

Soltau, Roger (索尔托, 罗杰), 287

Solustri, T. (索鲁斯特里, T·), 374

Sorel, Georges (索列尔, 若尔日), 296—297

Sorge, F. A. (左尔格, F·A·), 95, 192, 197, 244, 245

Soukup, František (肖库普, 弗兰蒂舍克), 353

Soult, Marschall (苏尔特元帅), 63

Southey, Robert (骚塞, 罗伯特), 21, 36

Spies, August (施皮斯, 奥古斯特), 223

- Stainsby, William (斯坦斯比, 威廉), 373**
Stalin, J. W. (斯大林, J·W·), 242
Stambulow, Stephan N. (斯塔姆布洛夫, 斯蒂凡·N·), 242, 243
Stampa, Gaspare (斯塔姆帕, 加斯帕雷), 143
Stampfer, Friedrich (施坦普费尔, 弗里德里希), 307, 308
Stanley, H. M. (斯坦利, H·M·), 319
Stauning, Thorwald (斯陶宁格, 托尔瓦德), 280
Steck, Albert (施特克, 艾伯特), 233
Steklow, Georg (施特克洛夫, 格奥尔格), 150, 197
Stephens, Uriah Smith (斯蒂芬斯, 尤赖亚·史密斯), 246
Steward, Neil (斯图尔德, 尼尔), 63
Stewart, William (斯图亚特, 威廉), 213, 361
Stieber, Wilhelm (施蒂伯, 威廉), 73, 76
Stokes, J. (斯托克斯, J·), 361
Swietoslaski, Zeno (斯维托斯拉斯基, 策诺), 95
Sylvis, William H. (西耳维斯, 威廉·H·), 133, 245
Syrkin, Nachman (聚尔金, 纳赫曼), 240
- Taaffe, Graf Eduard (塔菲, 爱德华, 伯爵), 255**
Talandier, Alfred (塔朗迪埃, 阿尔弗勒德), 92, 93, 95, 374
Tanari, Sebastino (塔纳里, 塞巴斯蒂诺), 143
Tarlé, E. W. (塔尔莱, E·W·), 47
Täschler, Pfarrer (特施勒牧师), 350
Taylor, John Robert (泰勒, 约翰·罗伯特), 373
Tchitchovsky, T. (齐佐夫斯基, T·), 243
Testut, Oscar (特斯屠, 奥斯卡尔), 121, 122
Theisz, Albert (泰斯, 阿尔伯), 165
**Thiers, Adolphe (梯也尔, 阿道夫), 61, 160, 161, 166, 167, 168,
 172, 174, 180**
Thompson, Eric (汤普森, 埃里克), 23, 40
Thorne, Will (梭恩, 威尔), 361

- Thrane, Marcus (特拉内, 马尔库斯), 234—235
- Thun, Graf (图恩伯爵), 59
- Tillet, Ben (提列特, 本), 211, 214, 259
- Tirpitz, Admiral (蒂尔皮茨海军上将), 221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阿列克西斯), 62, 63, 64, 71
- Tolain, Henri Louis (托伦, 昂利·路易), 104—105, 107, 136, 142,
146, 147, 150, 153, 160, 328
- Tortelier, Joseph (托尔泰利埃, 约瑟夫), 261
- Townshend (唐森), 183
- Treitschke, H. von (特赖奇克, H·冯), 21
- Tremlett, W. (特雷姆利特, W·), 373
- Trepow, General Fjodor (特烈波夫, 费多罗维奇, 将军), 238
- Treves, Claudio (特雷维斯, 克劳狄奥), 323
- Troelstra, Pieter Jelles (特鲁尔斯特拉, 彼得·耶莱斯), 234, 260,
300, 353
- Trotha, General (特罗塔将军), 318
- Trotzki, Leo (托洛茨基, 列甫), 304
- Tucci, Alberto (图奇, 阿尔贝托), 179
- Turati, Filippo (屠拉梯, 菲力浦), 230, 273, 279, 280, 332, 333
-
- Uebersberger, Hans (于贝尔斯伯格, 汉斯), 354
- Ursin, N. R. af (乌尔辛, N·R·), 309
-
- Vaillant, Edouard (瓦扬, 爱德华), 64, 192, 193, 194, 206, 207,
224, 254, 264, 280, 290, 331—332, 353, 361
- Valiani, Leo (瓦利亚尼, 莱奥), 14, 204, 225
- Vandervelde, Emile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 219, 252, 260, 290,
298, 342, 358, 360; über: Adler (论阿德勒), 224; Reformismus
(改良主义), 278—279; Regierungsbeteiligung (参加政府), 284;
Kongo (刚果), 321

- Varlin, Eugène (瓦尔兰, 欧仁), 136, 142, 153, 165, 206
-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万哈根·冯·恩塞, 卡尔·奥古斯特), 76—77
- Vasbenter (瓦斯邦太), 373
- Vellay, C. (韦莱, C·), 336
- Verrycken (韦里康), 199
- Victor Napoleon (维克多·拿破仑), 104
- Victoria, Königin (维多利亚女王), 90, 94
- Villetard, Edmond (维尔塔尔, 埃德蒙), 121
- Viviani, René (维维安尼, 勒奈), 259, 265, 355, 360
- Vliegen, Willem Hubert (弗利根, 威廉·许伯特), 209, 234, 260, 302, 304
- Voegt, Hedwig (弗格特, 黑德维希), 26
- Voinea, Serban (沃伊内阿, 瑟尔班), 242
- Volders, Jean (沃耳德斯, 让), 208, 219
-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冯), 207, 208, 268, 283
- Voltaire, F. M. (伏尔泰, F·M·), 40
- Waldeck-Rousseau, Pierre M. R. (瓦尔德克-卢骚, 比埃尔·M·R·), 263—264, 284, 285, 287
- Wallace, Graham (华莱士, 格莱安), 36
-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乔治), 30
- Webb, Beatrice (维伯, 比阿特里萨), 259, 312
- Webb, Sydney (维伯, 悉尼), 212, 259, 312
- Webster, C. K. (韦伯斯特, C·K·), 60
- Weitling, Wilhelm (魏特林, 威廉), 65, 66, 67, 74, 81, 95, 233
- Wellington, Herzog von (威灵顿公爵), 60, 86
- Wells, H. G. (威尔斯, H·G·), 212
- Wermuth, Polizeidirektor (维尔穆特警察局长), 73
- Werner, W. (威纳尔, W·), 259

- Weston, John** (韦斯顿, 约翰), 117, 182, 183, 373
Westphalen, Edgar von (威斯特华伦, 埃德加尔·冯), 70, 74
Weydemeyer, Joseph (魏德迈, 约瑟夫), 70, 74, 244
Wheeler, George William (威勒尔, 乔治·威廉), 108, 116, 117, 118, 373
Whitlock E. (惠特洛克, E·), 117, 373
Wieland, Ch. D. (维兰, Ch·D·), 21
Wiik, Karl H. (维克, 卡尔·H·), 309
Wilhelm I. (威廉一世), 275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255, 257, 274—275, 282—283, 319, 322, 355, 358, 359; über: Maidemonstrationen (论五一节示威游行), 255; Gottesgnadentum (君权神授), 275
Willich, August (维利希, 奥古斯特), 73—75, 77
Wirz, J. Paul (维尔茨, J·保罗), 295
Wittke, Carl (威特基, 卡尔), 67
Wolf (沃尔弗), 374
Wolf, Luigi (沃尔弗, 鲁伊治), 108, 114, 117, 136, 374
Wolff, Wilhelm (沃尔弗, 威廉), 69, 70, 71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 威廉), 21, 36
Worley, William (沃尔利, 威廉), 117, 373
Worzell, Stanislas (沃尔策耳, 斯塔尼斯拉夫), 92
Wright, James L. (赖特, 詹姆斯·L·), 246
Wurm, Mathilde (武尔姆, 马蒂尔德), 324

Zahle, Theodor (萨勒, 特奥多尔), 280
Zechlin, Egmont (策希林, 埃格蒙特), 257
Zetkin, Klara (蔡特金, 克拉拉), 207, 353
Zévaès, Alexandre (泽瓦埃斯, 亚历山大), 215, 266, 357
Zirnheld, Jules (齐恩黑尔德, 朱尔), 156

内 容 索 引

(索引中的页码系指正文页旁所注原书页码)

- Absolutismus** (专制政治), 37, 55, 56, 58
- Achtzehnter Brumaire** (雾月十八日), 45
- Adresse des Generalrats, Erste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156—157; **Zweite** (第二篇宣言), 158—159
- Agrarfrage, sozialistische** (社会主义农业问题), 144, 147, 149—150
- Agrarkommunismus** (农业共产主义), 47—48
-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1647)(1647年《人民公约》), 40—41
- Allemanisten** (阿列曼派), 217, 266
- Allgemeiner Jüdischer Arbeiter-Bund** (犹太工人总同盟), 239
- Allobrogen, Legion der** (阿洛布罗根军团), 25
- Allobrogen, Nationalversammlung der** (阿洛布罗根人国民议会), 26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工联合会), 208, 247, 254
- Amerikanischer Bürgerkrieg** (美国内战), 102, 310—311
- Amiens, Charter von** (亚眠宪章), 295
- Amsterdamer Resolution üb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阿姆斯特丹关于参加政府的决议), 290; **über Generalstreik** (关于总罢工的决议), 301—302
- Anarchismus** (无政府主义), 135, 152, 184—185; **in Amerika** (在美国), 127, 133—134, 245; **in Belgien** (在比利时), 218; **in Holland** (在荷兰), 234; **in Italien** (在意大利), 125—126, 225—229; **in Österreich** (在奥地利), 125, 132—133, 223—224; **in der Schweiz** (在瑞士), 187—188, 190; **in Spanien** (在西班牙), 126
- Anarchisten** (无政府主义者), 191, 196, 197; **Ausschluß aus der Internationale** (被开除出国际), 258—262
- Anarch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ongresse; Paris (1889)**(无政府主义

- 国际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 199; Chikago (1893)(1893 年芝加哥代表大会), 199; Zürich (1896) (1896 年苏黎世代表大会), 199; Amsterdam (1907)(1907 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9
- 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73
- Anti-Autoritäre Internationale: Kongresse Saint-Imier* (1872)(反权威国际 1872 年圣伊米尔代表大会), 197, 226; Brüssel (1874)(1874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98; Bern (1876) (1876 年伯尔尼代表大会), 198; Verviers (1877) (1877 年韦尔维埃代表大会), 198, 228; Gent (1877)(1877 年根特代表大会), 198, 228
- Antimilitarismus* (反军国主义), 334—335, 339—340
- Antipatriotismus* (反爱国主义), 335—339
- Arbeiderbladet* (Oslo) (奥斯陆《工人报》), 235
- Arbeiterchronik* (Budapest) (布达佩斯《工人纪事报》), 241
- Arbeiterpartei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美国工人党), 244
- Arbeiterzeitung* (Chikago) (芝加哥《工人报》), 244
- Arbeiter-Zeitung* (Wien) (维也纳《工人报》), 224, 255, 286, 313, 335
-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 67, 215, 231, 309
- Argentinien, Sozialistische Partei* (阿根廷社会党), 243
-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民主协会), 83
- Avanti!* (《前进报》), 323
- Avenir*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未来》), 243
- Babeufs Ideen* (巴贝夫思想), 47—48, 50—52, 53; *Verschwörung* (密谋), 47—50
- Bakunismus* (巴枯宁主义), 151—152, 184, 292
- Bakunisten* (巴枯宁派), 135, 187—188, 190—191, 225, 226, 267
- Balkankrieg* (巴尔干战争), 348—349
- Baseler Manifest* (巴塞尔宣言), 352—353

- Batavische Legion** (巴塔维亚军团), 25
- Bauernaufstände in Sachsen 1790, in Schlesien 1792 und 1793**
(1790年萨克森农民起义, 1792和1793年西里西亚农民起义), 26
- Beehive** (蜂房), 107
- Befreiung der Arbeit** (“劳动解放社”), 238
- Belgische Sozialdemokratie über die Kongofrage** (比利时社会民主党论刚果问题), 321
- Berliner Freie Presse** (柏林自由新闻), 222
- Berliner Vertrag** (1833) (1833年柏林条约), 59; (1885) (1885年柏林条约), 320—321
- Bessarabia** (Bukarest) (布加勒斯特(比萨纳比亚)), 241—242
- Blanquismus** (布朗基主义), 64
- Blanquisten** (布朗基派), 135, 196, 197, 265—266
- Bologna, Aufstand in** (波伦亚起义), 227
- Bosnien, Annexion von** (吞并波斯尼亚), 348—349
- Boxeraufstand** (义和团起义), 334
- Braunschweiger Ausschuß, Manifest des** (不伦瑞克委员会宣言), 157—158, 330
- 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Amsterdamer Resolution über** (阿姆斯特丹关于英帝国主义的决议), 316—317
- Broussisten** (布鲁斯派), 266, 280
- Buenos Aires, Kongreß von** (1896) (189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大会), 243
- Bulgarien, Partei der >Weitherzigen<** (保加利亚“宽广派”党), 242—243; **der >Engherzigen<** (“紧密派”党), 242—243
- >Bund** (同盟), 239; **siehe Allgemeiner Jüdischer Arbeiter-Bund** (见犹太工人总同盟)
- Bund der Geächteten** (流亡者同盟), 63
- Bund der Gerechten** (正义者同盟), 53, 63, 65, 66, 67, 96
- Bunder der Kommunisten** (共产主义者同盟), 53, 62页起一连几页, 72, 96, 186; **Kongreß des** (代表大会), 69—70; **Spaltung des** (分裂), 74—75, 110

- Bundesakte, deutsche (1815)(1815年德意志联邦议定书), 56
- Burenkrieg (布尔战争), 311—312
- Cadiz, Parlament in, (1812)(1812年加迪斯议会), 55
- Cambrai, Proklamation von (康布雷宣言), 55
- Candide* (《老实》周刊), 113
- Chalon, Zusammenstöße in (夏龙冲突), 266
- Charleroi, Bergarbeiterstreik in, (1886)(1886年沙勒罗瓦矿工罢工),
131, 218
- Charter, The (宪章), 86
- Chartistenbewegung (宪章运动), 31, 66, 78—81, 85—87, 94, 102,
189, 291—292
- Charisten-Konvent (1848)(1848年宪章派全国会议), 86—87
- Chartistenpetition (宪章派请愿), 291—292
- Chauvinismus (沙文主义), 315, 333
- Chikago, Tragödie von (芝加哥悲剧), 222—223, 245
- China, Aufteilung (瓜分中国), 334
- Chur, Kongreß von, (1881)(1881年库尔代表大会), 200, 206
- Charion, The* (《号角报》), 312
- Clarke Papers, The* (《克拉克文件》), 41
- Clemenceau, Ministerium (克列孟梭内阁), 298
-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54, 216
- Combes, Ministerium (孔勃内阁), 284—286
-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 (革命中央委员会), 206
- Commonweal* (《公益》周刊), 212
- Commune révolutionnaire* (革命公社), 93, 94
-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 de España* (西班牙劳动联盟),
231
-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 (C. G. T.)* (劳动总同盟), 295—
296
- Correspondent Piccard, Le* (《毕卡底通讯员》), 46

Corresponding Society (通讯会), 31, 32页起一连几页, 78—79, 96
Courrier de la Gironde (《吉伦特信使报》), 168
Courrier de Lyon (《里昂信使报》), 168
Courrier Francais (Paris) (巴黎《法兰西信使报》), 142, 146
Critica Sociale, La (《社会评论》), 230

Dělnické Listy (Prag) (布拉格《工人报》), 180

Democratic Federation (民主联盟), 210

Democratic Friends of all Nations (各国民主之友协会), 68, 79,
80, 81

Demokratie, Theorie der (民主学说), 40, 41

Demokratisches Komitee für die Regeneration Polens (复兴波兰民主委员会), 83

Deutsch-englische Gegensätze (德英对立), 343, 345—346, 348,
353, 354—355

Deutsch-französischer Krieg (普法战争), 154页起一连几页; *Halt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155, 157—158, 329—330; *Haltung der französischen Sozialisten* (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态度), 154, 159—160, 330—331

Deutsch-Südwestafrika, Aufstand in (德属西南非洲起义), 318—319

Deutsche Legion (德意志军团), 25, 72

Deutsch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65, 70

Deutschland, Kriegserklärung an Rußland (德国向俄国宣战), 361

Devoir, La (Lüttich) (列日《义务报》), 180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无产阶级专政), 52, 64

Dreibund (三国同盟), 341

Dreiklassenwahlrecht, preußisches (普鲁士三级选举制), 275, 306

Dreyfußkrise (德雷福斯危机), 264, 285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经济学和公法研究》), 297

- Egalité (Genf)** (日内瓦《平等报》), 188, 189
- Egalité (Paris)** (巴黎《平等报》), 215
- Eisenacher Programm** (爱森纳赫纲领), 132
- Emancipation, La (Madrid)** (马德里《解放报》), 231
- Engherzigen, Partei der** (“紧密派”党), 243
- Englische Föderation** (英国联合会), 188
- Englische Wahlreform (1867)**(1867年英国选举法改革), 189
- Englischer Bauarbeiterstreik (1859—1860)**(1859至1860年英国建筑工人罢工), 105—106
- Enzyklika Quod Apostolici Muneris** (《教皇职权所在》通谕), 188
- Equalità (Neapel)** (那不勒斯《平等》周报), 188
- Erbrecht** (继承权), 150
- Erfurter Programm** (爱尔福特纲领), 254, 267, 274
- Erste Internationale-Konferenzen** (第一国际代表会议): London (1865) (1865年伦敦), 136; London (1871) (1871年伦敦), 134, 175, 188; Kongresse (代表大会): Genf (1866)(1866年日内瓦), 135, 137页起一连几页; Lausanne (1867) (1867年洛桑), 143; Brüssel (1868) (1868年布鲁塞尔), 146, 292, 327—329; Basel (1869)(1869年巴塞尔), 122, 125, 126, 127, 133, 149, 181, 186, 187, 245; Haag (1872) (1872年海牙), 123, 190, 191, 192—194, 226, 234; Genf (1873)(1873年日内瓦), 197; Philadelphia (1876) (1876年费城), 197, 244
-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212, 259, 273, 311—312
- Fall Millerand, Der** (“米勒兰事件”), 265—266, 278, 284—285
- Faschodakrise** (法绍达危机), 334
- Fascio Operaio, II** (工人联合会), 126, 226
- Fascio Operaio, II (Bologna)** (波伦亚工人联合会), 188
- Februarrevolution, Französische** (法国二月革命), 59, 71—72, 74
- Federación Obrero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阿根廷共和国工人联合会), 243
- Fédération du Parti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 (社会工人党联盟), 206, 215; Kongresse (代表大会): Marseille (1879)(1879年马赛),

- 215, 295; Paris (1880)(1880年巴黎), 215; Le Havre (1881)(1881年哈佛尔), 215
-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Bourses de Travail* (劳动介绍所全国委员会), 295
-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Ouvrier de France* (法国工团全国联合会), 206, 216, 217, 294; Kongresse (代表大会): Marseille (1892)(1892年马赛), 294, 297; Paris (1893)(1893年巴黎), 294; Nantes (1894)(1894年南特), 294, 295, 297; Limoges (1895)(1895年里摩日), 294; Amiens (1906)(1906年亚眠), 295
- Figaro* (《费加罗报》), 168
- Fortnightly Review* (《双周评论》), 142
- Fourieristen (傅立叶主义者), 135, 233
-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1789) (1789年法国大革命), 19, 22, 37, 71, 73, 96; Dekret über: Schutz des Eigentums (保护财产法令), 41, 43, 44; Aufhebung des Koalitionsrechtes (取消结社权法令), 41; Solidarität mit unterdrückten Nationen (同被压迫民族团结法令), 23, 25; (1830)(1830年), 62—63; (1848)(1848年), 71
- Fraternal Democrats* (民主派兄弟协会), 31, 80—85, 88, 89, 93, 95, 96—97, 106, 111
- Frauenarbeit, Marx über (马克思论妇女劳动), 139
- Freier Arbeiter* (《自由工人》), 294
- Freiheit, Die* (Graz) (格拉茨《自由》), 180
- Freiheit, Die* (London) (伦敦《自由》), 222
- Friedensliga* (和平同盟), 145—146, 150, 186
- Friends of the People* (人民之友协会), 34
- Frühsozialismus, deutscher (德国早期社会主义), 67
-
- Gasteiner Konferenz (1871)(1871年加施坦代表会议), 170
- Gazette de France* (《法兰西报》), 146
- Gemeineigentum (公有制), 143—144, 149—150
- Generalstreik, Brüsseler Kongreß über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论总罢工),

- 292; deutsche Gewerkschaften über (德国工会论总罢工), 305;
 französische Gewerkschaften über (法国工会论总罢工), 217, 294—
 297; in Belgien (1892)(1892年在比利时), 218—219, (1893)(1893.
 年) 219, 298; (1902)(1902年), 219, 298—299; in England (1842)
 (1842年在英国), 291; in Finnland (1905)(1905年在芬兰), 309; in
 Holland (1903)(1903年在荷兰), 300; in Italien (1904)(1904年在
 意大利), 302—304; (1911)(1911年), 309, 321—322; in Österreich
 (1905)(1905年在奥地利), 309; in Schweden(1902)(1902年在瑞典),
 299—300, 309
- Genfer, Legion der (日内瓦军团), 25
- Genossenschaftswesen (合作制), 118, 138, 145, 147—148
- Gener Weltkongreß (1877) (1877年根特世界代表大会), 198—199,
 206, 241
- Gesellschaft der Jahreszeiten (四季社), 63, 96
- Gesellschaftsvertrag (社会契约), 37, 39
-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ternationale (国际工会运动), 307
- Gironde, Sturz der (吉伦特派被推翻), 43
- Girondisten (吉伦特派), 43, 52
- Gleichheit (Wien) (维也纳平等周报), 224
- Gleichheit, Die(Wiener Neustadt) (维也纳新城平等报), 180
- Gothaer Programm (哥达纲领), 267
- Gottesgnadentum, Theorie des (君权神授论), 20, 28, 29; Wilhelm.
 II. über (威廉二世的君权神授论), 275, 282
- Göttliches Recht, Theorie des (神权论), 20, 37—39
- Grütliverein (格留特利联盟), 233
- Guesdisten (盖得派), 207, 265—266; üb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论
 参加政府), 278, 282, 284; über Generalstreik (论总罢工), 295,
 297—298, 302. 339—340, 357
- Haager Friedenskonferenz (海牙和平代表会议), 341, 345
- Habeaskorpusakte (人身保护法), 19, 35

- Hainfelder Programm (加因斐纲领), 225, 241
- Hannover-Parteitag (1899)(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 266, 269, 274, 278
-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哈佛历史研究》), 305
- Heere, stehende (常备军), 331, 334, 339
- Heilige Allianz (神圣同盟), 56页起一连几页, 62, 137
- Heimin (Tokio) (东京《平民新闻》), 248, 250
- Hereros, Aufstand der (赫勒洛人起义), 318—319
- Herzegowina, Annexion der (并吞黑塞哥维那), 349
- Hessische Landeszeitung (《黑森邦报》), 276
- Het Volk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大众报》), 300
- Hochverratsprozeß, Wiener (维也纳叛国案), 121, 125, 132
- Hottentottenwahlen (霍屯督选举), 319
- Humanité (《人道报》), 286, 337
-
- Inauguraladresse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117—119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 L. P.)(独立工党——I. L. P.), 213, 214, 259, 346; über den Burenkrieg (关于布尔战争), 311—312
- Insurrektion, Methode der (武装暴动的方法), 47, 52, 64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国际协会), 92, 94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社会史国际评论》), 65, 92, 95, 96
- Internationale Allianz der sozialistischen Demokratie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186, 187, 194
- Internationale Brüderschaft (国际兄弟会), 186
- Internationale, Kongresse, siehe Erste Internationale und Zweite Internationale (国际代表大会, 见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 Internationale, Sitzverlegung (国际总委员会会址的迁移), 193—194, 196
- 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des arbeitenden Volkes (劳动人民国际联合会), 245

Internationale, Verfolgung der, in (对国际进行的迫害, 在): Frankreich (法国), 121, 167—169, 178; Deutschland (德国), 132, 169—172; Österreich (奥地利), 121—122, 132, 169—172; Spanien (西班牙), 172—173

Internationales Komitee (国际委员会), 92, 94

Internationales Sozialistisches Bureau, Konstituierung des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成立), 252

Irische Frage, Die Internationale über (国际论爱尔兰问题), 176—178

Iskra (《火星报》), 238

Italienische Arbeiterassoziation (意大利工人协会), 125

Italienische Föderation (意大利联合会), 190—191, 194

Jakobiner (雅各宾派), 43, 45, 46, 52, 81; Sturz (被推翻), 45

Japan, Sozialistische Partei (日本社会党), 247—250

Jemappe, Schlacht bei (热马普战役), 26

Journal de Geneve (《日内瓦报》), 142

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es Travailleurs (Genf)(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报》), 142

Journal des Hommes Libres (《自由人报》), 51

Juli-Revolution (1830) (1830年七月革命), 59, 61, 62页起一连几页, 71, 74

Jurassische Föderation (汝拉联合会), 190

Justice (《正义报》), 211

Kampf, Der (《战斗》), 75, 221, 223, 224, 360

Kapital, Das (《资本论》), 142, 149, 195, 210, 212, 240

Kapitalismus und Krieg (资本主义和战争), 327, 331—332, 339, 340, 341—342

Karbonari, Die (烧炭党), 56, 64

Karlsbader Beschlüsse (1819)(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 56, 60
Katastrophentheorie (灾难学说), 270—271, 276—277
Katholische Kirche, Bannfluch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天主教教会诅咒国际), 172; **Kampf gegen französische Republik(反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 264, 285—286
Kiautschou-Bucht (胶州湾), 311, 334
Kinderarbeit, Marx über (马克思论儿童劳动), 139
Klerikalismus, in Frankreich (法国教权主义), 264, 285—286
Klub des Pantheon (百神庙俱乐部), 46, 47
Kölnische Zeitung (《科伦日报》), 168
Kolokol (《钟声》), 237
Kolonialfrage (殖民地问题): auf Kongreß (1900)(在1900年代表大会上), 311—316; **Stuttgart (1907)**(1907年斯图加特), 324—326
Kommunistenprozeß, Köln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75—77
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 (《共产主义杂志》), 70
Kommunistisch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65
Kommunistisches Korrespondenzkomitee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68
Kommunistisches Manifest (《共产党宣言》), 53, 70—71, 116, 270, 336
Kongofrage (刚果问题), 319—321
Konterrevolutionäre Intervention in (反革命干涉): Ungarn (匈牙利), 59; **Spanien (西班牙)**, 59; **Neapel (那不勒斯)**, 56
Kriegsfrage (战争问题): auf Kongreß Brüssel (1868)(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 327—329; **Paris (1889)**(1889年巴黎), 330; **Brüssel (1891)**, (1891年布鲁塞尔), 332; **Zürich (1893)**(1893年苏黎世), 332; **London (1896)**(1896年伦敦), 333—334; **Stuttgart (1907)**(1907年斯图加特), 340—342, 343—344, 345, 370—372; **Kopenhagen (1910)**(1910年哥本哈根), 344—345
Krimkrieg (克里木战争), 91

Labour Elector, The (《工人选民》), 213

- Labour Party* (工党), 346
- Labour World, The* (Tokio) (东京《工人世界》), 249
- Laibacher Konferenz* (1821)(1821年莱巴赫会议), 58
- Land-and Labour League* (土地和劳动同盟), 181
- Landesverteidigung, Recht auf* (保卫国防的权利), 155, 156, 159, 160, 329—330, 331, 333, 336, 340, 345, 346, 331
- Lands-Organisation* (L. O.)(全国组织——L. O.), 299
- La Patrie en Danger* (Paris)(巴黎《祖国在危急中》), 331
- L'Eclair du Peuple* (《人民闪电报》), 48
- Lega Socialisti Milanesi* (米兰社会主义同盟), 230, 279
- Legitimität, Prinzip der* (正统原则), 55, 62
- L'Homme* (《人. 世界民主主义报》), 93, 94
- Liberté* (Brüssel)(布鲁塞尔《自由》), 180
- Liberté, La* (《自由报》), 168
- Liberté Siecle* (日拉丹办的《自由》), 146
- Link, The* (《链环》), 213
- L'Internationale* (Brüssel)(布鲁塞尔《国际报》), 122, 180
- Loi Falloux* (《法卢法令》), 285
- London Democratic Association* (伦敦民主协会), 81
- 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伦敦工人协会), 79
- Londoner Gewerkschaftsrat* (工联伦敦理事会), 104, 106
- Londoner Hafenarbeiterstreik* (1889) (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 213—214
- Lumea Nova* (Bukarest) (布加勒斯特《新世界报》), 241
- Lütticher, Legion der* (列日军团), 25
- Lyon, Aufstand der Weber* (1831)(1831年里昂织工起义), 63
-
- Magyaroszági Szociáldemokrate Párt*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240; *Budapest Kongreß* (1890)(1890年布达佩斯代表大会), 240
- Mailänder Aufstand* (1898)(1898年米兰起义), 303
- Manchester, Arbeiterparlament in* (曼彻斯特工人议会), 91

-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卫报》), 193, 361
- Marokkokrise (摩洛哥危机), 343
- Marx-Engels-Archiv*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101, 106, 111
- Marxismus (马克思主义), 69, 120, 203; in: Deutschland (在德国), 267, 272, 277—278; Frankreich (在法国), 215; England (在英国), 214; Rußland (在俄国), 237—238
- Marxisten (马克思主义者), 135
- Maschinenbauerstreik, Newcastle (1871)(1871年纽卡斯尔机器制造业工人罢工), 181—182
- Maximum des Besitzes, Theorie des (限制财产占有最大量论), 42, 43
- Mehrwertstheorie (剩余价值学说), 272—273
- Menschenrechte, Erklärung der (人权宣言), 20, 28, 40, 41
- Militarismus, Kampf gegen (反军国主义斗争), 315, 316, 331, 332, 333, 334, 339, 340, 341, 343
- Miner, The* (《矿工》), 212
- Mirabeau, Le* (Vervier)(韦尔维埃《米拉波报》), 180
- Moniteur* (《通报》), 112
- Morning Chronicle, The* (《晨报》), 86
- Munizipal-Sozialismus (市政社会主义), 164, 216
- Mutualismus (互助论), 113
- Narodniki (民粹派), 237
- Nation, über die (论民族): Hervé (爱尔威), 335; Marx (马克思), 335—336; Bauer (鲍威尔), 336; Jaurès (饶勒斯), 337—339
- National Labour Union (全国劳工同盟), 122, 133, 150, 245
- Naturrecht, Theorie des (天赋人权论), 20, 29, 30, 39
- Neue Freie Presse* (Wien) (维也纳《新自由报》), 178, 256
-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莱茵报》), 72, 73
- Neue Zeit, Die* (《新时代》), 79, 145, 191, 270, 272, 274, 277, 302, 360, 361

- Neuenburger, Legion der (纳沙特尔军团), 25
-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纽约人民报》), 244—245
- 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ur, The (劳动骑士团), 245—247
- Nordamerikanische Föderation (北美联合会), 127, 197, 243
-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北德总汇报》), 170, 174
- Norske Arbeiderpartei, Det (挪威工人党), 235
- Northern Star, The (《北极星报》), 31, 65, 79, 81, 82, 90
- Obero, *El* (《工人报》), 142
- Österreich, Ultimatum an Serbien (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 355—356, 357
- Österreichisch-französischer Krieg (奥法战争), 96
- Pariser Kommune (巴黎公社), 125, 126, 215, 229, 240, 304;
Zirkularnote über (各国政府的照会): französische (法国), 169—170; deutsche (德国), 169—170; spanische (西班牙), 172—173
- Parti Ouvrier Français (法国工人党), 206, 216, 217
- 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evolutionnaire (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 216—217
- Parti Socialiste Belge (比利时社会党), 218—219
-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 (法国社会党), 266; Kongresse (代表大会): Ivry (1900)(1900年伊夫里), 278; Lille (1903)(1903年里尔), 282
-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e (法兰西社会党), 266
- 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社会革命党), 217
- Parti Socialiste,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er (S. F. I. O.)(社会党,国际工人法国支部——S·F·I·O·), 290; Kongresse (代表大会): Limoges (1906)(1906年里摩日), 339—340; Nancy (1907)(1907年南锡), 340; Paris (1914)(1914年巴黎), 356—357

- Partido Socialista Argentino* (阿根廷社会党), 243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nol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232
Partio dei Lavaratori Italiano (意大利劳动党), 230
Partio Operaio (意大利工人党), 229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意大利社会党), 230; Kongreß (代表大会): Reggio Emilia (1912)(1912年勒佐-艾米利亚), 323
People's Paper, The (《人民报》), 90, 91, 94
Philadelphia Tagblatt (《费城日报》), 244
Plebe, La (《人民报》), 227
Poale Zion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 240
Polnische Frage, Die (波兰问题), 137; *Selbstbestimmungsrecht* (自决权), 337; *Aufstand* (起义), 103, 107
Polnische Revolutionäre Gesellschaft (波兰革命者协会), 96
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P. P. S.) (波兰社会主义党——P. P. S.), 238—239
Poor Man's Guardian, The (《穷人卫报》), 79, 80
Possibilisten (可能派), 206
Preußisch-österreichischer Krieg, Generalrat über (总委员会论普奥战争), 327—328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普鲁士年鉴》), 257
Progrès (Le Locle) (勒-洛克尔《进步报》), 188
Prolétaire, Le (《无产者报》), 216
Proudhonismus (蒲鲁东主义), 113, 114, 138, 144, 152
Proudhonisten (蒲鲁东派), 135, 136, 153
Prezedsnit (《黎明》), 238
Putney Debatte (1647)(1647年帕特尼辩论), 40

Radikal-Sozialisten (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286
Recht voor Allen (《人人权利报》), 234
Reform League (改革同盟), 141, 145
Reformismus (改良主义), 268, 373—374; *in Italien* (在意大利),

279, 321—322; **Pariser Resolution (1900) über (1900年关于改良主义的巴黎决议)**, 279; **Amsterdamer Kongreß (1904), Debatte über (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辩论)**, 282, 284, 286—290
Reformistische Sozialisten, Partei der (改良派社会党人党), 323
Reichsverfassung, deutsche (德意志帝国宪法), 274—275
Revisionsmus (修正主义), 270—272; **Dresdener Resolution über (德累斯顿关于修正主义的决议)**, 283, 284, 286
Revolution (革命): englische (1688)(1688年英国), 19; **französische (1789) (1789年法国)**, 19 页起一连几页, 37; **europäische (1848) (1848年欧洲)**, 59, 96; **in: Deutschland (1848)(1848年德国)**, 59, 74; **Neapel (1820)(1820年那不勒斯)**, 56; **Österreich (1848)(1848年奥地利)**, 59; **Piemont (1821)(1821年皮蒙特)**, 56—58; **Rußland (1905)(1905年俄国)**, 304; **Spanien (1868)(1868年西班牙)**, 230—231; **Ungarn (1848 bis 1849)(1848至1849年匈牙利)**, 59
Révolution Sociale, La (Paris) (巴黎«社会革命报»), 199
Revolutionär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革命社会工人党), 245
Revue (Schweiz) (瑞士«评论»), 178
Revue Contemporaine («现代评论»), 142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两大陆评论»), 142
Rheinsche Zeitung («莱茵报»), 69
Rieti, Schlacht von (里蒂战役), 56
Rimini, Kongreß (里米尼代表大会), 190
Risorgimento (意大利复兴运动), 225
Robotnik («劳动报»), 239
Rodo Kunaii Kiseikai (工会建会联合会), 249
Roma del Popolo, La («人民罗马»), 179
Romanische Föderation (罗曼语区联合会), 188, 189, 194
Rumänische Sozialdemokratie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241—242
Russisch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俄国社会民主党), 237—238,

- »Saint Mandé Programm« (《圣芒德纲领》), 264
 San Lupo, Verschwörung von (圣卢波密谋), 228
 Sarajewo, Attentat in (萨拉热窝行刺), 354, 355
 Savoyarden, Legion der (萨瓦军团), 25
 Schiedsgerichte, internationale (国际仲裁法庭), 346
 Schweizer Arbeiterbund (瑞士工人联合会), 233
 Sekretariat der Internationale (国际书记处), 251—252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ationen (民族自决权), 311
 Serbien, Österreichs Kampf gegen (奥地利的反塞尔维亚斗争), 348—
 349, 354
Shakai Shugi Kyokai (社会主义宣传联合会), 249, 250
 Shogunat (幕府), 249
Sociaaldemokratisch Arbeid Partij (S. D. A. P.)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
 —S. D. A. P.), 300
Sociaaldemokratisch Partij in Nederland (S. D. P.) (尼德兰社会民
 主党—S. D. P.), 300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社会民主联盟), 207, 208, 210—212,
 221, 259; über den Burenkrieg (论布尔战争), 311—312
Social-Demokraten (Kopenhagen)(哥本哈根《社会民主党人报》), 180,
 235, 336
Social-Demokraten (Oslo)(奥斯陆《社会民主党人报》), 235
Social-Demokraten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 236,
 255, 281
Socialdemokratisk Forbund i Danmark (丹麦社会民主党), 236
Socialist League (社会主义同盟), 207, 208, 212, 221
Socialista, El (Madrid)(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 232
Socialistiske Blade (Kopenhagen)(哥本哈根《社会主义之页》), 235
Solidarité (Neuchâtel)(纳沙特尔《团结报》), 188
 Souveränität des Volkes, Theorie der (民权论), 39, 40, 55, 62
 Souvillier, Kongreß von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 190
Sozial-Demokrat, Der (Berlin) (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 114, 136,

- Sozialdemokrat, Der* (Zürich) (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 185, 268, 269, 270
-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von Nordamerika (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 243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r rumänischen Arbeiter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 241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r Schweiz (瑞士社会民主党), 233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r Königtums Polen und Litauen (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 239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德国社会民主党), 209; Parteitage (党代表大会): Eisenach (1869)(1869年爱森纳赫), 125, 132, 179; Gotha (1875) (1875年哥达), 209, 267; Erfurt (1891) (1891年爱尔福特), 333; Hannover (1899)(1899年汉诺威), 272—286; Mainz (1900)(1900年美因兹), 313; Dresden (1903)(1903年德累斯顿), 267, 282—284; Bremen (1904) (1904年不来梅), 304; Jena (1905)(1905年耶拿), 305; Mannheim (1906)(1906年曼海姆), 305; Magdeburg (1910)(1910年马格德堡), 305; Jean (1911) (1911年耶拿), 343; Jean (1913)(1913年耶拿), 305, 308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220—221, 223—225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Rumäniens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242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Russisch-Polens (俄罗斯—波兰社会民主党), 239
-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Ungarns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240
- Sozialistengesetz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209, 257, 267, 268, 276
-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社会主义月刊》), 299
- Sozialistische Partei von Nordamerika (北美社会党), 244, 246
- Sozialistische Parteien, Stärke der(1914)(1914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实力), 358
- Sozialrevolutionäre, russische (俄国社会革命党人), 237
- Spanische Föderation (西班牙联合会), 194, 231
- Sprawa, Robotnicza* (《工人事业报》), 239

- Staatskapitalismus (国家资本主义), 138
- Staats-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organische (有机国家和社会理论),
29, 30
- Standaard, De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人民旗帜》), 180
- Star, The (London) (伦敦《星报》), 146
- 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parti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 236;
Göteborger Parteitag (1894) (1894年哥德堡党代表大会), 299
- Syndikalismus (工团主义), 198, 200, 294—297
- Syndikalisten (工团主义者), 265, 266
-
- Tagblatt (Bern) (伯尔尼《日报》), 233
- Thermidor, Neunte (热月九日), 45
- Thraniterbevegelsen (特拉内运动), 234
- Times, The (《泰晤士报》), 94, 122, 134, 146, 147, 174
- Tolpudde, Märtyrer von (托尔普德尔烈士), 246
- Trades Union Congress (工联代表大会), 206, 209
- Tribune du Peuple (Paris) (巴黎《人民论坛》), 48
- Tribune du Peuple, La (Brüssel) (布鲁塞尔《人民论坛报》), 142
- Tripolitanischer Krieg (1911) (1911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 322—323
- Troppauer Konferenz (1820) (1820年特劳波会议), 56
- Tumultpatent, kursächsisches (1791) (1791年萨克森选侯政府暴乱法), 26
-
- Un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amerikanische (美国独立宣言), 28
-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 Espana (西班牙工人总同盟),
231
- United Irishmen (爱尔兰统一党), 35
-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马克思主义旗帜》), 161

- Valmy, Schlacht bei (瓦尔米战役), 26
- Vanguardia*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锋报》), 243
- Verelendungstheorie (贫困化学说), 270—271
- Verfassung, französische (法国宪法): von 1793 (1793年), 23, 43, 47; von 1791 (1791年), 40
- Verfassungskrise, preußische (普鲁士宪法危机), 276
- Verona, Konferenz 1822(1822年维罗纳会议), 58
- Villafranca, Friede von (维拉弗兰卡和约), 102
- Voix de l'Avenir* (Ghaux de Fonds) (拉绍德封《未来呼声报》), 142
- Voix du Peuple, La* (Brüssel) (布鲁塞尔《人民呼声报》), 296
- Volksblad* (Rotterdam)(鹿特丹《人民报》), 180
- Volksstaat, Der* (《人民国家报》), 155, 159, 176, 183
- Volkswille, Der* (Wien)(维也纳《人民意志报》), 180
- Voorruit* (Brügge)(布鲁日《前进报》), 180
- Voorruit* (Gent)(根特《前进报》), 219
- Vorbote* (Chikago)(芝加哥《先驱报》), 244
- Vorbote, Der* (Genf) (日内瓦《先驱报》), 125, 142
- Vort Arbeid* (Oslo)(奥斯陆《我们的劳动》), 235
- Vorwärts* (Berlin) (柏林《前进报》), 270
- Vorwärts* (Buenos Aires)(布宜诺斯艾利斯《前进报》), 243
- Waadtländer, Legion der (沃州军团), 25
- Wahlreform, Kampf um, in (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 在): England (英国), 85—86, 141, 145, 189, 291—292; Belgien (比利时), 218—219, 220, 293, 298—299; Österreich (奥地利), 225, 305, 309; Finnland (芬兰), 309; Schweden (瑞典), 299—300
- Weitherzigen, Partei der (“宽广派”党), 243
- Werker, De* (Antwerpen)(安特卫普《工人报》), 180
- Werkman, De*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工人报》), 180
- Wiener Kongreß (1814)(1814年维也纳会议), 54页起一连几页
- Workingman's Advocate* (Chikago) (芝加哥《工人辩护士报》), 122,

Workman's Advocate, The (《工人辩护士报》), 142

Zuchthausvorlage (重刑监禁法案), 277

Zukunft, Die (Locarno)(洛迦诺《未来》), 269—270

Zusammenbruchstheorie (崩溃理论), 270—271

Zweite Internationale, Kongresse (第二国际代表大会): Paris (1889) (1889年巴黎), 200, 204—209, 241, 251, 252, 258, 292; Brüssel (1891)(1891年布鲁塞尔), 256, 258, 292; Zürich (1893)(1893年苏黎世), 251, 257, 259, 293; London (1896) (1896年伦敦), 251, 259—262, 263, 293, 311; Paris (1900) (1900年巴黎), 251, 252, 281, 297—298; Amsterdam (1904)(1904年阿姆斯特丹), 250, 282, 284, 286—290, 298, 301, 304, 315—317, 323; Stuttgart (1907) (1907年斯图加特), 340—345; Kopenhagen (1910) (1910年哥本哈根), 345—347; Basel (1912)(1912年巴塞尔), 349—354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国际史 第一卷

作者=(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著

丛书名=现代外国政治学术选译

页数=485

SS号=10240262

出版日期=1985年10月第1版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号=11188·42

中图法分类号=D1

原书定价=3.05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参考文献格式=(奥)布劳恩塔(Braunthal, J.)著;杨寿国等译.国际史 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0.

封面
版权
前言

前言

第一部分 先驱

思想的产生

国际主义者托马斯·倍恩

通讯会

平等派密谋

反革命国际

共产主义者同盟

民主派兄弟协会

国际协会

第二部分 第一国际

历史性国际的成立

第一国际的原则和章程

国际的实力——传说与事实

国际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国际

讨伐国际的十字军战役

第一国际的终结

第三部分 第二国际

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

进化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

国际关于总罢工的辩论

国际内部论殖民地问题

国际和战争

附录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斯图加特决议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表

第一国际临时总委员会
人名索引
内容索引

目录